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序

1980年5月30日晚上12时过后，喧闹了一天的东京逐渐沉寂下来。街面两旁的霓虹灯仍闪闪发亮，但街上行驶的车辆已明显稀少，白日奔波劳作的东京市民大多已进入梦乡。在忽明忽暗闪烁的灯光照耀下，只见街上一辆救护车急速飞奔。31日零时35分，救护车开到东京虎门医院嘎然停下。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位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他面呈倦容，脸色苍白，虚汗淋漓。医护人员迅速将病人送进医院六楼的心脏监视中心，在他身上安装心脏监视器，并马上点滴药物，展开急救。门外等着一群焦虑万分的病人家属和政府官员。大概因药物中加入了镇静剂，老人不久逐渐进入沉睡状态。

31日凌晨，老人逐渐苏醒过来，门外一夜未合眼的人们似乎松了一口气，这时他们周围又增添了不少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原来，这位重要的病人就是日本国民万众瞩目的政治人物——现任内阁首相大平正芳。在微弱跳动的的心脏驱动下，首相大脑中供血增加，神智更为清楚，眼前朦胧、凌乱景象也明晰起来。遥远的往事如过眼云烟，依稀可辨，流逝的岁月似电影一般，一幕幕倒映在脑海里。大平正芳短暂停顿的思绪又活跃起来，飞往那白云缭绕的赞岐山脉，飞到那带有牧歌情调般田园风光的三丰故乡……

## 前 言

大平正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政府中担任官职。1952年他竞选众议员成功，由此进入政界。以后他连续十一次当选众议员直至终身，并加入自由民主党，在自民党和内阁中先后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在自民党中，他曾任政务调查会长、干事长、总裁。在内阁中，他历任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通商产业大臣、大藏大臣直至总理大臣。在战后日本的许多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大平正芳皆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担任政府高级官职后，大平正芳曾三次访问中国，为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签订两国贸易协定、谈判两国航空协定等双边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平正芳一贯主张发展日中两国友好关系，1979年他作为总理访华时，发表了《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日中关系》的讲演。大平正芳还积极推进首脑外交，提出了著名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促进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书虽为人物传记，但却以丰富的资料勾画出了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轮廓，使读者在全面了解大平正芳70年生涯的同时，也可窥见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经济、政治和外交的大致内幕，粗知日本社会的风俗民情，了解日本人独特的奋斗精神和思维方式。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 故乡和家族

日本国由四大岛和一些小岛组成。四大岛中最小的是面积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的四国岛。四国岛北临濑户内海，南濒太平洋，除沿海地区有狭小平原外，四国岛大部面积为山地。岛上山脉东西横亘，将全岛大致分为南北两部分。赞岐山在香川县境内由东向西逐渐低缓，伸向濑户内海燧滩的临海处。在这赞岐山临海处的北侧，就是大平正芳的故乡——香川县三丰郡的丰滨町。丰滨町是1955年由丰滨镇与和田村合并而成。大平家族的祖先就居住在和田村的长谷村庄。

这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传说其祖先是日本战国时代（1467—1573年）由土佐迁到赞岐国的豪族大平伊贺守国祐，他当时统治着这一带，并在狮子端山上筑了城堡，城堡的石墙和泉眼至今犹存。后来，受到征伐四国的长曾我部的追逼，大平伊贺守国祐先藏于下属家里，后不知所终，其子被乳母抱在怀中，在城堡南端“乳母怀池”投水而死，女儿在丰滨镇跳海自杀，国祐之弟隐居于和田村而幸免于难，并娶妻成家，子嗣流传，大平一族就成了当地务农的平民。但祭祀祖先的“国祐寺”至今仍有大平家族的人看守，香火不断。据1971年的户籍调查，在原和田村居住的姓大平的有16家，据1980年调查，在三丰郡的大平姓氏有158户。

香川县由于受濑户内海干燥气候的影响，每年降雨量很少，不超过1000毫米，当地人曾形容是“天晴五日则无水湿之润”。和田村的山坡很多，农民只能开垦梯田。因此，确保农田灌溉用水就是农民生死攸关的大事，当地农民为了争夺水曾动刀伤人。每逢久旱无雨，农民便求神拜佛，希望上苍能降下甘霖。为抵抗旱灾，在香川地区兴修了约3万个大小贮水池，将冬季未用完之水积蓄起来，以备夏季灌溉之需。赞岐国历史上有一名僧弘法大师（774—835年）曾在此地修筑了不少贮水池，其中有日本最大的满浓池，灌溉面积可达四千六百多町（注：町，日本面积单位，一町为十反，约99.15公顷）。但这些水池只能满足当地用水量的七成，完全解决该地用水问题是在1974年，花费了13年时间，耗资近7百亿日元而兴建的香川灌溉渠，它贯穿赞岐山，将吉野川的河水引入香川县，实现了当地农民世代的梦想。而大平正芳作为香川灌溉渠推进联盟的会长，也为这一梦想的实现尽了一份力量。

大平正芳的祖父岩造明治（1868—1912年）以后曾任和田村议会议员。岩造的次子利吉就是大平正芳之父。利吉成人后另立门户，种着一町二三反的土地，属中等农户，他也曾任和田村议会议员，还担任村水利代表，常常为了大家的水利灌溉事务而操劳。利吉虽务农为生，却有相当的文化，据正芳回忆：“我父亲出生于明治三年（1870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学历。但他的书法不错，对日本与中国的古籍相当精通。他对书籍十分爱护，往往在线装书里夹上一些红纸条，作为对这些地方有疑问的记号，当这些疑问解决后他就把纸条轻轻抽掉，这样便不致把书籍弄脏。”父亲喜爱读书和爱护书籍对正芳一生都有影响。正芳的父亲虽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从从不责骂孩子和对孩子发脾气。孩子们学习时，他帮助点上灯，谁出门忘记戴帽子，他骑自行车追着送去。村里发生纠纷，他总是急忙赶去调解，使纠纷很快得以解决，所以他在村民中很有威望。

正芳的母亲是邻近的大野原镇诤间家的长女，善于交际，性格刚强，因而对孩子的严厉超过了父亲。但她心地善良，别人的孩子玩的时候，她总是炸些年糕块，拌上白糖送给他们吃。

在正芳出生前，父母已生育了五个孩子，其中一子一女早夭，故正芳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1910年3月12日，在香川县三丰郡和田村大字和田甲182号，大平正芳呱呱堕地，这是一个农家的普通男婴，其出生后的啼哭声与别的孩子并无两样。谁也不曾预料，他将成为20世纪中后期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成员，乃至成为日本国的最高政治首脑。

## 普通的孩子

大平正芳出生的年代，正是东亚局势剧烈动荡时期。他出生这年的7月，日本与俄国签订新协约，确保两国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利益，维持该地现状。8月，日本灭了李氏政权，正式吞并朝鲜。次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日本也产生了大正民主思潮……但这一切对远离政治中心的香川县农村来说，似乎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终年为生活辛劳的农民，仍过着与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差不多的旧式生活。正如大平正芳自己回忆的，“农民一年四季不停息地从事繁重的劳动，而所得的报酬却少得可怜。小麦从冻土里冒出嫩芽，新年就到来了，晚春，当葱绿的麦子变黄时，秧田里的稻秧就已出齐待插；插秧、锄草刚结束，炎热的酷暑便降临，秋收一完，寒冬便开始笼罩大地。农民的艰辛劳动就是随着这种宏伟的自然规律而循环不已。”

大平正芳家虽在当地不算太贫困，但由于又添了弟妹，家中共八口人生活，经济还是比较拮据。香川地区自古以来以盛产“三白”闻名，即白糖、白盐、白米。白糖到20世纪初在当地仅有少量农家生产，传统的制盐业也因化学制盐法的兴起而在当地日趋萎缩。因而和田村的农民主要靠种植附加值较低的水稻为生，收入自然是相当差的。正芳从记事起，吃的是酱汤、咸菜和掺有三四成大米的麦饭，酱汤煮米粉团子成为家中难得的佳肴，尽管家住海边，也只有过节时才能吃上鲜鱼。大平正芳身上穿的是袖子上沾满鼻涕的邋邋遢遢的衣裳，脚上穿的是稻草鞋。1916年4月的一天，6岁的正芳进了和田村立大正普通高小上学，他终于穿上了唯一的一件礼服——茶色带条纹的绸子和服。但这6岁的男孩刚一出家门，就摔进了路旁的水沟里，这件最好的衣服沾满了泥水，正芳虽然极为伤心，但也没有更好的衣服替换了。在当时，理发只需一角钱，但为了节省，正芳几弟兄头发长了，总是由父母给剃成光头。

那时，由于经济拮据，当地的农民大都要借债。每当播种插秧季节，农民就要向兼肥料商的地主赊购肥料，平日生活困难时也要向地主借贷，秋后再以高利结帐还贷。正芳家也不例外，他幼时常听到父母在一起悄悄谈论借债的事。

正芳的父母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曾将5岁的正芳寄养到别人家里，但因为这个男孩太淘气，一周后便被送回家了。于是父母又只得将正芳16岁的大姐大平哲嫁出去，那是在正芳6岁那年的冬天，送亲的人们挑着嫁妆在村外的坡路上慢慢远去，多情善感的正芳一边哭喊着“我不高兴姐姐走”，一边

在后面紧紧追赶，直到一个堂兄把他拉回家时，他还在抵抗。大姐嫁过去才几年，由于操劳过度，年纪轻轻便丢下两个孩子去世了，接着正芳的二姐又嫁到那家作填房。这一切都给正芳幼小的心灵留下了辛酸的回忆。

和其他农家孩子一样，正芳从小就一边上小学一边帮家里干活。插秧、除草、收割庄稼、喂牛、搞副业、通宵看守水，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贴补家用，当时三丰一带的农家多以编织草帽辫或编制草袋为副业。草帽辫是把用硫磺漂白过的麦秆用手工编织成的带状物，作为编草帽的材料。草袋子就是将弄软的稻草在手工织机上制成的袋子，用来装肥料或食盐。从事这种副业收入很低，连原料在内，一个人拼命干一天只能挣两三角钱。正芳严厉的母亲给每个孩子都规定了每天编织的定额。正芳每天忙得有时连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没时间。有时稍一贪玩，到天黑了都没完成定额，这时的正芳走到母亲面前，“就好像犯人出现在警察面前一样窘迫”。

因此，农家孩子们成天就盼望着节日或休假。在节日或休假的日子里，正芳和小朋友们到山上采集松蘑、竹笋，到海边去钓鱼、游泳，或到小河里去抓鱼、虾、蟹。到了夜晚，正芳还和小伙伴们搞些文艺演出，或把纸片粘贴在肩上作肩章做模仿打仗的游戏，甚至躲在黑暗中装鬼来试探同伴们的胆量……孩子们有时拼命玩到深夜，纵情享受着难得的欢乐。

过节是农民一年中暂时摆脱辛劳，最有乐趣的日子，孩子们也可与大人同乐。过年可吃到年糕，正芳感到这年糕十分可口，“而且永远吃不厌”。5月5日是男孩子的鲤鱼节，鲤鱼旗飘扬在各家门口。7月13—15日和24日是中元节，迎送祖先的灵魂，能吃到细面条和江米团等可口食品，10月是庙会，各村都要出动花鼓车热闹一番，许多善男信女都被吸引前往聚会，产生出许多浪漫故事。这些传统的文化给年幼的正芳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也在不断迈向近代化，文明程度迅速提高。这些变化也逐渐渗进了相对闭塞的香川山乡，使当地人渐开眼界。1914年，三丰郡开始装上电灯；1915年，附近的和田滨地区开始使用电话，1916年正芳进小学时，高松（香川县首府，四国岛东北岸港市）至观音寺的铁路部分竣工，丰滨有了火车站。和田村的人们都聚集在高处，看这个吐着黑烟跑动的庞然大物，感到万分惊异。当地的不少青年男女乘火车外出到大城市做工，但一些人也因此患上职业病而返乡休养，甚至还有些人在城市中走向堕落。商人们也凭借方便的交通到村里来，收购农民做成的粗糖。这些奸商常少算斤两，克扣应付给农民的糖款，一些商人在几年内便成为富商，这使正芳感到忿忿不平。

正芳就在这两种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和交织状况下，度过了自己的孩提时代。

## 小学和中学生活

少年正芳长着一副圆圆的脸，小嘴小眼，身材高大。看上去挺憨厚，甚至略显迟钝。但他在学习上却十分踏实、勤奋。课堂上老师提问时，正芳在无把握时从不抢先举手发言以显示自己。如果提问很难，无人回答时，老师指名正芳回答，他总是认真思索，尽量准确作答。遇到很难解答的数学练习题，有的同学急得伏桌而泣，正芳却闷着头坚持将难题一点点解答出来。正芳小学毕业的最后成绩（10分制）为，修身10分、朗读10分、书写10分、

作文 10 分、算术 10 分、历史 10 分、地理 10 分、理科 8 分、体操 10 分、唱歌 9 分，在全班 48 人中名列第二名。

除勤奋学习外，正芳也很注重体格锻炼，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喜欢相扑，善于摔跤，常在下课时与同学在沙地上较量。游泳也很棒，技术很好，常在放学途中与同伴潜入土野洼的深水将水底的石头捞出来。正芳比哥哥数光小一岁，但两人的体力与学力却不相上下。正芳认为哥哥意志坚强，遇事毫不妥协，有正义感，这些品质实际上正芳已具备，并在以后的从政生涯中有所体现。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评价自己“虽然不是突出的高材生，但也不是无可救药的顽童。我在平淡无奇中平安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

1922 年 3 月，正芳小学普通科毕业后，升入高等科一年。这时他很想报考中学，目标是位于观看寺镇的香川县三丰中学。在当时，普通农家子弟通常读到小学或小学高等科毕业就开始走向社会自谋生路，一个班四十多人，往往只有二三名殷实人家子弟能上中学。正芳家的经济状况显然也很难供他上中学。但这时“长子继承制”的遗风仍流行于香川，正芳作为次子，如果哥哥要回家继承财产，他就只得另谋生路。父亲利吉考虑到这一点也有心让正芳和弟弟多读点书。哥哥数光也深知正芳素质优良，支持他报考中学，而自己则于小学高等科毕业后返乡理家，再也未离开过丰滨。正芳认为哥哥为了他而牺牲了自己。

为了报考中学，正芳作了充分准备，专门请良师辅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雪无阻，寒暑不误，到老师家虚心求教。正芳于 1923 年春顺利通过入学考试，被三丰中学录取。

三丰中学建于 1900 年，二次大战后改为香川县立观音寺第一高级中学。尽管在一次大战前后，日本经济迅猛发展，国内教育也比以前大为进步，学校数量大大增加，但像三丰中学这种规格较高的县立中学却很少，整个香川县只有五所，因此，能考入这类学校的学生，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佼佼者。

正芳入学的班级，是三丰中学最后一届定员百人的大班，班上罕见地集中了许多高材生、出了许多人材。正芳的入学成绩在百名同学中名列第 41 名。在入学登记表的将来志愿一栏中，正芳填了本人志愿为“官吏”。13 岁的少年就有如此志愿，似乎预示着他将未来会在仕途上有所作为。

1923 年 4 月 6 日，大平正芳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了三丰中学为新生举行的开学典礼。校园里设立了许多临时售货摊，卖书包、文具、衣服、皮鞋等。正芳非常想有一双皮鞋，在标价 6 元的皮鞋摊前徘徊了许久，下决心请求同去的父亲给买一双，但被经济不宽裕的父亲拒绝，无论正芳怎么请求父亲也不答应。这件事给正芳印象极深，后来他回忆道：“售货摊上陈列的皮鞋，如同无缘的单相思恋人一样，既爱她，又恨她。”当时正芳就穿着和服和胶鞋参加了典礼，不像其他同学是西装革履。

上了中学的正芳，因是走读，不仅未摆脱家中繁重的生产劳动，反而因上学地点远而更加劳累。特别是在秋收农忙季节，生活紧张得如做恶梦一般，每天凌晨 3 点，田里就活动着一个少年的身影，这是正芳很早就起来收割稻子，割完一反多地的稻子后，他便急忙回家，胡乱吃几口饭，然后带上中午的饭盒，抄近道飞奔到火车站，乘丰滨到观音寺的火车去上学。到了晚上回家后，还要点着煤气灯在田里割稻。即便地里活干完了，晚上照样得完成编草帽辫的定额，学习再忙也得干，功课只能抽休息时间做。由于劳动太累，休息很少，以至上课时常打磕睡，正芳那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望着

老师，究竟是在打盹还是在听课，抑或是在思考问题，老师也无法判断。而且为了抓紧时间回家帮助干活，正芳放学后很少与同学在一起玩耍和交流。以至于以后正芳成了政界名人，除个别同学外，大多数同学对他中学时代的情况都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很不显眼的，极为普通的少年。为了学业。为了支撑贫穷的家庭，正芳牺牲了不知多少学生时代应有的欢乐和幸福，同时也磨练出了正芳坚定不移的信心、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巨大的自我克制能力，这些品格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

尽管学习和生活很紧张，但中学时代前半期还是给正芳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在中学，正芳遇到了不少良师益友，使他受益匪浅。给正芳印象最深的有两位教师，一位是教数学的中井虎男，一位是教汉文的细川敏太郎。正芳认为他们的教学“引人入胜，令人难忘”，中井老师在三丰中学建校之初的1901年就该校任教，一直执掌教鞭到1934年，将半生心血都用在为三丰中学培养人材上。他年轻时患过肺病，但后来每天早晨坚持洗冷水浴，故始终精力旺盛。正芳也向他学习，在50岁以前，从未间断每天早晨的冷水浴，因此，他基本上不患感冒。1970年正芳曾在中井老师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高度评价了这位恩师：“先生不仅是一位数学家，而且是一位教育家……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先生从不把功名和财产放在心上，终生处于清贫的境遇之中……真可谓伟人当有如斯人者……”细川老师是神宫皇学馆出身的汉学家，正芳说他那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的朗读和讲解，曾经深深打动过他年轻的心灵。

在众多同学中正芳最钦佩的是两位高年级学生桥本克彦和田中隆造。桥本克彦后来成为中央大学教授，中学时代他那温雅端庄的仪表，书写优美的笔记，都深深吸引了低年级的正芳，正芳十分钦佩桥本专心致志的治学态度。田中隆造待人和蔼可亲，他与正芳同村，虽然家中很有钱，但却穿着朴素，而且对正芳这种贫穷人家的孩子一点不高傲，照样真诚、和蔼，成为正芳以后待人接物的楷模。

正芳在中学仍勤奋、踏实，他从不务虚名，总是专心、认真地学习、思考。他最喜欢英语、数学、国语，特别是英语。他平时虽较腼腆甚至害羞，但一当朗诵起自己喜欢的诗或英语段落时，他便纵情放声，信心十足。如果谁讲了什么坏话，他也会针锋相对，反唇相讥，表现出他“柔中有刚”的性格。

中学的业余生活也令正芳难以忘怀。观音寺车站前的一贯堂面包店那散发着香甜气味的面包和老板娘亲切的音容笑貌，正芳到晚年都还记得；朋友们在有明海滨游泳和在野外活动的姿态，充满香味的鱼肉盒饭的魅力，校园内高年级同学的柔道角逐，与其他学校举行对抗比赛时的兴奋……都深深印在正芳那渴求幸福在活的心灵中。

但是，中学时代后半期，正芳受到了不幸的打击。刚上四年级的1926年夏，正准备考虑中学五年级毕业后的出路时，正芳患上了伤寒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足以致人于死地。正芳在生与死的边缘上徘徊了4个月的时间，父亲利吉怀着对儿子深厚的慈爱，没日没夜地守候在正芳身边；无微不至地护理爱子，把正芳的性命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身体刚恢复元气，正芳就为了寻求将来的出路，加紧复习，准备报考海軍军官学校。但考试之前又患了中耳炎，因体检不合格而被淘汰。

常言道：“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正当正芳为了自己的前途焦虑不安

时，更大的恶运又降临到他一家人头上。父亲利吉因过分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于1927年的8月29日去世，终年56岁。这对正芳全家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使一家生活陷入了更加艰难的窘境之中。母亲身体多病，年轻的哥哥数光担当起了料理家庭的重任。但母亲和哥哥没有被不幸所压倒，他们给予了正芳弟妹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

父亲去世后，家里已无力再负担正芳上更高的学校，海军学校又去不了，若要选择不花钱的学校，只有一个师范学校的二部。正当正芳家一筹莫展时，出现了一个偶然的机，正芳一位姑母与一位警察结婚，住在高松市近郊。她向正芳家建议，让正芳住她家走读，去报考高松高等商业学校。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芳在中学毕业后，考上了这所高等商业学校。正芳虽因患重病耽误了学习，在班上成绩一度落后，但经过顽强努力后又追了上来，到毕业时，他的成绩居全班73人中的第19名，毕业时成绩最好的三科是英语90分，汉文88分，英语作文87分。

### 在基督教召唤下

1928年春，18岁的大平正芳来到了香川县最大的城市高松，进入了高等商业学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渐渐出现了危机和灾难，1918年夏发生了“米骚动”。由于奸商利用战争之机囤积居奇，造成米价暴涨，从而引发了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大规模的群众暴动。1918—1922年日本加入协约国对苏俄的干涉，出兵西伯利亚，以失败告终。1923年9月发生里氏7.9级的关东大地震，死亡和失踪者达14万人，430余万人受地震损害，日本社会陷入大混乱。1927年又出现“金融恐慌”，许多家日本第一流的银行和公司纷纷倒闭。深刻的危机使不少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感到惶恐和苦恼。另一方面，危机加深的同时，日本政治和文化却异常活跃。1925年公布了第一次普通选举法，1928年2月举行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普通选举，民主主义和政党政治有了大的发展。日本与国际间的交流更为频繁，各种外来思潮在日本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流行，其中既有美国和西欧的民主主义，也有新兴苏联的共产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学说，也有基督教的神学世界观。对于以前在相对封闭的乡村很少接受新思想，现在又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的大平正芳，有时间专心思考问题了。年轻人旺盛的求知欲望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就像现在的不少阅历不丰的年轻人一样，如果首先接触到什么新鲜思潮，往往就很容易被这种“时髦”的思潮所左右。

那是在正芳刚进入高等商校的1928年4月的一天，在高松商业学校的讲坛上，一位颇有学者风度的人在激动地对学生们讲演：“……明治大正时代，日本虽然在物质文化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却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因此，才带来了今日的灾难和烦恼。长此以往，日本将无可救药地沉沦下去。怎样拯救我们的祖国？大家只有信仰万能的上帝，信仰上帝使徒传播的《福音书》。我们要在承认神道、儒教、佛教、武士道为东洋旧约圣书的基础上，下决心以基督福音建立新约日本。我们应站在上帝的立场上，重新认识并建设日本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教育。我们应超越阶级、超越教派，与上帝之子基督合一……”。讲演结束，一些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跑上讲台拉住这

位学者的手要求作他的门徒。这位极富煽动性的讲演者就是原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工学博士佐藤定吉，他讲演的题目是《科学与宗教》。佐藤博士才华横溢，曾因在东京帝国大学成绩优异而获得天皇赐予的银钟，并留学美国。在东北帝大任教时，又在东京创建“佐藤工业研究所”，在这里发明了大豆蛋白的合成树脂，成为塑料时代的先驱。辞去东北帝大教授后，他热衷于在学生中通过科学进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并于1927年在日本全国建立“耶稣之仆会”学生团体，在各地成立了该会支部。由于他本身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所以他更受青年学生们的崇拜和信任。

大平正芳听了佐藤博士的讲演后，深受感动。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对这位演说家崇拜得五体投地，虔诚地去找到佐藤，表示愿皈依基督教，参加“耶稣之仆会”。在祈祷会上，正芳总是向上帝请愿的最诚心者，他常常流着热泪向“上帝”讲述心中的烦恼，表现出他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他还常和同伴们一起，提着有十字架标记的灯笼在高松街头宣传自己的信仰。就在这一年夏天，正芳参加了在浅间山麓举办的“耶稣之仆会”研究进修班，秋天又到东京青山的青年会馆出席了“耶稣之仆会”全国大传教讲演会。

佐藤定吉宣传的基督教使正芳和他的伙伴们对上帝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起了一种诱导年轻人去信仰基督教的作用，但无法使他们深入理解基督教义。正芳为理解基督教义而读了圣经，并于生病休学期间的1929年12月27日，在观音寺教堂由布卡南牧师施洗入教。

但正芳毕竟是个有头脑的青年，不可能完全盲目地信仰一种宗教。在初期的狂热之后，他也渐渐冷静下来，用理性思维去分析问题。因此，他尽管受洗，并积极参加“耶稣之仆会”的具体事务，但他并未与特定的教会组织发生关系，反而对基督教无教会主义创始人内村鉴三及其门生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参加了内村的弟子之一矢内原忠雄在东京家中举办的“圣经研究会”。而且正芳从不对别人，包括家人和密友吹嘘自己在“耶稣之仆会”中的活动，既无传教活动，也不向别人强

调自己是基督徒，说明他经过冷静思考后，对基督教持有一种有保留的信仰。这一点正芳自己也曾有所表白：“自昭和3年至昭和5、6年间，在母校学习的诸位也许都还记得‘耶稣之仆会’这一团体的果敢活动……初期没有看准运动的焦点，纲领本身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因此呈现出一种盲目起飞的状态。”

## 眼界大开

高松高等商业学校是后来的香川大学经济系，是建于1924年的新学校，校园开阔，风景优美，有着较强的教师阵营，主要培养具有经营才干的实业家。后来这所学校成了关西的著名学府。在这所学府里，正芳除了学习基督教经典外，还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各个文化领域的知识，使自己头脑丰富，眼界大开。

正芳入学的第一学期，毕业于一桥大学的大泉行雄教授受聘到高松高等商业学校任教。大泉是商业学教授，但他不仅讲授商业学基础课，还讲了鲁道夫·欧肯的经济学。另外还有一位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年轻教授崛江邑一，是著名教授河上肇博士的高足，后来在日本共产党内担任有关对前苏联的工作。崛江教授公开对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在当时日本官方镇压共

产党，许多青年人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遭受挫折的历史条件下，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崛江教授还开办了“资本论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的正芳也和同学一起参加了研究会。

在高等商校二年级的夏天，正芳患了风湿性肋膜炎，有一段时间一直发低烧，正芳决定休学一段时间。在休学期间，他除了读内村鉴三的著作外，还阅读了夏目漱石的小说。正芳还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产生了兴趣，读了一些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以后在给朋友写信交流思想时，他常常提到这些哲学家的名字。除此而外，正芳还读了不少诗歌和随笔。

1930年4月，正芳复学，重新上二年级。他发现新的班上有位从高松中学免试推荐来的同学，名叫桥本清。正芳很仰慕桥本的才华，与桥本成了好朋友。桥本清少年早熟，作为在校学生，他已发表了有关正统学派的经济学说史的长篇文章。正芳后来回忆道：“我对他的渊博的学问，尤其是对国际金融的造诣，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他认真对待事物的理想主义态度，更是尊敬和钦佩。”看来正芳受桥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1931年春假期间，正芳到四国南部去尝试了一次所谓“不带钱的旅行”。正芳首先到古代平家溃军居住的祖谷深山里，拜访了平家的后裔。平家是古代日本的武士集团平氏家族，在公元11至12世纪时，称雄于现在的京都、大阪和神户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其首领平清盛曾控制中央政权达20多年，后于1185年被关东的源氏武士集团击败，部分败军曾溃散到这里居住，一些人便在此安家，繁衍后代，并保留了当时用过的珍贵文物——平家军队所供奉的军旗。正芳此行就是想亲眼目睹这面军旗，并有幸实现了这一愿望。他看到了据说是用草本纤维制作而成的军旗，上面写着“八幡大菩萨”五个大字。此外他还听平氏家族的后代唠叨起那遥远的往事，当年两军对垒，激烈厮杀的波澜壮阔的场面仿佛历历在目。当情感丰富的正芳辞别主人，在濛濛细雨中走下山岭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心情分外激动，直到以后年过花甲都难以忘怀。

离开祖谷后，精力旺盛的大平正芳又沿吉野川到达高知县中部的土佐，又经大杉来到了高知县首府、濒临浦户湾的高知市。因身上没带多少钱，正芳只好寄宿于高知高校的值班室里。高知市是16世纪末德川幕府建立之前兴起的古城堡，是四国岛南部最大的港市，具有迷人的海滨风光，明亮而幽静，令正芳留恋不已。他穿过浦户湾，来到桂滨，极目眺望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只见碧空如洗，水天相连，使人心胸仿佛开阔了万倍。遥想通过这世界上最大的水域能到达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利福尼亚，正芳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他深感宇宙之宏大，个人之渺小；岁月之悠远，人生之短暂。年轻人的抱负，已不限于狭窄的日本四岛，而是向着广袤的世界伸展开去。接着，正芳乘船绕过室户，伴随着极其优美的月光登上了甲浦港，在甲浦一所小学里住了一夜。以后从旱路经德岛、抚养等地，沿途造访学友家庭，最后回到高松，结束了这收获颇丰的旅程，口袋中仅剩一分钱。

这次旅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正芳在半路偶然遇到一位不相识的人，并同他进行了交谈。正芳作风质朴，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给那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他得知正芳是高松高商的学生时，他十分羡慕该校的校风，并愉快地将他遇见正芳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高松高商校长泽田源一。泽田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对学生训话时骄傲地提到此事，正芳知道是说自己，感到很悻

意。

## 彷徨

1929年4月正芳刚上高商二年级时，在美国以纽约华尔街的股市大跌为先导，出现了经济大恐慌，由此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日本也陷入了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工业生产从危机前的顶点到危机时的最低点，降低了百分之七十。进口和出口都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日本物价暴跌，许多公司纷纷关闭，并大量解雇员工，降低在职人员的工资，城市中失业人员达几十万人，经济萧条的状况持续到1931年仍无好转。

这时正在上高商三年级的大平正芳和他的同学们临近毕业，是马上就业还是继续上大学，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抉择。当时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就业相当困难，正芳的同学们大多选择继续升学，很少有人决定就业。勤奋上进的正芳早就决心继续到大学深造，并且瞒着家里人办理了报考东京商科大学的手续。但是，正芳的母亲鉴于家中的实际情况，连做梦都没想到正芳要上大学。她亲自去找和田村的一位前辈，当时任四国水力公司常务董事的田中隆先生，请求他能录用正芳到公司工作。但当时市面仍十分萧条，公司业务也无扩展的计划，所以当年不招收新人。得到这一明确答复时，已经临近毕业前夕。当正芳正在犹豫是否把自己希望升学的事告诉家里时，时间已流失，正芳既未能上大学，也失去了再寻就业的机会。

1932年3月，正芳在高松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因学籍档案在二次大战中被烧毁，正芳在校学习情况无从得知。能够反映他在高商学习和生活情况的唯一书面材料，就是次年正芳在报考东京商科大学时，高商向商大提供的一份调查书，保存在商大。调查书有五项均是调查有无左翼言行，全部填的“无”。“性格”一栏填的“温厚、正直、热心、认真”；“本人对未来的希望”一栏填的“有求学的希望”；在“学力、勤怠、健康概评”一栏中填的“学力甲、精勤、身体健壮，胜任学习”；在“其他”一栏中填的“宗教信仰强”。根据该表可以大致了解正芳在高商几年中的个人品行。

毕业后的正芳将何去何从？当他毕业之前正处于失去升学和就业两方面机会时，正芳通过“耶稣之仆会”结交的一位挚友——大阪的桃谷勘三郎为正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准备把佐藤定吉博士发明的药品投入成批量生产，以其收益作为基督教的传教经费，希望正芳能参加这一工作。正芳一方面处于彷徨不定的状况，正欲找点事干，另一方面又出于对“耶稣之仆会”的热情，便爽快地答应下来，毕业之后的1932年春，正芳便与旧制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的今井嘉久一起，来到了大阪。

大阪是本州西南大港，是日本第二大城市。桃谷勘三郎在这里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桃谷顺天馆。正芳和今井嘉久在桃谷家中设立了临时办事处，开始了工作。但是，资金的筹措很不顺利，而且佐藤发明的药沾到手上或脸上，颜色就变得漆黑，无法投放市场。佐藤答应再研制新产品，但这需要时间。正芳便利用这段空闲时间翻译了美国西服商纳秀的《黄金律》，想从这位基督教实业家的创业经验中得到一些启发。这样，正芳在桃谷家中住了两三个月，每天如同桃谷家成员，过着饭来张口的日子。到了1932年夏，桃谷见新药品研制尚无成功的消息，便请正芳去顺天馆帮忙做些事，等待时机。于是，正芳和今井又搬到公司附近的宿舍里去住。正芳在广告部帮助翻译一些外国

报刊上登载的有关药品与化妆品的广告文章，同时参与桃谷顺天馆每月举办一次的圣经研究会的组织工作，每天百无聊赖地打发日子，漫无目的地等待新药物的研制成功。正芳这段时间郁郁寡欢，心绪十分不佳。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空有一番抱负，现在弄得几乎再也不能实现进大学的梦想，又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不能为传播基督教积蓄资金，正芳简直苦闷到极点，真后悔自己的选择。

从夏到秋，新药物研制成功的希望仍十分渺茫，正芳和今井都认为不能再这样盲目地浪费自己的青春了，决定再回到学校，以图东山再起。正芳在好友桥本清的鼓励和劝导下，经过刻苦复习和准备，1933年4月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东京商科大学，今井则考入了神户商科大学。

但是，上大学是需要一大笔钱的、除了付学费和书籍费外，还要支付在东京的生活费，而这笔生活费远远高出其它城市的生活费。正芳家里根本无法负担。正芳决定向坂出市（属香川县）的镰田共济会和高松市的香川育英会借贷学费，镰田共济会是坂出市的镰田家、香川育英会是高松市的松平伯爵家创办的财团法人组织。由于这两个财团法人的资助，香川县的许多有才华的青年才得以升学，不少人以后在事业上大展鸿图。大平正芳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因此，正芳大学毕业后，经过一年的缓期，按规定手续还清债务时，除心情特别高兴外，还主动提出愿尽一两年义务，每月捐些款，作为借贷给后辈的部分资金。此事因无先例，两个财团法人组织婉言谢绝了正芳的请求。尽管未能遂愿，却表现了正芳知恩图报的情感世界。桃谷勘三郎也许是觉得提议让正芳去大阪销售药品最终未成功，耽误了正芳的前程而有些内疚，主动提出愿出资帮助正芳上学，正芳表示用不着。后来桃谷发给正芳在顺天馆的薪水，也未收正芳在自己家中居住时的伙食费，才算是尽了一点帮助正芳的心意。

1933年3月，在东京中野的堂兄大平秀雄家，正芳手提化妆品敲开了他的家门，对开门的堂嫂寿美说自己是在大阪的化妆品公司工作，到东京来出差，希望能获准在堂兄家住三四天，手中的化妆品是送给堂兄家的礼物。第二天正芳对堂嫂说出去给公司办点事，可去了不久又返回，头戴大学生帽，身着学生服。原来正芳已经考上了东京商科大学，是到东京来上学的，给堂嫂开了个小玩笑，表现出正芳少见的幽默，也反映了他一贯的不愿张扬自己的稳健性格。

## 师恩难忘

到东京上大学，是许多日本青年心驰神往的理想。特别是对正芳这种出身于丰滨农村的青年，渴望到东京这种世界第一流的大城市读书的强烈愿望，并不亚于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学生憧憬着到欧美发达国家去留学。在高松高商学习时，正芳曾不止一次去过东京，并向朋友赞美东京是座值得生活的城市。现在，他多年的梦想成了现实，其兴奋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他并不知道，这是他以后成为东京的永久性居民的开始。

正芳进入的东京商科大学，就是以后的一桥大学，它是由1875年创建的商法讲习所发展而成的。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专科学校，招收的学生人数不多，但培养学生的质量却相当高。该校不仅为企业培养了大量高级管理人才，而且为政界、外交界、学术界、文艺界和教育界输送了各种颇具实力的人才。

这些人材能够在各领域出类拔萃，充分施展才华，与他们在校时所受到的良师教诲是分不开的。对这一点，正芳似乎感觉特别深。他知道，任何一个稍有作为的人，都离不开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这些令人敬佩的老师或言以言，或以身教，或虽未与学生直接谋面，却以自己的著述给学生以启迪。学生们的前程灿烂辉煌，往往有甘为蜡炬的老师们的默默燃烧，学生们能攀上事业的顶峰，常常有愿为人梯的老师们的尽力扶持。所以，即使正芳以后在政界中成了出人头地的领导人，他仍对在东京商大时所沐浴的师恩难以忘怀。

一年级时给正芳以深刻印象的是讲授经济地理和商品学的佐藤弘教授。正芳和他的同学们在佐藤教授指导下，围绕着“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这个主题，开展专业课堂讨论。佐藤教授不仅指导学生学习方法灵活，而且对待学生的态度平易近人，他常与学生游玩，同学们感到他既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更是一位难得的兴趣广泛的益友，颇受同学们爱戴。

大平正芳在学校不仅学习必修课，还选学了多门不同领域的课程，如杉村广藏老师的经济哲学、山内得立老师的哲学史、三浦新七老师的文明史、牧野英一老师的法律思想史等课程。当然，一些课程正芳听起来感到比较难懂，但渐渐也听出个眉目，并对某些课程产生了兴趣。如对经济思想史，就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为此，正芳在二年级时选学了上田辰之助老师指导的“欧洲中世纪经济学说史”专业课堂讨论。

正芳认为上田辰之助与其说是经济学家，不如说是社会学家。而他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实际上又是一位语言学家。上田先生学术涉猎广博，除经济思想史外，对中古时期西方经院哲学的代表托马斯·阿奎那也有较深入的研究，这些都离不开他对西方语言的深刻理解。在一桥大学图书馆里，有一座半身塑像，塑造的是日本商业英语的鼻祖布洛克霍伊斯。刻在塑像下面的英文献辞就是上田辰之助先生的手笔。在献辞中上田先生叙述了布洛克霍伊斯先生的功绩和一桥大学的使命：“他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大工厂。在这里，他为培养和造就在世界贸易中为日本赢得自主与荣誉的人材，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大平正芳参加的课堂讨论一般都是在吉祥寺的上田老师家中进行，使用的教材是R·H·托尼的《获得社会》。托尼是现代英国经济史学家，曾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执教多年。他曾于1928—1944年担任英国工人教育协会主席，非常关心工人教育事业。他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问题颇有研究，除了《获得社会》一书外，还著有《十六世纪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土地与劳力》、《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等大作。上田老师不仅讲授托尼的经济思想，他还主要是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来对托尼的英文进行讲解。上田先生组织课堂讨论时，对参加讨论的各年级学生要进行严格的挑选，只有英语说得很好的学生才能参加。上田就曾表示：“语言学不是如何说，而是说什么。”这就意味着在讨论时，老师用不着去教学生如何说英语，而直接要学生用英语表达课堂讨论的专业内容。因此，能被上田先生挑上参加讨论的学生人数不太多，正芳的同级同学中只有他和另外一人。通过上田老师的严格训练，使正芳重视了语言。为他以后写文章，发表演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大平正芳影响最深远的老师大概要算杉村广藏先生。大平入学时，杉村老师还是一位刚提升为副教授的学者。杉村短暂的一生，献给了探索经济文化价值的工作，他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经济不应当仅仅是一种手段价值，而必须是形成独自的价值领域的学问。杉村曾教导他的学生们，我们并

不后悔把大半生涯投入经济实践活动。我们在其中尝到了专心致志于工作的乐趣，在人格上感到很充实。但如果把这种实践看成是只不过为其他目的服务的手段，我们将是无法容忍的。新的伦理世界应该扎根于经济社会，如果它不是属于经济的、为了经济的、并通过经济所产生的道义，那就不可能成为适应于整个社会文化的道义。

杉村先生是位极富天才的学者，他的讲课有很大的吸引力。大平正芳听过杉村先生的经济哲学讲座，当时并不能充分理解杉村先生所讲的内容的含义，但他总感到其中有令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楚。杉村先生的著作涵盖的内容广泛，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对货币的认识，生产、积累和投资的机能和限度，经济性观念的目标及形成其前提的文化价值等等，反映了杉村教授在学问上的博大精深。大平读了杉村先生的大著后，视野大为开阔，见识成倍增加。同时，杉村先生对于历史的看法和人生的反省，也给大平以启迪和喜悦。另外，杉村先生经常着重讲到大学应以方法论为其生命线，大学生如果没有学会方法论，就如同没上过大学。这种思想对于大平真是如醍醐灌顶，使他茅塞顿开。在大平的整个大学学习期间，一直是鼓励他前进的“鞭子和指针”。大平在毕业后以至在杉村先生去世后，仍在反复坚持学习他的著作，甚至一直到自己晚年，也没让先生的著作离开自己身边。而杉村这样优秀的学者，命运却十分不幸，他所提出的学位论文《经济社会的价值论研究》，在 1935 年 9 月教授会审查时，竟有人投了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的白票，这就是一桥大学历史上的“白票事件”。杉村教授认为这意味着大学的学术精神的停滞，忿然辞职以示抗议，在校内外引起很大争论，大平也为恩师感到不平。以后，杉村教授又英年早逝，大平感到万分痛心，哀叹道：“不知上帝为什么使这位天才如此短命，实在令人无限惋惜！”大平除在课堂上聆听杉村先生的教诲之外，与杉村并无更多的直接交往，但大平认为杉村对自己说来是一位“最大的恩师”。

还有一位大平十分敬重的老师中山伊知郎副教授，他也和杉村老师一样，颇受学生们欢迎。中山讲授经济原理课程，讲课的讲义后来编成了《纯粹经济学》一书。给大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经济平衡论”。他认为“经济现象最本质的是相互依存关系；经济理论的基础部分是由平衡理论的各种形态构成的……”

大平所钦佩的还有一位米谷隆三教授，他是一位很有骨气的学者，为研究商法而留学欧洲，1935 年回国后到东京商大教商法。米谷教授对大平也很欣赏，曾经夸他“真是一个有为的青年”。

还有一位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给大平正芳以影响的老师，这就是东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矢内原忠雄先生。上大学之后，大平曾到东京的矢内原忠雄家，参加在那里的“圣经研究会”，直接受矢内原先生的教诲，对先生十分敬重。

大平正芳对教师的尊敬还可从一件小事中得到体现：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曾为东京商大的学生讲授行政法课程。美浓部教授具有进步思想和很高的知名度，是帝国学士院会员，曾担任贵族院议员。因提出了“天皇机关说”，大力主张在日本建立政党内阁制，而成为日本右翼和军部攻击的对象，并被指控为对天皇“不敬罪”，于 1935 年被迫退出贵族院，并于次年被右翼分子击伤。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日本，正是法西斯上台的前夜，全社会笼罩着对进步思想家和进步言论进行围剿的恐怖气氛，东京商大的马克

思经济学权威大塚金之助教授就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同情共产党的学生也遭受检举，受到退学处分。连唯物论研究会的中年教授中也有受处分的。在如此氛围中，如果与美浓部达吉这样的学者接触过密，就有可能遭遇不测。大平正芳当时的思想不能算很进步，甚至有些偏“右”。但当他与其他4名同学听完美浓部教授的行政法课程后，决定给先生辞行。大平觉得辞行仅5个人于先生面上不大好看，于是他不顾嫌疑，在学校启事板上贴了一张“为美浓部博士举行辞行午餐会”的启事，结果前来参加午餐会的学生挤满了食堂，使先生深感学生尊师重道的深厚感情。

大平以后每每回忆起自己在大学时代的恩师，常常流露出无限的景仰和思念，这不仅表现出大平个人对教导自己的恩师的敬重，也反映出整个日本国民重视教育和尊重教师的社会风气。

### 勤奋的大学生

大平正芳就读时的东京商大已从东京市中心的神田迁到武藏野。照大平的看法，当时的武藏野还浓厚地保留着明治后期的著名作家国木田独步（1871—1908年）的作品中所描述的面貌，“把一所商科大学设在武藏野，让人总觉得有点不和谐。”大平和同学们在上课中间还得出去挖白薯，周围无商业区和娱乐场所，看电影必去新宿，买旧书须到神田，想划船得

去隅田川，这些地方距学校都很远，来回得乘电车，对大平这种穷学生，连支付电车费都感困难。

当时大平上学的生活费来源，一是两个财团的资助，二是课余时间从事兼职，如为中学生讲授英语，三是靠哥哥有时从家中寄些钱来。尽管如此，大平正芳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在学校里仍一如既往地勤奋学习。当时日本由于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影响到在校学生的的情绪。学生们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胸怀大志，不受干扰，埋头学习；另一类则随波逐流，吃喝玩乐，得过且过。大平则属于前一类，他深知自己出身普通农家，没有殷实的家景，也无可作靠山的权势支持，要想在社会上立足，要想真正为国民做一点贡献，只能立下雄心，刻苦学习。

为此，他除了认真地听学识渊博的各位教授们的授课，积极参加不同学科的老师举办的各类讲座外，还刻苦攻书。如不止一次地读我妻荣著的《物权法》、高田保马著的《经济原论》。他读书时不仅动脑，还勤动笔，他不仅在重点语句上画上横线，而且还在一些字词边加各种记号，画上圆圈、三角符号，有些页码边还加上旁批，甚至还在笔记中作些摘录，或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激励自己的语句。如“现在不读则无读书之日。不为利害、爱憎、毁誉所烦恼，有的只是不可思议的喜悦和惊心动魄的悲壮心情”。“气生于志，志奋于义，义苟失矣，匹夫犹且侮之，”“力不足以缚鸡，貌不足以加人，而活气所发满堂偃伏，以秦王之暴不得少折其节。”这些文字，表明了大平正芳排除客观环境所造成的干扰，专心致志学习的心愿；同时也反映出他愿效法古代志士，树雄心，明大义，立宏志，在激烈竞争、变幻无常的社会中能一展才华、崭露头角的志向。这些都是鞭策他勤奋学习，不断进取的动力。

勤学努力使大平正芳大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三年学习期间，各门课程的成绩他一共得了三十个“优”，七个“良”，“一般”以下的成绩没有，最后经过考试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他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职业社会与同业组

合》。这篇论文共分两编，第一编论述了在上田老师主持的专业课堂讨论会上学习到的托尼的《职业社会论》，包括“权利和职业”、“获得社会论”、“职业社会论”、“托尼学说的划时代意义”等问题，并对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进行了卓有见解的分析。第二编题目为《美国的同业组合论》，在这一编中他对同业组合的概念进行了阐释，研究了同业组合发展的历史、同业组合的组织、同业组合的内部行政以及同业组合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所占的地位等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对同业组合的看法。1980年担任一桥大学校长的宫泽健一对这篇论文作了评价：“他认为，在‘阶级斗争和自由竞争共同使社会陷于混乱’的现在，人们‘希望扬弃这种对立的一切，克服分裂的统一，超越斗争的调和，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他注意到当时世界各国出现的产业统制的动向，并把它作为‘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媒介组织’提出了‘组合’这一见解。作为一个年轻的基督教徒，他曾为‘个人对于社会的正确联系’而烦恼。但由于他读了托尼的《获得社会》，在思想上，他回溯到圣马托斯，阿奎那的世界，而在现实上，他作为时代的问题提出了‘同业组合’的看法。在这涉及广阔历史年代的构想中孕育了后来作为日本领导人的大平总理哲学的起源、源流以及他的人品。”从大平进入政界后的作为以及这些作为的指导思想看，宫泽健一校长对大平毕业论文的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 温暖的大家庭

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有一种优良传统，就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前辈和后辈校友之间常常互相帮助，团结非常紧密。这一优良传统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东京商大是专科学校，每一年级的学生人数较少，许多课程、专业课堂讨论和其它活动，往往是不同年级的学生一起参加，彼此很容易认识，联系较为密切；二是因东京商大的发展道路比较曲折，在明治后期曾一度发生危机，当时政府为紧缩财政，企图撤销该校的预科和专科，为此发生了“护校事件”，学校师生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师生被抓走五六十人。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成了学校内部加强团结的动力。因此，社会上普遍认为，东京商大（一桥大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关系最为协调的一所大学。整个学校仿佛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平正芳曾说：“我荣幸地能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得到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大平在这个大家庭中广交朋友，他与这些朋友或相互切磋学问，或共同抒发情感；或彼此交流于课堂讲座，或一起游玩于郊野神社。其乐融融，令人终生难忘。大平刚到东京时，就得到朋友的帮助。他首先寄宿于杉并区阿佐谷二幢562号的立岛家中，但这里离学校较远，于是不久他又搬到东京商大附近的府下国分寺324号冈村熊太郎家寄住，为增加收入他去给附近一家中学生讲英语，也是朋友介绍的。到二年级时，大平与吉永荣助、富樫总一参加了以助教田上稷治老师和大平善梧老师为核心的法律研究会，三人成了至交。大平认为，吉永与富樫皆有敏锐的法律头脑。吉永虽在三年级考上了高等文官司法科，毕业后却留校教商法和经济法。富樫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名列前茅，进入了内务省和劳动省工作，他对劳动法特别感兴趣，把一生献给了日本的劳务行政工作。交上了这两位挚友，使大平正芳对法律知识有了较多的了解，而这一点作为一名政治家是必不可少的。

武野义治也是大平关系密切的同学，他也参加了上田辰之助教授的专业

课堂讨论，英语也很不错。后来讲授商法的米谷隆三教授从欧洲回国，他又与大平一起跟随米谷教授学习商法。二人常交流学习心得，互助互进。武野后来与大平一同参加文官考试，进入外务省，曾任日本驻保加利亚大使。

长尾赖隆与大平既是高松高商的校友，又是东京商大校友，二人很要好。他比大平早一年入大学，常到大平学习的地方一块儿聊天。他们俩一同去多摩川河畔踏青，春天共同去欣赏小金井的樱花，秋天又一起去林中拾树上掉下来的栗子。二人还一同逛过府中的大国魂神社。梅野典平和大平一样信仰基督教，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他和大平认识不久，就把大平带到世田谷区东松原的贺川丰彦先生家。贺川先生在自己家中教授《圣经》，并在松泽有自己组织的教会。贺川认识大平后很高兴，热情邀请大平以后去他家吃饭。梅野典平还同大平一起去“红风车”剧院看戏，返回时因无钱买车票，二人便安步当车。经过府中监狱附近时，这两位基督教徒还一起唱赞美诗：“洗去我的罪过，使我比雪还洁白。”大平和他们在一起，尝到了艰苦学习之外的生活乐趣。

鹰尾宽是比大平低两年的后辈，同时也是高松高商的校友。他和大平一起受到了东京商大的老校友加藤藤太郎的特别关照。当大平后来参加高等文官考试成功后，鹰尾宽召集了在东京商大的全体后辈同学聚会向大平表示祝贺，气氛异常热烈。大平大学毕业时，又邀请这些同乡会成员到自己的宿舍大吃了一顿火锅。

给大平印象较深的同学还有后任驻外大使的小岛太一，后进入铁道省任铁路监督局财政课长的纸田千鹤雄、后进入农林省水产厅任渔政部长的冈本贞良等人。

大平在上大学期间乃至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得到不少东京商大出身的前辈们的关怀与支持，其中给大平支持最大的莫过于加藤藤太郎老前辈。加藤是1910年的东京商大毕业生，中学也是在香川县三丰中学就读，因此他是大平中学和大学的老前辈，对大平特别关照。加藤大学毕业后，进王子造纸公司工作，因其有才干逐渐升至公司负责经营管理的常务董事。大平在学生时代多次找过加藤，经常到日比谷三信大厦的王子造纸公司办事处去拜访这位老前辈，请他为香川县的学生同乡会捐款，每次得到的捐助都比所希望的数目多。有一次大平和鹰尾宽度完暑假返回东京，与加藤正好同乘一列火车。这两个穷学生连坐处也没有，只好在过道上铺张报纸坐下。这时加藤从卧铺车厢走来，请他们进餐车用餐，并给了他们付帐的10元钱后就回卧铺车厢去了。二人大吃一顿之后，算帐时，找回的零钱超过了应付帐的钱。大平认为这是加藤在考验他们二位是否贪占小便宜，于是便和鹰尾一起到卧铺车厢去找加藤。大平敲门进去后对加藤说：“我们吃得很好，剩下的钱带来了。”加藤训斥了他们俩一顿：“你们真小气！到东京还要走17个小时，还得吃好几次饭，谁让你们把钱拿来的？有这么傻的吗？”鹰尾事后说：“虽然被他训斥一顿，但我们从加藤眼神中看出，他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些故乡的年轻人。”

大平正芳对加藤十分敬慕，加藤也很喜欢这位诚实上进的小伙子，二人关系形同父子。1937年，大平甚至准备结婚一事也去告诉加藤。加藤知道大平刚参加工作，生活不宽裕，便主动对大平表示至少要负担婚事费用的一半。边说边从钱包里掏出800元送给了大平，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因为1000元就可建造一幢住房。后来大平进入政界，参加了十来次竞选，每次加藤先

生都赶回家乡，为太平竞选获胜出了不少力。

加藤先生在二次大战结束时，担任王子造纸公司副总经理。此时，恰逢盟军总司令部发布褫夺公职令，除了剥夺原日本政府官员、军人、教员的公职外，又将范围扩大到在日本银行、公司任职的人员。加藤离开了王子造纸公司。褫夺公职令废除后，他又在废墟上重建王子造纸公司的神崎造纸厂，担任了第一任经理，该厂后发展为制造高档纸而闻名的神崎造纸公司。

除加藤外，大平还得到其他许多同窗好友的关怀，如本田弘敏、小泉幸久、田中外次、松本正雄、宫崎一雄等。大平在担任政府大臣后感叹道：“我之所以有今天，无疑是由于获得许多前辈、朋友的友谊与支持……而且他们对我这个晚辈所寄予的友情，至今依然如故，脉脉相连。真使我不胜感激！”在即将出任首相的前一个月他在会见记者时也曾说：“我得到前辈诸兄极大帮助，没有这种帮助，决不会有我今天的地位。”

大平不仅接受别人的帮助，自己也总想为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作一些贡献。1934年4月，为了建造一桥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楼，发起了募捐活动。大平因家中经济拮据，不可能赞助资金，他便拿着募捐书，走访了关东、关西各地的前辈，成功而幸运地筹措到15000元巨款。由于大平和该校基督教男青年会成员们的努力，把募集到的大量捐款，在校园附近的绿树丛中建起了两层的宿舍楼。宿舍楼聘请了一位姓大掘的女管理人员，她信仰虔诚，待人亲切，后来还与大平有通信联系。这幢宿舍楼每月都要召开一二次圣经研究会，大平每次都自带盒饭出席。他虽然没住过这幢宿舍，但能为它的建立尽力，内心还是挺高兴的。通过为宿舍楼募捐等活动，表现出大平正芳的精明强干和善于争取人们认同自己主张的社交能力，这种能力对他以后从政不无裨益。

## 人生新起点

年轻人总是充满着幻想，若要问到某位青年将来有何理想，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确切的，或是有不止一种的选择。大平正芳对此亦不例外。他虽然在小学毕业的志愿一栏里填了“官吏”，但并非就没有其他的就业愿望。从很早起，大平就觉得“住友公司”有一种吸引力。住友公司兴起于德川幕府时代，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发展，其经营范围也由单一经营铜矿向工业、林业、金融、仓库等领域发展，经济实力极为雄厚，二次大战前成为日本最大的四大财团之一。大平正芳从儿童时代起，就是一边望着住友矿山公司的四阪岛冶炼厂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一边去上学的。他的家乡和田村里也有很多人到住友财阀的发祥地别子铜矿去干活。而且大平在以后的求学经历中，阅读的许多基督教书籍和文学书籍，或作者与住友公司有关系，或作品中常描写住友的情况。这一切都对年轻的大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他一直希望到住友去工作。

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完全由自己的主观愿望决定，总是受诸种客观条件的制约，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

日本国中央行政部门在录用新的大学毕业生担任职员时，按往常惯例，多偏重于选择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因为人们往往认为，能够考上东京帝大法律系的学生，都是在大学升学考试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大学毕业后皆能胜任政府任何部门的工作。但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

的“九·一八事变”以后，20年代后期陷入危机的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回升的势头，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准战时体制”时期。战争的需要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以军需工业为首，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日本工业生产又趋活跃，带动了出口的增加和财政的好转。因此到1932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日本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到1933年甚至出现了繁荣。这种繁荣实际上伴随着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和国民经济逐渐向战争轨道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国家政权中急需大批懂得经济的官员。因此，录用新大学毕业生的目标便开始重点转向经济专业的毕业生。已为日本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材而在国内享有盛誉的东京商大的学生，自然属于被挑选的范围。许多学生跃跃欲试，积极准备参加国家的高等文官考试。

比大平正芳年级高的同学如吉永荣助等人考上了高等文官，与大平同期的许多同学也磨拳擦掌地加紧复习，这些都使大平受到激励，他更加刻苦地学习，决心到国家高等文官考试的考场上去拼搏一番，希望能抓住机遇，实现自己的抱负，同时也为毕业后的谋职开辟一条道路。

1935年9月，经过认真准备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大平正芳与许多同学一起，参加了当年的高等文官考试。考试完后经过一个月忐忑不安的等待，终于盼来了10月的发榜。大平正芳榜上有名，考上了行政科！大平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简直难以言表。他兴奋地参加了同乡鹰尾宽为他举行的庆祝会，并向同学们谈了他参加考试的体会：“答卷应像淡妆的女性一样谦虚地写出”。次年8月发行的高松高商同窗会杂志《又信》上，大平写了《高等考试断想》一文，向后辈介绍了他参加考试的体验，并提出了三点希望：一、自己要有成为官吏的意识；二、选择经济科目，发挥自己的特长；三、应将日常经验与经济学的原理联系起来思考。这些都是大平自己的经验之谈。

通过考试仅是取得了到政府部门工作的资格，具体进哪一部门工作还得自己去努力。大平经过为自己提供奖学金的镰田共济会的镰田胜太郎的介绍，在发榜当月就去拜访了大藏省次官津岛寿一。

津岛寿一是香川县坂出人，东京帝大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大藏省这一机关相当于其它国家的“财政部”，关系到国家财政命脉，在日本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府机关，因此过去一直是选用东京帝大的毕业生。津岛在东京帝大的一群佼佼者中显得更为出类拔萃，很快在仕途中崭露头角，由驻外财务官升为理财局长，再晋升为大藏省次官，直接辅佐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大平正芳去拜访津岛的目的是想向他请教毕业后应到哪个政府部门去工作，还想请津岛给推荐一下。但是津岛突然对大平说：“到大藏省来工作吧！”这完全出乎大平预料之外，他楞了一下问道：“您说要我来，能录用我吗？”津岛明确回答：“你就是今天来，我马上也可录用你。你不要报考别的单位了。”大平又进一步问道：“但是，我是东京商大毕业，进大藏省恐怕不合适吧？”津岛答道：“大藏省过去是东大的，偶尔有一二名京都大学的。但在处理某件事时，大家都无自己独立的见解，个个事务官看法都一致，这怎么行！我们需要新鲜血液，你来大藏省吧！”这样，大平正芳进入大藏省一事在当时已内定。没想到寻职一事如此顺利，大平兴奋得快陶醉了。他给家里写信时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我高兴极了，简直像上了天一样。”

但是，第二年形势突变。当大平完成了毕业论文，即将完成学业的前夕，1936年2月26日，发生了震惊日本的“二·二六”事件。早在20年代末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政治日趋走向军国主义化，政府推行各项政策往往受陆

海军军部的制约。特别是军部的一些少壮派军官，提出越来越偏激的主张，对内企图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反对政党政治，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特别是加紧对中国的进犯，以转移日本国民对国内矛盾日益深化的不满情绪。这些少壮派军官对他们视为军事独裁的障碍——日本文官特别是政党政治的首脑视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自1932年5月15日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后，军人们仍不断制造事端。1936年2月26日，东京师团的军官们率领军队发动政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等人，刺伤多人。高桥是清从1913年以后，曾多次任日本内阁大藏大臣，甚至1921—1922年任首相期间仍兼大藏大臣。他是一位银行出身的政府官员，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对财政经济政策上出现的军国主义倾向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抵制，最终招来杀身之祸。事件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气焰甚嚣尘上，社会舆论日益偏激，正直的人们对国家的未来和个人前途均感忧虑。

大平正芳也对自己的前程担心。“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担任首相并重新组阁，马场镒一作为新的大藏大臣入内阁。津岛寿一因忠于被杀的高桥大臣而决定辞职，离开大藏省。大平正芳得知这一讯息后，心中惶恐不安。他急忙跑到大藏省去询问津岛：“听说您这次要辞职，我来大藏省工作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津岛并未对此作正面回答，反而训斥他说：“你说什么胡话！？好好学习去，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936年4月，大平正芳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告别了对他的人品、性格有终身影响的学生生活。在毕业前半年填的就业志愿中填的第一志愿：政府机关；第二志愿：特殊银行。在“胜格”一栏中填的优点是：“快活、圆满、质朴”；缺点：容易感情用事，不够理智。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担忧完全成了不必要。毕业之后，大平顺利地进了大藏省，实现了从小就有的做“官吏”的夙愿，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他后来在担任首相前夕曾怀念起自己的大学时代，认为一桥大学是日本的一个珍贵的“文化财宝”。

## 第二章 担任公职——从政的预演

### 大藏省里的新面孔

“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内阁上台，劝业银行总裁马场镓一任大藏大臣，他与大藏省次官川越丈雄、主计局长山田龙雄一起，在大藏省内形成了一股新势力。他们在组织上排挤支持前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的自由主义健全财政体制的官员，这些人有的辞职，有的被调走任闲职，大藏省的财政政策上开始出现军国主义倾向。马场大臣为了满足军部因发动战争的需要而拿出的预算方案，提出废止以前的逐步减少公债的政策，实行减息增税，这就是当时的“马场财政”。准战时体制也波及到了这一关键的政府部门。大平正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6年4月10日来到大藏省工作。

报到那天，先接受了马场大臣的训话。同时被录用进大藏省的还有另外九名学士。他们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的宫川新一郎、若槻克彦、山下武利、矶田好祐、福田久男、中平荣利、藤原正久，经济系的篠川正次、小林英二，后来又增加了日本银行的泽田悌和兴业银行的小川润一。这些新参加的大学毕业生，为了给上司一个第一良好印象，个个西装笔挺，精神抖擞，满怀希望和信心地来到大藏大臣官邸。马场大臣面色严峻地对他们训了一通话：“……切忌不要以为学问到此结束，真正的学问从现在开始，请诸位牢牢记住这一点！”到了中午，这一伙年轻官吏在一起共进午餐。大平正芳对众人说：“今后咱们要学中国的办法，彼此之间要多说好话不说坏话。将来咱们当中有人成了大人物，大伙儿就可以到他家当食客去。”后来，这批人关系十分融洽，几乎每月聚会一次，重温初进大藏省时的旧日友情。

大平被分到存款部，次年春兼任大藏大臣官房财政经济调查科的工作。当时大藏省由于制定准战时体制化的财政政策的需要，开始对纳粹德国的各项政策进行研究。大平正芳负责翻译资源政策。他详细阅读了德国的有关政策的文件，提出了十分扎实的报告。在存款部的具体分工是学习存款部今后应作的改革，并提出相应的报告。

这时大平作为见习官，责任不大，工作总的来看是较轻松的。当然，也有的时候工作很繁重。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中国华北制造了“芦沟桥事件”，正式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准备这场战争，日本的国民经济迅速进入战争轨道。军需物资需求量迅速扩大，铁、煤、石油、橡胶、铅、铜等战争必需品的生产严重跟不上迅速扩大战争的需要。日本只能在扩大国内生产的同时，花钱到国外购买和向海外扩张经济。这就势必增加财政负担，这些负担只通过增税或发行公债的方式转嫁给百姓。马场大藏大臣为此提出了“中央、地方统一税制改革方案”，计划用增加税收和公债发行数额的办法为扩张国力，满足军需提供费。为了制定这项改革方案，大藏省全体动员，大平和她的同事们常常从白天一直工作到深夜。

但在他争全面爆发前，大平他们在机关中过着相对悠闲的生活，大平称之为“一半学习，一半游玩”的生活。当时这些见习官们举办了读书会，大家热心地轮流交换阅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凯恩斯的《货币论》、瓦格曼的《景气变动论》、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等各种观点、各个流派的书籍。在当时军国主义紧张气氛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年轻的见习官们也开始探索自己在日本政治中究竟应起

什么作用，也日渐感到苦闷。参加读书会的除与大平同期进大藏省的官吏外，还有一些早一点进入的前辈，如桥本龙伍、石原周夫、石野信一、黑金泰美等人。以后又进来一批较大平晚的新录用官吏，如村山达雄（后任大藏大臣）、稻田耕作、佐藤一郎（后任经济企划厅长官）等，他们以这个读书会为中心，前辈们带着后辈们了解大藏省内的情况，然后大家一起出席欢迎会和宴会。欢迎会往往在筑地的“治作”饭庄举行，宴会则常安排在银座的“可川”小饭庄。到这个小饭庄用餐的客人主要是大藏、外务、司法各省的官员和《朝日新闻》的人。大平正芳酒量不大，但每次都参加这些欢迎会和宴会。到了夏日，只工作半天，这真是“读书会”的黄金日子。到了中午12点，大家就跑到镰仓的海边，租下鱼铺子二楼的房间，整个下午和晚上游泳，打麻将或读书，尽情享受这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单身汉生活。大平除了过这种生活外，还保持着学生时代的习惯，特别爱读书，尤其喜欢读文学和哲学的书，尽量多吸收各方面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当别人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时，大平却深藏不露，虚心听别人谈论，表现出一种年轻人少见的稳健性格。

当时大藏省食堂的饭分为两种，高等官吃三角钱的“雪”灶，见习官吃一角钱的“松”灶。当见习官改吃“雪”灶时，就意味着他快要成家了。正如大平后来回忆：“有的人开始谈恋爱，有的人开始组建家庭。对于必须出席的读书会不再那么感兴趣的人也陆续出现了。”

大平不久也成了这种人。1937年3月，进入大藏省的第二年，大平经人介绍认识了铃木三树之助的次女铃木志华子，仅认识后的一个月，他们就“闪电般”举行了婚礼。婚后大平把新居安排在东京都杉并区和田本町852号。刚过了两个多月的新婚生活，1937年7月1日，大平被任命为司税官，到横滨担任税务署长。兼任辖区内继承税审查委员。这样，大平结束了一年多的见习官的日子，开始享受高等官的待遇，工资由75元增到137元。当时这种工资待遇对于年轻人是相当高的，因为一般雇工只有5元，私立大学毕业生也仅50元。

### 初出茅庐的司税官

1937年7月7日，当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发动“芦沟桥事变”时，大平正芳到横滨赴任税务署长。他先住在红叶山官舍，两个月后又搬到矶子区的芦名桥。这里的住房环境幽雅，离海边只有一条街，有一种海滨气氛，大平觉得很不错，便把妻子接来。次年，大平的长子正树就出生在这里。

神奈川县首府横滨距东京的外港仅30公里，是日本第三大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但大平到任时的横滨却完全不像它以后在全国的地位。当时，关东大地震对横滨造成的创伤尚未彻底治愈，横滨的外贸主导权已逐渐被东京的日本桥和九之内的大公司接管过去。丧失了外贸主动权的横滨日益沦为替其它城市进行外贸充当中转货物的港口，其经济发展不仅不能与东京、大阪这些特大城市相比，还远远落后于以前发展水平低于自己的神户、名古屋等城市之后。因此，横滨的税收工作很难有大的起色，大平税务署长虽有抱负，也难以施展才能。

横滨税务署是东京税务监督局管辖的64个税务署中的一个。原只有这一个税务署，大平赴任时又新设一个神奈川税务署。大平手下的工作人员有80人左右，其中很多人比大平年长，进大藏省工作的时间也长得多。大平的任

职，表明了当时的大藏省对年轻官员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但大平在那种客观条件下不大可能有较大作为，每天他坐在署长座位上，一边观察署里的动静，一边机械地在那些堆积起来的文件的指定位置上盖图章。除了每日上班，日常应酬也很频繁。横滨因是港口城市，离首都又极近，因此这里住着不少外国人，如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和印度人等，英国总领事馆常举行要穿礼服的招待会，大平也多次应邀参加。当时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上下尊卑关系很明显。一般署长很少同下级讲话，也从不和署员一起外出旅行。但大平署长却与众不同，他曾同署员一起到伊豆的土肥温泉作慰问旅行，和下级们不分尊卑，一块儿游玩喝酒。他有时还与大伙一样，穿着兜裆布在海滨浴场游泳和摔跤。还有一次，伊势崎街的一家店铺因滞纳税款，被大平手下署员查封了商店陈列窗。大平路过这里看到封条后觉得过意不去，就撕下了封条。

因此，在同事们眼中，大平署长是位平易近人，体察下情的领导。孰不知这正是大平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以和为贵”、这种处世原则与他以后作为政治家的信条是一致的。他在当上政治家后就曾表示：“诉诸权力是最后的手段，希望政治家流着冷汗谦虚地反省自身，以真诚寻求理解的‘和’的政治为信条”，“避免显示强力和野蛮的对立、抗争”。这种原则换一种解释，就是大平的“中庸哲学”，大概是吸收了东京商大时代中山伊知郎老师的“经济平衡理论”，把它应用到处理工作中的矛盾上来。大平在1938年元旦前夕的新年团拜会上，向全署同事表达了他的这种“中庸哲学”：“行政如同椭圆形一样，有两个中心，当这两个中心处于既平衡又对立的状态时，这种行政就是完善的行政……税务工作同样如此。一个中心是征税权，另一个中心是纳税者，既不能仅凭权力强行征税，也不能轻易向纳税者妥协。只有贯彻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中正的原则，才是合情合理的课税方法”。

在横滨税务署，大平正芳第一次见到了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有巨大影响的地田勇人。池田勇人是东京税务监督局新上任的直接税部长。他出身于京都帝国大学，1921年进大藏省。他所担任的直接税部长一职，是管辖区内各税务署长的，税务署长遇到无法处理的业务问题都请直接税部长处理，因此池田成为大平的顶头上司，大平因工作需要常去会见池田，池田也不定期地到横滨来指导大平这位初出茅庐的司税官。两人虽接触数次，大平每当池田来时仍多少有些紧张。池田对大平的工作既有鼓励，也有批评。大平都谦虚地接受，二人关系十分融洽。

### 取缔私酒真难

在横滨工作一年时，1938年6月，大平正芳被任命为仙台税务监督局的间接税部长，上司规定大平限期赴任，前往仙台须经东京。赴任那天京滨地区遇到台风和暴雨、洪水的袭击，横滨到东京之间的交通断绝。大平为了按时赴任，仗着自己水性好，只穿了一条裤衩，头上顶着皮箱，样子活像个脚夫，涉水渡过了六乡川。为此，上任不久便因脏水感染，患痔疮住了医院。

仙台现在是本州东北部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但在三四十年代这里并没有大型工厂，街道清洁而宁静。当时这里又冷又穷，人烟稀少，居民收入不高。因此，税收来源也不多，只有酿酒税是最大的税源。在征酒税的同时，大平正芳为首的间接税部又遇到了令人棘手的“取缔私酒”的工作。

所谓“私酒”就是指仙台当地农村百姓自酿自饮的“浊酒”。这是一种类似米酒的饮品，造法很简单：在米饭中掺进酒曲子，然后用水溶化即成。由于地广人稀，酒铺隔好几里才有一个，酒价又贵，冬天又特别冷，所以一般老百姓都自制这种浊酒，冬天自己喝点暖身子，平日休息小酌一杯，红白喜事招待宾客皆用这种酒。老百姓都认为这种自造自饮酒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妥，不关他人之事，也不向政府纳税。但是，1899年颁布的酒税法曾规定，凡含酒精一度以上的饮料均属酒类，不能免税。况且这种酒从卫生角度看也不利于身体健康。从这两方面考虑，日本政府决定取缔这种私酒的生产。当时仙台税务监督局间接税部的三百名职员几乎有一半人的专职工作是取缔私酒。也正因为这项工作特别棘手，大藏省在挑选仙台税务监督局间接税部长的新任人选时，感到很为难，不知挑选谁去承担这一麻烦差事。最后由池田勇人推荐，认为大平正芳才能出众，应让他去担任这项别人都不大愿干的职务。于是大藏省就任命了大平。

直到30年代初，间接税部取缔私酒的主要手段都是采取强制性取缔，但1932年，在秋田县查处私酒时，一位老大娘为逃避追查不幸摔死，在当地引起轰动。加上当地整村百姓常联合抵制查处，不少地方还发生暴力反抗事件。针对这些情况，官方改强制取缔为主的手段为以教育为主，查处为辅的方法，在秋田县和岩手县成立了“私造酒类矫正会”这种宣传组织，企图通过大力宣传来教育百姓酿造私酒的危害。该会以县知事为会长，地方检查厅厅长、地方法院院长和税务监督局局长任顾问，担任干事的有教育部长、警察部长、副检查厅长、部长审判官和间接税部长，并征求地方名流的意见，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制订宣传和取缔措施。大平对这种作法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包罗万象的政治性工作，与卫生习惯、社会风气和官方政策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不应由税务部门主管。但因职务关系，大平仍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这时在另外四个县也成立了“私造酒类矫正会”，在几个县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上，编辑了一本题为《私造酒类矫正措施》的宣传小册子，长达二百多页。小册子的序言大平也参加了撰写，他在序言中分析了东北地区私造酒泛滥的原因，在于饮酒量过多，百姓守法观念松弛和道德观念欠缺。他认为，“对这种社会疾患如果放任不管，农村的再生和教育的振兴将化为幻梦，农村的经济会遭到根本的毁灭”，并表示对东北地区酿造私酒的行为“将借助国法的权威，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坚决加以矫正。这本宣传册以后成为仙台税务监督局的行政指南而沿用数年。

当然，宣传教育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酿造私酒的现象，对造私酒者进行的处罚照样施行。税务局的私酒监视班常在晨曦未露时便出发去各村搜查，如果搜出谁家有盛浊酒的酒缸，当场就进行审讯，并给予处罚。轻则罚款，重则拘留或坐牢。东北农村老百姓本来就穷，连酒都买不起，正因为如此才自造浊酒自饮，现被查出后为了支付罚款往往倾家荡产，还有的甚至卖儿鬻女。农民一年到头都起早摸黑地劳动或外出谋生，留在家中的往往都是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他们实在交不出罚款就代年轻人去坐牢。大平正芳目睹此惨状，感到不胜悲哀又无可奈何，他在从政之后曾回首这些往事十分感慨：“东北地区如此贫穷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从国家得到好处，还要在征税的桎梏下过着痛苦的生活……这是何等悲惨的命运啊！我对于国家以至国法的冷酷约束产生了某种反感。”这无疑是对当时日本政府与国民之间关系

的深刻反思。

1939年5月的一天，在仙台工作近一年的大平正芳突然接到大藏省次官大野龙太发来的电报：“望速来京。”接到电报后大平感到提心吊胆，因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什么事都可能降临到头上，在横滨时就有同事被征召入伍，有的已在中国战场送命，如今不知又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 第一农到中国大陆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这些被占领的中国领土超过日本本土许多倍，如何对这些占领地区实行统治，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部非常关心的问题。为此在政府和军部之间出现了争执，最后决定在内阁中设立“兴亚院”这一专门机构，负责制定和执行对日本占领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政策，监督在华的特殊公司，统一内阁各部门的对华行政事务。1938年12月16日兴亚院作为日本内阁的一个专门机构正式成立，首相兼任兴亚院总裁，外务、陆军、海军和大藏四大臣任副总裁，实际负责人是兴亚院总务长官。兴亚院总部设在东京，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张家口和厦门四地设该院联络部，需要派官员到这些联络部去。大野次官正是为此事找到了大平正芳。

大平在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就赶回了东京大藏省，见到了大野次官和秘书课长山际正道。正好该吃午饭了，大野提议到外面去吃一顿饭。大平稀里糊涂地跟他们两个到了芝区一家饭馆，用餐快完时大野才书归正传地告诉大平，建议他到张家口的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去工作，并且为大平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前景：“张家口这个地方冬暖夏凉，生活方便。你到那里马上就像当地的大藏大臣，在那里工作，简直就像在白纸上画画一样，可以任凭你的意志去搞财政经济。”

大平当时虽年轻，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容易冲动，但他性格

稳健，所以也未在餐桌上贸然拒绝或答应这一突如其来的建议。他想了下回答道：“我已成家了，让我考虑一两天，同家属商量一下再给您答复。”在离开饭馆回家途中，大平在一家书店买了一张中国地图，查看了一下华北和内蒙的情况，发现天津和张家口正好以北京为中心，几乎等距离地分布在北京的东西两侧，似乎距北京都不太远。大平想应趁年轻时到处游览一下，而且在北京和天津有不少要好朋友，到周末还可以从张家口去同他们一起欢聚。于是大平并未同在仙台的妻子商量，就决定不带家属去上任，次日便向山际秘书课长表示了愿去张家口。于是在1939年的5月31日，大平正芳便成了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事务官，薪俸比在仙台时又加了一等。

从仙台将家眷接到东京安顿好后，大平于6月15日离开东京单身前往中国赴任。在铁道管理部门工作的商大时的同窗好友长尾赖隆在下关（马关）迎接大平，并在饭店为老同学接风送行。他发现大平在言谈中流露出一种寂寞的心情，似乎有“西出下关无故人”的感觉，仿佛已预感到在那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将会受到的冷遇。

从下关乘船到韩国的釜山，经汉城、平壤进入中国，又经奉天、北京到达了张家口。大平正芳到张家口以后，发现完全上了大野次官花言巧语的当。张家口与大野说的完全不一样，给大平的第一印象这是一座“黄土城市”，

没有一棵树，凛冽的朔风常卷起一阵阵沙土，使人感到极不舒服。饮水的硬度很高，泡茶无味，饮用后还常腹泻。有时屋里还有蝎子出没。

更令大平不快的是兴亚院的蒙疆联络部所处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在张家口行使实际统治权的是日本军方，具体是莲沼著中将率领的日本驻蒙军。在这支军队操纵下，1937年先后在内蒙和山西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和伪“晋北自治政府”，以及所谓的“蒙疆联合委员会”，这些侵略性机构又同时受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的行政节制。后来日本内阁成立的兴亚院又插手进来成立了“蒙疆联络部”，实为一种“叠床架屋”式的管辖方法，反映出在对中国北方统治的问题上日本内阁同军方的矛盾。因此，大平等兴亚院的官员的到来，自然受到掌握实权的日本军人的冷遇。正如大平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在张家口，校尉级的日军青年参谋可任意行使权力，对兴亚院来的人态度冷淡，把这些人看成是多余的累赘，几乎要冲着大平等人的鼻子说：“你们是干吗来的？”因此，大平虽去后几个月就担任了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课长，但仍闷闷不乐。

大平去后的9月，内蒙古、察南、晋北各个伪“政府”合并，成立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日本人让内蒙古当地统治者德王当“自治政府”主席。当时整个内蒙古人口约有七八百万，绝大部分是汉人，蒙古人仅有二三十万。因此大平认为让蒙古人德王担任自治政府的主席，这件事本身就很不自然。当时的大平并不理解所谓“蒙古自治政府”不过是日本侵略军为了将中国中西北部地区变成日本殖民地而扶植的傀儡。监视这个傀儡政权的是日军顾问金井章次，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是酒井隆中将。酒井中将尽量注意避免同军方发生摩擦，时常袒护兴亚院来的官员，这使烦闷的大平感到一丝宽慰。

由于军人的飞扬跋扈，使大平课长并不能像大野次官所鼓吹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展工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只是十分不愉快地混日子，因而大平对这些军人非常厌恶。他并不想在此地施展什么抱负，只是打算四平八稳地混过去，以免招来是非。

当然，一向稳健务实的大平终究还是有进取心的官员，在逐渐适应了这种复杂环境之后，便逐渐开始困难地展开自己应负责的工作。当时日本对蒙疆的经济政策中首要的是制订和实施投资计划和物资动员计划，实质上是日本为了加紧掠夺中国北部的矿产资源，适应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制订和实施的计划。日本和蒙古合办了大型的龙烟铁矿公司和大同煤矿公司，就是这些计划的对象。由于这两个公司生产规模大，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机械设备和消费品等数额很大，每年皆要由大平所在的蒙疆联络部根据日本的“物资动员计划”提出方案，与兴亚院东京总院交涉审定，再交到企划院裁决。大平为此对这两个大企业的经营情况作了深入调查和精密分析，制订出详细计划报送东京总院。东京总院经济局经济二课的滨田祐生由于非常憎恶关东军的过火行为，往往对受关东军节制的“蒙古自治政府”方面的报告严加审查，一般很难通过。但由于大平正芳的精心准备，上报的计划都很容易获得批准。大平在从事这些工作时，表现出了精明强干的处事能力和敢于向上司陈述己见并力争上司采纳自己意见的顽强精神。

1939年10月17日，大平的次子裕在东京出生。在这时，大平被任命为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课长。

大平作为经济课长为了进一步参与对蒙疆地区的经济管理，而开展了对

这一地区经济情况的调查。这种调查有时很仔细，大平等人乘汽车在无边无际的蒙古高原走好几个小时，到一些边远小村落去走访蒙古包，调查牧民的家庭财产情况。通过调查他发现日本当局完全不了解中国内蒙地区的经济状况，对这一地区进行瞎指挥，造成对被占领地区经济政策矛盾百出。东京方面严格在内蒙地区实行低物价政策，但由于日本军队在这一地区控制的范围不大，只控制了一些点与线，这种低物价政策只能对日本人掌握的某些经济部门如煤炭、盐、铁路、运输、电力、电信等实行，而对广大农村收购农产品时只能实行高物价。因此这种政策根本渗透不到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中去。

在调查过程中，大平正芳亲眼目睹了日本军人在内蒙地区作威作福，干下令人发指的勾当，他对这些军人感到深深的厌恶，同时也为文官政府不能制止军人的这些胡作非为甚至想利用军人的丑行为自己谋利而感到气忿。他认为那些拜倒在权力象征的参谋肩章之下，一味服从军人，或企图利用军人权力的当权者和民间人士，也应对此负责。当然，大平并没有想到，他到中国工作乃至以后回到兴亚院任职，也是同许多善良的日本人一样，不自觉地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侵略别国的工具，实际上也同当时大量的日本同胞一起在自己一生的履历中留下了一个抹不掉的阴影。

在如此环境中工作的大平实在不想再呆下去。1940年夏，大平在张家口的任期快结束了，但接替自己的人尚未找到，许多人都不愿到张家口去工作。大平着急了，到东京出差时找到山际正道秘书课长询问此事，山际让大平自己寻找到继任人再回日本。大平立刻想到佐藤一郎，他比大平晚一年进大藏省，当时正在企划院工作。于是便邀佐藤一郎到银座的饭馆吃饭。在饭桌上他给佐藤讲了中国古代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自幼喜爱文学的佐藤一郎，他也非常想去亲眼目睹一下与这些传奇般故事有关联的神秘地方，当场便欣然答应去张家口接替大平。从这件事和以前大平力争让上级部门采纳自己的意见之类的事中，已初步显露出大平的外交才能。

## 在“兴亚院”总部

1940年10月，在中国工作了16个月的大平正芳终于接到盼望已久的回国调令。在回国之前，他到中国东北各地参观旅游了一段时间，于10月下旬返回了东京。他以后在回顾这段在张家口任职的岁月时曾感慨道：“在张家口度过的一年半左右期间，可以说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来研究一个朴素的国家的缩影。”回到东京后，大平被分配到兴亚院总院经济部二课，具体工作是监督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也同兴亚院一样，是日本推行侵略中国政策的机构，不过兴亚院是政府管理机构，这两个公司是经济实体。它们的任务是向华北和华中地区的铁路、电力、煤矿、铁矿、制盐、电信电话和水运等行业的子公司进行投资与贷款，间接协助占领地区的行政事务。这两个公司是特殊法人，在华的众多子公司相当于当地法人。日本政府对在华子公司无力一一操纵，便以这两个大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或贷款合同，间接插手子公司的业务，实现对子公司的指导和监督。大平正芳就是分管这项工作。

由于这些接受投资和贷款的子公司不仅本身就具有经济实力，而且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与日本军部和政府保持着联系，因此，往往不完全受上述两

家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当时华北开发公司的总裁就是曾任第一届近卫文磨内阁大藏大臣的贺屋兴宣。他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加强本公司对华北地区各子公司的控制，拟定了一个在华北地区大搞资源调查的计划。贺屋准备聘请大村清一任副总裁，主持设立一个庞大的调查局，并提出了预算方案。因大平正芳对这一预算草案审查极严，激怒了贺屋兴宣总裁，两人发生了正面冲突。最后，经过铃木政务部长的从中斡旋和调解，调查局虽然成立了，但财政预算被大幅度削减和压缩，内定副总裁大村清一也因此拒绝上任。这件事在兴亚院引起较大反响。当时任兴亚院经济部第一课课长的毛利英放曾善意地提醒年轻气盛的大平：“官吏与飞机一样，起飞和降落一瞬间最为重要。你现在正处于要起飞的阶段，最好不要跟领导太顶撞。”大平很感激这位心地善良的前辈语重心长的劝导，并作为今后在仕途中谨慎行事的明鉴。他事后也觉得自己当时太过于任性了。

兴亚院这种临时组成的应急机构，不同于内阁其它各省那样职权分明，大平认为它是由各单位拼凑起来的集体。其内部设有财务、经济、文化、技术等各部，部长以下的职员是由各省厅根据各自业务派来的。虽然各省厅之间有矛盾斗争，但各省厅派来兴亚院工作的人却结下了超越部门界限的友谊，这无疑又为大平提供了一次广交朋友的机会。大平先与其他六名年轻的事务官组成了“七贤会”，后又加入两人成了“九贤会”。除大平外，还有大藏省来的大槻义公、宫川新一郎、若槻克彦，满铁来的佐佐木义武，通产省的村田恒、鹿子木升、农林省的伊东正义、铁道省来的矶崎睿等人。这伙年轻人常一块儿喝酒，在酩酊大醉中结成了友谊，所以大平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吃喝玩乐朋友，游山玩水交情，怎么也谈不上是君子之交。这些人后来在政坛和所任职位上都显示出了各自出色的才能。而且他们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大平稳健老成；佐佐木天真无邪，留下不少逸闻趣话；大概感情细腻，富有人情味；村田有骑士风度，自己喝醉了还要照顾别人；鹿子木虽不善言语，却有海量；宫川多愁善感，伊东一醉就高吟“男子汉感情纯真……”。他们之间的友谊延续了许多年，有机会过经常聚一下。照矶崎睿的说法，他们几人“像一伙江湖义士，义重如山，亲同手足，简直像九条一起嬉戏的狗，始终保持着最平凡的友谊。”他们中有的人以后成了大平正芳的政治盟友。

除了“九贤会”的朋友外，大平还交了一些别的朋友，如以后担任驻美大使的武内龙次、以后担任最高法院长官的冈原昌男等，他们常在中午休息时与大平对弈。大平因负责监督投资和贷款业务，故得到了兴亚院主管金融工作的石田正的指导。又因要管理包含各行各业的在华子公司，他又求助于在横滨商业学校讲授经营管理的山城章，两人曾在大平岳父的热海别墅里一起草拟文件。大平为了感谢山城章的帮助，还请他担任兴亚院帮办，去中国旅游了一趟。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太平洋上的美军基地珍珠港，从而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2月30日，大平的女儿芳子出生。第二年的7月30日，大平结束了在兴亚院的事务，奉命调回大藏省。

### 严厉的主计局事务官

大平正芳回到大藏省之前的1942年6月，正是战争狂人东条英机担任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时期，日本舰队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岛海域同美军舰队发生

激战。中途岛是夏威夷的前沿屏障，日军发动此次战役的目的，是企图占领中途岛美军基地，摧毁美军在中太平洋上的海军主力舰队。会战结果，日军遭到严重挫败，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和大量飞机，使日军丧失了在中太平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作战能力，从此转入守势。这一战役的失败震动了日本朝野，致使日本全国的人力物力皆被动员起来投入战争。大藏省主计局的编制预算工作也被纳入战时体制，各部门向主计局提出的各类预算方案也都可以看到战争的影响。

中途岛战败一个多月后，太平正芳调到了主计局。主计局是大藏省核心机关之一，负责拟订和执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储备金，调查和审议各省厅报来的财政预算，起草有关财会制度的文件等工作。在当时战争气氛的笼罩下，大平被任命为文部省和南洋厅的预算主查。这时文教部门也为了适应战争扩大的需要，强烈要求振兴科学技术，加强人才培养，大量增设学校，于是向大藏省主计局提出了庞大的预算方案希望政府拨款。文部省提出要新设 15 所高等工业学校和 11 所医学专科学校。

一向对军国主义和战争持厌恶态度的大平接到如此庞大的预算方案，无法克制内心的义忿。他对文教这种部门被纳入战争轨道简直难以容忍，认为这根本不是办教育，而是兴建一些华丽的校舍来炫耀办学成果，搞一些毫无成效的速成培训。因此，一向务实的大平对文部省的这种华而不实的要求坚决严格把关，基本持否定态度。经过严格测算，发现即使不增设学校，不增加班级，仅利用现有设施培养目前的在校学生，当这批学生毕业而文部省申请增设的学校尚未兴建竣工时，已能完全满足当时社会需要。所以，文部省增设学校的申请基本上被大藏省否决。后来由于大臣之间的私下商定，仅增加了高等工业学校和医学专科学校各一所。

大平接着面对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创建日本育英会。这一问题的提出早在 1931 年春，当时便有人提出应由政府出资建立日本育英会，帮助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青少年。但这时要求政府的资助究竟是向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还是向这些学生提供贷款，尚未明确。助学金是用不着偿还的，而贷款则需按规定偿还或还要附加一定利息。到 1931 年底，在国民教育议员联盟的众议员三宅正一主持下，拟订了一项向五万名学生贷款助学的宏大方案。次年 2 月，国民教育议员联盟向国会提出了“创建兴亚育英基金制度，确立大东亚教育体制建议案”。这一提案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随着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占领地区的扩大，需要众多的管理人才输送到这些地区；二是让国内许多有学习能力但无经济承担力量的辍学者能获得受教育机会。议员联盟提案的真正用意在于后者，但因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一切部门都逐渐被纳入“准战时体制”，故将第一层意思也包含进来，以期获得通过。国民教育议员联盟会长永井柳太郎还在国会中发表讲演对这项提案加以说明。他认为“教育之机会，应不拘身份高低，广泛开放于国民之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中潜在的良智良能。此乃国家兴隆之根本，亦为政治之最高理想。”接着他又阐明当时日本教育的现状，仅有五分之一的小学生能升入中学，因此建议国家创建兴亚育英金库，向贫困学生借贷学费。永井的讲演博得国会议员的共鸣，提案顺利获得通过。

但后来由于战争迅速扩大，育英会迟迟未能建立。直到大平正芳担任大藏省主计局主管文部省预算的主查时，因战局的变化，加速培育人才的呼声又趋高涨，育英会的建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命主计局长

植木庚子郎和大平正芳负责办理育英会创立的具体工作。

但是，这时育英会创立的宗旨和方针仍不大明确，创建的目的究竟是培养百里挑一的“英才”，还是扶持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青少年？对学生究竟实行免费助学（即无偿发放助学金）还是贷款助学？在这些问题尚未明确的前提下，大平就开始着手筹建育英会了。结果大平制订的方案受到指责。根据大平理解，既然是由国家创办育英事业，就应该搞免费“助学”，即向受益学生无偿发放助学金，这样一来当然不可能使很多人受益，只能使少数“英才”获益。而且大多数贫困学生皆因各县政府和民间慈善机关已创办了许多育英事业而获得了帮助，用不着国家再帮助了。根据这种理解，大平就决定把整个小学六年级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十作为可以享受国家育英事业的基本人数，乘上因贫困和死亡不能升学的比率，然后减去从现有的育英事业中可以得到救济的学生人数，从而算出育英对象的人数。而且通过试算，了解到把对象人数减少一半，就不用搞贷款制，而可以搞免费制。所以大平就以“免费上学”这种思路拟订了育英方案。这一方案也是对以战争需要应加速培养人才为借口而盲目要求增加财政投入的倾向加以抵制。这一方案不仅比议员联盟起初设想的援助对象是20万学生的人数低得多，而且比文部省经调查后拟订的受援学生为3万人的数字还要低。所以大平的这一方案遭到议员联盟的反对，文部省也不同意，大藏省的上司也批评他卡得太严了，建议进一步放宽享受对象的人数。

文部省的学艺课长剑木享弘（后为文部大臣）冒着盛夏酷暑，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到大平正芳的办公室来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希望能修改他的草案，但很难奏效。后来大平的直接上司植木主计局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平吐露了肺腑之言：“我出生于贫苦家庭，家里根本不可能供我升到更高的学校念书，我只好改姓给别人当养子，由养父家供我上了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一个男子汉要改变自己原来的姓，确是一件痛苦之事，但因家境贫寒和自己求学心切，也只好不得已而为之。但如今的日本，恐怕还有许多人与我当年境遇一样，不得已而辍学。我不忍心让后来的青年再感受这样的辛酸，为此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为促成这项制度而努力。希望你能考虑尽可能让更多的青年分享这一恩惠。”

望着植木主计局长含泪请求的诚恳面容，大平也回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的艰辛生活，也想到自己是因香川县育英会和镰田共济会的援助才得以进大学深造，于是他像冰雪在阳光下溶化了一样，心情豁然开朗了，决定把助学金改为贷款，大批增加享受对象人数，并把修改后的方案提交了国会。

1943年10月18日，日本育英会正式宣告成立。它是在日本对外侵略开始转向失败，国内财政十分困难的形势下出现的。在日本战败后一段时期内，为许多因经济衰退而无法就学的青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到日本经济重新起飞后，育英会继续存在并日益受到重视，为日本教育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年后植木庚子郎在福井县与大平正芳在香川县同时参加国会议员竞选，他在对选民的竞选词中提到他同大平合作创立日本育英会之事，把这件事称为自己“终生难忘的一个纪念碑”。

## 宛如甘霖的酒

1943年11月，大平正芳调到东京财务局当间接税部长。在这之前他曾

调到外资局短期工作。这时池田勇人正在大藏省国税局第一课任课长，即将调任东京任财务局长，他建议大平到他手下去任间接税部长，有心栽培这位精明强干的年轻官吏。大平欣然接受了池田这一建议。

随着侵略战争的深入，日本社会的消费品日益匮乏，战争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使社会经济渐趋凋弊。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酒类的生产，产量由1936年的414万石下降到1942年的186万石，只能实行配给供应制了。税务机关被指定负责酒的配给工作。

战时酒的酿造和销售均由政府管制，酒的配给分为军用、工业用等特殊业务用酒，一般饮食店的业务用酒和家庭用酒三类，家庭用酒配给极少，每户每月仅2合左右，一般饮食店配的酒每月也仅二三升左右，饮食店主无法用这么少的酒来从事正常营业，只得将其配的酒流入黑市卖高价或自家留用。正在这时，东条英机政府实行了“享乐禁止令”，提出了“享乐就是敌人”的口号，老百姓生活愈加困苦，除了大众化食堂外，一般菜馆酒店全部关闭。这样，一般饮食店的业务用酒已得不到配给。大平正芳认为，长此以往，这些酒肯定会被调到军用或军事工业使用上去，而广大民众却喝不到酒，这正是他最反感的现象。当时日本国民已出现“厌倦战争、疲于艰苦生活与繁重劳动的情绪”，大平非常理解这些普通百姓的苦衷，他认为有必要让人们干完一天的工作之后，能到啤酒酒店喝上一杯啤

酒解解疲劳，或者喝上二三两清酒解解愁。于是他想了个点子——开设“国民酒店”，草拟了“有效配给业务用酒纲要”，设法利用被关闭的店铺，雇佣失业人员开设酒店，向酒店配给业务用酒，让市民用这些酒“滋润于渴的喉咙”。同时饮食店也正切盼重新开业，保住配给酒量。

大平为使这一纲要付诸实施，征得了监督饮食业的警视厅的同意，取得了酒类商店的合作。“国民酒店”共104所，于1944年5月5日在东京35个区同时开业，每个酒店每日傍晚开业售酒和少量下酒小菜，每店容纳人数为250人左右。不久这种酒店便增加到300多家。

“国民酒店”出售的酒虽然不多，每人排队只能购清酒一合或啤酒一瓶，但在当时物资匮乏，战争灾难随时可降临到每人头上的环境下，这一举措却博得了市民意外的好评。大平正芳的“有效配给业务用酒实施方案”，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开来，各地陆续开设了“国民酒店”，奢望不高的平民百姓纷纷排队购酒，大平就亲眼看见一些家庭主妇在队列之中。这宛如甘霖的酒不仅滋润了市民干渴的喉咙，而且缓解了市民因战争和加倍工作而造成的身心痛苦。大平仿佛做了一件功德无量之事而感到欣慰。

还有一件有关酒的轶闻趣事。1944年秋天开始，美军B29轰炸机开始对日本本土实施袭击。1945年2月23日美机轰炸东京，东京财务局设在大手町的机关中了燃烧弹全部焚毁，大火迅速蔓延到存放重要文件，文具用品和印刷机等物品的地下室。那天正好星期日，大平值班，他赶紧督促值班人员从神田川排着长队传递水桶，拼命地灭火。但火势太大，这种方法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平急忙跑到有消防水泵的皇宫护城河边，请求消防队员们协助，但疲劳的消防队员们已不愿再动弹了。大平突然想起刚才有个警卫人员把一缸清酒放在一个下水道的工作口里，便急中生智对消防队员们说，若他们能帮忙灭火，则愿将酒奉送。消防队员们一听有酒便精神抖擞，将已收拾好的水管重新打开伸进护城河中，最后灭了大火。大平正芳因此获得了池田局长的奖励。

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一些有权的警察与酒店老板勾结，白喝市民用酒的事时有发生，引起市民反感。但大平虽主管酒的配给，却从不以权谋私，甚至常常克制自己对酒的嗜好。一次他到池田局长家去做客，高兴地对池田夫人满枝陈述市民排队买酒的好消息，对“国民酒店”的成功颇感得意。满枝看他身体健壮，又是主管配给酒的官员，便取出烧酒请大平喝，但大平却推说自己不会喝酒，满枝觉得不可思议。

## 在津岛大藏大臣身边

东条英机内阁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宣布倒台。1944年7月成立了由小矶国昭为首相的新内阁。1945年2月底，津岛寿一接替了石渡庄太郎的职务，进入小矶内阁担任大藏大臣。津岛到任后立即进行了人事调整，池田勇人由东京财务局长调任大藏省主税局长，黑金泰美和大平正芳被任命为津岛大藏大臣的秘书官。大平又得到一个学习做秘书工作的机会，并且在津岛大藏大臣身边也可换一个视角，站在全局来观察许多问题。

津岛寿一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大臣，他很少回家，喜欢在永田町的大藏大臣官邸工作和休息，因此家属也常在官邸生活。黑金和大平两位秘书官只好轮流在官邸值班。而大平运气很糟，轮到他值班的夜晚都遇到了美军空袭。有一天空袭时他领了津岛大臣的家属躲进了防空洞，津岛大臣却若无其事地照常办公，在大平秘书官的再三劝告之后才进入防空洞。

小矶内阁在日本即将彻底战败的形势下，决定同中国国民党媾和，但受到外相重光葵强烈反对，于是1945年4月，小矶内阁宣布辞职。以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为首相的停战内阁上台，津岛只当了45天大藏大臣便去职，大平又回到了主计局。津岛去职后，还常邀请大平等老部下去下二番町他家中作客。

1945年5月25日夜，大藏省前次官田中丰和大平等人正在津岛家的院子里作客时，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空袭。美军B29轰炸机编队袭击东京。在市内投下了雨点般的燃烧弹。津岛家也中弹起火，大家决定躲避危险。大平带津岛夫人和女佣逃到半路时，夫人却要大平返回将忘在佛龕上的观音菩萨像救出来，大平只好冒着危险返回，从大火中救出了观音菩萨像，但却与津岛夫人走散。大平抱着沉重的金属菩萨像前往四谷车站，途中险些被包扎着大铁环的燃烧弹击中。深感恐惧的大平把菩萨像放在站长室里，就跑到车站附近的一个燧洞里过了一夜。次日又抱着菩萨像颇费周折地在下二番町的一间小房里见到了津岛全家。但回到津岛家所在地，其住宅已燃得荡然无存。大平急忙赶回自己的家，看到自己家和岳父家全部烧光，钢琴的弦线烧得像麦芽糖似的掉落在地上。大平庆幸自己的家属早已疏散，自己则到世田谷区的乌山租了房子，每天从这里到世田谷区樱上水的主计局去上班，直到战争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天大平和主计

局长中村建城等人在樱上水的小学听了天皇的录音广播。中村听着广播流下了眼泪，而大平却像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觉得应该到来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大平对军人的胡作非为早就感到厌恶，并已在此之前就通过观察知道了日本必将战败。他认为作为日本人对日本战败这件事也许感到遗憾，但如

果日本由于军部的独断专行而取胜，也许世道会变得更加可怕。而且。那样的日本也注定很快要垮台。显然大平从内心讲是厌恶这场战争的，尽管他当时并未认识到这场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日本宣布投降后，铃木内阁立即辞职。8月17日，由皇族东久迩宫稔彦为首相的新内阁组成。这实际上是在非常时期的一个过渡性内阁，存在时间仅51天。津岛寿一再次作为大藏大臣加入内阁，大平正芳和宫泽喜一当上津岛大臣的秘书官。

原有的大藏省官邸已毁于战火，津岛大臣在碑文谷临时借用的房子里办公，常从晚上工作到凌晨一二点钟。大平秘书官也只好奉陪办公。但当早晨大平醒来时，津岛又坐在办公桌前处理这非常时期繁忙的公务了。津岛处理公务井井有条，他对下属发出的当天工作的指示，常用漂亮的毛笔字写在纸条上，纸条上还注明送给哪位部门负责人，如“交次官”、“交主计局长”、“交主税局长”等。大平每日上班后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向各部门分送这些纸条。

从当上秘书官那天起，大平就用条格纸记录了津岛大藏大臣每天的活动日程。这些记录被保存至今，其封面加上了《东久迩宫内阁大藏大臣日誌》的字样。这些记录真实再现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大藏大臣繁忙的活动，其中很多是抑制通货膨胀与同美国占领军交涉之事，反映出当时日本内政的特点。

8月28日，大平刚当上大藏大臣的秘书官不久，72岁的母亲在家乡去世。母亲对孩子们很严厉，却培养了大平吃苦耐劳的品格。在父亲死后，母亲和哥哥为了大平和弟妹们也吃尽了苦头。为了中学毕业的大平能有个好的出路，母亲也曾低首求人。现在，劳累一生的母亲去世了，大平深感悲痛。但由于大藏大臣每日陷于战争结束的诸项工作，大平作为秘书官也不便请假，因此不能返家奔丧，由大平的岳父、深深喜爱大平的铃木三树之助代替大平参加了送葬仪式。而大平秘书官这一天却照常工作，在他记录的这一天的日访中的内容为：“十时、内阁会议；正午，出席首相官邸午餐会……四时，会见记者；六时，部局长会议……”这一天，也是美军第一次进驻日本本土的日子，从此以后，大藏大臣开始了与占领军的直接交道。

津岛大臣首先注意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日本金融出现混乱。在上任第一天会见记者时就表示，无论如何都不采取延期偿付的措施。接着又通过种种努力，阻止了美国占领军准备在日本使用军票的行动，避免了日本的市制混乱。进入9月以后，大平在日誌中记载了不少重要内容。

“9月2日，星期日，阴，七时，首相官邸：本日在停泊于横滨的‘密苏里’号舰上，重光全权代表、梅津全权代表将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午前五时，送全权代表一行，早晨的官邸，肃然无声。”

“9月8日，阴，麦克阿瑟司令部及八千名美兵第一次进驻东京。进驻地区之一部交通中断，市内平静。”

“9月10日，阴有间断小雨，七点二十分，中央停战事务局成田第一部长来访，带来了盟军总司令部关于让出大藏省机关房舍的要求，全体职员骇然。经反复商议，拟妥善对待。”

大藏省机关于9月14日从霞关迁出，所有在此地的办公用房于15日交占领军使用。直到1956年3月才重新交还大藏省。

大平在津岛大臣身边有两件事印象最深。

9月的一天，津岛大臣命令大平通过中央停战事务局联系会见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盟军司令部很快就答复表示同意，并定了会见时间为9月23日。但当津岛大臣得知这一会见时间后却十分生气，要大平去取消这次会见。大平询问是何原因，津岛回答说：“23日是秋季皇灵祭典，是日本的重要节日。把约会安排在礼拜天或节日是极不礼貌的，按西方的礼节也是不应该的。日本虽是战败国，但我是天皇亲自任命的国务大臣。因此我认为这种安排也是对日本国的不礼貌行为，应该予以拒绝。”

大平闻言大吃一惊，他深知麦克阿瑟元帅目前是日本的“太上皇”，如果拒绝他定下来的会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便委婉地劝说津岛大臣：“您的话也有道理，不过我认为不应该拒绝。因为日美之间尚未媾和，仍处于战争状态。麦克阿瑟元帅是占领军总司令，他现在仍如同在战场上一样，这次会见也如同军营议事。战场上是不分什么礼拜天和节日的，在此情况下，即或对方有不礼貌之处，也无法责备。我认为还是赴约为上策。”

津岛大臣勉强接受了大平劝告。根据大平的“日誌”，津岛于23日上午10点先参加了秋季皇灵祭典，11时去会见了麦克阿瑟。据大平后来的回忆，他随津岛于上午11时来到会见的盟军司令部时，麦克阿瑟的副官邦克早已等候在办公室，他带着文雅的微笑，上前迎接大臣说道：“其实元帅昨天上午11点就等着大臣阁下来访了”。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许是中央停战事务局与盟军司令部之间联络上的失误，或许是盟军司令部觉察到安排不妥后作为补救措施而导演的“小品”。不管什么原因，津岛听到此话面部表情一下子开朗起来。邦克副官搀扶着他，引进到元帅的房间。津岛和麦克阿瑟不用翻译会谈了近一小时，据说话题的中心是有关解决当时极为困难的粮食问题。战时的日本，由于一切经济部门被调动起来支援前线，造成日本国内生活物资奇缺，连维持最低温饱的粮食都不能正常供应，人们每日为了购粮而疲于奔命。津岛大臣正是为此事约见麦克阿瑟的。会谈结果显然令人满意，据后来担任首相的吉田茂所著《激荡百年史》记载，1945年发放陆海军储备暂时摆脱了饥饿危机，第二年又陆续发放了驻日盟军保有的大米，并进口了粮食。这些虽不是津岛大臣与麦克阿瑟会谈的直接功劳，但会谈至少对盟军的驻日策略有所影响、使盟军不至于对日本百姓的饥饿见死不救。那天会谈结束后，津岛大臣情绪特别好，对麦帅的副官邦克上校的文雅态度赞不绝口，而对坐在他身旁粗鲁的大平秘书官却未说一句安慰的话。大平秘书官此时虽为会见圆满结束松了一口气，却对邦克上校似乎产生了一种妒忌感。

另一件事发生在9月底，驻日盟军司令部下令关闭日本在各殖民地和外国的银行，如朝鲜银行、台湾银行等。9月30日，金融局长式村义雄从盟军司令部带回了这份命令的备忘录，在大藏省引起震动。津岛大臣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津岛对式村局长大发其火：“你明明知道这两家即将关闭的银行有许多存款户，其中肯定有孤儿寡妇。这些人被禁止取款，他们想到以后的生活无着，今晚就会睡不着觉，惶恐不安。你应该站在储户的立场上，不充分磋商好关闭后的措施就不回来。搞行政工作就应有这种严格的责任感和对别人的关心。”

津岛大臣的训斥，对大家触动很大。为研究对策，会议几乎开了一个通宵。到深夜两点，各位官员已疲惫不堪。大平见状上去劝津岛暂停会议，又受到大臣的训斥。再过了一会儿，大家实在熬不住了，山际大藏次官和爱知

文书课长表示愿负责起草全部善后的文件，并在早上 8 点送到大臣家中，会议才于凌晨 3 点结束。而津岛大臣在五点半才回家。当 10 月 1 日大平去津岛家报告山际次官和爱知课长加了一通宵班把文件起草完毕送来了时，津岛大臣已穿好衣服，端坐在办公桌前等候了。津岛大臣这种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使大平受到深深感动，到晚年都记忆犹新。大平认为，日本政府机关的官员们大都缺乏奋斗目标和进取精神，对与民众利益休戚相关之事反应迟钝，这种现象在日本官衙已积弊甚深。津岛大臣正是力图以身作则，来纠正这种积弊。

短命的东久迩内阁于 1945 年 10 月 5 日倒台，但奇怪的是大平正芳这一天的“日誌”却未能保存下来（日记一直记到 10 月 8 日）。接着上台的是币原喜重郎为首相的内阁，津岛大藏大臣辞职，大平正芳也辞去秘书官职务，回到了主计局工作。

### 初显改革才干

大平回到主计局后负责的具体工作是汇总预算和兼管战后应急财政的处理。他虽然在主计局工作时间不长，却为了应付战后复杂的情况而日夜工作，并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

战败的日本面临的经济状况空前糟糕：一方面债台高筑，需要支付的战争赔偿、战时债务和整顿占领地通货的债务高达 4000 亿元之巨，给主计局编制财政预算带来重重困难。另一方面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极度萧条，维持国计民生的工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造成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带动物价飞涨，引起恶性通货膨胀。零售物价从 1945 年 9 月到 12 月上涨 20%，黑市价高出公定价 40 倍：日本银行的钞票发行额在战争结束时为 302 亿元，到 12 月底膨胀为 554 亿元，并在继续增发。通货膨胀使人们储蓄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居民纷纷将存款取出购买生活用品，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大藏省主计局为了应付这纷至沓来的困难，全体职员不分昼夜工作，大平正芳也竭尽了全力。他在处理日常工作的同时，还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提出了：“出售官营企业问题。”在这一建议中，大平分析了出售官营产业的利弊，认为从财政上考虑，可以出售官营企业之所得偿还国债，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阻止通货膨胀继续恶化，有利于稳定国民生活和恢复社会经济。从战后产业政策的角度考虑，将官营产业出售，既可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使官营企业变成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又可精简官僚机构。而且战后日本“领土”面积大幅度减少，资金、技术、资源和劳动力市场都非常狭隘，出售官营产业可以将这些经济要素向民间开放。另外，出售官营产业也是消除经济垄断，使日本经济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手段。接着大平还探讨了出售官营产业的形式和对官营产业的价值评估等问题。从以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大平的这一建议无疑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同一时候，大平还另外提出了“财政危机对策纲要笔记”，提出了加速进行国民经济的缩小再生产，以抑制通货膨胀的继续发展势头的设想，并为这种设想提出了具体对策。

与当时的经济混乱相反，战后日本的政治局面却十分活跃。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在战后的日本强行推行非军事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波茨坦宣言》就曾明确表示要“除去一切在日本国民中阻碍恢复和加强民主主义的障碍”。

在占领军强制下，日本废除了天皇统治下的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而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每个日本公民都可自由加入任何政党，任何政党都可参加竞选议员和组织内阁。内阁是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对天皇负责。在这种形势下，被军国主义统治者关在监狱里的所有政治犯全部释放，所有政党皆合法化。许多政党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由国民意志选择由哪个政党执政。

1946年4月，战后第一次大选举行。由于严格实行了占领军的“剥夺公职”的命令，使在实行战时体制时期的许多支持军国主义的政治家被剥夺了参加竞选的资格，这样就许多新人当选了众议院。第一次大选的结果，由原旧“政友会”派人物为骨干的日本自由党在464个众院席位中获得140席，比第二名日本进步党多46席，取得了绝对胜利。其总裁鸠山一郎正准备组建与进步党的联合内阁时，被占领军宣布剥夺公职，由自由党议员，前币原内阁外相吉田茂接替鸠山担任总裁，在5月组成了第一次吉田内阁。自由党候选人石桥湛山担任大藏大臣。大平正芳仍在主计局编制预算。

这时大平收到了家乡和田村村长田中次郎写来的一封长信，信中对国家扩大教育规模，增加官吏数目而财政仍未见好转的情况表示深切的担忧，并用生动的比喻提出了他的“舍卒保帅”的建议：“当橡树养分不足，必须砍掉树枝和树叶，否则全树将死。如果保留了主干，就保住了橡树的生命。过一些年月后，它又会随着养分的增加而抽出新的枝条，发出新的叶片，长成苍郁的大树。”田中村长的建议实际上与大平提出的“出售官营产业”和“国民经济缩小再生产”的宗旨不谋而合，他们都深知“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一缓和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大平作为身份低微的主计官，很快将田中村长的建议向石桥大藏大臣转达。但石桥大臣信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即认为社会失业现象和经济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因此国家应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举办公共工程，通货膨胀，实行赤字财政。所以石桥当上大藏大臣后，实行所谓“积极财政方针”，结果更加促使通货膨胀。当然，对于大平转呈的田中村长的建议就被认为是消极政策，不会予以采纳。

尽管如此，大平还是继续向石桥大臣提出了“战后财政重建对策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大平认为要偿还巨额的国债，从外部看必须取得国际援助，特别是美国的物质援助；从内部看，由于日本银行不能融资，偿还国债须依靠出售官营产业吸收流动资金、征收财产税等手段。另外要维持收支平衡必须制订出今后五年的财政计划，定出国民经济自由经营的准则，以利于恢复国家信用和安定民心。要使大藏大臣的所谓“生产财政”的构想具体化，极力抑制“消费财政”。大平又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中央财政机构的改革设想，如扫除依赖中央和地方国库的积弊，培养各财政主体和经营主体的自主权；在编制预算上应赋予大藏大臣优于各省大臣的地位；应刷新财政管理部局的阵容等。此时，大平正芳已初步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改革才干。

### 潜在外交才能的释放

美国占领军对日本民主化的诸要求之一，就是根本改革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这时，日本各政府部门的职工也建立起工会组织，向政府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为此，1946年6月25日，大藏省设立了薪金局专门负责与此有关的事务。大平正芳调到薪金局任第三课课长，负责退职薪金、加班薪金和以互助制度为中心的福利制度等工作。

二次大战前日本的官吏制度及薪金制度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所有政府官员都是“天皇的官吏”，各有严格的身份等级，其薪金的多少与职务的重要与否基本上无直接关系，而是由身份的高低决定。为了改变这种封建性和不合理性，大平和薪金局的同事们一起，改革了公务员的官职制度和薪金制度。他们参考了美国胡佛委员会的报告书等材料，根据公务员官职的复杂性和责任的大小进行分类，制订出职务等级制度，并据此定出薪金的高低。另外在其它各项薪金方面，也取消一手包办的因素，促进了薪金制度的民主化和合理化。

除了制订薪金制度外，大平正芳还为建立合理的福利制度而奔波。公共企事业部门即使在薪金制度方面相同，在福利待遇和互助经济方面却有显著差别，十分不合理。大平对各政府机关的互助会调查后发现有很多缺点，因而考虑将它们合并起来，以便取长补短。但因各省厅反对而未能实行。大平仍不甘心，继续为改善政府公共企事业单位的福利待遇而努力。1947年初，他打听到由于实行非军事化，陆军的互助会解散，并想把其中部分财产如医院、疗养院等卖给国家。大平计划成立一个“财团法人政府职员互助联合会”，利用各省厅互助会的捐献来使用国家购买的这些设施。3月初，次官会议就充实福利设施问题做出了决定，并召集各省厅的负责互助会工作的课长商讨了设立财团法人的问题。最后决定由会员每人缴3元钱，筹集了300万元基金。各省厅主管课长签字后，由大平负责报送审批部门。4月1日，联合会成立，薪金局局长今井一男为这个财团法人组织的理事长，大平任常务理事，栗田千足为事务局长，三人负责联合会的一切事务性工作。当时国库开支了5700万元购买了这些旧陆军互助会的财产，联合会用这些财产开展福利工作。

但购买财产过程中又遇到了不少麻烦，因为战前互助会不具有法人性质，购买的财产只能以陆军省或陆军大臣名义登记。美军占领日本后原则上要没收一切军用财产，因此必须向美军逐项解释哪些不动产不应被没收，力争美军同意发还这些财产。这件颇为棘手的工作又由大平全部承担，大平施展了他潜在的外交才能，获得了成功。后来大平病重时住进的虎门医院也是这一时期建起来的。

后来太平为了替因战火而居住在防空洞和棚户中的公务员争建宿舍，又同占领军当局打交道，要回了十几万平方米的土地。然后他又想办法借到了资金运用部的钱来盖宿舍。几经曲折，最终使这一大片空地成了官民共用的大住宅区。

1948年6月30日，大平亲手制订的有关互助会的制度，以《国家公务员互助会法》的法律形式公布，7月1日实施，“财团法人政府职员互助联合会”根据这项法律改为“特殊法人公共事业部门互助会”，后来又变成了“国家公务员互助会”。互助会在各地设置了各种福利设施，为改善公务员生活作出很大贡献。

### 为战后公共事业操劳

1948年7月10日，大平正芳在薪金局工作两年之后，调到经济安定总部，担任建设局公共事业课课长。他在薪金局工作期间，第三个儿子大平明于1946年9月9日出生。同时在这期间，日本政坛又发生了变化。1947年4

月举行了大选，社会党获得 145 席，成为第一大党。吉田内阁辞职，由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出任总理大臣，组织起同第三大党民主党和第四大党国民协同党的联合内阁。片山内阁 8 个月后倒台。1948 年 2 月，由民主党总裁芦田均任总理大臣，再次组成三党联合内阁。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与部分从民主党分裂出来组成的“同志俱乐部”合并，组成民主自由党。

大平所去的经济安定总部建于 1946 年 8 月，成为后来经济企划厅的前身。1947 年 5 月，刚上台的片山内阁对经济安定总部进行了改革，改革措施之一就是新设置了建设局。大平担任的建设局公共事业课长权力很大，手下管着一百多名建设省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公共事业课的权限是统管中央和地方的所有土木建筑事业，所以它的权限比现在的建设省还要大。

尽管权限很大，但大平课长却有很大的苦恼，就是经常要去和并不了解日本的具体实际而自作主张的占领军当局打交道。在美国，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新上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 年在任）实行了“新政”，其措施之一就是由国家兴办公共事业，以消除社会失业的现象。自那以后，美国一向把公共事业作为失业对策来制订计划。但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战时国土荒芜，灾害频仍，无论山区或沿海都是如此糟糕。这些情况并非无就业机会。因此，日本的公共事业首先必须从克服灾害，恢复经济入手。但盟军司令部劳动课却根据自己的理解，命令将 60 亿公共事业费用于安置失业者就业，把 30 亿民生安定费列入预算，可与公共事业费调剂使用，实际上意味着可将公共事业费转为民生安定费。双方对公共事业的看法明显存在着严重分歧。

大平就任公共事业课长后，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改善公共事业优先顺序的决定方式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大平首先指出日本的公共事业与美国的公共事业有差异，接着论述了决定优先方式的两个方面，即一个是经济的重要性，另一个是对事业的补助率。大平提出了根据受益面大小决定是否给予资助的原则，受益者具有普遍公共性质，则应多提供资助，如修筑道路即属此例；反之，若受益者只限于特定的一部分人，则不应多得资助，如各个具体的经济部门即属此例。大平在《意见书》中还就创建新设施不如维护旧设施、经费和利益均衡、确立各公共事业的有机联系、承包者的能力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除了提建议，大平还同盟军司令部劳动课、财政课的美人进行交涉，增进了解，解释和说明日本的实际情况，以取得双方的共识。在大平的耐心工作下，美国人也逐渐了解日本的现状，并在心理上与大平沟通，财政课长莫斯勒还与大平交往密切，给上级写报告时也要先征求大平的意见。

大平在担任公共事业课长期间，也受理了不少基层寄来的建议，大部分都是复兴日本战后经济的切实要求。大平也因职务关系而跑遍了全国各地，更加广泛、深入地了解各地方的实际情况，使自己能站在更高的角度从全局来思考国家管理的诸多问题。

1948 年 10 月，芦田内阁因阁员贪污受贿的丑闻而宣布辞职，吉田茂领导的民主自由党组成看守内阁。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吉田培植了不少自己亲信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后来都成为“吉田派”的骨干。

1949 年 1 月 23 日，国会举行大选，民主自由党推荐的候选人许多当选，其中有吉田茂的亲信佐藤荣作、池田勇人等。这次大选民主自由党取得了出乎预料的胜利，获得了 264 席，超过了半数。本来按宪法规定超过半数议席

的政党可以单独组阁，但新组成的第三届吉田内阁还是起用了两位民主党人入阁。由此，民主党发生分裂，其中一派“联合派”的保利茂等人与民主自由党合并，成立了自由党。新组成的吉田内阁中起用了许多新人，刚当选议员的前大藏省次官池田勇人作为大藏大臣入阁。

有一天，在经济安定总部工作的大平正芳听说池田勇人在大选结束后患了感冒，就前往池田家中去探望。池田漫不经心地告诉大平，他这次将担任大藏大臣一职。大平听后大吃一惊，立即劝告池田，在不了解基层甘苦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一下子就当大藏大臣。大平的这类劝告已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吉田内阁时，石桥湛山大藏大臣要求主计局长池田勇人担任大藏省次官，池田把自己信任的大平叫到办公室去征求意见。大平当时劝池田：“官就当到主计局长为止吧，将来把它当作最后的花道退職多好呀！”“最后的花道”指戏剧演出闭幕时，演员从台前穿过观众席中间的一条下台的通道。这里大平是要池田当到主计局长就体面下台。但大平的这两次劝告池田都未接受，他先后当上了大藏省次官和大藏大臣。

1949年4月，公共事业课长大平正芳到南九州出差，突然收到池田大藏大臣发来的一封电报：“起用贵君为秘书官，急速返京。”大平万万没想到。这封电报对改变他以后的命运起了关键作用。

### 池田大藏大臣秘书官

大平接到池田大臣的电报后思想上矛盾了许久，一方面感激池田的惠顾，另一方面又不大愿意出任新职。因为他对担任经济安定总部公共事业课长一职兴趣很大，对自己能为战后公共事业的复兴尽一分力量而感到荣耀，对这一职务很留恋。于是大平给大藏省官房长官森永贞一郎发回一个电报，希望在自己回到东京之前暂缓发表委任状。以后大平陪着大藏省同事游历了许多地方，企图拖延时间让池田大臣取消这次任命，一周后才返回东京。回东京后大平去池田大臣办公室表示谢意：“我感谢您的好意。但大藏省里适合当秘书官的人才众多。如果您同意，我准备给您推荐最合适的人选。至于起用我的事就请免了吧……”池田却笑着对大平说：“委任已于一周前发布。你什么都不干也行，从今天起就坐到隔壁的房间里吧！”

从此，大平正芳就和宫泽喜一共同当了三年半池田大藏大臣的秘书官。大平后来十分感慨地回顾道：“没想到这竟成了我进入政界的机缘，并逐渐加深了我同池田先生之间的师生关系。人世之炎凉，走运背运都是难以避免的。”池田勇人虽貌似冷酷，且不善交际应酬，但性情温和，对人體贴。他正是看中了大平才干才极力把大平调到自己身边作为得力干部培养的。

大平正芳刚担任池田大臣秘书官时，正逢日本大藏省全力实施“道奇方案”之时。1948年10月7日，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了由凯南和特莱帕提出的新的对日政策基本方针，其中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要求被归纳为“稳定经济九原则”，于1948年12月由驻日盟军司令部作为指令向日本政府提出，其中包括抑制日本通货膨胀，谋求预算收支平衡和设定日元对美元的单一汇率制等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召见了美国底特律银行总经理约瑟夫·道奇，要他作为总统特命全权公使去日本实施经济稳定化政策。道奇是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战后初期作为占领军顾问曾从事过西德的货币改革。1949年2月1日，美国总统公使道奇来到日本，

准备将“稳定经济九原则”付诸实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稳定经济的方案被通称为“道奇方案”。

道奇将当时日本的财政比喻成“踩高跷”，一脚踩在美国援助上，一脚踩在政府补助金上，根基很不牢固。在道奇指导下，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为日本编制了194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并强迫日本政府贯彻。预算案的指导思想是缩小财政规模，达到收支平衡。因此预算案采取了“矫在过正”的作法，实行了“超平衡预算”，即强行使政府财政收入超过财政支出，一年之内使财政赤字变成黑字。日本政府尽管担心这样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但迫于压力也只得接受。

1949年4月20日，依据道奇方案编制的预算案在国会通过。刚上台的池田藏相不得不为实现这一预算案而采取了空前“狠心”的措施：一方面停止支付价格补助金，并停止发行与偿还复兴金融公债，以大幅度减少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向国民征收重税，以大幅度增加国库收入。这样一来当然造成社会的极大不满。

在这怨声载道的情形下，负责跑外勤的秘书官大平正芳做了大量安抚民心的工作。他首先采取的办法是站在请愿者的立场上，对他们的不满表示同情，并批评池田藏相的措施中的不足之处，同时向请愿者解释池田大臣并非冷酷无情者，希望他们能谅解。第二个办法是督促税务署的工作，因道奇方案实际上是把空前重税强加于民，所以税务工作必然会产生障碍，出现差错的概率增大，重复征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平一接到此类投诉，就给有关税务署长打电话，要他们立即改错并向纳税人道歉。第三个办法是安抚申请贷款者。当时因财政紧缩，资金流通极其困难，为发展生产而申请贷款者感到非常困苦，大平对他们表示理解和同情，但不能因此向银行施加行政压力，因为贷款与否和如何贷款是银行的自主权，大平只能对申请贷款者实行安抚，并为他们充当金融顾问，告诉他们可以选择哪些银行，如何请求选择等。

道奇方案虽使日本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阵痛，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但在阵痛过后，日本的恶性通货膨胀被扼制住，日本经济逐渐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据道奇方案制定的预算案通过后，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固定下来，此后二十多年里一直未变。

池田藏相因刚进入政界、许多情况尚不熟悉，加之又不善应酬，因此许多社交活动必须委托大平正芳去办理。大平从事这些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东京筑地的“荣家”饭庄。饭店女主人和田荣子是广岛人，大家称她“阿荣”，她与池田大臣是老乡，池田特别照顾她，许多社交集会都在此举行。大平就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政界、财界、官界的关键人物。大平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外交才能，在协调池田大臣与各界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这种协调过程中，大平常站在池田大臣的立场乃至更高的政治角度去思考、判断和行动。这无疑更进一步锻炼了大平的政治敏锐和处事能力，同时也促使大平萌发了当政治家的愿望。

## 从政的准备

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大平就自己的长远发展问题作了反复的思考。刚满40岁的大平认为，自己已年届不惑，不愿再干事务官工作，到一定年龄，事务性的行政官都得另谋生路，一般不会超过50岁。但自己办实业无信心，文

字工作也难搞，靠少量薪金过隐居生活又精力过剩。作为男子汉应该搞一搞能够发挥自己活力的、未曾干过的冒险事业，使自己生命的火焰更充分地燃烧。于是大平想到自己是否应进入政界，这是一条激烈而危险的道路，犹如走钢丝，履薄冰。从事政治意味着严酷的斗争，挨骂多于赞扬，还必须有牺牲家庭的准备，如果搞竞选还有筹措经费这一难关……但政治这种职业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职业，所有社会行动都带有政治，政治家是社会不可缺乏的。自己也并非无能之辈，是否也应考虑从政……

人有所思必有所表露。1951年4月，大平有一次在火车上对池田大臣说：“当政治家我真腻了，真想去当企业家，发一笔大财，那我也可以向池田先生大量捐款了。”这表明大平深知在日本这种政治制度的国家，金钱与政治的密切关系。1951年夏天，池田与他的三位秘书大平、宫泽和登坂重次郎一起喝酒泛舟时，大平突然说：“池田先生，我也想当一名政治家，您看如何？”池田答道：“这很好啊！你完全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但问题在于能够筹集到多少金钱。”大平说：“可以搞到一些。”池田说：“那其它问题我包下来好了。”

池田早就看中了大平的才干，有意识将大平调到自己身边加以栽培。现在他觉得是让大平出马从政的时候了。

1950年2月，吉田茂首相与麦克阿瑟元帅会谈时，提出派员访美，就日美单独媾和问题探询美国政府意图。取得同意后，吉田派亲信池田勇人作为战后第一位大臣级官员访问美国。池田于4月访美，传达了吉田首相的媾和想法。美国为此同意派杜勒斯访日落实媾和问题。后因朝鲜战争媾和拖延。1951年夏，媾和活动重新开始，日本又派员访美。同时，美国在战后除向日本提供大量物资援助外，还接纳来自美国占领地区的留学生、学者和官员，其中一项是美国陆军部主办的“国家领导人接待计划”，即把美国占领地区的国会议员、学者和官员等，在一定时期内请到美国，围绕特定的专题，进行参观考察和进修活动。

由于这两个机缘，1951年8月，池田安排大平正芳去美国考察。同行的有参议院的高濂庄太郎、众议院的前田正男。大平后来回忆道：“池田大藏大臣特意让我这个秘书官参加这个考察团，看来是有他的考虑的。他希望我在下届大选中出马参加竞选，因此先让我到美国去看一看。”但池田却从未向大平正面谈及访美目的，只是说将要召开有关媾和的会议，趁这一时机赶快出去看看。

1951年8月13日，大平一行从羽田机场出发前往美国。他们是去考察美国的科学技术政策，大平的具体任务是从财政预算方面考察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事业的情况。

美国是大平年轻时就早有所闻并十分向往的国度，在高松高商读书时站在桂滨海边，望着浩瀚的太平洋，想到由此可通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他的心情都格外激动。如今真的亲身到了美国，所见所闻都感到异常新鲜。于是写下《美国之行》的旅行记，从9月8日到10月26日在《四国新闻》陆续刊登了17篇连载，谈了他对美国的感受，这是了解大平正芳对美国和国际形势看法的重要材料。

大平首先看到了美国的一些表象。如住宅漂亮，人口比日本稀少，商店中物品价格较贵，且许多老太婆在当店员等。进一步接触了美国的一些学者、官员后，他又了解到美国的民族构成，对基督教的信仰，美国女性比日本女

性社会地位高，同时也了解到西方移民在美国的“西进运动”，即美国现代发展经济的历史。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他又发现美国报纸种类很多，每种每天的数量也多达40页，认为这对美国人的文化水平有较大影响。大平还特别考察了美国的政府机关，那里的官员工作态度严谨，待人亲切，给他留下了较深印象。9月26日离开华盛顿后大平到了巴尔的摩。27日离开巴尔的摩，重点考察了位于沃明通的著名的化学工业公司吉本公司，探寻了这个拥有近15亿资本和9万职员的大公司是如何进行科技开发研究的。他发现这类经营良好的公司，不仅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和人力，而且有自由的研究气氛，使大平感到无比羡慕。通过考察他发现“美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都对研究工作大胆地进行投资”。当时美国有一个术语叫“技术贸易”，即一个国家在技术方面的收支多少是衡量该国经济力量的重要标志，靠出口技术的收入越多，说明该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很强；技术进口越多，表明该国实力较弱。美国在技术贸易方面的进出口比率为1比10，说明国力很强，日本当时正与此相反。大平认为美国在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还将发挥更大作用。相比之下，落后的日本应在科技研究方面进行更大的投资，才能缩小与先进国的差距。

接着，大平一行又访问了美国工业大城市费城，他对这里汽车工业的发展很感兴趣。离开费城，又到了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纽约，大平对纽约的高大建筑感到十分惊讶，他还参观了联合国大厦。

在大平访美期间，1951年9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诸国代表在旧金山同日本签定了“旧金山和约”。这次与日本的媾和是“片面媾和”，媾和协商和条约起草及签订都没有让因日本侵略而受害最深的中国参加，美国不顾苏联等国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与起草和约和出席签字仪式的要求，根据西方国家的利益制订了对日和约。和约没有提出让日本对受它侵略的国家给予赔偿，并对日本今后的出路提供了相当优惠的条件，除了让美军继续长期驻扎日本外，几乎没有什么惩罚性措施。为了确保日本的“安全”并让美国长期控制太平洋地区，同一天日本和美国签定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两条约的签订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应，并引发了一系列骚乱和流血事件。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认为旧金山和约“是为下次战争作准备的和约”，此话受到签定和约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指责。大平正芳在美国看到了《纽约时报》上登载的签订和约的消息时，百感交集。他一方面想到日本恢复独立的日子就要到来，内心很激动；另一方面又认为，即使签定了条约，对日本及签字各国来说，和平仍很遥远，“签约是冷战新局面的序曲，特别是在亚洲的斗争的序曲”。他还看出，“签约对我们的立场有利，却给苏联提供了许多宣传材料。”大平正芳当然是站在日本国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已具备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力。

美国之行使大平视野更加开阔，不少地方虽是浮光掠影地参观，但大平注意到了在一个发达的文明国家发人深思的许多地方，特别是美国人民在建设国家中表现出的“开拓者的雄心和尊重独立、自由的豪放不羁的精神”。他在旅行记中将所看到的美国文化归结为“联结天堂与人间、旨在架起有限与无限之间的桥梁的实证性文化”、“勤劳与节约的文化”和“运动不已、不知停滞的动态文化”，同时特别强调必须深入观察这种文化的创造者美国人的态度。他将看到的美国称之为“拥有史无前例的巨大怪物般的相貌，正在

持续而无限地发挥着巨大的生产力”，希望日本人纠正对美国的误解，早日赶上美国。

### 第三章 进入政界

#### 旗开得胜

1951年10月21日，大平由美国的旧金山返回东京。池田大臣叮嘱大平，今后对大藏省的工作少考虑些，尽可能多回家乡，要搞熟关系，众议院随时都可能解散，要作好参加竞选的准备。于是大平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竞选准备活动。按大平的说法就是去各选区“朝拜”。

为了寻求支持，大平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乡丰滨町。1952年2月，大平与小学时的40名同学聚会，他的平易近人博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大家纷纷骑自行车上街，为大平拉选票。大平后来回忆道：在“各个市、町、村，以我的一些亲戚、同乡、同学以及同事为中心，纷纷组织了后援会。因为我一向在大藏省工作，有关盐、酒的制造和销售方面的人，以及种植烟草的人首先站到了我一边”。大平的母校三丰中学的同学也出了很大力量，高商的同学听到大平要出马竞选议员，也建立起支援组织。在大阪工作的神原龟太郎率领两个兄弟为大平帮忙，后来投票后，大平的选举班子发现没有投入力量的地方居然也出现了几百张票，才意识到是神原兄弟暗中相助的结果。在朋友中对大平支援最大的是加藤藤太郎，他视大平如爱子，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大平以巨大援助。他派营业部长远藤福雄站在第一线为大平进行活动，为大平的竞选立下汗马功劳。大平家中的人当然是支持大平的骨干力量，哥哥数光因意志坚强，办事干练而获得“麦克阿瑟”绰号，他把有关人员都发动起来，为弟弟的竞选而竭尽全力。大平的堂兄、前日本陆军少将大平秀雄像一个现役军人，既当参谋又作士兵，他负责拟定计划并指挥“实战”，看着手表催促大平夫人志华子按既定日程行动。大平的姐姐慕玛和妹妹富江负责后勤工作，紧张得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大平的岳父铃木三树之助用自己的住宅作担保筹集了大平的选举资金。

大平自认为讲演技巧不高明，参加竞选一激动或紧张更是拙于辞令，使人听起来味同嚼蜡。连大平的外甥加地一宪也说：“当时舅舅的演说很像大马力发动机，而且还是一种低速发动机，每个运动过程间都要停顿一些时间。”支持大平的人听了他的讲演后也为他能否当选而担心。但大平也有他出奇制胜的竞选策略，他知道自己第一次参加竞选，完全没经验，故有关选举的一切活动全托他人去办，自己尽量少插言。他要求所有帮助他的人绝对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要对其他候选人有礼貌。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坚持到竞选揭晓。大平本人在讲演时尽量避免夸夸其谈，从不对选民随意许诺，只谈自己有把握之事，特别强调在财政方面应将眼光放远些，眼前虽因紧缩和整顿财政造成了暂时困难，但是符合长远利益的。

大平的稳健务实的态度博得不少选民的好感，有的妇女对大平说：“你很可亲，我们投你的票。”赶马车的老大爷也对大平说：“我家有5票，都投给你，加油干吧！”

在大平个人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下，竞选宣传获得很大成功。1952年8月，吉田决定解散议会；9月5日宣布举行新一届大选；10月1日投票。结果，第一次参加竞选的大平正芳在本选区获得47356票，以得票第二位当选。大平旗开得胜，异常高兴。他说：“我感到竞选与其说是与人之争，不如说更主要是与自己本身的战斗。能战胜自己，就一定能在选举中取胜。”

## 残酷无情的考验

大平刚当上议员，担任国会农林常任委员，在他尚无多少作为时，就初尝了政治的冷酷。

与大平同时当上议员的，有不少是被解除了“剥夺公职”后重返政坛的重要人物，如鸠山一郎、绪方竹虎、三木武吉、重光葵等人。自由党内立即出现鸠山派与吉田派的殊死争夺，保守党内呈现分裂的趋势。鸠山派在自由党内组织起“民主化同盟”（简称“民同”），与吉田首相及自由党领导机构抗衡。

在推行“道奇方案”时期，1950年3月，池田大藏大臣曾在国会就中小企业问题进行答辩时说过：“中小企业有五个十个人因破产而自杀，是在所难免的。”这句大平正芳认为“不成为一个问题”的话在1952年11月27日的众议院全会上，成了在野党攻击池田的把柄，社会党右派议员加藤勘十旧话重提，对池田大臣提出诘问。池田的辩解引起了议员们的不满，第二天在野党联合提出对池田的不信任案。在表决该案时，“民同”派25名议员故意缺席，使不信任案以208票对201票获得通过，池田大臣因而被免职。

大平正芳对池田的倒霉深感痛心，同时也对自己的政治命运忧心忡忡。他分析这件事的背景：“一方面是由于对池田先生本人的嫉妒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政界存在着吉田和鸠山两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池田先生初次当选为国会议员后，马上就当了大藏大臣，而且在占领时期负责执行过道奇方案。所以他遭到人们的嫉妒和反感，是有原因的……池田先生因此而被在野党提出了不信任案，加上鸠山派表示赞同，不信任案就通过了。这对于池田身边的我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沉重打击。我刚刚进入政界就遇到了这场冷酷的考验。”

大平不知更倒霉的命运还在等待着自己。1953年3月28日，右派社会党的西村荣一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要求吉田首相对国际形势发表看法，并提出质询。西村因对首相的答辩不满而咬住吉田的话不放，吉田一气之下怒气冲冲地对西村说了一句“真无礼！”接着又骂了一句“混帐！”结果造成右派社会党向众议院提出对内阁总理大臣的惩罚动议。当时自由党内还有一个以农林大臣广川弘禅为首的亲鸠山的派别，即广川派。广川在大平正芳当上议员后曾企图拉拢大平，他请大平到自己家，并在一个大签名册上签个名。大平后来才知道，他在上面签了名就属于吉田派了，但实际上是正打算从吉田派中分裂出来的广川派。由于鸠山派和广川派赞同，惩罚动议通过了。左右社会党在3月14日又联合提出“对吉田内阁不信任案”。吉田立即将广川农林大臣免职，但在表决不信任案时，因自由党内有23名反吉田派议员投票赞成，使不信任案以229票对218票通过。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日本宪法规定，或者吉田内阁宣布总辞职，或者在10天之内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吉田当然选择了后者，决定立即解散众议院，即通常所说的“混帐解散”。同时开除了三木武吉、广川弘禅等反对派首领的自由党党籍，他们拥立鸠山组成新自由党，人们称其为“鸠山自由党”。

宣布解散的当晚，众院议长大野伴睦宣读了天皇诏书：“根据宪法第七条，解散众议院。”这样，全国所有众议员的议席都失去了。这件事对大平正芳简直如同晴天霹雳，打击太大了！大平刚当上众议员不到半年，既没有

同选民巩固关系，也未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实在感到尴尬。他“痛感政治是如此的残酷无情”。

沉重的打击并未使有政治抱负的大平正芳从此消沉下去，他紧接着又投入了下一次竞选。

### 一名普通国会议员的活动

大平参加的第二次竞选异常艰苦，准备相当不充分。因为离上次大选不到半年，大平尚未回选区与选民沟通，选举班子的组建也很仓促，宣传工作当然来不及作周密安排，最大的问题是选举经费的筹措也较困难，许多人对在这种情况下大平能再次连任议员不抱希望。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大平却得到了意外的支持。除了以前的支持者尽了最大努力之外，好友桥本龙伍专程于4月11日赶来声援，甚至其后吉田茂首相改变了预定的游说路线，专程赶到三丰郡的观音寺声援大平。与首相同来的还有池田勇人、爱知揆一、山口喜久一郎等人。当时，在观音寺的上高野小学的操场上，挤满了选民和群众，会场樱花盛开，铺着欢迎贵宾的红色地毯。主席台上，竖挂着几张大条幅，在书写有候选人大平正芳名字的旁边的几张条幅上，写着吉田茂、池田勇人等支持大平者的名字。吉田首相原定作声援讲演15分钟，结果讲了45分钟。大平的支持者们非常兴奋，大平选举事务所对形势的估计也较乐观，认为有信心获得4万张选票。

1953年4月19日投票结束后开始计票时，形势对大平并不很有利，以后情况逐渐好转，最后大平获得39000多张选票，以第三名当选，比落选的第四名仅多1000余票。大平选举事务所的人事后想起仍有些后怕。与此同时和大平一起在上一次大选中初次当选议员的56名自由党成员在这次选举中有28人落选，可见竞选争夺之激烈。

第二次当选众议员后，大平正芳担任了国会和自由党的一系列职务：大藏常任委员、自由党干事、自由党青年部副部长等，工作比较繁忙。但作为一个普通新议员，还得花很多精力去关心本选区选民的利益。大平这时需要操心的事成倍增加，一些事情的确很重要，如家乡的水利工程，学校扩建，整修和改建道路、河流、港湾，幼儿园设施的完善，绿化环境，争取电力补助金和各项经济发展贷款，批准建立公园等公共事业，这些事都需要钱，往往受财政预算的限制，每做一件都很艰难。有一些事情看上去很小，但处理不当也会影响选民的利益，如调解日常纠纷，协助推销家乡的产品，反映纳税过多等事务。有些事实在太琐碎，但也不得不去应酬，如听闻选区有集会，就得拍贺电去，或赠送锦旗、奖品之类；选区有人到东京来办事，还得招待吃饭；选民的孩子来东京求学，得帮助想法解决；这些孩子考入学校又得帮忙解决住宿，临近毕业又得协助他们就业；还要帮选民代办小卖店的营业许可证……。大平说：“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尽力完成，真是一事成功，麻烦成倍。”他每天早晨从7点起，就要接连续不断的电话，甚至深夜12点以后也常被叫起来，他深感：“一个议员承担着几倍的服务工作量。”当大平从东京回家乡时，当地选举事务所的房租、电话费和汽车费又在等待他去支付。因此大平认为当议员是非常费钱的，“从金钱花费来说，没有任何事业会这么费钱”。

大平的感受千真万确，日本是实行“金权政治”，竞选议员要筹措大量

资金，一般情况下，谁的资金雄厚，谁当选的可能性就大。当上议员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需花费不少金钱。而这些钱当然只有较大的资本家、财团才可能支付。因此，日本的政治家往往都与某一个或数个财团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大财团往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操纵选票，可以让当选的议员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大平因长期从事财政、税务等工作，因而除了岳父铃木三树之助、老前辈加藤藤太郎之外，他还同许多财团有密切联系，这些关系为他连选连任议员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当然，大选获胜当上议员后，除了有各种政治特权外，亦可每月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丰厚收入。

尽管很忙乱，大平还是想尽可能为家乡的选民们多办点好事。他在东京练马区租借了一处房子，取名为“西讚寮”，即“西讚的学生宿舍”，专门为家乡来的学生提供住宿。这地方约有一千平方米，有三幢房子。每幢房子由学生自己推选寮长管理，另派一名妇女给大家做一日三餐。学生自付伙食费，大平支付其它费用。当时这里住了 20 多名学生，大平经常携家属前来看望，与大家一起会餐。大平还给学生讲时势课，向大家指出日本今后的发展趋势是稳定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希望同学们努力。大平的讲课，很有鼓动力和说服力，使这些年轻学生深受感动，并激发起他们的雄心壮志。但令人惋惜的是，“西讚寮”的房子因年久失修，需要改建，但房主不同意，到 1960 年这项善举便停止了。

1953 年 10 月，大平为纪念自己进入政界一周年，写成了二百多页的《财政徒然草》一书，10 月 20 日由如水书房出版。书中描述了大平的前半生，全书共分为五章，即“农村漫笔”、“官僚生活回顾”、“我的财政观点”、“进入政界之途”、“美国速写”。这部书在两年后经过增补，于 1956 年 1 月 5 日由 20 世纪社以《国会议员的真相》为书名再版（非卖品）。

## 又干上了理财的老本行

1953 年的大选中，自由党虽获胜，但议席未过半数。经过争取，鸠山等 23 人又恢复了党籍，而三木武吉等人另组日本自由党。

但吉田刚高兴了一个月，自由党又出事了。1953 年 12 月司法当局调查特殊产业违法问题时，发现自由党和运输省的 122 名官员接受了山下轮船公司等造船业的贿赂，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政调会长池田勇人等涉嫌。1954 年 4 月，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当局准备逮捕佐藤时，吉田首相命令法务大臣犬养健动用指挥权，根据日本检察厅法第 14 条规定，检察当局只好停止对佐藤的逮捕，转为一般性调查，使该案不了了之。当大平听到池田勇人也涉嫌并受到调查时，他相信这位恩师是无罪的，又深感从政太危险了。于是跑到池田家中含泪劝说池田：“不要再干政治家了！我也不干算了！”一向稳健的大平遇到这种情况也禁不住感情用事了。

“造船行贿事件”及吉田首相指令法务大臣行使指挥权一事，使吉田内阁的统治更加摇摇欲坠。1954 年 9 月，自由党内成立了以鸠山为委员长的新党筹备会。11 月 24 日，鸠山自由党、自由党岸信介派和改进党一起，合并成日本民主党。这样一来，民主党，左、右派社会党三个在野党的议席总数达到 253 席，自由党仅 180 席。12 月 7 日，各在野党提出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案，吉田又准备解散众院，但副总裁绪方竹虎为首的党内势力不支持他解散众院，吉田被迫把总裁职位让给绪方，并宣布内阁总辞职。

吉田离开首相官邸前往家乡神奈川县中部的大矶时，显得十分凄怆。据大平回忆：“那一天朔风凛冽，寒气逼人，来与离开首相官邸的吉田先生送别的人寥寥无几。”吉田茂下台后，池田勇人也辞去担任了几个月的干事长一职。

12月10日，众议院重新选举首相，民主党的鸠山一郎在社会党支持下当选，组成了鸠山看守内阁。1955年1月18日，左右两派社会党通过了实行统一的决议。

1955年2月1日，鸠山内阁公布举行第27届国会大选。2月27日大选揭晓，鸠山的民主党获得185席，成为日本第一大党。自由党席位大大减少，成为第二大党。尽管如此，大平正芳在自己的选区中仍以第三名获胜，而且比上次多得了1万多张选票。大平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我自上次选举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另外，我坚守了自由党的孤垒，始终拼死地战斗，因而获得了选民的支持。”

3月19日，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由于得到自由党的赞成票而组成了第二次鸠山内阁。大平正芳从这个月开始，担任内阁常任委员（理事）、大藏常任委员、经济计划特别委员会委员；在党内他担任了自由党政务调查会财政金融部副部长，自由党国会对策委员，负责海外归国者境外财产补偿问题和增加军人抚恤金问题。大平的这些任职使他又可以从事他理财的老本行了。

1955年6月23日，大平代表自由党在众议院会议上发表演说，对“修正所得税法案二附件”表示赞同，演说的题目是：《关于所得税法的部分修正案》。在演说中，作为自由党议员的大平首先指出，民主党政府的税制修正案，不过是沿袭了自由党内阁的租税政策。接着又分析了此修正案的核心，在于创立了所得税中选择性经费的扣除制度，为了谋求利息所得免税而对分配所得实行优惠，提高对寡妇不具备残疾者等的扣除额，以及对低收入法人所得减轻法人税等，随之而来的是一年追加减税410亿元。总之，自由、民主两党的修正案使纳税者进一步减少了38万人，这无疑给农民、中小企业主、个体劳动者等低收入者和劳动大众带来了福音。

但他又指出，今天的日本经济离正常的国民经济距离尚远，其根本缺陷在于资金缺乏和输出萧条。国民生活水平虽较战前高，但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绝不是稳定经济基础上的繁荣，也不是维持着充分的弹性。日本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就是通过积累资金和发展输出，谋求经济正常化、就业面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持续增长，税制当然也要为这种需求服务。为此，在某种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牺牲原有的租税原则是理所当然的。

大平在演说中不仅强调了日本经济发展存在的“危机”，而且提出了避免这种“危机”的良策，表明大平作为国会议员，已能更加深入地在全局思考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了。

1955年底，自民党建立不久，大平担任了党的政务调查会内阁部长，负责处理海外撤回人员的国外财产补偿问题和增加旧军人的抚恤问题。大平总是采取积极态度去妥善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诸问题。第二年，大平又担任了总理府的境外财产问题审议会委员。这一年他执笔与其他10名议员一起提出了“关于对旧军人等的遗属的抚恤金特例的提案”，到今年12月。参众两院会上通过了这一提案，增加了36000人可以享受到公务扶助费和遗属年金。1957年，大平又担任了总理府的临时抚恤金调查会委员，他又解决了提高军人抚恤金的问题。大平正芳从事理财这个老本行真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 在保守党合并的活动中

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虽组建了新一届内阁，但因民主党议席未超过国会半数，因此在执政时常受掣肘，十分不便。民主党元老三木武吉看到革新派政党社会党即将实现统一，便积极策划保守派政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合并。

三木武吉是高松人，他对大平正芳这个老乡很有好感。所以他明知大平是对立的池田勇人的亲信，仍加强同大平的接触，大概作为一名老练政治家的三木武吉也看出大平很有才干，将来或许在政治上大有作为。

据大平回忆，有一次三木要他到牛込山伏町的家里去，三木用瘦骨嶙峋的手倒出保温瓶里的稀粥，一边喝着一边对大平说：“要把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在参、众两院内确保三分之二以上，修改现行的‘占领宪法’。否则我死不瞑目。”大平认为，三木武吉气概虽然豪壮，但实际做起来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因为保守政党合并之目的是急于修改宪法和打破占领行政的现状，而大平认为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在美军监督下制订的日本宪法，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益处，因此对保守党合并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不仅不衷心拥护，反而表示担心。不识时务的大平当场反驳了三木武吉的主张，受到这位年长者的训斥。

训斥之后，三木又谆谆教导大平这个晚辈，要他学会政界的处世之道，教他如何关心同志，如何筹措和使用政治资金。这些经验之谈使大平受益匪浅，三木对他的关心也使他颇受感动，并对保守党合并一事逐渐改变了看法。1955年10月大平在家乡的国会报告会上向选民作报告时，谈到对三木武吉的看法。他认为三木这次从事保守党合并竭尽全力，非常认真，大平也相信三木干这事并非为了自己，因为他年事已高，身体亦不佳，他只是想在有生之年为国办件好事。大平说：“点燃保守政党合并之火，使之继续燃烧不灭，不正是其证据之一吗？坦率地说，我对三木先生的忧国之情深表敬意。”

看法改变之后，大平为保守政党的合并积极出力。1955年夏天和秋天，在大平的斡旋之下，民主党的代表三木武吉和自由党的代表池田勇人在筑地的“菜家”饭庄举行过几次会谈。但池田对合并一事不太感兴趣，似乎担心保守政党合并之后，如再出现问题就难以挽回。所以两人的会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但民主党毕竟是执政党，在该党的努力之下，政界舆论逐渐倾向保守政治势力应该合并，争取合并的具体步伐也加快了。经过反复协商，组建一个新党的细节已大体有了眉目。但最重要的问题——谁任总裁很难确定。这时左右两派社会党已决定召开统一大会实现统一。两大保守党立即作出决定，把总裁问题暂挂起来，由鸠山一郎、绪方竹虎、三木武吉、大野伴睦四人组成“代行总裁委员会”，暂时代行总裁职权，马上召开新党成立大会。大平所属的吉田派观望许久之后，最后决定顺应潮流，参加新党。

有一天早晨，三木武吉托大平转达几句话给池田勇人，希望在新党促进协议会常任委员会上，池田尽可能不发言，意思是池田只要不阻碍两党合并即可。当大平将三木的话转告池田时，池田默默听着，未置可否。那天的委员会开完之后，大平在众议院食堂旁边遇到三木武吉，三木武吉对大平说：“谢谢你，顺利地办成了！”

这样，在民主党的主导下，1955年11月15日，日本最大的政党“自

由民主党”宣告成立，该党一直掌握日本政权到20世纪90年代（1993年）。大平正芳也就成为自由民主党党员。自民党成立后，鸠山内阁辞职。11月22日组成了第三次鸠山内阁。1956年1月28日，绪方竹虎突然去世。4月5日，在自民党大会上，鸠山当选为自民党第一任总裁。

在下一届大选之前，大平又担任了自民党政务调查会财政部长和自民党总务。

1955年是日本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之年，社会党统一，保守政党合并为自民党。人们通常将此年形成的政治体制称为“55年体制”，即政治趋向稳定，自民党长期执政，社会党成为主要在野党。在军事和外交上，依靠日、美共同的军事力量，针对苏联和中国结成日、韩防御体系，同时谋求日美中对等关系。

### 为振兴教育而默默奉献

1956年12月，第三次鸠山内阁寿终正寝。自民党内岸信介、石桥湛山和石井光次郎开展了争夺总裁的战斗。结果石桥湛山获胜。大平跟随池田勇人，在决选时投了石桥的票。12月23日，成立了石桥湛山内阁，池田任大藏大臣。但两个月后的1957年2月，石桥因病辞职，外相岸信介接任首相，内阁的班子和政策未变。但到了这年7月，岸信介调整内阁时，池田去职。

1958年5月1日，岸内阁宣布举行众院第28次大选，22日投票。大平正芳获56817票，以选区第一名当选，比第二名多4804票，表明大平在选区的地位已巩固，形象也越来越好。

6月27日《每日新闻》（香川版）发表评论《善于深思熟虑者，国会保守派的希望》，对大平作了高度评价：“大平长期任大藏事务官所锻炼出来的诚实人品博得人们好评……人们都说大平是个完全不讲谎话又诚实工作的人，他处事冷静，不管出现什么突发事件，都要首先仔细考虑后再处理，因此效果显著。他作为保守派之希望而获得人们的好评……”

大平再次当选众议员后，在党内外又新担任了一系列职务：在党内担任了政务调查会副会长、临时税制调查会专门委员、林业对策小委员会副委员长、烟草事业对策专门委员会委员长。在党外，1959年6月担任了众议院文教委员会委员长。在文教委员长这一职务上，大平为振兴日本教育默默无闻地作了许多奉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平为创建和办好“长期失学儿童学生援助会”（即“黄十字会”）而作出的努力。

日本在美军占领时期，曾被迫实行“六·三三”义务教育制，但由于许多家庭收入很低，造成不少儿童不能入学或中途辍学，在日本大约有20—30万儿童长期失学。教育质量研究会负责人松永健哉起草了一篇设立“长期失学儿童学生援助会”的宗旨的文章。大平看了这篇文章后，下决心为“援助会”的建立尽一份力量。他向松永询问了经费的情况后，打算寻求又担任通产大臣的池田勇人的支持。大平先同文部省次官宫泽喜一商量的具体的细节，然后向池田作了汇报。池田爽快地允诺担任“援助会”会长，大平和宫泽任副会长。从此以后，大平为这项事业连续工作了12年，解决了大量失学儿童的入学问题。后来在池田去世后，大平又担任了“援助会”会长。直到1971年“黄十字会”因目标基本完成而解散。在这期间，大平不仅为解决孩子们的学习费用而四处奔走请求援助，而且还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孩子们的

联欢和夏令营活动，在贫民街为孩子们建教室。大平夫人和池田夫人、宫泽夫人一起，为孩子们进行募捐，有力地协助了“黄十字会”的工作。

当时大平周围有些人不理解他为什么公务特别繁忙还去为这些事“浪费”时间。大平在《我为什么关心长期失学儿童》这本小册子中作了回答。大平认为“教育就是政治，而且是政治的核心，甚至超过政治”，他认识到高水平的国民教育，是使日本飞速发展的原动力。因此大平暗下决心，今后一生决不脱离教育问题。联想到大平曾为“日本育英会”的建立做的工作和出资兴办“西讚寮”之事，可以看出大平重视教育的思想是一贯的。

除此而外，大平还对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尽力。1960年3月18日，大平以委员长身份在文教委员会议上作了特别发言，要求大学教师除搞好教育学生的本职工作外，还要承担提高全国学术研究水平的任务，并向政府要求重视大学教授的科研工作，提高大学教授的待遇。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1967年在所著《激荡的百年史》中分析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和高速发展的原因时曾说：“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高超的教育程度成了战后复兴的巨大力量。日本人由于战争而损失了许多财产，可是最为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却没有丧失。”应当看到，这种高水平的教育，也有大平正芳的一份默默奉献。

## 审时度势

大平正芳的恩师池田勇人本来与佐藤荣作同是吉田茂的得意门生，日本报刊把吉田茂当政时期吉田派的骨干称为“吉田学校”培养的学生，池田、佐藤以及他们的晚辈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人都被视为吉田学校的优秀学生。但吉田茂下台后，池田与佐藤开始各奔东西。鸠山引退后，池田先后支持石井和石桥，佐藤则支持其胞兄岸信介。岸信介于1957年2月接任首相后，暂时维持了石桥内阁的班子不变，但到了7月，岸信介调整内阁班子，除副首相石井光次郎留任原职外，内阁成员全部变动。岸信介要求池田担任防卫厅长官或经济计划厅长官，池田表示非大藏大臣不担任其它职务。战后日本因实行“经济外交”为主的对外政策，因而在中央行政部门中，外务、大藏和通产三大臣特别受政界重视，一般担任首相者以前皆曾担任这三种职务之一，故池田不愿改任是有自己打算的。

池田去职后，积极开展社交活动，将支持自己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到1958年，支持池田的后援者形成了政治结社“宏池会”，成为自民党内“池田派”的政治组织。这时池田派约有30多人。1958年春大选时，由于池田的活动，使自己声援的50人当选为众议员，池田派成为国会中仅次于岸信介派（57人）的大派系。这一年，在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的劝说下，池田又进入内阁担任了无任所国务大臣。但到了1958年12月，池田又与经济企划厅长官三木武夫、文部大臣滩尾弘吉一起，不顾岸信介挽留而辞去了内阁职务，以示对岸信介打算继续任自民党总裁的抗议。但岸信介于1959年1月仍当选为总裁。

当时池田派“宏池会”的许多人都支持池田退出内阁，但作为池田的亲信和池田派骨干之一的大平正芳，对池田反复辞去内阁职务的作法却不以为然，他觉得不应把政府的重要职位当作派系斗争的工具。大平与池田勇人虽

亲如兄弟，但并不否认池田身上有许多缺点，例如个性要强，处事生硬，固执己见，不能审时度势等。

1959年5月参议院选举后，受到党内其它派别反对的岸信介急于想拉拢在国会中处于第二大派系的池田派，再次要求池田入阁。但池田在本派许多人的压力下，一再拖延表明愿意入阁之意。经过反复考虑后，大平决定对池田进行规劝。6月17日天未亮就给池田挂了电话，建议他暂缓表态拒绝入阁，“只说考虑考虑就行了”，池田答应了。这天下午3时左右，大平到池田家中，给池田分析了入阁的利弊。大平谈到，池田已成了这次岸信介改组内阁的中心人物，掌握着“挽救岸信介困难处境和摆脱政局混乱的钥匙。”大平还引用了池田说过的一句话来开导池田：“作为政治家，不能只局限于政界这个狭小天地里，而该在国民面前表演。”他请池田考虑，应该使目前的混乱政局走上正轨而使国民安心。希望池田作出勇敢决断，把毁誉褒贬留给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去做，大平劝池田以政界领袖的觉悟和责任，与岸信介总理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在充分理解总理真意的基础上对人阁问题下决心。

大平这番审时度势、语重心长的劝导，对池田将要采取的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后，政界和财界的一些重要人士也来劝说池田。最终，池田下决心重新入阁，担任了岸内阁的通产大臣，池田派成为岸内阁的主流之一。池田这一着棋，对他以后竞选总理大臣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后来佐藤派和岸派决定转向支持池田，也与池田这次行动不无联系。由此看出，大平正芳这时的政策水平已大为提高，并已初步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 进入政治领导核心

1960年1月，岸信介总理大臣到华盛顿签署了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此招致中国、苏联、朝鲜等国和日本社会党的谴责，同时引发了日本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史称“安保斗争”。这场斗争最终导致岸信介内阁的倒台。5月20日，在众议院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条约》，6月19日在参议院自然通过，6月23日在外务省交换批准书后条约生效。这一天，岸信介宣布辞职。自民党必须迅速选出继任总裁。

池田勇人被政界视为总裁一职的有力竞争者。大平正芳到池田家去征求他的意见时，池田明确表示要立即参加总裁竞选。以前池田要担任大藏省次官和大藏大臣时，大平都曾进行劝阻，但皆无效。大平在回忆录《我的履历书》中说：“打棒球的人，谁都不愿意三击无效，而且是连续三击无效，我是更不愿意干了。池田先生作为一个政治家，留给他的最后一层台阶，就是总理大臣的宝座了。昭和35年（1960年）夏天，当池田先生表示要出马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时，我再也没有想第三次去劝阻他，要他自重了。这次我不但没有三击无效，反而希望他三进成功，并准备为此而尽自己的一点微薄的贡献。”“这次出马参加总裁竞选，我认为理所当然，这是应该走的道路，愿意为他尽最大努力。”

池田派经过磋商后，一致决定支持池田竞选总裁。但该派谁也无这方面经验，大平也深感一筹莫展。他想到上一次总裁竞选时，佐藤派有位重要的参谋田中角荣，曾在岸信介竞选总裁过程中肩负重任。

于是大平便去与田中商议、请教。田中本与池田有远亲关系，与池田也有往来。大平此去与田中见面，使二人的关系由此开始密切起来。两三天内、

田中就整理了数页材料送给大平，其中有总裁竞选的政策大纲，具体活动方式和竞选经费的预算等。材料的字是用蓝墨水写成，但在重要之处，田中特意用红墨水写，以引起大平注意。对田中的这种热情周到的帮助，大平十分感激。

大平带着这些材料兴冲冲地去见池田，向他作了说明，但不知为什么池田却并不高兴，只说了一句“不许乱花一分钱”。大平只好说：“我明白了。对您的希望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还不敢断言，但我尽可能按您的意图去办。唯有这次竞选，希望您让我们负责去办。如果可能，望您一切不必过问。”池田后来就照大平说的去办了。

以大平为核心的池田竞选班子在赤坂王子饭店设立了办事处，开始投入紧张的竞选活动。当时自民党内除池田派和佐藤派之外，还有岸信介派及其支派藤山爱一郎派、大野伴睦派、石井光次郎派、河野一郎派、三木武夫派、松村谦三派、石桥湛山派等。其中池田、藤山、大野、石井、松村是这次总裁候选人，但松村实力微不足道，藤山出马也仅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一派。大野和石井为了对抗池田派而结成联盟，并取得了河野、三木、松村、石桥派的支持，结成所谓“党人派”，即非官僚出身的议员，池田派则被称为“官僚派”。

大平正芳实行竞选的主要战略目标就在于取得自民党内的一大派系——佐藤派的支持，如果成功，则佐藤之兄岸信介为首的一派就很可能倒向池田，同时也不放过争取其它几派中有希望支持池田的选票。大平首先取得了隐居在大矶的前首相吉田茂的支持，吉田茂是佐藤的老师，对佐藤的政治倾向有影响。另外又得到了佐藤派参谋田中角荣的协作，最后取得了佐藤派的支持，连佐藤本人也到赤坂王子饭店与池田一起指挥竞选。

1960年7月10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池田勇人竞选总裁的声明，这个纲领性文件据说是大平正芳起草，许多地方都体现出大平的政治主张。例如“对反对党必须有宽容与忍耐之精神”，“人心安定和相互信赖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应该把“施政的重点放在文教方面，建立和平、自由、合作的国际关系”等，大平历来认为“宽容与忍耐是政治的根本，是民主主义的核心”。大平在竞选结束后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强调从事政治应该“宽容与忍耐”。

自民党定于7月13日在产经大楼召开全党大会。大野和石井两派眼见池田派实力日增，为了集中力量，大野退出竞选，以便“党人派”集中投石井的票。13日上午10点是开全党大会的时间，池田派按时出席。但由于“党人派”没有出席，致使大会拖到下午召开，且只选出了会议主席便散会。“党人派”为了协商对策，这天下午在丸之内饭店开会。一直持观望态度的岸信介因河野、三木派曾批评过自己在“安保条约”上的作为而耿耿于怀，他发现“党人派”集会后，决定支持池田以与其弟佐藤荣作保持一致。大平的战略成功了！这大概也是他以前劝池田重新加入岸内阁而得到的回报吧。

池田与佐藤见13日的党大会未开成，便将大平叫到产经会馆的一个房间里，命令大平立即去找三木武夫以寻求支持。大平打听到三木正在丸之内饭店七楼参加“党人派”会议，于是他来到人声嘈杂、异常闷热的丸之内饭店，连跑带喘地爬上七楼，但“党人派”的塚田十一郎、滩尾弘吉、稻叶修等站在房间门口不让大平进去，说三木正与河野、松村、大野、石井一起开重要会议，不让大平见三木。大平从他们的神情中感到似乎“党人派”已胜券在握，但他又想起两三天前这位塚田十一郎说过的一句话：“大平君，战斗是

取决于最后 5 分钟啊！”

大平未见到三木，赶紧回产经会馆，党代表大会会场已空无一人。谨慎的大平巡场一周，看有没有人丢下未熄灭的烟头。走出会场碰到了椎名悦三郎，大平小声地向他打招呼，他却自言自语地说：“我糊涂了，搞党人派联合，怎么外交观点不同的北京派和台湾派都携起手来了！”大平乘车前往赤坂王子饭店途中，反复思考椎名的话是何意思，后来终于悟出，亲北京的松村、三木和亲台湾的大野、石井正在搞联合，因对外政策的分歧，目前暂时还不能完全统一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党人派”的力量就会集中，那时若再要战胜他们就困难了。回办事处作好安排后，大平赶快到赤坂的饭馆里找到正在吃饭的党代表大会会务委员长菅家喜六，请他务必在次日（14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菅家爽快应允。紧张了一天的大平家也未归，当晚就在办事处沙发上裹着毛毯打了个盹。

1960年7月14日早晨，池田派在松木楼饭庄举行早餐会。“早餐会盛况空前，充满着热烈的气氛”。池田派已预感到胜利在望。上午10时，自民党代表大会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会上举行了两轮总裁公选。第一轮预选池田勇人得246票，石井光次郎得196票，藤山爱一郎得49票。第二轮决选时，藤山派投了池田的票。最终结果池田得302票，石井得194票，池田以压倒多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

在池田当选总裁的当天，大平含义深刻地问池田：“您从广岛来到东京时，有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池田答道：“完全没想到。”大平就说：“所以总裁这把交椅对您来说，是意外地拣来的，您无论什么时候离开它都不会后悔吧？”池田点头道：“是的。”于是大平就向池田提出要求：“正因为您有了早晨组阁晚上就倒台也在所不惜的想法，所以希望您决不要提长期政权这句话；另外，今后必须与国民同甘苦，希望您要尽量回避有艺妓伺候的宴席，不去打高尔夫球。”池田立即表示赞成，而且后来也基本遵守了这一诺言。池田说：“将用宽容与忍耐精神进行对话，实行议会主义，今后决不搞单独审议”，“要一边吃着咖喱饭”一边与在野党领袖会谈，与酒吧、高尔夫球绝缘。其实大平作为年轻官吏时，对享乐是十分感兴趣的，他把出席酒会、宴会看成是同社会各界交往的必要应酬，因此从不拒绝在这些招待会上露面。在横滨任税务署长时，新婚不久的志华子每天都要等到很晚才能见到丈夫的面，因为大平忙于应酬去了。到仙台任间接税部长时，大平就像招待员一样，每天都为参加宴会而忙碌。离开仙台时，到车站送行的艺妓竟有几十人，令志华子夫人大吃一惊。但中年以后的大平逐渐在政治上成熟了，酒也基本戒了，也特别注意个人在国民中的形象了，而且还以此劝诫前辈池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平的政治抱负。

池田当上总裁后，决定益谷秀次为干事长，佐藤派的保利茂为总务会长，岸派的椎名悦三郎为政调会长。

7月18日，国会选举池田勇人为首相，立即开始组阁。在这之前，池田已决定他最得意的弟子大平正芳为内阁官房长官。因此，内阁成员的人选几乎都是大平提出，交池田审定。这样，大平通过多年的努力，进入了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这一年，大平正好50岁。

## 第四章 宦海沉浮

### 紧张而忙碌的关键人物

内阁官房长官是内阁的关键人物，一般由总理大臣一派的人担任，通常也是总理大臣最亲信的人物。大平正芳是池田最中意的官房长官人选。内阁官房长官负责的工作十分繁杂，主要职责是安排内阁会议的议程，处理内阁日常事务，搜集重要情报进行研究分析，然后向内阁提出制定重要政策的依据。但官房长官要做的工作却远远超出了这些法定范围，可以说是既紧张又忙碌。对此，大平正芳自己深有感受：“官房长官是个很忙碌的差事，对于内政、外交等一切问题都要不断注意，开动脑筋。无论国际国内，不分白昼黑夜，凡有重大事情，都要代表政府立即加以处理。另外还要争取同政府各部门以及执政党的全面合作；不仅要和在野党、新闻界、劳工界，而且还要和学术界、教育界、艺术界、体育界处好关系。这就需要能适应各种变化的灵活的态度，生硬僵化就应付不了。所以官房长官若不是虚怀若谷，就不能当机立断、灵活自如地处理问题。”

大平正芳外表憨厚，给人的印象甚至有些迟钝、笨拙，一些人奇怪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受到池田的重用，也受岸信介及其他一些自民党派系首领的赏识。也有人认为这正是大平大智若愚的表现，不能被其外表所迷惑。池田一派才子云集，大平则是这些才子中具有特色的政治家，所以才会被委以官房长官的重任。

官房长官首先必须对付的是记者，作为内阁发言人，往往要面对记者的各种提问，思维敏捷而又机智灵活地正确回答各方面问题。大平每日必须六次会见记者，从早晨上班直到晚上12点半，不仅体力上很疲劳，而且精神上相当紧张。所以大平说：“我在担任官房长官期间，总是提心吊胆地工作……我感到有某种巨大的压力。”大平每天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但每时每刻内心都很紧张，必须边回答问题边整理思路，以免忙中出错。当凌晨1时左右记者走后，大平还得赶往池田家中，与池田首相商量有关问题。遇到时间太晚，池田家的大门关了，大平还得如顽皮的孩子一般在警卫协助下翻墙而入，对于大平这种年过半百的人，真是不容易。回到家后稍微睡上一会儿，又该上班会见早班记者了。有一次记者问大平星期天有何安排，大平回答：“我没有星期天。”

尽管这样，大平并不讨厌记者，他认为记者是传达政府方针政策的重要渠道，同时又能从记者那里了解民情，因此记者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重要媒介。所以大平很乐意同记者交朋友。这种作风早在他当一般议员时就已形成。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岛桂次回忆，1955年的一天，他喝了不少酒后去大平家，大平对他滔滔不绝的胡言乱语耐心地听了5个小时，使岛桂次很感动，认为大平真是一位胸襟开阔的人。现在大平地位变了，更是“虚怀若谷”地对待记者。他任官房长官期间，专门在首相官邸兴建了别馆作为记者会馆，供记者采访首相和官房长官时使用，内有记者室、会见室、报道室、摄影厅、食堂等，记者们将其称为池田和大平的“善政”。

与记者打交道仅是大平工作的一小部分，他还得随时代表政府去处理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1959年初岸内阁执政时，因采用把能源由煤炭转变为石油的方针，使采煤业陷入困境，导致工人运动出现。1960年7月池田内阁即

将诞生时，煤矿发生暴力事件，导致 300 人受伤。这无疑给刚上台的池田政府出了个难题。为了解决劳资双方的争端，新上任的劳动大臣石田博英作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大平作为官房长官也积极配合，他与东京商大的同学，当时担任劳动省劳政局长的富樫总一密切磋商具体措施，还主持包括首相、劳动大臣、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负责人、煤矿工会委员长参加的调停会议，为最后妥善解决工潮起了关键作用。

1960 年 10 月 12 日，日本解散众院准备举行第 29 届国会总选举。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暴徒刺杀身亡。工会总评议会立即召开抗议大会，并决定连续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大平为了迅速使事态平息连夜赶到信浓町，向池田建议让国家公安委员长山崎岸辞职，事前也去山崎家做了工作。后来山崎也到池田家，三人共同研究了善后对策。第二天内阁会议上决定山崎辞去公安委员长一职。

如此繁忙的公务大平是怎样有条不紊地进行呢？他首先努力做到尽量不积压问题，有何问题就立即安排相关部门的人去办，尽快把它处理掉。而且大平从不发出如何处理的“指示”，即使办事者处理该问题的结果不尽善尽美，大平也注意尊重办事者，使办事者能大胆行使职权，大平就避免了“事必躬亲”，减少了不少事务性工作。尽管如此，大平搞了整整两年这方面的工作后，还是感到相当疲劳。

1960 年 11 月，众议院举行第 29 届选举，大平因工作太忙无暇回选区发表竞选演说，由长子正树代表他演讲。结果大平得 64077 票，以第一位当选，比第二位多 2 万多票。

## 大政方针的制订者

大平作为官房长官，时常要为池田总理大臣起草施政方针的演讲稿，仿佛成了总理大臣秘书官，在这一过程中，大平成了政府大政方针的实际制订者之一。

池田在上台之前的竞选演说中就曾提出诱人的“收入倍增计划”，即 10 年之内国民收入增长 1 倍。并把它作为本届政府奋斗的任务。大平正芳同意把这个方案当作政府的施政方针，但反对将它规定为政府的“计划”。因为大平认为日本不是计划经济国家，只能把池田的“收入倍增论”作为衡量政绩的一面“镜子”。但池田本人则坚持要将收入倍增这一目标作为政府的计划，大平也只好服从，并积极拟订政策措施，将池田的计划具体落实。

大平首先与大藏省的下村治、宏池会事务局长田村敏雄以及各省来的事务官一起拟订了新政策体系，其中规定今后三年经济递增率为 9%，这一点成为新政策的基础。9 月 1 日，池田首相在自民党领导成员和内阁大臣联系会上最后裁定了这一新政策。新政策在政治、经济、外交、文教和青少年问题等各方面均采取了积极的“高姿态”。大平将这项新政策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在政治活动特别是国会活动中以宽容和忍耐精神为基础，把确立人事管理体制作为改革行政的基轴。

二、内政与外交实行一体化。

三、把今后 10 年内收入倍增作为经济政策的指针。

四、确立长期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政府今后的任务是加强经济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开发人的能力和扩大社会保险。

1960年10月17日，召开了第36届临时国会，这是池田内阁组成以来的第一次国会，因此池田首相在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就特别引人注目。演说词是大平起草的。池田演说之后，各党议员对演说内容进行了例行质询，没有提出特别的责难，大平总算放下了心。事后他对起草施政方针演说词一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演说稿是很难写好的，如果写得详细具体，就会被认为冗长繁琐；如果进行高度概括，又会被认为空洞无物，省略之处以后又会出麻烦；写得通俗会被认为无诚意；写成严肃文章又会被认为枯燥无味。这种分寸实在难以把握。但这项工作又很重要，往往关系到首相和内阁在议会中的形象和在国民眼中的威望。因此大平深感责任重大，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政策水平。

1961年1月，一年一度的国会常会复会了，池田首相又须在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概括地表明池田政权今后的政策方向。大平又综合了各省厅送来的材料，经过仔细推敲和研究，写成了这篇施政演说稿，这个演说大致包括了外交和经济政策两大方面的内容。在外交上，强调了外交和内政不可分离，尽力说明所谓“中立主义”只能是幻想。在经济政策上，主张积极推进综合性的施政方针。目前经济政策的重点是使劳动力充分就业和自由流动，另外要注意使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农林业和中小企业走向现代化，这是实现日本经济现代化的最大难关。大平起草的这个演说稿，既顺应了战后日本积极推进“经济外交”的战略方针，又指出了实现战略目标存在的困难。

对于一些突发性的重大事件，因涉及到内阁的责任，池田首相也必须对舆论明确表态，这种表态的发言稿也往往由大平拟订。1961年2月1日，一名17岁的右翼少年声称《中央公论》刊登了深泽七郎的“风流梦谭”，作品中有天皇一家被处刑的情景，这是对天皇的侮辱，以此为借口袭击了《中央公论》社长岛中鹏二的住宅，导致警视总监辞职，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政府追究作者和《中央公论》社损害皇室名誉的罪责。大平为处理此事费尽心血。最后避免了诉诸法律，由大平起草了一个讲话稿，让池田在4月29日天皇诞辰之际以“谈话”的形式发表：“……对于这次所发生的事件，考虑到有关人员公开表示了遗憾之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政府决定放弃控告手续，而静观事态发展。我同国民一起期望这种关系到日本国民名誉和品质的问题，今后不要再发生。”此事以后就没有再扩大化。

### 必须充当“关系协调专家”

大平担任的官房长官所处理的各种事务中，最头疼的还是协调党内党外的各种关系，对党外必须体现出本党的统一性，而对党内既要协调总理大臣与各大臣之间的关系，又要协调好自民党各不同派系的大臣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当一种“关系协调专家”的角色。

池田首相历来的作风是对工作极端热忱，但常常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要他人也这么办，有时不惜采取高压手段。他当首相后，常把内阁大臣及其幕僚叫到官邸，详细听取情况汇报，不断发出具体指示，有时使人觉得他做得太过分。大平见状就劝告池田：“您是信任这些人，才亲自任命他们为大臣的。既然已任命了人家，他们所管的事就应该委托他们去办。只要不是特别重大的事，我认为就不应该做太具体的指示。”池田却很不高兴地说：“你少管闲事！”但大平认为自己管得对，因为文教大臣

荒木万寿夫很少来请示汇报，但他的文教政策被认为是成功的。河野一郎在总裁竞选时与池田对立，但在第二次池田内阁时入阁担任农林大臣。他并未等待首相“指示”，积极主动地刷新省内人事，解决了“黑市米”的自由买卖问题，冻结了新鲜食品的价格，对贯彻池田方针起了推进作用。连池田总理也不得不夸河野“是个能干的家伙”。所以大平认为池田如此不信任大臣，其弊病往往是出于自恃。

1961年5月13日，自民党和民社党共同向国会提出“政治性暴力防止法案”，目的在于限制游行示威。池田首相周围的人如大平、宫泽等都反对提出该法案，但池田又固执己见，说：“你们都不懂”，用强硬态度指示通过此法案。当国会审议此法案时出现了混乱，池田决定强行表决，但法案因参院反对最后未获通过。后来大平在《朝日新闻》周刊与东京大学副教授寺泽一对谈时，当寺泽一问大平提出该法案是不是池田总理个人的想法而并非自民党的意见时，大平巧妙地为池田作了辩护，说“最后作决断时，池田还是慎重的。”这样大平就避免了因此事可能造成的对池田首相的不利局面。

协调自民党不同派系大臣之间的关系，更令大平头疼。这方面的矛盾要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大平只是尽量使这种矛盾趋于缓和，避免激化。

为了使第一次组阁时被排斥的反主流派首领河野一郎不采取分裂党的行动，大平正芳花费了许多心血去做河野的工作，河野后加入内阁并颇有建树。但同时就引起了主流派首领、对池田当上总裁和首相作了很大贡献的佐藤荣作的不满。佐藤不仅对河野不满，对为缓和党内矛盾而去河野工作的大平也有意见。大平为了协调各方面关系，在前三次池田内阁组成时，他提出的阁员名单，都尽可能照顾各派系首领人物的利益，因而有人将池田内阁称为“举党内阁”，也有人称之为“平衡内阁”。事实上，大平在向关系密切的记者交谈时，又谈到了自己根据大学时代从中山伊知郎老师那里学到的平衡论观点而信奉的“椭圆论”，即要稳定他田内阁这个椭圆，必须想法妥善对待佐藤与河野这两个椭圆中的两个焦点，以使池田内阁这个椭圆保持平衡。

除了这两个派系有矛盾外，藤山派也对池田不满。1962年4月13日，国务大臣兼经济企划厅长官藤山爱一郎在经济同友会大会上批评了池田的经济政策。藤山大臣是企业界颇有经济实力的人物，他的批评在日本财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内阁为此事召开了四次与经济有关的大臣会议，后来以大平正芳为中心，拟定了包含藤山发言内容在内的统一见解，表明了“今后经济运营的基本态度”，这一风波才得以平息。

在这种有各派实力人物参加的内阁中，官房长官要协调各派首领的关系，比其它情况下要困难得多，稍不注意就会开罪于某一派。当时官房长官尚不是大臣，直到后来佐藤内阁的桥本登美三郎任官房长官时，才正式成为国务大臣。这种稍低一等的地位使大平的协调工作开展较困难，但同时也给大平以下台阶的机会。正如大平自己对记者说的那样：“所谓实力人物内阁，说得不好听点就像动物园似的，有许多猛兽在一起。所谓官房长官是猛兽的使者，因此不能放在与猛兽同等的地位。由于低一格，当猛兽发怒时，说声‘对不起’也就完了。”大平在这里绝不是自我解嘲，而是摆正自己在内阁中的位置，不计较个人恩怨与得失，为了池田政权的大局，尽力完成好关系协调专家的任务。

做了两年官房长官而又感到相当疲劳的大平，希望在1962年夏池田第四次组阁时能告退，便推荐了在大藏省工作时的友好黑金泰美来接任。尽管池

田强烈地挽留大平，他还是谢绝了。心想“这下总算无官一身轻，可以去休养了。”谁知组阁时情况又发生了突变。

## 迎接新的挑战

1962年7月，池田勇人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为了组阁之事他考虑了很久。本来考虑让佐藤荣作来担任外务大臣，但佐藤拒绝了。池田反复斟酌之后，决定让大平正芳担任外务大臣这一特别重要的职位。从此以后，大平就走上了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新岗位，去迎接新的挑战。

在当官房长官时，大平因常在电视里会见记者、参加座谈讨论等活动，使国民逐渐熟悉了大平，并对他日益有了好感。现在大平担任了外相，抛头露面的机会更多，大平当然就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当时的报纸也对大平担任外相纷纷加以评论，如1962年7月18日的《朝日新闻》晨刊是这样评论的：“人们一度都推测他将留任，但由于在后来的日韩谈判等外交悬案中有许多重要问题，首相为了竭力推行‘池田外交’，所以决定由其心腹大平任外相。”“从担任内阁中具有掌柜资格的官房长官到担任内阁中的外相这个重要职位，池田首相对他都无比信任。他于东京商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大藏省，但在他身上看不出什么呆板和书生气十足的大藏省官僚的许多特点。相反，他细心、周密，善于分析形势，对政治动向敏感异常。他使安保骚动后才成立的池田内阁采取低姿态的融和政策，也可以说是提高池田声望的主要人物。”

大平到外务省上任后，发现外务省次官武内龙次、以及审议官、局长等在资历上都是自己的前辈，一向稳健的大平当然就表现得更谦虚了，甚至在会见记者时说自己搞外交是外行。但实际上，以前就已展现出外交才能的大平，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更是得到一个大显才华的良机。

这时的日本，自从签订“旧金山和约”恢复独立后已12年，1956年12月14日又被联合国接纳为成员国，地位比二战结束时已大为提高。但日本人认为，这十几年来日本尚无自己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大平正芳也认为：“当时日本总算在经济上达到了自立，正处于摸索开展真正外交的时期。”

日本是个亚洲国家，要开展外交首先要遇到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并遗留了许多必须解决的悬案。20世纪6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日本当然也就面临着解决日韩、日中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问题。

在岸信介内阁时期，为了改善与韩国的关系，恢复两国邦交，从1952年2月到1958年4月，日本曾四次派员与韩国谈判，但因日本不愿对半个世纪来给韩国造成的损害表示道歉并加以赔偿，导致谈判最终未有结果。1960年池田内阁组成后，日本派外相小坂善太郎前往韩国谈判恢复两国正常关系。但谈判从10月持续到1961年5月尚未进入正题。5月16日韩国发生军事政变，朴正熙上台建立军事政权，日韩会谈中断，朴正熙的统治稳固后，对恢复日韩谈判持积极态度，企图通过解决“对日请求权”问题，获得日本的经济赔偿，从日本引进资金。

1961年6月池田访美时与美国总统肯尼迪达成共识，决心认真对待日韩问题。1961年10月举行了第六次日韩会谈。1962年6月，池田在参议院

选举游说中表示一定要尽快实现日韩关系正常化。这年 11 月，在池田访欧时，大平外相与韩国实力人物、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就韩国向日本的赔偿请求权问题进行谈判。

当时韩国要日本赔偿 6 亿美元作为日韩复交的条件，日本答应给 3 亿元，还有 3 亿元差额令大平外相深感难办。韩国因长期受日本殖民统治，对日本有强烈的猜忌和疑虑，大平作为外相是理解这一点的。为了沟通双方的观点，大平充分施展了他的外交才能，他对金钟泌说：“贵国人民的感情我也能充分理解。但是，我认为只是讲仇恨日本的话，对贵国也不会有任何益处……两国是隔海相望的邻居，因此，难道不应该使过去的一切烟消云散，共同展望未来吗？……贵国独立来之不易，今后面临艰难的国家建设任务。日本作为贵国的永远之邻，准备提供相当数量的有偿和无偿的经济合作，以协助贵国走向未来。”谈判结束后，双方交换了秘密备忘录，这就是较为有名的《大平——金钟泌备忘录》。根据这一备忘录，日本向韩国提供无偿援助 3 亿美元，有偿援助 2 亿美元，经济合作 1 亿美元，谈判基本获得成功。“请求权”问题谈判成功后，日韩渔业纠纷的谈判也取得明显进展。以前大平外相几乎每天都要接到韩国抓捕日本渔船及船员的报告，并不断向韩国抗议，现在此类事件再没发生。此后由于韩国政局不稳，日韩基本条约到 1965 年 6 月才正式签署。

大平在《我的履历书》中回忆此事时曾说：“所谓请求权可以看成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可是只在这个范畴里来考虑，那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如果不是这样考虑，而是把韩国看成是独立的新国家，日本作为它的旧宗主国和关系最密切的邻国，对它采取表示‘祝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才算是开诚相见，而且也切合实际。我根据这种精神协商的结果，以开展经济合作的办法（主要是提供无偿援助 3 亿美元，有偿援助 2 亿美元），解决了请求权问题，打开了建立邦交的门路。”大平的话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日本政界的普遍观点，即对过去遭受日本侵害的国家不是立足于道歉赔礼等“向后看”的做法，而是立足于“向前看”，从发展今后两国的关系出发，由日本提供一定的补偿和援助。即在维护日本“面子”的前提下给这些受害国一定的实惠。这种原则在日本对其它亚洲国家的交往中也多次采用。

日本外交在亚洲的最大课题无疑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在“旧金山和会”召开之前，苏联、英国等要求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遭到美国拒绝，最后英美达成协议，台湾海峡两岸的代表都不参加，将来由日本选择与哪一方缔结和约。中国的政治现状给战败国日本以可乘之机，由它来选择战胜国的某一方，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开了一个滑稽的先例，也给以后日中邦交的恢复设置了障碍。1952 年 4 月 28 日，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日台条约”，该条约贯穿了 1951 年日本首相吉田茂给美国杜勒斯信的精神，称条约适用范围是“中华民国政府所控制的和今后将控制的一切领土”，实际上与当时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口号相呼应。这更为今后的日本政府解决两国关系正常化增添了困难。以后日中两国政府间的交往基本中止，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继续维持。

到岸信介内阁时，日中民间贸易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岸内阁却对此持消极态度，以免引起美国的不快。结果日本财贸界感到非常不满，说日本外务省“似乎成了美国国务院的日本科”。当时中国商务代表团在日本悬挂了五垦红旗，受到台湾当局抗议，岸内阁以未恢复邦交为理由，立即表示不承

认中国国旗权利。中国对此十分忿怒，于 1958 年 4 月废止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停止履行 450 亿日元的进出口合同。5 月 2 日，在日本长崎市百货大楼的中国邮票展览会上，一名反华青年撕下了中国国旗。中国方面对此反应强烈，外交部长陈毅于 5 月 9 日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岸信介首相却狡辩说：“中共才是不友好的。”5 月 10 日，中国提出全面停止中日贸易，两国关系中断。

池田内阁当政后，改变了岸内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态度，加强了同中国的经济贸易交往，企图通过“经济与政治分开”的作法，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恢复日中邦交创造条件。中国方面也采取了灵活的态度。1960 年 8 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日中贸易促进会的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

- 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
- 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 三、不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

并提出，如果条件成熟，没有政府协定，也可缔结个别民间协议。

但日本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处处受到美国掣肘。美国担心日中贸易的扩大会增强中国的实力，要求日本协助遏制中国。为此，刚担任外相的大平正芳费了不少心血向美国作解释。他每次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国务卿腊克斯会谈时，都强调恢复日中贸易的必要性，并且声明，日本政府“对于同中共的贸易既不鼓励也不阻止。”最后美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更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接触。1962 年 10 月，日本实业家、前通产大臣高崎达之助访问中国，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会谈、双方以“政治经济不可分”的一致意见为基础，交换了“日中民间贸易综合备忘录”，被称为“LT 贸易”（LT 为廖、高崎日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这以后日中贸易大幅度增长。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自民党内和财界围绕日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展开了矛盾斗争。台湾当局和自民党内的亲台派遥相呼应，反对日中贸易的这种飞速扩大。1963 年 8 月，日本“仓敷人造丝”公司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这是战后日本第一次对中国大陆出口成套设备。日本政府批准了这项出口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受到台湾当局的激烈反对。大平外相认为，当今世界贸易的主导形态，正由早期的分散买卖物品转变为出售成套设备等完整形态，支付也多不是用现金结算，而使用延期付款方式。他认为中国大陆市场潜力很大，日本与其进行贸易的规模不应比同西欧的贸易规模小，否则难以被日本国民所认同。因此，大平外相对台湾当局反复进行了说服工作。

但台湾当局仍采取了报复行动，1964 年 1 月，台湾当局决定停止官方购买日货和限制对日进出口贸易。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下，自民党内和池田内阁内许多人都主张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发展应持慎重态度。一次大平对自己共同处理对华事务的通产大臣福田一说，中国与日本目前的关系就像除夕与元旦，即很密切。但两国虽是“同文同种”，却存在许多差异，还应作出更大努力来谋求与邻国的和平相处，希望福田一顽强坚持下去。1964 年 7 月 3 日，在台湾当局要求下，大平外相访问台北，大平称这是一次心情沉重的旅行。在台北，他会见了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的政界首脑。在大平的说服下，台湾当局正式决定解除停止购买日货的决定。

但大平对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却出言谨慎。1964 年 2 月 12 日，大平外

相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回答社会党议员穗积七郎质询时，曾涉及到这一敏感问题。大平认为当出现中共政府在世界的祝福声中加入联合国这种情况时，当然日本政府也必须下重大决心；如果中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并受到祝福时，必须考虑邦交正常化问题恐怕是理所当然的。言下之意，如果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日本政府才会与之磋商邦交正常化问题。大平的这一回答比起岸内阁时日本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来，可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比起他以后所迈的步伐来，仍显得过于保守。这当然也离不开当时美国和自民党内部的许多人对中国态度的影响。除此而外。大平在池田内阁担任外相时，无论在国会的演说还是其它场合，很少直接涉及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

## 推进对发达国家的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对日本的长期占领，以及美国对战后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巨大影响，使日美关系的协调成为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石。战后几乎每届日本首相上台后，都要到美国访问，被戏称为“例行朝拜”。1961年6月，池田首相也按例访问了美国，受到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欢迎。在双方会谈中，美方建议设立日美经济贸易和日美科学技术两个常设混合委员会，日方欣然同意。由此，日美关系更加密切，产生了“日美伙伴关系”这一用语。

但是，这种“伙伴关系”并非双方平等的，日本方面常受到来自美方的压力。大平当外相后，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配合防卫当局，忠实地执行日美安全条约。”“为了在日美之间不撒下任何不信任的种子，我是费尽了心机，注意作到考虑周密。”

在协调对美关系的工作中，大平得到了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的协助。赖肖尔日语说得很好，他比大平小半岁，故用日语称大平为“前辈”，二人关系很融洽。赖肖尔曾说：“大平先生留给我的最强烈印象，是他为建立日美友好平等关系，倾注了热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大平外相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种种要求，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都尽量给以协助。刚当上外相不久，赖肖尔大使就向大平外相提出要求，希望日本增加从美国的小麦进口。原来，由于美国在50年代增加了对世界各地的经济、军事援助，使美国的黄金不断外流，到1960年时，黄金储备降到180亿美元以下，造成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困难，因此希望扩大出口增加硬通货的储备，望日本给以协助。大平外相听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但这一情况不要向任何人讲。”不久，这一问题顺利解决。

1962年10月22日，赖肖尔大使携肯尼迪总统亲笔信拜访池田首相，谈到因苏联将导弹运到古巴，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要求日本支持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池田和大平表示同意。

1963年1月9日，赖肖尔大使又向大平外相提出，美国非北极星型普通核潜艇希望在日本港口停泊，以便让乘务员休息和补给。大平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心灵带来极大创伤。日本老百姓的反核情绪特别强烈，如果听到美军核潜艇将在日本港口停泊，势必引起社会的不安与骚乱。但大平认为美国要停靠的只是以核能为动力的潜艇，只要不装载核武器，是可以

允许它停靠日本港口的。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不安，大平外相要求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和科技厅对美国核潜艇的主要安全性问题进行研究，并希望美方对核潜艇的安全性通过外交途径用照会予以确认。到了6月。上述两机构向日本国会提出了《有关美国核潜艇的资料》的报告，同时，大平又发表了《外务大臣关于鸚鵡螺号核潜艇和 F105 战斗轰炸机的谈话》。最后使此事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这一年的3月19日，大平外相被任命为在日美之间领事条约中签名的全权委员。但大平外相并非对美国的所有要求全部满足。他站在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上，对美方的一些过分要求加以抵制，同时又不损害两国的密切关系。

1963年7月18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国会提出《国际收支特别咨文》，咨文中提到为了保护美元，要求实行利息平衡税，即美国政府对美国人在海外投资的利息征收10%作为平衡税，但并不是针对所有的美国投资国家，如在加拿大投资就可以免征这笔税，而在日本投资则需征收。这一政策无疑会使美国人在日投资锐减，使日本很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7月31日，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奉池田总理之命访美，与日本驻美大使武内龙次一起会见了肯尼迪总统、腊斯克国务卿，并重点与美国财政部长狄龙进行了会谈。大平就美国实行利息平衡税对日本将产生的影响作了详细说明，要求美国对日本也同对加拿大一样，不征收利息平衡税。经过反复磋商，美方作出了让步。8月2日双方发表共同声明，美国在声明中承诺，如果利息平衡税使日本的国际收支发生危机，美国准备采取特别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利息平衡税。该法案在美国推迟到1964年9月2日通过，由于大平访美时美国的承诺，对有关日本政府的债务；每年在1亿美元以内免征平衡税。

1963年11月2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日本方面谁去参加葬礼讨论了很久，池田希望天皇派代表参加，并向大平外相谈了此事。但天皇宫内厅以此事无先例没有同意。最后由池田和大平前往美国参加了葬礼。

除了美国外，欧洲的发达国家，也是日本外交的重点。1962年9月，大平外相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进行了会谈，要求美国认真研究归还冲绳问题。然后大平外相飞往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同各国首脑举行了会谈。在伦敦，大平外相与英国国务大臣格林交涉《日英通商条约》事宜，并与英国掌玺大臣希思会谈。在巴黎，大平会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并与法国财政部长德斯坦会谈，要求加入关贸总协定。还与法国外长库布德米尔比尔商谈了分阶段实施贸易自由化问题。在波恩，大平与西德外长施莱达会谈，表明日本希望扩大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和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罗马，大平又同意大利工商部长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意大利总统塞尼伊。大平外相还到梵蒂冈拜见了教皇约翰23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大平正芳此时心中可能有特别的感受。在布鲁塞尔，大平外相先与比利时首相鲁菲布尔会谈，然后拜会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长赫尔施太因。在海牙，大平与荷兰外长伦斯举行会谈，并访问了国际法庭。大平的访欧，从政治上看，是战后日本力图探索不受美国制约的独立的真正外交的开始，从经济上看，是为了扩大日本的海外市场，以适应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大平这次访欧，为他田首相的访欧铺平了道路。

1962年11月4日至20日，池田首相访问了欧洲各国，与西德、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国开展了“经济外交”，努力推进日本与欧洲贸易规模的扩大。所以法国总统戴高乐把池田称之为“半导体的推销员”，

由于池田访欧前，英国颇有影响的《经济学人》杂志出版了专辑，题为“注意日本”，介绍了飞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引起了欧洲各国的重视，使池田的访问收到了预期效果。这次访问的成功当然也离不开太平外相的努力。同时，这次访问反过来又促成了日本把对美国 and 加拿大的部长级“协商外交”扩展到了欧洲。

第二年8月25日至9月10日，为了进行这种“协商外交”，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又应邀访问了欧洲的挪威、瑞典、丹麦、法国、英国及亚洲的伊朗。访问北欧三国时大平如“游仙境”般高兴，在挪威受到国王接见，参观了北海沿岸的峡湾；在瑞典参观了现代化的原子能发电站和与日本有关的远东博物馆；在丹麦则游览了具有优美田园风光的大农场和令人浮想联翩的古城堡。在法国，大平外相在日本驻法大使萩原的陪同下，与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进行了会谈，聆听了这位世界闻名的总统对欧洲文明的高见。这次会见使大平对戴高乐总统有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对“他那明亮的蓝眼睛和细长的腿”。大平认为戴高乐总统“既不是一介武夫，也不是别具特色的政治家，而是一位思路宽阔的哲人思想家”。

在访问英国时，大平外相受到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的热情款待。大平和日本驻英大使大野胜己等人应霍姆大臣的邀请在格拉斯哥郊区的别墅住了一宿，并同霍姆大臣的家人一起愉快地打过一次雷鸟。大平是新做了一套猎服去打鸟，霍姆穿的却是被虫蛀过的破旧猎服，这件事使大平看到了英国人的那种典雅风度的一个侧面。结果，大平一只雷鸟也未打着。霍姆却打下了好几只。晚上，就用这些雷鸟做菜，霍姆盛情款待了大平夫妇等人。第二天早晨，格拉斯哥的报纸报道了此事，标题是《大平先生是最好的服装员，但不是最佳射手》。

由于大平和池田的先后访欧，促成日本于1963年2月1日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该组织于1961年9月底成立，参加者大多是欧美发达或较发达国家。日本申请加入这种组织，表明日本政府已认识到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了变化，可以进入经济发达国家之列了。1964年4月，日本正式加入了这一组织。日本已成为世界先进工业国这一事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 呼吁和平与发展

联合国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最重要的国际性组织，也给各国提供了最主要的国际论坛。日本于1956年加入联合国后，也就获得了在重要国际场合表达自己观点的宝贵机会。

大平正芳刚就任外相两个月，就于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呼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停止核实验，实行裁军和援助不发达国家。

1963年9月，大平刚访问欧洲返回日本，五天后又飞往美国去出席联合国第18届大会。这届联大召开前的8月5日；美、英、苏三国签订了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即“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大平外相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充分阐述了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看法。

首先，大平强烈地呼吁全人类实现和平：“像今日这样大量谈论和平的时代可说是前所未有的，那是因为能使人类灭绝的核战争的威胁增大，我们

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和平问题。”接着，大平提到了古巴导弹危机给全世界带来的恐怖，认为它与全世界人类的存亡相联系。

除了这种威胁和平的因素的存在，大平还分析了促进和平的积极因素：“但是，伴随我们的不仅是这种消极面。今天科技的发达促进了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交流，的确令人惊叹，现在一国人民与其它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紧密联系起来。如同个人不可能在国家中孤立生活一样，国家也不能在世界中孤立存在。这样，当今人类从生到死都深深相连。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全人类真是共命运了。和平之所以不仅停留于观念问题，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务必亲手确保和平。这是生活于现代的我们的义务，也是责任。”大平这里说的和平，不是某一地区、一段时期内的和平，他已把和平提高到全人类相互依赖，谋求共同生存的高度来加以阐述。

大平进一步指出确保和平应采取的手段应该是“缓和对立，消除不信任”，他认为无论多么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只要尊重事实，相互信赖，是没有解决不了的。

但是，大平又提醒道，尽管已签订了片面禁止核实验条约，只是和平的漫长道路中的第一步。和平之路决不平坦，全世界所有国家应不失希望地忍耐和努力，一步步向和平前进。大平特别强调：“我们寻求的和平，绝非作为战术口号的和平和观念上的和平，而是保证尊重人权、伴随着自由的、具体的全人类和平。”“为了确保真正的和平，大国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大国对全世界和全人类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大平认为作为世界和平维持机构的联合国的使命，也愈来愈重要。

大平又谈到与日本关系最密切的亚洲局势，尽管西伊里安问题已和平解决，但老挝、越南、朝鲜、马来西亚等地区仍紧张不安，围绕中国也有种种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使亚洲能安定发展。

关于裁军问题，大平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必须考虑各国军事力量的均衡和安全保障上的要求，否则将会威胁到和平，达不到裁军的预期目的。第二，大国在裁军上应担负重大责任，特别是把禁止核武器实验由部分推向全面，并希望更进一步在一般裁军领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实现全面的裁军。

关于殖民地的独立，大平认为这是联合国必须紧急解决的重要问题。虽有许多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令人高兴，但今后要解决的问题和克服的困难还很多，还有许多民族尚未独立，已获独立的国家对这些民族的命运不得不给予重大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需防止过激行为。与未独立民族有关的诸国，应从人类的进步这一高度出发，对这些民族的愿望给予充分同情和理解。

大平在演说中将发展中国的经济进步与繁荣，作为确保永久和平的基本条件，认为这是现代国际社会的重要课题之一，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南北差距问题。相信联合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会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日本将对联合国的建设性事业积极给予协助。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应对自己的将来作现实的展望，确立长期而健全的开发计划。当然，要制定和实现这些计划，就必须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充实行政能力，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强化社会组织力。日本将在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合作，对亚洲诸国的要求，日本将作特别考虑。

大平外相还谈到了扩大国际贸易问题和联合国的财政问题。最后大平再

次强调：“我们寻求和平——永久的、稳定的、全人类的和平。为此，我们必须从地球上扫除恐怖和不安！”

大平外相有关和平与发展的这些思想，以后在1963年10月18日的第44届国会外交演说中也再次表述、并将其进一步具体化。

1963年11月21日，日本国会大选投票，大平正芳在选区获得票数64077票，比上一次少11票，以选区第二名当选第30届国会议员。

在担任外相期间，大平因外交活动出色而获得了其他国家授予的各种勋章，有泰国一等白象勋章，墨西哥阿吉拉·阿兹台克一等勋章，萨尔瓦多何塞·马提亚斯·德尔加德一等勋章，挪威的圣·沃来夫一等勋章，阿根廷圣马丁一等勋章，联邦德国一等功勋章，比利时利奥波尔德一等勋章，马来西亚苏里马哈拉吉亚·曼克·努加拉一等勋章等。

### 风云变幻的宦途

1964年春，池田首相两届任期快到之时，他还决心继续争取第三次连任总裁，以图最终完成他的“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但池田的亲信中许多人却不以为然，大平正芳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池田能当上首相，离不开佐藤派的支持。佐藤和池田是第五高中同学，也都是吉田茂的得意门生。吉田原有让池田干两届就让佐藤接任之意。因此池田周围不少人对他连选第三任总裁持消极态度，大平也曾对别人流露出这种意思：“首相只想强行干下去，真叫人为难。”大平的这种消极态度使池田对他产生了猜忌。大平因公务繁忙不常去池田家拜访，这时有谣言说大平正芳想另立派系，其根据是大平以个人名义向池田派的“宏池会”所属年轻国会议员提供了活动经费。池田听到后把大平叫去追问：“你是不是在搞自己的派阀？”大平听后震惊地申辩：“决无此事！我只不过替你给了本派议员一些钱，以往不是有先例吗？您不是对我说过，用不着每件事都向您请示吗？”池田忿怒地说：“不许这样干！”于是，关系一直很亲密的池田与大平之间出现了裂痕。一段时间甚至严重到大平不能进入池田住宅。

这时自民党内佐藤与河野的对立仍在继续，大平做了许多工作之后，这种对立虽有所缓和，但并未结束。河野为了牵制佐藤，鼓动池田继续出马第三次竞选总裁。5月18日，佐藤要求与池田会谈，但被拒绝。池田已下定决心竞选第三任总裁。大平无奈，也只得为池田的竞选继续效力，向财界募集竞选经费。

7月10日，选举结果揭晓，池田以第一位当选自民党总裁，但仅比需要的半数多4票，令池田派出了一身冷汗，并感到池田的地位已有每况愈下的趋势。

池田当选后立即进行内阁和党领导的改组，结果池田的几位最亲信的“秘书官”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和宫泽喜一都未入阁。在党的领导方面，干事长前尾繁三郎因健康原因辞职。干事长一职非常关键，颇费考虑。大平本希望得到这一职位，但前尾认为大平还须再经锻炼，于是向池田推荐了政调会长三木武夫担任干事长，大平被任命为第一副干事长，协助干事长工作。这次任命是大平在一直很顺利的宦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他以后的发展也就不像以前那样一帆风顺了。但大平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职务，继续努力工作。

大概这次又像中国成语所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内阁改组后不

到 20 天，他心爱的长子大平正树不幸去世！这一打击使大平简直悲痛到了极点。

就在这雪上加霜的时候，一个出乎意外之事接着又发生了：池田当选首相后不久，发现以前声音嘶哑的毛病更严重了。到医院检查后很快诊断出是喉头癌。大平副干事长又如当头挨了一棒，急忙与前尾商量，既不能直接告诉池田本人及其家属，也不能向外界透露，以免引起政局动荡和对即将在东京召开的奥运会产生不利影响。在大平的劝告之下，9 月 9 日，池田首相住进了东京筑地的治癌中心医院进行放射治疗。大平与前尾反复商量之后，秘密叮嘱治癌中心医院负责人，要他们将池田患癌症这一事暂时保密。9 月 25 日发表的公告称“首相的病情是癌的先兆”，意思是现在不是癌症，但有可能转化为癌。

这种公布没有引起局势动荡，但大平等人从此便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既要考虑如何劝不明病情真相而又雄心勃勃的首相主动引退，又要考虑首相引退后谁来接班的问题，既要同三木干事长及各派首领磋商，又得每天安排许多必须一件件完成的急事。

大平反复思考之后，决定通过治癌中心医院的比企大夫向池田委婉地劝告，希望他退下来休息治疗。比企在 10 月 10 日池田出席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的几天，向池田表达了希望他引退的意见，并说这是大平和前尾的意思。池田这次没像往常那样刚愎自用，而是很快接受了劝告，决定辞去总裁和首相职务。10 月 25 日，东京奥运会闭幕那天，池田首相发表谈话。宣布辞职。辞职声明是大平正芳起草的。

从 10 月 25 日到 11 月 9 日，是指名继任总裁的两周时间。由川岛副总裁，三木干事长负责选举继任总裁的具体协商工作，大平负责安排病房中的池田与川岛和三木之间的联系。据大平后来回忆：“我把每天到治癌中心去看望池田先生，陪他谈两三个小时的话，当作我的日课。关于继任总裁的事，除了以川岛、三木两位先生为中心所搞的推选工作经过的报告外，别的从没交谈过。所以我跟池田先生交谈的话题，主要是一些有趣的闲杂事。当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来探望病情，也有人打电话来慰问。而这些人好像也都有意回避谈论有关继任总裁之事。”

当时，自民党内外公认的有实力的总裁候选人是佐藤荣作、河野一郎和藤山爱一郎。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合适的候选人，希望池田首相能指定自己继任，于是都向川岛、三木和池田的亲信积极活动。三位候选人中佐藤当选的可能性最大。佐藤与他田既是第五高中同学，又同为“吉田学校”优等生，虽然二人之间已出现裂痕，但个人关系毕竟比与他人密切，池田上台佐藤功不可没。而且两人的老师吉田茂也有意让佐藤继任，在三个月前的选举中佐藤也仅次于池田而居第二位，这些条件为社会大多数人看好，财界的大资产者们也支持佐藤上台。

大平副干事长分析了这些因素，也知道佐藤继任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他二人。但他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不直接对池田说出希望谁继任，还劝河野派、佐藤派不要干太出格之事。

佐藤派在这两周期间加紧了活动。田中角荣作为佐藤派的骨干，一方面到池田首相病房直接劝池田推举佐藤为继任者。另一方面努力作大平正芳的工作。大平对田中说：“这种问题要好好考虑，不能胡乱行动。政权问题只能因势利导。我理解佐藤派想拥立佐藤的心情，但应慎重行事。”据大平后

来回忆：“真希望11月9日早一点到来。而这两周却显得特别漫长。政权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在平河町的自民党总部与筑地的治癌中心之间来回徘徊，寻找它的归宿。”

11月8日是总裁指名继任人工作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当晚，大平为池田草拟厂指名文件，“我推荐      君为后继总裁”，在应填姓名处空了四格，由池田第二天一早亲自填写。11月9日早晨7时，川岛、三木、大平和官房长官铃木善幸到了池田病房。川岛副总裁和三木干事长向池田详细汇报了推选继任总裁的经过及他们个人的意见，提出党内的主要趋势是支持佐藤继任总裁。最后他们一致请首相池田作出裁决。池田在大平事先准备好的文件空格上填写了“佐藤荣作”四个字，于是这场长时间的推选剧就结束了。

现在大平副干事长最担心的是河野和藤山两派在上午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大会和下午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会作出如何反应。上午10点召开自民党议员大会，会前大平在自民党总部门口遇到河野派干部森清，他对大平说：“我们败了，但要进行合作，今天全体都来出席大会并投票支持佐藤。”大平心中如一块石头落了地。自民党议员大会上，佐藤当选为自民党总裁。下午众议院全体会议时，大平与河野并排坐，中间仅隔一人。大平向河野打招呼：“谢谢您，费心了！”河野高姿态地答道：“大平君，不要客气，没问题。今天河野派全体都来出席会议，而且都投佐藤荣作的票，您尽可放心。”说完便愉快地与旁人交谈起来。对河野一郎的这种心胸开阔的政治家风度，大平感触根深，他感到那天的主角好像不是佐藤先生，而是河野先生。这天下午佐藤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顺利当选为内阁首相。从池田到佐藤的政权交替总算完成。

照大平的说法：“从10月25日到11月9日这两周，犹如跳进热水桶一般，真是非常紧张难熬的历史时刻啊！”政权交接结束后，当天下午，大平又回到了池田的病房。他对这位卸任首相说：“11月9日这天，无论是对您还是对我来说，都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池田点头表示同意。

佐藤内阁掌权后一个多月，池田派的官房长官铃木善幸和第一副干事长大平正芳因与首相关系不密切而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 在重新崛起之前

大平正芳辞去副干事长之职后，直到1967年11月的三年间，没有担任党和内阁的重要职务，仅担任了一些较次要的闲职。这一时期的大平表面看来是无官一身轻，但他精神上并不轻松。他既有宦途失意的郁闷，也有失去亲友的悲伤；既有对时势的冷静观察与思考，也有为重新崛起而充实自己的行动。

刚辞职不久的1965年1月23日，大平向自己选区的后援会会报《东京通信》寄去一篇短文，题为《祸生得意，福育隐微》。文中介绍了从1964年8月6日长子正树去世到11月9日池田交出政权这段时间内自己的遭遇和作为，以及新一届政权诞生的过程，同时也表述了自己当时抑郁的心情。大平认为，1964年对他是非常暗淡的一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长子去世、池田因病入院和辞职、佐藤执掌政权等一系列变故，使他感到晕头转向。大平深深感叹道：“时运真不可思议，恰如川流，既有清澈缓流之时，亦有激流漩涡狂暴之时。然而，作为在这时的激流中航行的人们，最重要的是具

有虔诚之心和周密的注意力、小心谨慎以避免失误。因为祸多生于得意之时，福几无例外育于隐微之中。”大平认为自己在为池田政权的建立出谋划策，又在该政权盛期担任要职，这种政治家实不多见。政权的结束比政权的建立更为艰难，若政权结束时一出现差错，其政权一瞬间便会声名扫地。而自己为了维护池田政权的名声已尽了最大努力。

最后大平谈到：历史上的时间似乎不变地向前推移，但有时一瞬间就会改变人民、国家和世界的命运。我们无法判断这一瞬间何时到来。因此我们应时常静心、虔诚，准备迎接上帝的考验。这里大平隐约表达了自己静观待变，终将东山再起的决心。

另一方面，在这三年之间，不少大平熟悉的政治家相继辞世。河野一郎于1965年去世，大平出席了6月12日的葬礼；池田勇人于同年8月13日去世；1967年2月7日，大平的恩人、同乡、前大藏大臣津岛寿一去世；10月20日，曾亲自声援大平的前首相吉田茂以89岁高龄去世。特别是大平的恩师池田勇人的去世，对大平又是一次打击。池田不仅作为大藏省和政界的前辈，将大平引上从政之路，对大平进入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对整个日本在6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池田提出10年之内使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结果在7年之内完成了，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不久以后跃居世界第二位，直到70年代过着富裕生活的日本国民仍对“池田时代”难以忘怀。因此，池田之死使多情善感的大平正芳仿佛失去了一个亲人，感到无限惆怅，生活空虚。

池田去世后，他的两名亲信前尾繁三郎和大平正芳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不睦。前尾是1957年池田在离开岸内阁时，向岸信介引荐而进入内阁的，并担任了通产相的要职。池田内阁时又担任党内重要职位干事长，逐渐取代了大平而成为池田最亲信之人。在1965年8月4日池田第二次动手术前，曾把前尾、大平和铃木善幸三人叫到床前，交代了后事。前尾认为池田之意是要自己任池田派领导人，大平却不认为池田有此意，而主张由活着的人来决定谁作本派领袖。当然，因无人反对。最终还是前尾作了池田派领导人。但从此以后，前尾和大平之间便产生了龃龉，以前以兄弟相称的两人皆心存芥蒂，行动上也不那么合拍了。这种情况对于佐藤派是非常有利的。

池田派的政治组织“宏池会”于1963年大选结束后，遵从自民党组织调查会的劝告而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名亡实存。池田去世后，池田派成了前尾派，组建了一个名为“新财政研究会”的政治团体来取代宏池会。这个新政治团体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其管理机构、活动时间和活动方式完全没变。大家仍习惯地称其为“宏池会”，在大平、铃木等人的支持下，前尾派的力量正在逐渐加强。后来，由于前尾掌握了宏池会政治资金，并笼络了本派许多议员，大平就另外组织了“周四会”，吸收了一些年轻议员参加，并另外筹措政治资金，原池田派大有分裂的趋势。

但前尾并不适合作政治领袖，他身体不大好，做事优柔寡断，常无自己的主见，似乎对很多事显得信心不足。甚至1966年进行总裁选举时，他一再要求本派年轻议员“不要写我的名字”。这一情况为大平以后成为本派领袖埋下了伏笔。

在这未担任要职的三年里，大平喜爱看书的特点更突出。读书可以排解他这时的忧郁心情，同时对于他今后的发展也是一种积累和充实。大平经常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处于闲职之时才能更多地学习，与人的交往也密切，

可以取得更多的收获。在荣耀的岗位上看起来很华丽，实质上收益甚少。”大平每星期都要到书店去一两次，一般情况下都要买两三本新书回去，他在书店里翻阅较多的并不是政治，经济、法律等书籍，而是有关历史、社会和随笔之类的书。大平说：“每当我闻到每星期新到的书籍的新鲜香味，每当我翻阅新书所产生的温柔的感觉，心里就不胜愉快，这一瞬间，使我感受到生存的喜悦。”

大平通过读书，特别是比较多地读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书。发现了日本文化的缺陷。他认为，西欧的作品在构思宏大、立论雄伟，例证丰富，笔调锐利这些方面有明显优势，中国的古典著作本身就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其中大胆披露中国人固有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日本人的作品则是介绍或模仿东西方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豪感和信心，作品缺乏自己独特的风格。即使在战后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仍置身于西欧和中国两股巨大的思想潮流的漩涡中，忽东忽西，处于仿徨和苦闷之中。日本的书刊虽多，但留给读者的，“既不是自豪，也不是自信，更不是满足，留下的始终是精神上的渴求。”看来大平正芳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不仅考虑日本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在考虑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的何去何从。经过深思，大平认为，不管是接受的西方还是东方的文化，都应该变成日本人的血肉，形成日本人自己的文化，它才会发展壮大，产生日本人自己的伟大思想。

1966年4月5日，大平正芳作为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外交调查会副会长，在自民党总部所办政治大学上，大平作了题为《我党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在报告中，大平谈到了什么是外交，日本外交的范围，自由阵营与日本，日本的安全保障，联合国政策，亚洲外交，经济外交，南北问题与日本等各方面的问題。大平在讲演中着重谈了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中国问题。大平提到因为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作法，所以日本被迫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我们的前辈选择了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当然就不能选择中共了。为什么会选择中华民国呢？大平认为当时大概是有如下考虑：蒋介石“以德报怨”，将留在中国的许多日本军队放回了日本，对日本有恩谊；中华民国政权与日本同属自由阵营；台湾对日本来说是很大的顾客，与日本的贸易数额较大；日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与台湾周围的西南太平洋的和平有关。

大平认为，现在日本尚未下决心与北京谈判，目前仍维持着与台湾的“正常关系”。因为日本与中国大陆又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故双方虽无政府间接触，但民间交往却存在，即实行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可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行不通，政治和经济终究是融为一体的。现在别无他法，暂实行这种政治经济分离的办法也大致无妨。

然而这种不正常关系是很成问题的。“台湾和北京都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毕竟是中国应解决的问题，日本是无能为力的。“世界舆论若能对此问题有一致看法，也许会抓住解决的线索。”

大平又分析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支持台湾和北京的都是47票，20票弃权，于是又提出了重要事项决定方式，即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題，也是关于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大会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取消台北保有的代表权。”他认为假如联合国用投票方式承认北京一方的中国代表权，也会出现难以想象的麻烦。北京是否会到联合国来，谁也不能判断。集合了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国，现在将以前当作好战政权谴责的北京迎接人联

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如何解释。而且至今仍忠实执行宪章规定义务的成员台北的态度如何也很难判断。当国际舆论决定性地承认北京代表中国时，日本对联合国和对中国的政策都会有重大转机，国内舆论也会日益活跃。

从大平的这些论点看，当时日本的佐藤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仍跟着美国亦步亦趋。大平作为执政党的一名官员，仍未脱出政府基本方针的局限。当然他也暗示了日中关系将来可能出现转机。

在这三年相对松闲期间，大平还为巩固自己的选区作了努力。鉴于第六次当选议员时，虽身居外相要职，却在选区名列第二的教训，大平事务所加强了后援会的组织。1964年12月12日，开设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大平政治教室”，聚集在教室的人成立了“芳友会”，创办了《东京通信》、《芳友会志》等刊物，使大平后援会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以神崎造纸厂的加藤藤太郎为首的三丰中学、高松高商的校友们对后援会的活动给予了巨大支援。结果，在1967年1月的大选中，大平获得了75076票，以第一位当选，比第二位多出了35000票。

大平也趁这个机会密切与家乡的关系。1967年7月19日，他曾就家乡四国与本州之间架桥的问题在国会建设委员会进行质询。他从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的高度，论证了四国与本州间架设复数桥梁的必要性。当时在场的有许多记者和建设大臣西村英一。听了大平的论证，西村惊奇地说：“想得非常开阔！”

在这三年间，大平除了读书充实自己外，还写了《回忆长子正树》一文，并出版了自己的《春风秋雨》，由鹿岛研究所出版会出版（非卖品）。这部书主要回忆了池田政权的一些情况。1966年10月，大平的次子大平裕结婚了。

1967年11月，闲居三年但并未消沉的大平正芳的命运，又来了一次大的转折。

## 命运的转折

佐藤内阁在执政三年期间，也经历了重重波折。1967年晚期，佐藤荣作为了争取第二年能第三次连任总裁，决心采取较重大的内政、外交措施。对内他计划重新调整党和内阁的成员构成，外交上则开始着手解决美国归还冲绳，小笠原的问题，1967年11月14、15二日，佐藤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谈，就归还冲绳的时间达成协议。归国途中，佐藤在檀香山向记者暗示，要尽快进行党和内阁的人事改组，建立举党体制。

佐藤回国后，立即请三年未担任要职的大平正芳出山担任党的三领导之一政务调查会会长。大平属于前尾派，该派在左藤上台后是受到压制的。1965年7月进行党政人事改组时，田中角荣干事长拟请大平担任政务调查会会长，但遭佐藤拒绝。这次佐藤请大平担任该职，目的是为了在第二年的总裁大选中牵制已决心参加竞选的前尾，使大平作为前尾派的骨干不能充分参与支持前尾竞选的活动。所以大平对是否出任该职曾犹豫不决。他不仅征求了本派首领前尾的意见，也与佐藤派的田中角荣多次协商，最后决定出任该职。1967年11月25日，佐藤正式宣布大平为政调会会长。这样，大平在沉寂了三年之后，再次回到政治领导核心之中。

自民党除了最高领袖总裁之外，还有被称为“党三役”的三名核心领导

人，即干事长、政务调查会长和总务会长。

政务调查会简称政调会，负责制定政策。照自民党党章规定，党的正式的方针政策，必须首先由政调会进行研究和通过，然后再交党的总务会讨论和通过，最后经党代表大会或党的国会议员大会通过，才形成最终决议。然后以内阁提出法案的形式，作为国会议案交国会审议表决通过。但实际上，政调会在这方面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及议员大会虽然是决议机关，但并不参与拟定具体方针政策。这些具体方针政策都是政调会拟订，交总务处修改一下甚至不修改就通过，送交党代表大会或议员大会表决，表决时基本上是原案通过，很少有改动，更不会否决。所以政务调查会在决策方面具有很大的实权。

政务调查会会长领导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关，有五名以内的副会长和审议会，15 个部会以及无数个处理特殊政策问题的临时特别调查会。大平正芳任政调会会长领导着这庞大的机关，担负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担子是非常沉重的。但这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很快就调整了思维，并拟就了如何开展工作的方针。1967 年 11 月 28 日，大平在《朝日新闻》主持的“直言问答”中披露了这些方针：一、谦虚行事，对于国内外日益复杂的环境和庞大的经济规模所造成的问题灵活处理；二、切忌先入为主，应以扎实而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三、既要前进，也要回顾过去，吸取以往教训，重新研究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四、充分开展协商和对话，不仅在执政党和政府内，也要与在野党和普通国民进行充分对话，使政策的制定能吸取充分的意见，为在自由的氛围中制定政策创造条件。

大平担任政调会长的这一年中，内政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财政僵化和收购米价问题，这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大平刚任职三天，大藏省的村上次官就到他办公室来呼吁应采取强有力措施消除一些行业的财政赤字，特别是要找出国营铁路、大米收购和国民保健等行业赤字严重的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消除或减少这些赤字。

大平认为，首先应了解一下真实情况，研究大藏省提出的数字是否准确。其次是弄清下一年度的财政规模。但要根本解决财政问题，还须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正确估计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趋势，并将财政在这长远发展的经济中置于应有的地位。大平主张在提出解决目前财政问题的方案之前，应该先在执政党和政府中充分协商，统一看法，否则方案将难以产生，即便产生也无法贯彻实施。因此他希望执政党应统一认识，结成一体解决财政困难。1968 年 1 月 30 日，大平在第 58 次众议院常会上代表自民党进行质询时，谈到了有关财政问题。他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的根源不仅在财政金融系统本身，也应追究现存的制度和习惯，这些制度和习惯使机构雍肿，人员庞大，效能低下，却又耗资巨万，使财政很难适应快速多变的时代要求。解决困难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断和国民的理解与接受，政府应以坦率态度将实际困难告诉国民。以后日本实行的“行政财政改革”证明了大平的分析是正确的。

与财政赤字相联系的是国家收购的大米价格问题。由于政府每年收购大米给予了大量补贴，造成了这一部门赤字累累，无法再提高收购价。围绕这一问题，1968 年 7 月，农林方面的议员在自民党总务会上强烈要求提高收购米价。但若提高大米收购价，势必进一步增加财政负担，同时带动其它相关商品的价格上涨。一向稳健的大平政调会长当然不同意立即提高大米收购价格。因此在一次会议上，自民党两任总务田村元和田村良平相继激动地站

起来指责大藏省官僚出身的大平政调会长不了解农业和农民生活，要求大平立即辞职，从会上退席。大平听了一阵后觉得不对劲，站起来想离开会场。这时坐在大平身旁的米价调查会长田中角荣拉住了他，劝他不要一气之下就离开，否则不好再回来了。于是大平又留下耐心地听他们说完了，然后从容不迫地发言：“两位总务先生刚才说我不了解农民生活……我大平只是赞歧一个贫农的儿子。我在少年时代，天刚亮全家就必须起来，去山间的田地里劳动，然后我还要赶去乘清早第一班火车去上学，天天如此……现在竟说这样生活过来的大平正芳不了解农业，真使人感到意外。”大平的话使闻者深受感动，田中角荣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大平感人肺腑的发言。”大平发言后，总务会慎重决定将米价问题交由党的三位领导和米价调查会长解决。

在外交方面，日本当时面临的最迫切课题是收回冲绳和政府对核问题的基本政策。1968年1月30日，大平政调会长在第58次众院常会上，就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首先，大平谈了政府对核的政策问题，他提到佐藤荣作总理曾说过：“在现今的核时代应如何生存，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课题。”大平指出：对于近期即将形成的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早期缔结，日本各政党之间尚无大的分歧。政府常常明确强调不允许核武器进入的方针，这当然是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的核政策，与此相反，如果宣传政府默认核武器的秘密进入，而国民又对此无动于衷，那将是日本的不幸。对有关核的知识的吸收与对反对核武器显示出同样的关心和热情，这是日本核政策的进步。

大平进一步分析对核的科学知识的了解所具有的重要性。他说：“必须谦虚地避免用贫乏的知识和经验，急于在核政策上全面地下一一些尴尬的结论。”“我们应考虑如何研究和开发核能。否则无法有效地管理核能。同时必须慎重处理核武器，以销毁它为目的，积极参加核裁军以及其它的国际协调。为此，我认为应提高我国有关核知识的认识水平。”

大平又提到最近因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停泊日本而引起的日本人民的反对，说明政府的核政策尚未被国民所接受，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来加深国民对日美关系以及日本核政策的理解。

对大平有关核政策的发言，佐藤首相当场重申了日本政府对核武器的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

大平接着谈到了美国归还冲绳的问题。他说，以前美国曾答应冲绳是日本领土之一部，待亚洲局势缓和就归还。因此，日本历来的冲绳政策重点在于日美协力，提高冲绳的民生福利，尚未涉及统治权的归还问题。但近来要求实现冲绳统治权归还的呼声异常高涨，对这种情况作出的回答是，佐藤首相访问冲绳时发表了历史性声明：“冲绳不归还，日本的战后就未结束。”为此，1967年秋，日美首脑举行的会谈，主要讨论了这一问题。其结果，在归还冲绳统治权这一基本方针之下，日美间商量好就冲绳地位继续共同协调。这的确是一大进展。

但大平又指出，对这种协调国民有一部分人强烈不满，大平认为这是对冲绳问题理解不足所造成的，因为冲绳问题是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坚持的核政策有关系的问题。果然，以后冲绳问题讨论的中心，就集中到了安保条约和核政策上。所以冲绳问题不单是归还统治权就算了，而是必须保障冲绳永久的安定和繁荣。大平进一步提出了对解决核问题的主张：即在形势逐渐向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发展时，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加深国民对冲绳问题的理解。为此，政府在不妨碍外交的前提下，向国民表白这一问题进展的难度和设想，以促进冲绳问题的讨论有实质性进展。

最后，大平还阐述了与以上两个问题紧密相联的安全保障问题。大平认为，日本安全保障之根本，在于国家所作的有利于保卫日本的努力，即关键在于日本内部的发展，如秩序井然的民主政治，社会秩序的健全维持，经济文化的经营充满活力，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国民生活内容充实等，这些因素才是安全保障的根本。

大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战后剧烈分化和反复动荡的世界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只保有相对较少的防卫力量，外交上不使用武力。另外，放弃帝国主义野心，在和平共存的观念指导下，不敌视他国，维持与各国活跃的外交，这样才保卫了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我相信，这才是日本应该采取的正确道路”。所以大平认为，今后日本应继续追求和平共存之道，为世界作出贡献，具体说来就是动员高素质的国民能量，为解决令全世界苦恼的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不仅在经济力量方面，而且在提供知识和技术方面也尽到自己的责任，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然，大平认为具体的安全保障手段也同样重要，这就是采用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轴心的地域性集团安全保障方式。在现实中，只有这种方式更安全。日美安保体制在战后长时期内，远离世界其它地区的纷争，保障了日本的安全和复兴，它经历了战后严峻的历史考验而行之有效，所以是日本应该选择的坚实道路。

政调会长这一职务大平正芳虽然仅担任了一年时间，但却给他提供了一个站在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全面观察和深入研究内政外交各方面问题的良机。比起他以前负责的政府某一方面的工作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似乎有了更多的收益。

## 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促进者

1968年11月27日，新一任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佐藤荣作以绝对优势战胜了三木武夫和前尾繁三郎，第三次当选为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后，田中角荣与大平、前尾在“荣家”饭庄会晤，达成了大平进入新一届内阁的协议。11月30日新内阁组建完毕，大平入阁担任通商产业大臣。这是内阁中的又一个重要职位，通常被认为与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一样，是通往首相职位的重要阶梯。

通产省是主管日本工商企业、国内外贸易、外汇汇兑和度量衡管理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工业基础的发展，改进工业技术，促进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大平担任通产大臣时，正是日本第二次实施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政策时期。日本于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后，为了加强与各国贸易往来，适应逐渐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在1967年曾实施了第一次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产业政策，将限制进口和生产的商品种类下降到163种。大平任通产大臣后不久，1968年12月19日内阁召开会议时，通过了积极推进产业自由化的方针，将限制输入的产品降到121类。3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资本自由化，到1969年的4月1日，又将限制进口产品降到120类。到1969年7月

18日第七次日美贸易经济混合委员会会议上，又决定到1971年12月底，把现存的限制进口项目由120项减少到60项以下。

这种贸易和资本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也在日本国民中引起了不少的议论，认为如果日本敞开自由化大门，外国的商品和资本会像洪水般涌进国内，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占领日本市场，这样就会迅速将日本国内的企业挤垮。

大平却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实现自由化后，并未造成人们担心的那种结果。因此他决心继续推行自由化，并促成大型企业之间的合并。这种合并的典型之一就是新日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

日本在二次大战前最大的钢铁企业是日本钢铁公司，简称“日铁”，它是1896年由官办的八幡钢铁公司吸收了四个民间公司后形成的官民合营的企业。1950年，根据“禁止垄断法”的规定，将“日铁”分解为八幡和富士两个钢铁公司。为了即将进行的技术革新的投资发挥更高的效益，两个公司经过策划，在1968年4月17日宣布即将合并为“新日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日铁”。对这种合并的倾向，通产省表示谅解，承认了合并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但由学者及有关人士组成负责调查和判断企业是否违反“禁止垄断法”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却认为新日铁有可能违反禁止垄断法，不大赞成这项合并。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这次合并大多持批评态度，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都表示反对。但大平正芳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认为：“从产业政策上看，必须实现这次合并。诚然，由于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它的各种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将会提高，但不能认为这就和禁止垄断法相抵触。对产业政策来说，具有吸引力的是，由于这两家公司的研究开发与市场的一元化，将会带来技术水平与经营质量的提高。如果都是脆弱的产业，就不可能制订出有信心的产业政策。而且只靠政府的力量，也不可能制订出有实效的产业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也要依靠具有卓见与实力的优秀企业的协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一个希望新日铁公司诞生的人。”

有了这样的认识，大平通产相便为两公司的合并积极斡旋。他几次会见了公正交易会委员长山田精一，要求他予以理解；又同过去在大藏省的同事、公正交易委员龟冈进行了频繁接触，请他促进委员会对合并一事充分理解并给予审议。1969年6月19日，公正交易委员会决定重新审理这项合并。7月29日，政府对此合并提出统一见解：“大型钢铁企业的合并，原则上是必要的。”8月21日，两公司又向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了追加性对应条件。10月30日，公正交易委员会最后承认了两公司的合并。”1970年3月30日，两公司正式合并为“新日铁”公司，大平自己认为他实际上对这个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的诞生起了一个助产士的作用。

以后，日本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资本自由化章程的原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扩大了自由化的产业种类。如汽车的自由化生产销售问题，在10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就决定了实施方针，到1971年4月开始施行。日本的汽车行业并未因该方针的实施而被挤垮，反而因此而加紧技术改造和提高生产管理质量，使汽车产量成倍增长并畅销全球，到1973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号汽车生产国，到1980年，汽车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成为世界头号汽车生产国。

实践证明自由化的产业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大平通产相于

1970年1月1日的《五行评论》上发表了《新通商产业政策的课题》一文。在该文中，大平提出了70年代日本发展的课题：集中国民力量，创造新的价值。他接着分析了日本战后15年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经济增长率极高，人均生产总值增长很快，国民储蓄数额剧增，说明日本经济发展前景可观，潜力极大。但他又指出，经济发展中问题不少，如外汇储备少，海外投资积累低，出口产品中成套设备的比例小，在技术方面的支出远远高于收入，企业金融能力不足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国民的强烈不满，如公害、住宅狭小、道路拥挤、上下水道不足等，影响到了国民生活的安定。

大平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担任通产大臣以来，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强烈要求，要日本撤销尚存的进口限制，让美国及其它国家的资本能自由进入。大平承认日本经济发展尚存不少弱点，并答应美方要努力纠正乃至除去这些弱点，锐意致力于自由化。

大平着重谈到通产省于1969年7月研究了今后两三年的通商产业政策，并考虑了今后的基本方向，这就是所谓“四大支柱”：

- 一、经济的国际性扩展；
- 二、充实国民生活的质量；
- 三、确保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 四、以创造性发展为指针。

这“四大支柱”的具体内容因已有各种详细说明，大平在文中仅作了一些补充。

第一，在推进自由化时，为了与欧美优秀企业和商品竞争，整顿国内产业体制就成了紧要问题，这种整顿不仅限于八幡和富士两钢铁公司那样的合并，而且必须按照行业种类推进专业化和协作化。

其次，关于充实国民生活质量，这在提高生产力是至高无上的命题这一阶段，很难成为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但今后仍必须花精力解决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协调生产发展与国民生活的矛盾。为此，政府应加大相关的科技研究投资。

第三，关于资源问题，应该改变以前单纯依靠商业手段从海外获得资源的作法，探索如何着手开发海外资源，但对这种需要庞大资金而又伴随着极大风险的海外开发，政府和资源需要者的配合是很必要的。

在文章的最后，大平正芳谈到了今后的经济运营与政府的作用。他主张：“今后的经济运营，应以民间为主导。民间主导的真正意图，就在于今后必须更明确地认识到，民间企业要凭自己的力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自由经济体制中，发展经济的主力是民营企业，只有民间的睿智、活力和创造力才是发展的原动力。这点自不待言，但历来的日本企业存在着一种倾向，一遇困难动辄就依赖政府。若不改变这种苟且偷安的态度，是没有指望向未来大发展的。”

大平的这种以民营企业为主导发展日本经济的思想，早在他任职于大藏省主计局的1946年就在“出售官营产业问题”的政策建议中初具雏形。这许多年来，日本经济已由战后恢复转向快速发展，他的这种思想的基本点仍然保持，不过他看问题的视野更为开阔，论述更为深刻了。

## 再度访欧的观感

在八幡和富士两钢铁公司的合并有眉目以后，大平到欧洲九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与被访问国的“友好亲善”，没有特别具体的事务需要交涉，所以是一次类似休整的观光旅行，随行人员只有志华子夫人、女儿芳子、通产省贸易局长原田明和秘书福川伸次。

大平一行于1969年10月17日出发，18日先到意大利罗马。次日参观了那不勒斯东南的庞贝古城。离开罗马后到了保加利亚索菲亚。在这里同贸易次官及其他官员座谈，对日夫科夫总理表示敬意。大平还参观了葡萄酒厂，并与各部及公共团体高级官员会谈。接着，大平一行又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与匈牙利外贸部长比罗会谈并出席了比罗主持的晚宴。然后于23日与匈总理福克斯和外长贝塔会谈。大平等人还游览了被称为“多瑙河珍珠”的美丽城市布达佩斯。紧接着他们又飞往波兰，访问了著名钢琴家肖邦的故乡。24日，大平拜会了波兰总理和外长，参观了维拉诺夫宫殿，当天又飞到了布拉格。25日，大平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副总理和工业部长，并游览了布拉格市容。亲眼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苦恼。26日，大平一行又到了世界著名的“音乐之城”维也纳，不仅参观了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而且还欣赏了歌剧《玫瑰骑士》。27日，他们又游览了谢恩·布伦宫殿，并飞到了柏林。在这里，大平参观了西柏林以及将德国一分为二的柏林墙。然后到了西德首都波恩，会见了西德国防部长。29日大平一行又到了伦敦，与英国商务部长及日英经济界的重要人士联欢。30日，大平拜访了老朋友道格拉斯·霍姆，并与英技术部长会谈。大平于31日到了这次出访的最后一站巴黎，当天就拜访了法国原总理库夫，并礼节性地拜访了法国财政部长。11月1日，大平参观了巴黎近郊，并出席了有关欧洲经济问题的大使馆干部座谈会。11月2日结束访问回国。

这次出访因无重要任务，使大平能较为冷静地观察欧洲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状况，这种观察尽管属“走马观花”式的，却使大平感触颇深。这些观感在大平于巴黎为日本《产经新闻》所撰写的文章以及他的回忆录《我的履历书》中皆有所记载。

大平对欧洲的文化十分欣赏，但他认为，“东欧的气氛并不是那么明朗，政治和经济上也看不出有什么朝气。这些国家对苏联的依赖，不仅表现在安全保障方面，在经济方面也相当突出。但同时也能感觉到，它们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是相当根深蒂固地倾向于西欧。看来它们是处于东西方的峡谷之间，极力使自己不失去适当的平衡。当然，这些国家对日本的兴趣与期待，也正在逐渐加强。”看来大平也并非完全是“休闲旅游”，他已从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访问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对日本扩大海外市场有利的一些外部条件。

大平在巴黎时，为日本的《产经新闻》撰稿时，谈到了对西欧特别是德国的观感。他看到了由于德国马克的大幅度升值，使马克将能起到维持新平价固定汇率制的作用，为消除世界通货不安创造了良好条件。大平深深感到德国的现实力量明显增加，其潜在力量也是十分可观的。包括东欧在内的欧洲经济对德国的依存正在加强。希拉部长从内到外都在大胆地推进经济的自由化……成功地巩固了工人、经营者和政府间的协调路线。

大平不仅看到了德国的经济优势，同时也对日本经济存在的不足之处表现出忧虑，他谈到：“日本经济表面完成了出色的飞跃，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其内部，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平衡的和巩固的。我深深感到日本的技术水

平依然很低，金融力量和组织力量不强，劳资之间的信赖也很淡薄……”日本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在这种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大平作为主管经济发展的通商产业大臣并未沾沾自喜，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分析它国之长处与自己之不足，找出日本经济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实在难能可贵。

有趣的是，大平这次访欧发现，“在东西德人们之间，没有其他分裂国家那种相互憎恶的情绪。德国民族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表现虽都很平静，但是在东西方的峡谷中，正在扎实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平正芳实际上已预感到德国民族不会长久地分裂，其中已存在着统一的因素。20年后两德统一，证实了大平的洞察力实在不凡。

1969年11月3日，大平一行回到日本。等待着大平的是艰难的日美纺织品谈判。

“这真是一条阴暗的道路！”

到60年代后期，纺织业的不景气困扰着美国南部各州。1968年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时，为了取得这些州的支持，承诺要对纺织品的进口实行限制。美国很快就向日本提出了减少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要求。大平任通产相后，1969年5月10日，美国商务部长斯坦斯来到日本，提出推进资本自由化和日本应参加限制纺织品输出的国际协议的要求。5月12日、13日大平通产相与斯坦斯商务部长举行了两次会谈。

在会谈中，斯坦斯反复强调美国纺织业处境困难，很大程度上是进口纺织品增多造成的，因此希望限制毛纺织品和化纤制品的进口。大平正芳针锋相对地回答：“日本多次要求美方提供有关进口纺织品对美方的影响和造成损害的情况，但都未得到明确答复。因此，日本不能同意谈判限制协定。”而且，大平还进一步反驳美国采取的限制措施，实际上违背了美国自己倡导制定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即“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障碍，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这种措施对日美双边关系及美国的纺织业都无益处。这次会谈宣告破裂。

1969年7月29至31日，在东京举行了第七次日美贸易经济混合委员会全体会议，限制日本向美国出口纺织品一事又成了会议的重要议题。第一天会谈结束后，大平邀请斯坦斯等美国商务部官员到家中共进晚餐。由于天气较热，住宅又无冷气设备，便在房间两个角落放了两根冰柱降温。宴会结束，大平送走客人后躺到床上休息，迷迷糊糊之中，被一声巨响惊醒，他走到客厅一看，冰柱融化后倒塌了，弄得一地的水。次日大平对记者半开玩笑地说：“昨晚我在梦中正与斯坦斯部长争论时，一声巨响惊醒了我，也许这就是不祥之兆吧！”

果然，第二次日美会谈时，双方在纺织品问题上出现了意见的尖锐对立，美方仍坚持强调美国纺织业的困难，日本则认为日本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未对美方造成损害。后来，斯坦斯提出建议，要日方派员去美国调查受害情况，大平勉强接受。日本派出了以通产省纺织杂货局长高桥淑郎为团长的调查团前往美国。9月16日至19日，调查团与美国政府、国会人士、纺织业界和工会组织等方面分别举行了会谈。回国后调查团向大平通产大臣提出了报告，结论是：“美国的纺织业界从整体看是健康的，未受到损害。”

高桥调查团的结论当然不能得到美国承认。10月2日,美国提出了建议,对毛纺织品和化纤制品按三个阶段分别对综合、集团、个别三个项目范围进行限制,并要求日本进行有关双边协定的谈判。但因大平访欧,谈判被搁置。11月3日大平回国后针对美国的要求作了相应的准备。11月7日,日本政府向美国提出了反建议,要求就纺织业问题召开多国会议,研讨纺织品进口的受害问题;不是缔结日美双边协定,而是缔结主要有关国家的多边协定;如果存在因进口而造成损害的项目,可对此项目作个别交涉;如果确有造成损害情况,应按照“关贸总协定第十九条”的规定考虑采取救济措施,并准备研究过渡性的临时措施。

大平通产相认为美国的要求违反了贸易自由化原则,国际贸易本来就有消长问题,“不应因暂时的现象而轻易地破坏贸易自由的原则”。尽管如此,大平因担心态度强硬会损害日美关系,于是提出了上述显然有妥协性的建议。但这一妥协性建议却引起了日本纺织业界的强烈反响,这一行业组织起“纺织产业联盟”,举行反对妥协建议的示威。纺织业界还不断派代表会见大平通产相,大平也只得不断向来访者表态“不采取不合理的解决办法”,力图说服产业界人士理解政府的苦衷。

美国接到日本的反建议后,要求日美两国重新协商。但日本则希望举行多边会谈,从而拒绝了双边会谈的建议。但决心尽快归还冲绳的佐藤首相将于11月17日至22日访问美国,于是就决定日美双方于同一时间在日内瓦以预备性会谈的名义进行协商。佐藤在出发前一天的16日夜与大平通了电话,希望日内瓦的协商不要对日美首脑会谈产生不利影响。大平谨慎地答道:“我非常了解总理的想法,要细心去办,请放心。”

佐藤在美与尼克松总统会谈后,于11月22日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将于1972年归还冲绳,不运进核武器,日美安保条约同样适用于冲绳。这是佐藤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功。

与此相反,在日内瓦的日美纺织品问题的协商却未取得任何结果。美方不接受日本的妥协方案,而提出了“止滑式”解决办法,即向美国出口某一品种纺织品超出前一年出口量的一定水平时,出口国自动停止出口。但日本认为这仍是在未证明受损害情况下的限制进口措施,表示拒绝。双方这次协商只好终止。大平接到这一报告后,虽然深感遗憾,但仍然主张要耐心同美国谈判,以求得公正解决。

佐藤首相于11月26日回国后只谈归还冲绳谈判的成功,绝口不提与尼克松总统就纺织品问题会谈的内容,在国会答辩时也仅轻描淡写地提到“纺织品问题要用互让精神努力解决。”大平对此心存疑虑,担心为了归还冲绳,佐藤是否向美方就纺织品问题作了什么承诺。社会舆论也怀疑佐藤似乎与美国有什么秘密协议,即“用线买绳”(用纺织品换冲绳)之嫌疑。

12月19日,美国又送来备忘录,要示重新进行纺织谈判,并把10月2日美国的建议具体化为四限制,即日本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时应有期间、基准时间、数量和方式的限制,这次备忘录被称为“第一次正式建议”。美国这次态度强硬,完全以自身利益出发,置日本利益于不顾,使日本感到十分震惊。当时大平通产相正在外地为新一届国会选举进行游说,获悉此事后立即返回东京与事务当局紧急磋商。他对艰难的日美纺织品谈判深深地感叹道:“这真是一条阴暗的道路啊!”

12月27日新一届国会大选结束,大平在香川选区获72343票,以第一

位当选众议员。但这件令人高兴之事很快被另一件不快之事冲淡，1970年1月2日，美国又提出了第二次建议方案，只对第一次正式建议作了些技术性修改，基本限制原则丝毫未变。1月8日，日本再次表示对美方建议不能接受，并继续要求美方提供有关纺织业受损害的情况，日美对立愈加尖锐。

以佐藤荣作为总裁的自民党在这次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取胜。归还冲绳谈判的成功为佐藤第三次连任总理创造了良机。1970年1月14日，佐藤在特别国会上再次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次重新组阁，使大平正芳的政治命运再次发生重大转折，大平认为：“佐藤首相可能是面临归还冲绳的谈判，从大局来考虑日美关系，他一直希望日美纺织品谈判尽快解决。因而在一月改组内阁时，没有让我留任，起用宫泽喜一君接替了我的工作。”

这样，大平正芳又第二次离开了日本政治领导核心，同时也离开了日美纺织品谈判这条“阴暗的道路”。

## 第五章 派系领袖

### 为独树一帜而积蓄力量

1970年1月13日，大平正芳与宫泽喜一去打高尔夫球时，曾见到佐藤，佐藤并未言明此次重新组阁将免去大平职务。当天晚上，田中角荣干事长通知大平，此次组阁他仍留任通产大臣。但次日下午保利茂官房长官宣布内阁名单时，却没有了大平的名字。这时大平正在山王大楼事务所里看电视转播，表情僵硬，如同一名忠实的员工突然被老板解雇一般。第二天早晨，大平驱车前往池田勇人墓地，向这位恩师宣泄了自己心中的忿懣。

这是大平又一次离开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使他觉得命运真难捉摸。就像他以前给《芳友》杂志撰稿时所说的：“人之一生，既有欢乐，也有忧愁；既有得意之时，也有失意之年；既有荣耀之时，也有屈辱之秋。”这件事使大平与佐藤的感情恶化，以后他便对佐藤政权持批评态度。同时，大平也再次痛感政治的无情，深刻意识到要在日本政坛站稳脚跟，绝不能靠他人的“恩赐”，充当别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属品，而应该拥有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内应该有拥戴自己作领袖的政治集团。实际上，大平正芳在长期担任公职和从政的生涯中，已逐渐具备了充当政治领袖的主客观条件。

大平是自民党公认的“党内理论家”。他不仅在学生时代就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而且在担任公职和从政之后，善于冷静地观察，思考工作中和社会上各方面的问题，并擅长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些分析往往具有独到见解。因此在许多场合，他的政论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常令听众感动和折服。他的讲演水平也因发言机会较多而迅速提高，往往还可以用英语在国际场合讲演，这是不少同时代的政治家所不及的。在性格上，他始终给人一种稳健、深沉、倔强的感觉，使人觉得他可以信赖。他不仅从事了党务和内阁各业务部门的具体工作，而且担任过政策理论水平要求很高的政务调查会长一职，使他在拥有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的同时，也能站在全党和国家的高度去洞察秋毫，综览全局。作为政治领袖的个人素质，大平已基本具备。

当然，日本政治是典型的“金权政治”。各政治派别势力的大小往往与其拥有的财力成正比。如据1967年的调查，这一年自民党各主要派别公开的政治资金分别为：佐藤派37784万元，福田派31747万元，前尾派22900万元，田中派12059万元，三木派16180万元，因此，仅有才能，没有强劲的财力作后盾，在政治上将一事无成。大平正芳在这方面也拥有了相当突出的优势。他不仅本身拥有一定资产，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企业界和财界的鼎力支持，不少企业界与财界拥有雄厚实力者都与大平关系密切。如原委内瑞拉石油贸易公司董事长、日本营业者团体联盟会长樱田武、日本精工公司董事长、海外石油开发公司总经理今里广记。许多大企业家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大平正芳的团体，如关西电力会长芦原义重、前中部电力会长横山通夫、东京电力社长平岩外四。东京瓦斯社长村山武雄等组成的“村芳会”；松下幸之助、崛田庄山等关西财界实力人物组成的“吉兆会”；东京商大的校友们如古河电工社长小泉幸久、住友金属社长藤崎章等人和曾在池田勇人身边的人物组成的“大平会”；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日立社长驹井健一朗、三菱电机社长大酒保谦、日本电气会长小林宏治和新日铁会长稻

山嘉宽等人组成的“未广会”。此外还有“大荣会”，“清友会”、“芳明会”、“大雄会”、“官界大平会”、“高松高商大平会”等。东京商大的同年级同学中也不乏支持大平的有产者，如三菱瓦斯化学社长相川泰吉、日本矿业会长庭生正之助、三井铝业社长川口勋、住友橡胶社长斋藤晋一等人。

这些企业界和财界的实力人物和团体，在不同时期先后与大平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关系，他们可以为大平的政治活动提供雄厚的资金，这在日本政界是合法的。前述各派的政治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大企业的“捐赠”。大平完全可以为自己在政治上独树一帜而筹集巨额资金，从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此外，有丰富经历的大平正芳还在官界有着广泛的关系。如大藏省的同僚桥本龙伍、石原周夫、石野信一、黑金泰美、下村治、原纯夫等人后来都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在兴亚院的同僚武内龙次后任驻美大使，冈原昌男后任最高法院院长官，矶崎睿后任国铁总裁，还有伊东正义、佐佐木武之……池田派的官僚有不少人也与大平结成了政治同盟，甚至佐藤派的田中角荣与池田有姻亲关系，加之自己的政治目的，也与大平结为同盟。

大平出身寒微，没有什么有势力的亲戚。但他通过联姻，与一些有实力的人物发生了密切联系。大平的岳父铃木三树之助是三木证券公司的创业者，经济力量不可忽视。大平的次子大平裕是神崎造纸公司董事长远藤的女婿，三子大平明后来娶的是大正制药公司的上原正吉参议员的孙女，上原家又联结了昭和电工公司的安西正夫，日清制粉公司董事长正田英二郎，这一姻亲关系，一直延伸到天皇家族。

因此，第二次离开政治领导核心的大平正芳，已再不是势单力薄而任人摆布的普通官吏，为了在政坛能独树一帜，他开始着手积蓄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将已处于涣散状态的原保守政权的主流——池田派重新团结起来，而且要由坚定的大平取代动摇不定的前尾做这一派的领导人。

正如前述，池田死后，池田派成了前尾派，宏池会改名为新财政研究会，但实际上大家仍习惯称之为宏池会，会长是前尾繁三郎。前尾身体不太好，性格也优柔寡断，因而使人很难相信他能胜任一派领袖。1966年竞选总裁失败后，1967年10月底，前尾几经犹豫，在三木武夫宣布参加1968年总裁竞选之后，也宣布再次出马竞选总裁。但1968年11月投票的结果，前尾在454票中仅获95票，排在三木之后屈居第三位。而这次竞选前尾自己不愿作任何努力，把一切交给大平和铃木善幸去办理，让“大平筹集资金，铃木善幸拉选票”，结果当然惨败。这一结果在宏池会内部引起许多派内骨干和年轻议员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前尾退下来，将宏池会领导权交给大平。当时大平作为协调会长，对担任宏池会领导一事尚处于观望时期，认为这是水到渠成之事，不能急于求成。因此，大平对派内的议论自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记者说：“公选出现这种结果，只能服从。对已经结束的事重新议论并非良策。至于前尾派今后怎么办，前尾先生要采取什么态度，这完全是应由前尾先生自己考虑决定的问题。”而前尾对这次失败似不甘心，他对亲信说：“若不是出现这个结局，我就准备把宏池会交给大平了。事到如今，再干一次，死也甘心了。”“正因为没有拼死一战，所以才落得这般地步。我们还有许多人马，解散宏池会还为时过早，我还要倾全力再拼一次。”

1968年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前尾在1970年公选时却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对佐藤谦恭俯就，对本派下属却持尊倨傲。1970年9月22日，前尾在与佐藤会谈时问到佐藤是否想争取第四次连任总裁时，佐藤表示若第四次连任须得前尾合作，并故意设下诱饵说：“届时想请你入阁，身体还好吧？”前尾被佐藤这一小小的权术所左右，他不想通过竞争去获得胜利，而是想放弃出马竞选以换取新一届内阁的一个大臣职位。于是轻易地承诺了放弃竞选，与佐藤合作。宏池会的年轻议员们对此非常反感，但前尾摆出长者姿态，置大家的意见于不顾。宏池会的议员们无奈，只得支持佐藤。

10月29日自民党总裁公选，佐藤当然就如探囊取物一般以绝对优势击败三木武夫，第四次登上了总裁和总理的宝座。党的选举大会一结束，佐藤立即召见前尾，明确表示“不想进行人事改组”，实际上就拒绝了前尾进入新一届内阁，前尾于是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这种最终结果使宏池会仿佛点燃炸药包一般，会内许多议员对前尾放弃竞选本就不满，这次前尾又轻易同意不改组内阁，这些议员对前尾的不满来了个总爆发。特别是大平派的“周四会”的议员简直造起反来，他们纷纷议论：“我们选举总裁时出于无奈，写了佐藤荣作的名字，结果除了屈辱，我们得到了什么呢？”还有些人干脆大喊：“散伙！另谋出路！”这种客观情况犹如导火线，终于带来了前尾交班，大平上台的局面。

### 宏池会的新领袖

在新一任总裁公选前的1970年7月，大平正芳曾对著名政治评论家，原池田勇人秘书官伊藤昌哉说：“我掌握了宏池会的全部人马，有遗漏的话，也不过三四个人。少壮派议员对我喊道：‘快明确表态吧！’而前尾身边的人也向前尾进言：‘放弃总裁候选人资格。’”大平的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表明他在离开内阁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已逐渐积蓄起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而前尾则与其下属貌合神离，逐渐降低了自己的威望。前尾也许对这种情况了如指掌，所以才放弃了竞选，寄希望于佐藤能分一匀羹给自己。

当前尾入阁的希望破灭后，宏池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少壮派议员们皆表示必须尽早刷新体制，改善体质。拥戴大平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已在要求前尾辞职的誓约书上签名盖章。这种对前尾责任的追究也就促使大平采取具体行动。

冷静洞察局势的大平并不像年轻议员们那么冲动和鲁莽，他不断劝告这些少壮派不要过于着急，给前尾一个考虑的余地。担任总务会长的铃木善幸也做了不少劝阻“造反”的工作，同时劝大平要自重。另一方面，铃木又去做前尾的工作，希望他能早下决断，将宏池会领导权交给大平。但前尾仍在游移不定。束手无策的铃木找到宏池会的后援支柱——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会长樱田武商量对策，后来又由池田勇人的夫人满枝出面与樱田武谈，设法使前尾退下来。前尾在多方调解下，终于表示了一个不明确的态度：“我自己也要下最重大的决心，但是需要有最大限度为一个月的期限。所谓重大决心，当然包含考虑进退问题在内。”

11月初，前尾的秘书安田正治找到与大平关系密切的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希望伊藤能为前尾和大平的相互沟通搭桥，并将前尾的用意告诉了伊藤，即打算1971年8月13日池田的七周年忌日一过就引退。伊藤拜会大平时把前尾这一想法告诉了他。

双方的亲信经过协商，拟订了一个过渡性措施，即前尾仍为宏池会会长，下设以大平为首的“五人委员会”为辅佐机关，并新设“干事会”以听取年轻议员的意见。这实际上为大平掌握宏池会领导权设置了一个阶梯，宏池会会长的权力从前尾手中交给大平已成必然趋势。

大平这时的心情十分复杂，前尾是池田的“兄弟”和自己的前辈，自己不可能主动要他下台，否则将陷于不义之地。但池田传下来的宏池会已由政权的主流变成了非主流，仿佛像“党内野党”，而且有日渐瓦解的趋向。自己如果不接管宏池会的权力，不仅这一派将土崩瓦解，而且自己也将失去支持力量。大平后来回忆这一段时间的心情时曾谈到：“如果是前尾先生继续照管宏池会，我并不打算同他合作。不过，我考虑到，如果表示不满的年轻人不听我的规劝，非要同前尾先生分手不可，尽管这是我所不希望的，但我也不能置之不理。另外，如果前尾先生提出要把掌管宏池会的责任委托给我，我当然也要作好不得不接受下来的准备。”

12月28日，前尾秘书安田又找到伊藤昌哉，告诉他：“明年1月到3月期间，前尾终将辞去宏池会会长。大平若能在元旦到前尾家拜年略表敬意，那太难得了！”伊藤将这一信息传给大平后，大平很爽快地答应了。

1971年2月，前尾又犯了错误，劝别人辞掉议员竞选东京都市长，结果失败。这时前尾已暗下决心引退，但又不公开表态。

3月9日，大平为《日本经济新闻》撰写了一篇短文《新权力论》，一般人认为他这篇短文是在批评前尾失去了威望却还抓住权力不放，但实际上这是大平对“权力”的深刻反思。

大平首先指出：“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一般认为他是为了权力而玩弄计谋和手段，这种理解显然片面。实际上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主张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实现道德。而我们人类往往是随波逐流地盲目安排命运，这样是不能实现道德的。为了实现它而必须使用权术，这就是我理解的马基雅维里哲学的精髓。”

大平认为：“权力并非孤立之物，权力必须有其服务的某种目标。权力只允许存在于它所服务的目标范围内。”那么，马基雅维里之流要实现的道德是什么呢？大平认为在现代日本就是“和平”、“福利”、“富强”、“舒适”。其具体内容不一定明确，对其理解因人而异。如和平，并不满足于元战争的状态，而是维持国内外的积极秩序的、具有更具体内容的和平。如福利，不单是计算国民生产总值，而必须是能带来更积极的生存意义的东西。

正当的现实权力一定得考虑自身存在的理由，不能忘了，掌权者往往以“安定”作为达到目的的借口。大平认为，世界上很多人并不关心意识形态，而掌权者必须考虑的，与其说是寻求对自己意识形态的同情与理解，不如说是使这些不关心政治的广泛阶层变得对自己存在有利，至少也要下功夫使其无害于己，从而巩固自己的基础。

大平最后指出：“权力必须有更深的根基。在东洋，为政之根本并不在于寻求手段，而在于寻求权力主体的人格。与其期待制度和法律的完备，不如寻求掌权者的德望。首先要把知己、克己、尽己之事当成为政之根本。”

“以前的政治理想正在于权力不能超越意识之上，若是那样，重新问及权力论就不大受欢迎……但是必须记住，权力的主体在于掌权者自身存在的方式。能够为权力带来真正的信赖和威严的，并非权术的分量及其组合的巧拙，而是权力主体所取得的威望的大小。”

大平言下之意，就是表明自己将以德在宏池会树立起威望，逐渐掌握政治领导权的愿望。

1971年3月，铃木总务会长向前尾做了大量工作，要他向大平交班。随后樱田武又直接出面，在筑地荣家饭店会见了前尾，同去参加会见的有财界首脑今里广记。樱田武明确提出要前尾将宏池会领导权交给大平，前尾听后显出失望的神情，但也无可奈何了。

4月16日，前尾会见大平，表明让出领导权，大平正式就任宏池会会长。4月17日，在宏池会总部举行了大平就任第三代会长的仪式。大平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致词。在致词中，他首先肯定了本派经过吉田、池田、前尾三位领导人的时期，得到了许多同甘共苦的同志们们的支持，并表示自己也将倾注全力搞好宏池会的工作，决不辜负大家的期待，也希望同志们大力协助。

接着，大平又感谢前尾过去对宏池会的指导，并提议推戴前尾为名誉会长。然后他说：“此次会长交接，正是宏池会自成立以来孕育最大危机之时，以福永、小坂两前辈为首，各位干部都倾注了所有的智慧和热情，为处理问题而殚精竭虑地奔走于同志之间。从而不仅幸运地打开了这种局面，而且成功地使之变为扭转困境，增强团结的契机。”

大平主张，在会务运营方面，期待与各位同志相互沟通，消除隔阂，遇事少犯错误。“我们追求的主体路线，已有幸在昨日前尾声明中表示出来……要紧的是加强相互信赖和同志间的活跃交流，向这一目标勇往直前。”

从此以后，自民党的前尾派就成了大平派。大平有了听命于自己的政治集团，有了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的资格。以后大平派的实力迅速壮大，成为自民党内不可忽视的政治派别。

## 亮出自己的旗帜

大平正芳是个颇具自知之明者，他清楚自己成为派系领袖，并非宏池会内所有的议员都口服心服。正如他在《我的履历书》中回忆的那样：“结果前尾先生选择了把宏池会委托给我的办法，于是我决定把它承担下来。这一过程表面看来好像很自然，但人的心理并不那么简单。由于我的做法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前尾先生以后对我的态度变得很冷淡、生硬；而且宏池会本身也没有达到充分的团结。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马参加总裁竞选的，而宏池会的多数人都主张目前首先要把总裁竞选的资格弄到手。这样，其结果大体上都可以预想的。”

自由民主党自1955年建党以来，党内就形成了各种集团，这就是所谓派系。为什么已经统一的政党内会出现公开的政治派系呢？这正是日本政党政治的特点。因为日本议员选举是“金权选举”，当选的自民党议员都接受了数额不等的资金赞助。提供资金的当然是利益不同的企业和财团，当选的议员自然就形成代表各不同企业和财团的政治派别，在制订政策或采取重大措施时，也就必然以这些资助者的利益为出发点。凡能筹集到大量资金的议员，就可吸引一批议员组成一个派系，自己成为派系领袖。每一届党的重要职务和内阁职务的分配，也是以派系为单位来进行分配的。因此一切自民党所属议员，只要希望自己在政治上能够前程远大，就必须隶属于某一派系。正因为各派系在党内和内阁中的地位和利益要得到体现，所以随着派系势力的变化，日本政府就需经常进行内阁改组，造成日本政局不大稳定的特点。

自民党的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在一般情况下，总是由某一派系的领袖担任。反之，有实力的派系领袖，在自认为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往往要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和总理。

大平正芳也知道自己这时出马参加总裁竞选获胜的希望不大，因为大平派的实力远远不如从佐藤派中分离出来的田中角荣派和继承了岸信介派衣钵的福田纠夫派。但由于前尾以前参加过一次总裁竞选，1970年因放弃竞选引起了宏池会内的强烈不满。为了巩固宏池会的内部团结，扩大本派的影响和实力，刚接任宏池会长的大平决心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出马参加竞选，以为本派在新一届内阁争得一席之地，改变宏池会的“党内野党”的处境。为此，大平必须亮出自己的旗帜。发表竞选宣言，为参加竞选在国民中树立自己的形象。

1971年9月1日，大平在宏池会议员研修会上，发表了精心准备的演说，公开提出对佐藤政权的批判。这篇演说可视为大平参加竞选总裁的宣言。

演说的题目为《日本新世纪的开幕》，副标题为“改变潮流”。在演说的序言中，大平开宗明义地分析了日本面临的严峻局面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目前，我国迎来了可说是战后总决算的转折期。过去以来，一个劲地致力于寻求富裕，但在已到手的富裕中未必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生存的意义；毫不踌躇地沿着经济发展轨道猛跑，但正是由于其发展过快，又不得不再次以稳定为方针；不顾及形势而尝试向海外扩展经济，但正是由于其扩展之激烈，而受到外国的嫉妒和抵抗；以对美协调为基调而回避参与国际政治，但正是由于美元体制的削弱，不得不走向险峻的自主外交；举国上下专心于自己的经济复兴，却不得不作为国际成员承担起经济的国际化。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转折期。处于这种转换时期，正确指明今后的方向，是政治的使命。我国国民的确具有足够能量来经受这种考验。但为了促使这种能量充满活力地释放，必须断然纠正政治态度，大胆修改政策轨道。”

接着，大平谈到了应消除对政治的不信任。他指出近年来各种选举的弃权率逐渐上升，最近的参议院选举弃权者超过四成，大城市接近五成。这不仅是对政治的不关心，而是国民希望避开政治家，要求更直接地参加政治。这表明对政党、尤其是对自民党的极端不信任。因此，政治家不应忽视国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揭示问题的实质及对策，与国民各阶层展开对话，使国民的能量得到“超乎预料的发挥”。

大平又谈到了改善人际关系的问题。他指出，随着战后经济秩序的变化，日本社会的人与人之间某种程度的“断绝和相克”，企业设备、公共设施与居民之间的摩擦也不少。这些都削弱了国民的共同意识，威胁到国家存在的基础。因此，如何提高和平与富裕时期国民的共同意识，是政治的最大课题和教育的基本任务。他主张：“教育不单是学校教育，还必须推广到家庭、工作单位和社会中去。”“其目标是恢复人类的共同意识，其方向就是从同家族的共同意识向地区性的、国家的和世界的共同意识发展。”

大平在外交方面着重谈了他的“努力开展和平自主的外交”。首先，他分析了日本在当前形势下所处的国际地位：“我国处于美中苏三极之交点，常受三国的压力。而且今天我国作为高度发达的经济大国，必须向世界寻求市场和资源，只有世界的和平才是我国的生存条件，我国与世界任何部分都必须保持联系。”“然而，最近似乎听到军国主义复活的言论，当然，这肯

定是误解乃至曲解，但假若那是指我国轻率的大国意识或经济上的利己主义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充分自戒。另外假若是指超出了自卫能力，那作为和平国家的我国的自卫力量就应该摆正位置，消除国内外误解。总之，再不走孤立主义道路，我国应该表示对和平作出正当贡献的决心，进一步显示自己确为国际社会之一员，以取得世界的信赖。”

接着，大平就和平外交阐述了三个他认为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改善对美关系。他认为：“对美协调以前就是日本外交的基调。对于在太平洋经济圈内与其生存和繁荣有关的日本来说；今后，日美友好仍是外交核心。然而不幸的是，近来日美相互不信任升级。首先，我国应清算愚昧的受害者意识，站在对等自立的立场上，加深信赖和理解，消除这种不信任的鸿沟和理解的隔阂。”

第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问题。大平说：“我在1963年（应为1964年——作者）的国会上曾发言，‘如果北京受到世界祝福而被接纳入联合国，日本也应谋求与北京的邦交正常化’。从那以后，联合国继续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去年秋季以来，联合国的大势已迅速朝着承认北京有权代表中国的方向倾斜。而且其后，与北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也逐渐多了起来，我国舆论也大幅度地朝这个方向摆动。”

“我认为，政府正确评价这种形势，解决所谓中国问题的时机已逐渐成熟。我相信，政府遵循日中友好的精神和原则，尽快开始同北京的政府间接触，才是顺应国内外舆论之道。即使在尚未最终解决之前，也希望政府慎重，不要做诸如在联合国支持逆重要事项提案之类的倒行逆施之事。”

大平在这里指的是佐藤政府于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即7月22日的表态。佐藤表示日本将成为两项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一是“复合双重代表制”议案，即“邀请北京政府进入联合国，但也要承认台湾国民政府的存在。”二是“逆重要事项决议”议案，即“驱逐国民政府应采用指定重要事项决议案的方式”。而“指定重要事项决议案”是以前美国为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认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一项重要决议案，需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三分之二成员同意方能通过。佐藤政府则反其意而用之，要求驱逐国民党代表出联合国也需三分之二的票数。大平在这里是批评了佐藤政府的对华政策，并表明了自己在恢复日中邦交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决心。

第三，推进经济文化协作。大平认为，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都是唯一的可以从内部抓住南北问题的国家，也是有余力可以将自身进步成果的相当部分分给后进国的国家。更作为希求和平的经济技术国家和知识教育国家，而应当得到世界的评价和信赖之国。因此，日本应分担国际责任，更加扩大经济文化的协作。在这方面应加速建立实施协作的组织，在制订经济和财政计划时确保提供稳定的资金等。

最后，大平在演说中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国家”的设想作为日本今后应奋斗的目标。他说：“现在，国民生活因公害、物价、交通等问题而日益不安和紧张。国民现在与其说无限追求物质财富，不如说更渴望精神充实的安定生活。为了满足国民的这种希望，我们必须在四个岛上建设一个与大自然协调的、均衡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以自动防止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可以协调农村、山区和城市的长处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即在农村和山区创造出良好的住宅条件和较多的就业机会，使之变成富裕的田园，并将这种

田园导入城市的所谓崭新的田园城市国家。这种田园城市国家决不否定今后的经济发展，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生产效率高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山区在更高水平上相结合的社会。”

这篇演说既是大平的竞选宣言，也是大平的政治哲学和时代观念的集中体现，既表现出他对发展日本社会的内政外交的具体政策设想，也反映出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概貌。当然，他的这种类似“乌托邦”的理想社会的描绘在当时并未引起舆论界的强烈关注，舆论更关心的是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大平时佐藤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给日本政界和新闻界以很大冲击，各家大报对此纷纷加以报道。《朝日新闻》的标题是：《大平宣布反对佐藤，主张迅速改变对华政策》；《读卖新闻》的标题是：《关于中国合法席位问题的逆重要事项提案，由于自民党内的反对，政府已陷于困境，大平也反对这项提案》；《产经新闻》的标题是：《想当自民党总裁的大平承认北京是正统政府，值得注目》。

除了大平的政策性演说外，宏池会政策委员会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如9月28日的“修正经济轨道和财政的作用”，11月17日的“紧急财政对策临时措施法”和12月16日的“公债政策”等。这些政策性建议与大平的演说一起，鲜明地亮出了大平派的旗帜。使日本国民对大平的政治理想、政治体系和实施手段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为太平出马参加1972年的总裁竞选大造了舆论。

### 参加总裁竞选

此次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共有四名：福田赳夫、田中角荣、三木武夫、大平正芳，而以前最多只有三名候选人，故这次选举被称为“三角大福”决战。在这四人中，最有实力争夺总裁职位的是福田和田中。佐藤有意让福田继任党的总裁，故在1971年7月5日改组内阁时，将最有可能继任总裁的干事长田中撤职，让他改任地位稍次的通产大臣，让福田改任地位稍重要的外务大臣，使福田有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田中对此安排始终耿耿于怀。

1972年除夕，大平与田中共进午餐，两人谈了三小时，大平除了偶尔发问之外，主要是听田中表明出马竞选的信心。田中表示，反对通过“协商”方式决定总裁后继人，而必须按党章投票选举。因为田中明白，所谓“协商”实际上就是佐藤指名福田为继承人，而若通过选举，自己获胜的希望很大。田中对大平说，他已掌握了佐藤派的四分之三的人，这些人知道佐藤快下台了，想寻求新的靠山，这个靠山就是田中。田中希望大平派支持自己，不要让佐藤把前尾周围的人控制过去支持福田。同时田中还大平说，任何中间派别想联合起来反对自己都不行，那样只会被自己一网打尽，参议院已被自己收买，右翼势力、检察官和警察都将听命于自己。这些话好像是对大平说“知心话”，实际上是从另一角度对第一次出马竞选总裁的大平含蓄地提出警告和威胁。

1月5日，佐藤为了谈判归还冲绳的最终协议，率领福田外务大臣和田中通产大臣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与尼克松总统会谈。政界消息灵通人士推测，在这期间佐藤可能在田中和福田二人之间做了些调停工作，但未见成效。1月8日，佐藤与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决定3月15日两国交换归还冲绳的批准书，5月15日正式归还冲绳。这预示着，佐藤内阁的使命已完成。“三

角大福”都在为争夺下届总裁的宝座而拼死战斗。

除了势力最大的福田和田中派外，三木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70年三木第二次参加总裁竞选时得了110票，比1968年多出3票，仅次于佐藤。故这次三木仍信心十足地准备再次大干一场。四人中显然大平是处于劣势。1968年前尾参加竞选时仅得95票居第三位，1970年又放弃竞选，使宏池会议员如在野党一般坐上了冷板凳。大平于1971年4月刚接过宏池会领导权，势力还不够强大，内部关系仍需进一步协调，但在这种状况下，不但要出马竞选，而且还必须超过前尾上次获得的票数，否则，人们会认为宏池会是一代不如一代，大平在政治上也许就会走下坡路，而从此一蹶不振。这时宏池会的铃木善幸被迫辞去了总务会长之职，以他为中心在大平事务所负责大平的竞选事务。铃木也非常担心大平在第一轮投票时得票少于前尾上次所获票数，他认为若是那样，不如大平派一开始就支持田中。但他这一消极想法受到大平周围许多人的反对，大平也力图从中曾根康弘派和中间派中寻求支持力量。

大平派专门组织了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会从1972年2月22日起，在青山寓所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直到7月5日选举。参加会议者除大平本人外皆为最亲信者，如佐佐木义武、伊东正义、浦野幸男、田泽吉郎、服部安司等，这些人后来都先后成为内阁大臣。会议起初只是交流情报，后来发展为分析形势、研究方针策略的聚会。选举对策委员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设法多争取选票。当时自民党内形成了一强、四弱、一风标的派系势力，一强指佐藤，四弱指这次参加竞选的四位候选人，一风标指立场不稳定的中曾根康弘。因此，中曾根派成了几派争取的对象。另外还有一些较小的中间派。大平选举对策委员会决定每人去做几名议员的工作，当然大平承担任务最多，要这些议员投大平的票。

结果，中曾根派大部分被田中派争取过去。在这种形势下，大平同时采取了退后一步的措施，与田中签订了盟约，商定在第一轮投票中无论谁票数领先，另一人在第二轮投票时全力支持这位领先者。

5月8日，大平又专就外交问题提出了他的政策性建议，题为《和平国家的行动原则》。在这项建议中，大平重申了日本应成为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这一原则。不过与以前的外交演讲相比，这项建议又有了一些新意。

大平提到，5月15日就要实现冲绳的归还。随着美国指导力量的逐渐削弱，日本经济力量的强大，对美依赖的时代结束，迫使日本改变以前的外交政策，必须充分显示日本创造和平的真意，以自主的行动证实这一点。

大平指出，世界上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增加并不能带来和平，反而造成内政上的重负，使外交手段黯然失色。现在人类为了生存，已具有了超乎人种、国界和社会制度之上的共同而切实的课题，也就是说人类不得不面临共同的敌人。如何由量到质，由对抗到缓和，超越强权政治理论，克服共同的敌人，这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

大平认为，亚洲地区局势也不稳定，日、中、美、苏四大国，尤其是日中两国应致力于创造该地区的和平。日本愿为此付出行动。日本主张：一、禁止一切核攻击和核扩军；二、禁止侵犯各国主权；三、禁止助长任何国际纷争；四、禁止污染海洋、大气、水源和乱开采资源；五、禁止对世界上的饥饿、贫困和疾病放任不管。

最后，大平再次强调和重申了日本在最近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应采取的原

则立场，包括恢复中日邦交、日美安保条约、日本防卫力量、对外援助等问题。

这次政策建议和紧接着在6月14日发表的《教育及社会保障的新方向》的政策建议一起，起到了一种在临近选举前再一次为大平出马竞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的作用。

1972年6月17日，佐藤荣作首相终于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上正式表示引退。当天下午，大平正芳第一个宣布了参加总裁竞选的声明，正式成为新总裁的候选人之一。以后20日和21日，其他三名候选人也宣布出马竞选。

紧接着，新闻记者们纷纷采访几名候选人。其它三名候选人均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只有大平的宣传是以概论为重点，没有多少具体政策。因为他认为，随着日本社会的进步，政府应减少具体的行政干预手段，而改以政治引导为重点，引导广大国民一起来深入思考如何对当前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局势，怎样适应新的变革。因此大平简要地提出了自己对组建政权的构想，他将这一构想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政治信条的三大支柱：1.心心相印的政治；2.不惜流汗的政治；3.没有谎言的政治。

二、和平外交五项原则：即5月8日政策建议中关于世界和平的五项“禁止”。

三、八条政治行动：1.对侵犯人生尊严者挺身作斗争；2.珍惜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3.为避免国内外紧张局势的激化，一边诚心尽到自己的责任，一边努力说服对方理解；4.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环境；5.为不幸的人们提供参与社会和有生存意义的场所；6.禁止以权谋私；7.使国民利益优先于党派和集团的利益；8.政治和行政应遵守规则，重视行动和快速。

当时记者们提得最多的是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大平再次声明了他的观点，认为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时机已来到，新一届政府应立即采取行动。

7月2日，大平、田中、三木这三位候选人于大仓饭店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三派政策协定，三方一致同意，无论哪一方当权，都将致力于恢复中日邦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以缔结两国和平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1972年7月5日上午10时，自民党在东京日比谷大会堂召开了继任总裁的选举大会。在佐藤首相发表辞职讲话后，立即开始投票。第一轮投票结果，四名候选人得票多少顺序是：田中角荣156票，福田赳夫150票，大平正芳101票，三木武夫69票。田中角荣对自己领先6票而居第一的结果，惊喜得“啊——”的一声，旁边的议员吓了一跳：“角公为何如此吃惊呢？”田中知道，就在7月4日夜，佐藤仍在打电话到处为福田拉票，因而取得这一初步胜利的确来之不易。大平正芳也感到舒了一口气，因为得票虽不太多，但总算超过了1968年前尾的得票数，保住了宏池会会长的面子，巩固了宏池会内部的团结，而且得票数超过了两次参加总裁竞选的三木。初次参加竞选就获此结果，大平很满意了。

按照规定，第一轮投票若任何候选人所得票数均未过半，需对得票居第一二名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接着进行的第二轮投票中，大平派遵守了与田中派的协议，全部投了田中的票，三木派也有部分议员投了田中的票，结果田中得了282票，福田获190票，无效四票。田中以压倒优势当选为新任自民党总裁。大平的这一支持田中的行动，尽管后人对其评价不一，甚

至有人说是大平中了田中的圈套，但无论如何，它为以后大平登上总裁宝座奠定了基础。

公选总裁结束的7月5日晚7时，田中打电话请大平到赤坂的饭店去协商新一届内阁人选。协商结果，田中负责内政和党务，大平负责外交事务。这样，在第一次田中内阁中，大平就担任了外务大臣这一重要职务。新闻界对大平重新担任外务大臣纷纷加以评论，称田中新首相“把主要的职位给予支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人”；“大平主张日本同美国、苏联和中国举行会谈以维持亚洲和平”；“缺乏外相经验的首相，从多年的知交大平那里得到了弥补”。自从1964年大平辞去池田内阁的外务大臣职务后，至今已有8年。在8年后又重新掌握外交大权，大平正芳也许是百感交集吧。7月8日，福田赳夫外相和新任外相大平正芳在外务省所在地霞关举行交接仪式。大平在仪式上对福田说：“事隔8年，又重操旧业。终于上了二年级。请多关照。”话虽幽默，但感慨之情溢于言表。

从此，日本又开始了“大平外交”时代。大平正芳作为执政党的派系领袖，通过这次总裁竞选，以后也在党和政府内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彻底脱离了任人摆布的处境，他个人的从政道路也逐渐变为坦途。

## 第六章 艰辛的外务大臣

### “满头大汗地进行奋战”

田中内阁成立后所面临的重大外交课题，就是许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问题。在佐藤内阁晚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得到恢复，曾和美国一起充当“逆重要事项和双重代表制”提案国的日本在外交上十分被动。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佐藤首相企图在日中关系上做出一点和解的姿态。1971年11月，他让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给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呼吁就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府间谈判。此信托与中国关系较密切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捎给周恩来。但周恩来总理说“对佐藤已不抱希望”，从而拒绝了保利茂的建议，使佐藤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在那以后，中国方面再次强调了中日恢复邦交的三项基本原则，即第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该予以废除。

田中内阁一成立，随即将日中邦交正常化列为首要解决的问题。新内阁刚组成的7月7日傍晚，田中首相就发表谈话以代替政府声明。他在谈话中提到：“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新任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7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就有关问题表示了态度，他认为当日中完全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以前日本与台湾的条约仍然存在就是不可想象的了，新政府决心实现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日本跟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现在应该为采取负责的行动独立作出决定。

中国方面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周恩来总理7月9日表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而在这之前的7月3日，中国就已派遣非常了解日本的外交官肖向前担任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这位被日本方面称为“大使级”的代表这时来到东京，表现出中国方面准备同即将成立的新政府积极接触的姿态。7月11日，中国又派前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前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孙平化作为赴日演出的上海舞剧团团长前往日本访问。上海舞剧团已于前一天赴日，这个二百人的大型艺术团是首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演出。

日本各在野党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已为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作了不懈努力。田中发表谈话后，日本各在野党也纷纷表态，愿意协助新一届政府，为日中复交作出贡献。

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日本自民党和新政府与中国之间的官方接触已成为必然。一向稳健的大平外相这时一方面仍对此事持慎重态度，告诉记者“事关大局，应从容不迫，不可操之过急”，另一方面又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由此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恢复日中邦交最高级会谈的准备。而这两个月正是日本炎热的夏天，《每日新闻》为此于8月1日发表了文章，题为《大平外相“炎热的八月”，为奠定“日中”基础而汗流浃背》。文章说：“在田中内阁里以外相身分担负新政权的一翼的大平正芳，在今秋首相、外相访华前夕，正在为日中关系正常化奠定基础而满头大汗地进行奋战……他要为日

中关系正常化的步骤而冥思苦想，试拟方案。”

自民党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把党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改组成直属总裁领导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有316人参加，代表自民党内的多数，由前外相小坂善太郎任会长，在党内完善了这一事务的领导体制。

在政府方面，大平外务大臣命令外务省的负责官员把中国问题作为“特命事项”，随时报告进展情况。7月10日，大平外相会见记者时，当记者问到“被称为最大课题的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大平说：“如果不进行政府间接触，那将一事无成。”

记者问：“在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日中两国是否应以对等的地位来进行谈判？”大平答道：“外交，当然应该是对等的。不过，问题在于在战争中，（日本）处于加害者的地位。不根据这一点来着手进行是不行的。”

当记者问到“是不是应避免由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使第三国，即亚洲各国处于窘境的情况”时，大平断然他说：“是那样。但是若把台湾作为第三国的话，那是制造‘两个中国’，这样，是不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大平外相实际上表明日本新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已在向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靠近。日中两国第一次政府间接触是7月14日。这一天，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日本的小木曾、北原两位大使代表日本政府主持了招待会，中国驻日内瓦副代表卜明出席了招待会。尽管这一行动与恢复日中邦交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大平外相对两国第一次实现政府间正式代表的接触还是表示欢迎。

接着，中国方面进一步明确表示了更热情的期待。7月16日，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在北京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合影之后相互寒暄时，周恩来对日本摄影记者秋冈说：“《朝日新闻》的记者秋冈，你认为有可能把我和大平外相谈话的场面拍下来吗？”秋冈答：“我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周恩来说：“我认为那是可能的。”接着他又对佐佐木说：“期待着田中总理大臣访问北京。”

对中国领导人发出的这一明确而强烈的信号，日本方面也作出迅速而热烈的反应。17日早晨田中首相会见记者时对周总理期待日本首相访华一事说：“谢谢！看来‘时候’到了，要趁热打铁啊！”大平的态度更稳重一些：“为了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某个阶段，政府首脑将访华。但是，作为政府来说，打算进一步脚踏实地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大平的调子虽不高，但给人一种务实、可靠的感觉。

7月19日上午，大平外相又会见了美国驻日本大使英格索尔，主要交谈了本月底将要举行的日美贸易会谈问题。最后大使问：“田中内阁打算以什么样的考虑来推进日中邦交的恢复呢？”大平含蓄地答道：“政府是想完成日中邦交正常化，所以目前正在研究。”

大平之所以采取这种稳重、含蓄的态度，是考虑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在国内还存在着较大的阻力，特别是自民党内“亲台派”势力还很大，这一派的议员虽不反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极力主张应继续保持同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而大平深知这正是日中复交的主要障碍。因此大平认为还应进一步做工作以调整党内的不同意见，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另外，大平还不知道中国方面对日美之间的密切关系的态度有无转变，他在《我的履历书》中曾谈到：“我担心的是，我国既然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中国方面会不会接受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因为过去中国方面对日美安全条约

体制一直不断地发表批判性的言论。”因此，大平认为与其大张旗鼓地宣传，还不如脚踏实地地作准备，这样会更有利于推进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

以前日中之间没有政府间的正式接触，有关双边关系之信息皆通过在野党或民间人士来回传递。大平外相为改变这一状况，于7月18日表示，准备通过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等正式途径来进行两国间的接触。7月20日，“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以欢迎孙平化、肖向前的名义，在新日本饭店举行酒会，邀请了大平外相出席。这实际上是为日中双方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非正式接触牵线搭桥。在藤山介绍下，大平与孙、肖两位代表亲切握手。大平在握手时小声对孙平化说了一句：“下次再会。”暗示将进一步作正式接触。

经过外务省负责官员与两位中国代表的秘密磋商，7月22日，大平外相与孙、肖两位代表举行了会谈。会谈后大平会见记者时，虽未透露会谈细节，但表明孙、肖两人和大平都希望日中关系尽快正常化。

此后大平为加快恢复两国邦交谈判的准备进程而做了两件事。首先他在“荣家”饭庄会见了元派系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古井喜实与中国领导人有着长期交往，成为中国方面信赖之人。大平与古井就与日中复交的有关问题举行了长时间会谈，这些问题包括在继续保留日美安全条约的前提下，中国是否会同意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日中两国复交后，日本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是否能继续维持；“日华条约”（即日台条约）的失效从日中两国恢复邦交后开始而不是追溯到缔约之时，中国能否同意；中国是否放弃可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要求等。

其次，大平在外务省设置了中国问题对策协议会，以外务省次官法眼晋作为委员长，有关的司局长和课长15人参加，专门研究日本在参加复交谈判时对各个问题的基本对策。8月2日，这个对策协议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大平外相出席了会议并发出指示：“这是决定百年大计的问题，不允许有丝毫疏忽。由于事情要求很急，希望诸位取消夏季休假。”这样，大平外相属下的这些外交官们，也只得同大平一起满头大汗地苦战夏日了。

## 未雨绸缪

在中国方面已伸出橄榄枝，明确表示欢迎日本新内阁首脑访华，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通过近一个月的前期准备和接触，一般人都认为田中首相访华似乎已成定局，日中复交已指日可待。但一向稳健的大平外相认为这一重大外交悬案的解决绝非易事。在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还有不少重要问题应具体明确和落实，如日中两国关于复交的具体方针如何？美国这个日本最重要的政治盟国如何对待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的作法？中国对日本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将采取何种态度，会不会影响两国邦交正常化？只有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做到未雨绸缪，为恢复两国邦交的首脑级谈判扫清障碍。大平外相为此进行了更为细致艰苦的工作。

8月3日，大平外相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常任干事会上，宣读了日本政府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大致包括如下几点：

一、日中政府间接触的时机正在成熟，政府要负起责任，脚踏实地去推进旨在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政策。

二、日本谋求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目的在于，1.消除两国间不自然关系，

并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和平外交；2.通过实现邦交正常化，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不存在针对第三国的问题。

三、这一重大问题不能有丝毫漏洞，要努力获得执政党和国民各阶层支持。

四、邦交正常化不仅是日中间的问题，也是亚洲和世界各国都强烈关心的问题，因此要取得与日本友好的各个国家的理解。

五、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日中政府间接触，目前尚处于预备性阶段，很难预测今后政府间谈判的结果。政府对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三原则”能充分理解，并站在这一立场上，通过日中间的会谈，谋求达成协议。

六、一旦日中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与我方的外交关系将不能持续下去，而贸易、经济关系及各种事务关系将得到现实解决。

听取大平外相发言的协议会常任干事中，既有积极赞成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推进论者”，也有反对放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而实现日中复交的“慎重论者”，双方前一天尚在激烈辩论。听了大平宣读政府的方针后，亲台的“慎重论者”的代表贺屋兴宣、藤尾正行、渡边美智雄等议员对大平发起了猛烈攻击，反对与台湾断交。大平一方面用长时间耐心说明方针的内容，另一方面坚持原则不作让步。

第二天召开内阁会议时，大平外务大臣向总理和阁僚们报告了田中内阁组成以来，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的进展和前一天向自民党所作的政府六点见解。阁僚们认为，这六点基本见解只是“中期报告”，不是最后决定了的方针。

要最后决定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还得探询中国方面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态度，以及中方会对两国复交提出一些什么条件。以前大平外相也获得了不少有关信息，但这些信息来源的渠道都不太正规，不少人传达中方的态度时往往根据私利加进了一些主观见解，不能作为决策依据，必须要有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的准确信息，才能帮助政府作出判断。这时，到中国访问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回国了。竹入义胜在北京时，曾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次共10小时的会谈，并将周恩来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的中方草案作了详细记录。8月4日，竹入拜访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向他们转交了这份记录。记录共有八项内容，其中对日方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了以下表态：

日美安全条约的存在，以及佐藤和尼克松会谈时的“台湾条款”，均不构成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钓鱼岛问题也不会妨碍两国邦交的恢复；中国方面考虑到两国将来的友好，准备放弃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赔偿请求权；拟缔结一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取代以前日本与台湾的“日华条约”。

在正式获得中国方面的表态之后，日本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经过反复研究，于8月9日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支持田中首相访华的决议。大平外相当天在回答社会党人提问时再次重申，当日中关系实现正常化时，“日台和约”将自然失效。

8月11日上午，大平外相第二次会见了中国代表孙平化和肖向前，正式转达了“田中首相现在希望访华”的意向，并答应安排中国代表与田中总理大臣之间的会谈。当天中午，美日协会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午餐会。大平外相在会上用英语发表谈话，表示“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已明确，这样做的时机成熟了”，而且他还向在座的美国人允诺“这丝毫不会损害日美之间密切和融洽的关系”。

针对日本方面明确表示的希望访华的意向，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于8月12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日本国田中总理大臣访问中国。

在此形势推动下，日中双方的接触更为密切。大平外相又出席了古井喜实为孙、肖两位代表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古井对孙、肖二位提到当年“暗中支持松村谦三为打开日中关系而活动的是池田总理大臣和大平官房长官”时，大平外相连忙说：“哪里，哪里，没有做什么事情。”使中国代表觉得大平是一位非常谦逊的人物。

8月15日，在大平安排下，举行了田中角荣总理、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与孙平化、肖向前两位代表的会谈。两位代表向田中首相表明了衷心欢迎他访华的意向，田中则希望与周恩来的会谈能取得丰硕成果。当中国代表提出希望田中首相尽快访华时，田中询问：“北京的气候何时最好？”中国代表回答：“9月末至10月初最好。”实际上日本首脑访华的时间就大致确定下来了。

会谈顺利结束后，还有两件重要的事需要做，一是调整自民党内意见，二是与美国就此问题协调看法。大平外相见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逐渐成熟，就敦促田中首相说：“中国的真意已经基本上清楚了，剩下的只是行动了。你过去想做的事情已经到了该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下决心一块干。”田中信心十足地答道：“好！人生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去吧！具体谈判由你负责，党内问题由我解决。”

8月24日，经过反复磋商、协调之后，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召开了正副会长会议，决定了《政府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原则（草案）》，内容主要有五点：

一、日中邦交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迅速正常化；

二、互相尊重同友好国家的关系；三、互不行使武力和武力威胁；四、努力增进同各国之间的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五、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而进行合作。

这一《草案》的决定，表明虽然拥护台湾的“慎重论者”仍在主张继续维持与台湾原有关系，但自民党内的调整工作已基本完成，最后就看美国方面作何表态以及日美首脑会谈后中国方面有无新的反应了。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州的第三大岛瓦胡岛，是著名的旅游和疗养胜地，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檀香山）以及著名的海军基地珍珠港都在这里。每到夏日，世界各地许多旅游者都云集瓦胡岛，欣赏这里旖旎的海滨风光，度过一段令人陶醉的假日。1972年的8月31日至9月1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都来到了瓦胡岛北部的幽静的库依里马饭店。但他们既不是来观光旅游，亦不是来休闲度假，双方抱着各自的目的前来举行会谈。

田中内阁组成不久，日本就向美国提出了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要求。7月24日，双方一致同意9月上旬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对于这次会谈，日本打算将恢复日中邦交的意图向美方作说明，并希望得到美国的谅解。美国则没有预料到日中邦交正常化进展如此迅速，因此打算在这次首脑会谈中主要讨论纠正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在日美首脑会谈之前，日本已就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试探了美国的态

度。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在东京听取了大平外相就田中内阁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所作的说明之后，7月25日返回华盛顿，立即会见了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说明了日本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见解，要求美方给予谅解。8月10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途经日本，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会晤。日本方面再一次就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作了说明，但美方仍无任何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时，日方向美方充分说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取得美方谅解并元损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就显得特别必要。8月20日，大平和田中首相，就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步骤进行了仔细磋商，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即将于夏威夷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必须向美国阐明日本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立场。另外还决定，在田中访华之前先派遣自民党大型代表团访问北京，同时，向台湾派出特使。后来田中派前外相椎名悦三郎作为特使去了台湾。

8月31日，大平外相陪同田中首相到了瓦胡岛，在库依里马饭店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举行会谈。会谈中，日方向美方保证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体制，同时表示不管成功与否，要着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美方对前者表示赞赏，对后者则表示“预祝成功”。9月1日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田中总理即将访华一事表示了肯定，并说“双方希望这有助于促进亚洲紧张局势的缓和”。

在会谈之前，大平外相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美国会反对日中之间迅速进展的邦交正常化，二是担心日美首脑会谈时强调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会不会引起中国方面的反感而影响邦交正常化。现在第一个担心已不存在。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之后，大平发现中国并未对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作出特别反应，于是第二个担心也就成为多余。大平后来回忆道：“如果中国方面对于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轴的旧金山体制不提出异议，多年来成为悬案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就应该借此时机加以解决。看来中国对日美安全条约已采取灵活而现实的态度……我判断处理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敦促田中首相作出了决断，着手进行正常化的谈判。”

大的方针政策和外交协调完成之后，日本方面就开始了具体的准备行动。9月14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代表团由小饭善太郎会长率领前往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先行访问，政府特使椎名则于18日飞往台湾向国民党当局作解释。但没想到这两项行动都惹出了麻烦。

小坂代表团中既有拥护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推进派”，也有主张继续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慎重派”。后者在访问北京过程中，常有人把“中华民国”、“蒋介石总统”等话语挂在嘴边，惹恼了中国方面。当小坂正与周恩来总理谈判时，又传来了椎名特使在台湾的讲话，称“日本打算继续维持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的以前的一切关系”，这更激怒了周恩来，他当场质问小坂这是不是日本政府的真意？弄得小坂十分尴尬。但中国方面仍从大局出发，作了相当大的克制，使事情没有出现无可挽回的局面。

与此同时，作为非政府机构的备忘录贸易代表团在古井喜实和田川诚一率领下，已于9月13日赴华，在北京与中方就联合声明进行了具体讨论。当然，他们二人出发之前同大平外相进行了充分协商，所以他们同周恩来总理就田中访华的谈判内容深入交换意见时，也代表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双方就“战争状态结束”问题、“复交三原则”的处理等交换了意见，未取得一致处留待日中首脑会谈去解决。

在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工作之后，田中首相访华一事已准备就绪。日中双方于9月21日同时宣布：“田中总理大臣高兴地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将为谈判并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这样，日中复交一事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股东风将把田中、大平一行由东京送到北京，去为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作最后的努力。

## 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9月下旬的北京，天高气爽。近看秋菊怒放，到处花团锦簇；远望枫叶丹红，满山层林尽染。中国的首都已作好一切准备，迎接为打开两国复交之门来访问的日本贵宾。

9月25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行启程前往中国。在羽田机场第22号停机点前的贵宾室里，大平向中国代表肖向前打招呼：“得到了您多方面的关照！”同时他又对站在身旁的藤山爱一郎说：“多谢先生！”藤山听后笑容满面地对大平说：“有你去就放心了。”

大平虽然轻松地与他人打着招呼，内心却颇有些紧张。这两个月的复交谈判准备工作，使大平外相不仅感到身心疲劳，而且精神压力极大。随着谈判准备进程的加速，反对进行两国复交谈判的势力也加紧了活动，大平私邸不断有人扔进恐吓信，大平身边的人都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一次大平外出时，对随行的《产经新闻》记者阿部穆正说：“和你在一起旅行，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就会被人暗算，如果上帝保佑我的话，这次会谈大概会成功的！”大平说这话时表情严肃，没有丝毫开玩笑之意，这既表现出他具有政治家的严肃的使命感，也反映出他对自己致力于日中复交可能会对自己个人造成的后果作了最严重的估计。因此，在决心访华之后，大平就写下了遗嘱。9月22日，大平对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说：“我主意已定，田中也豁出一切，最后的一切将由我负责决定。”9月25日临上飞机前，他又把秘书真锅贤二叫到跟前说：“万一这次谈判不成功，我也许不能再度回到日本。而且

因为这次谈判，也可能遇到什么危险。我不在期间，一切都拜托给你了。”登上飞机之后，大平的心情仍然紧张，但他所考虑的却是如何使谈判取得成功。

日本贵宾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迎接。抵达北京的当天，就开始了谈判。双方一共举行了四次外长会谈，许多实质性问题是在大平外相和周恩来总理之间进行，细节问题则由大平外相和姬鹏飞外交部长具体协商，双方将有分歧的问题及各自观点并列写出来，并为拟定联合声明说明了各自的想法。会谈的核心问题皆与台湾有关。

复交谈判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主要原因是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就台湾问题作的详细说明伤害了中国方面的自尊心。高岛指出，中国主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立场，日本可以理解，并要尊重。但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对台湾实施统治。高岛还举了国际法的例子：

“如果日本人在台湾遭受危害时，中国政府能保护或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吗？”高岛因这种周密的诡辩和扭住不放的劲头而被中方称为“刀笔吏”。周恩来总理态度强硬地指出：“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话反映了田中和大平两

位领导人的真意。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明白你们是为吵架而来的还是为正常化而来的。”田中和大平反问道，“中国方面的见解又是怎样的呢？”周恩来总理便逐条阐明了中国方面的原则立场。

谈判陷入僵局的另一个较次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的欢迎宴会上田中总理大臣的祝酒辞。当时周恩来总理在欢迎辞中提到：“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而田中总理大臣对这一点只在祝酒辞中轻描淡写地表示：“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这种表述远远没有达到中国方面的期待，引起了中方强烈的不满。

担任主要谈判任务的大平外相由于谈判陷入僵局、心情格外沉重。而田中总理大臣因为将谈判全权委托给了大平，自己则轻松地在宾馆里做起了汉诗。当结束一轮谈判回到宾馆的大平向田中汇报了谈判陷入困境，并问田中：“怎么办？……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回不去了。”田中显出无所谓的表情说：“你们这些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拿不出办法来怎么行呢？”说完哈哈大笑。然后又安慰大平说：“事到如今，不需要作出太大让步。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回去就是了。就当我们来中国旅游一趟。以后的事，由我负责。再坚持一次。”

26日晚，大平外相与姬鹏飞外长举行会谈。大平外相按照中国方面的希望，对日本提出的方案逐条加以说明。每说明一条，姬外长就仔细作下记录，然后由中方秘书将记录拿到另一个房间去。待全部说明完了之后的二十分钟左右，中方秘书又将记录从另一房间送了回来。据日方推测，当时很可能是周恩来总理尽量避免在第一线谈判，因而在另一房间坐镇，一边研究送来的日本方面的方案，一边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主要情况，并调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

27日上午，中方安排日本客人游览长城和十三陵。大平外相和姬外长同乘一辆车，双方又利用行车时间进行了谈判。由于大平满脑子都是谈判内容，故游览时显得步履沉重，与田中首相的轻松漫游成了鲜明对照。

27日下午，大平外相又同周恩来举行了实质性谈判，对几个关键问题，由于中国方面的灵活态度和作出重大让步，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关于如何表述双方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周恩来想出了一种办法，即“结束两国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后来在《联合声明》中关于这一条作了如下表述：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有关中国对台湾的领有权问题，经过反复磋商，在《联合声明》中兼顾了双方的意见而作了如下表述：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波茨坦公告》又称《波茨坦宣言》，即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规定必须实施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国在开罗发表的《开罗宣言》中的有关条件，即日本夺去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一切地方均应归还

中国。

有关战争赔偿问题，《联合声明》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于日本今后与台湾的关系，在《联合声明》中未作表述，中国一方面默认了日台之间继续保持经济和文化等民间交往，另一方面又敦促日本公开表示与台湾终止外交关系。周总理要求日方明确何时发表，大平外相答道：“外交问题和其他问题不同，即使有绝对把握也不便明确具体时间。如果明确了时间，万一推迟一小时或一天，就会使两国的信赖关系出现裂痕，请相信我能做好。”周恩来沉思良久，终于下决心说：“我们相信大平。”将此问题交给了日方处理。在28日首脑会谈结束时，周恩来用毛笔书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交给日本方面，表明对大平外相的期待。

27日夜里，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周恩来、廖承志等人也在座。毛泽东一开口就说：“你们吵完了吧，不吵架是不行的。”他用“吵架”来指复交谈判的艰难。毛泽东还针对田中所说的“添麻烦”一句祝酒辞强调说：“一些年轻人认为添了麻烦这个措词是不够的，因为在中国，把水溅到女人裙子上时才用这个词……”

这次会见是日本客人访华的高潮，也表明谈判已渡过难关。关于“添了麻烦”这个意思，后来在《联合声明》中作了较慎重的表述：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9月29日，是日中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日中两国政府首脑在这里举行两国复交的签字仪式。日本的田中总理大臣、大平外务大臣，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并排坐在用两国国旗装饰起来的签字桌旁。记者们的摄影机中的镁光灯不断闪动，争相拍摄这一历史性的庄严时刻。两国首脑讲话之后，各自在《联合声明》上用毛笔签署了名字。自此，日中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立即在民族文化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联合声明》中的重要部分作了说明。在说明中，大平特别强调了中方最关心的台湾问题：“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已在第三条中明确，开罗宣言中已指出台湾应归还中国，波茨坦宣言接受了这一条……政府当然应坚持基于波茨坦宣言的立场。最后，在联合声明中虽未触及，但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本政府的见解是，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续存的意义，可以认为它已经结束。”周恩来总理担心并几次催问的这个问题，就这么迅速地解决了。大平后来说：“我当时虽然是那样回答周总理的，但我的决心已下，因此马上便付诸行动了。”

在谈到第五条中国政府放弃赔偿时，大平说：“若考虑到日中间不幸战争的结果，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损害，我们对此应给予直率和正确的评价。”当记者询问这是否意味着从内心协助中国今后的建设时，大平回答说：“所谓正确评价，就是对在过去的战争中，日本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有形无形的极大损害，表示深刻反省之意……今后两国的经济建设将根据各自国家的计划自主地进行。我们当然将站在互惠平等的立场上，促进相互的经济交流。”

记者问到何时缔结联合声明第八条中提到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大平认为应以联合声明为基础，从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去考虑，具体时间将通过外交途径磋商。

在记者招待会快结束前，大平外相特别强调，发展日中友好关系，并不是为了损害第三国的利益。同时，两国都不在这一地区，也反对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

返回宾馆后，田中、大平、二阶堂举杯相互祝贺，田中对大平说：“你辛苦了。今后还要继续合作下去。”大平如释重负般地轻松愉快，深有感触地赋诗一首赠予二阶堂进：

长城延延六千里，汲尽苍生苦汗泉。

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民心。

山容城壁默不语，荣枯盛衰几如梦。

日本贵宾接着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下访问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9月30日，离开上海回国。

回国之后，大平外相在10月6日的内外形势调查会和10月28日的第70届临时国会的外交演说中汇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性事件。在演说中大平强调：“使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确立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对于巩固亚洲安定和繁荣的基础是最重要的事件。”“日中两国之间，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当然不同，且在战后世界政治中各自的立场和情况也不同。但是，这次日中首脑会谈，在友好气氛中相互坦率地交换了意见，结果虽留下了有关分歧，但在追求通过邦交正常化而对亚洲和平作出贡献这一目标上保持了一致。在这种基本理解之上，本着互让精神反复交涉，最终达成了邦交正常化的谅解，迎来了日中关系史上的新阶段。”

在对联合声明中有关结束两国不正常状态、台湾问题、中国放弃赔偿问题、日中复交与第三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阐述之后，大平外相再次重申：“最重要的是，两国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秩序和繁荣作出贡献……日中两国只有通过这种稳固信赖的邦交，才能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友好关系并使其得到发展。作为政府，将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大平外相的演说，在国会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在这次演说中，大平正芳第一次提出了他的“环太平洋各国经济协作”的初步构想。

## 劳而无功的奔波

大平外相虽因妥善解决了日中复交这一重大外交悬案而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认为日本由于地处美、中、苏三大国之间，要想得到长期的安全与发展，除了与美国、中国搞好关系外，加强对苏联的外交也是作为外相的重要任务，何况日本与苏联之间尚存在悬而未决的“北方四岛问题”。因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对苏关系便提上了日本外交的议事日程。

早在1956年鸠山内阁时期，日本就与苏联发表联合宣言，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但在联合宣言第九条中规定，苏联同意把日本北方的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日本，实际移交要待两国缔结了和平条约之后。这样，实际上就将“北方四岛问题”搁置起来。以后苏联态度发生变化，称领土问题已于二战结束时解决。虽经多次努力，日本历届政府皆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两国和约

亦未能缔结。

1971年尼克松宣布访华，苏联担心此事可能会促使日中关系接近。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苏联决定对日本实行牵制政策。1972年1月，苏联派外长葛罗米柯访问日本，同意于年内开始日苏和平条约的谈判。但此事在佐藤内阁时期没有任何进展。

田中内阁组建后，苏联为了避免即将出现的日中复交，指示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提议举行日苏和平条约的预备性会谈，但日本方面当时正全力以赴准备日中复交谈判的各项准备工作，对此提议显得并不热情。

日中邦交恢复一事，对苏联刺激颇大，特别是日中联合声明中有关“反对霸权”的主张，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日本外务省打算开始进行日苏之间关于缔结和约的预备性谈判时，却受到苏联方面的拒绝。大平外相则力图奉行与几大国实行“对等外交”的原则，并多次在各种场合申明，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为了向美、苏等国说明日中复交的情况，大平外相决定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苏联，同时向韩国和东南亚等国派遣政府特使说明情况。

10月10日，大平外相离开日本出访。10月13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向田中首相递交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希望日苏和平条约的谈判能早日开始。10月21日，大平外相从华盛顿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同苏联政府首脑的会谈，除了说明日中复交的情况外，日苏和平条约谈判也从此开始。

10月23日，大平外相会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上午，双方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大平就整个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向苏方作了说明。当然，葛罗米柯不出预料地紧紧抓住日中联合声明中“反对霸权”的有关条款追问大平外相，这是不是针对苏联的日中联盟，大平外相向他反复解释了有关条款的含义。下午，双方又讨论了日苏和平条约这一重要议题。

10月24日，大平外相与苏联总理柯西金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今后就日苏之间的问题举行外长一级协商。但大平进一步提议，双方举行首脑之间的直接接触更有利于诸项问题的解决。柯西金表示同意。这样就为田中首相次年访苏一事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是，关于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一事，大平这次访苏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访苏结束时发表的联合新闻中只是提到“阐述了双方的立场，完成了意见交换”、“决定继续进行谈判”之类的外交措词。而且大平外相此次未见到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明显受到冷遇。

到12月，勃列日涅夫又向日方表示，苏联打算在1973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开始苏日和平条约的谈判。所以大平外相对此仍抱有希望，他在1973年1月27日第71届国会上作外交演说时，还是认为“日苏两国的关系，这一年取得了扎实的进展。作为政府今后将锐意致力于其发展。特别是有关西伯利亚开发的各种计划，期待以符合两国长期利益的形式实现这些计划，并将作进一步研究。”“作为悬案的北方领土问题，很遗憾尚未解决。政府考虑解决这个问题才可缔结日苏和平条约，并继续以极大耐心进行交涉。”

1973年3月6日，日本向苏联转交了田中首相的亲笔信，该信由于未直接接触及北方领土问题，只是表示“希望解决日苏间的悬案事项”，并强调“对西伯利亚的开发不惜提供合作”。从而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兴趣。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立即回信，邀请田中访苏。

田中预定10月初访苏，9月先访问西欧，大平外相则于9月23日出席联合国大会。两人于9月29日在英国会合，参加了第十届日英定期协商。然后于10月3日至6日一起访问了西德，参加了日德定期协商。西德外长谢尔是一名对苏外交老手，他告诉大平对苏谈判的一个诀窍：“在苏联，谈判桌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通常是在演出休息时或即将回国前夕，苏联方面才会有所表示。请你注意，坚持到最后也不松口。”

10月7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抵达莫斯科。8日至10日，日苏两国首脑共举行了四次会谈。日苏双方对这次首脑会谈抱有不同目的，日方主要想解决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问题，在此问题获得解决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解决缔结日苏和约以及日苏经济合作问题。苏联方面则打算尽量回避领土问题，重点解决日苏经济合作。特别是日本对开发西伯利亚提供资助的问题。双方由于立场和着眼点不同，谈判很快陷入僵局。

10月10日，是日本代表团预定回国的日期，田中和大平在9日夜里与日本事务当局的有关官员进行策划，决定在10日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谈时，向苏方提出如下方案：将勃列日涅夫1972年12月21日演说中的一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单数）”写进日苏联合声明，实际上意味着强调“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如果苏方不接受，则不发表联合声明即打道回国。

10日黎明，大平得到报告，苏联方面愿意在联合声明中写进战后日苏之间存在着未解决的各种问题（复数）。大平暗想，谢尔所言被验证了。他与部下商议后，答复苏方：“如果苏联方面保证在1974年内继续进行和平条约的谈判，我想是可以原则接受的。”

这样，在出发回国之前的几小时，举行了最后一次日苏首脑会谈。当勃列日涅夫希望把日本提出的方案中的未解决的问题由单数改为复数时，田中马上穷追不舍，迫使勃列日涅夫承认了这些问题也包括北方四岛问题。实际上也就促使苏联改变了以前一直坚持的领土问题已经解决的主张。这样，在10日发表的日苏联合声明中，写进了“认识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尚未解决的诸问题，缔结和平条约，将有助于确立两国间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谈判了有关和平条约内容的诸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在1974年的适当时候两国间恢复进行缔结和约的谈判。”

田中和大平认为此次出访总算使问题的解决有了进展，在回国的飞机上还不断千杯庆贺这一“划时代的成果”。1974年1月21日大平外相在72届国会上的外交演说中，充满希望地谈到了这次访苏的成果：“去年10月田中总理访苏之际，全力以赴地就最大的悬案北方领土问题进行了交涉。其结果，确认了应该解决这个战后未解决之问题，缔结和平条约，为解决本问题开了个头。在本年度再次开始的和平条约谈判中，政府将根据总理访苏的成果，在各位国民支持下，为解决本问题作出进一步努力。”但大平万万没料到，此后，苏联的态度又有了变化，重新主张“领土问题已经解决”，使北方领土问题一直拖了下来，大平外相的两次访苏也就成了劳而无功的奔波。

### 在石油危机冲击下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为了促使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把石油作为战略武器加以运用。10月17日，在科

威特召开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会议宣布了一项令发达国家感到震惊的决定：提高原油价格，削减石油生产，并限制对友好国以外的国家供应石油。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它给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深刻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廉价的石油。而由于这项“限制”，使石油供应短缺，价格暴涨，同时带动了其它物价的轮番上涨，使各国经济陷入混乱之中。

大平正芳早在这一年出席7月9日开始在外务省召开的中近东使节会议时，就指示会议围绕两个重要题目进行讨论，一是中东是否可能再度爆发战争，二是是否会出现石油危机。当时经讨论，驻外使节和外务省官员都认为：“只要日本在阿以争端中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态度，就不大可能被列为石油禁运国的对象。”这次会议虽未得出正确结论，但由此可以看出大平作为外务大臣，已对世界敏感地区发展的趋势有所预见。

中东战争与民族纠纷本来与遥远的日本无关。但是，由此引发的石油冲击，给99.7%的石油都依赖进口的日本带来巨大影响。大平正芳在《我的履历书》中曾回忆道：“昭和四十八年（1973年）十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所谓的石油冲击发生了，整个世界经济就像打翻了玩具箱似地陷于一片混乱。我国是几乎不出产石油的国家，而且是石油在所需的能源中占极大比例的国家。日本在战后二十多年来，以每桶2美元左右的稳定价格，可以毫不发愁地随便买进石油，而且经济上创造了飞跃发展的记录。现在石油不仅一下子涨了3倍，而且事实上今后能否保证供应也都无法知道，使我国陷入了极为不安的境地。”

这种“不安”不仅表现在经济秩序的混乱上，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似乎也快达到极限。日本居民到处抢购生活必需品，连砂糖、调味品、合成洗涤剂、食盐、卫生纸、洗衣粉也成了抢手货。政府当局为了稳定社会而发表谈话，但只要报纸上一刊登官员说不必担心某种物资会出现短缺的谈话，人们就怀疑这种物资会出问题而纷纷抢购之。抢购风从关西蔓延到首都。日本社会的物价直线上升，人心惶惶。这种心理状态影响到了舆论。据大平正芳回忆：“政府和民间都感到束手无策。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本身产生了裂缝，发生了动摇，所以左右摇摆也是在所难免的。于是对我这个外务大臣，政府内外都开始提出强烈要求，要把对中近东的外交方针改变为偏重于阿拉伯国家。而且从各方面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从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外的渠道来寻找确保石油供应的方法。”

在这种官方和民间众口一词的舆论压力下，大平外相在开始一段时期仍保持着 he 历来的稳健、慎重的态度，不主张轻易改变日本的中近东政策。他认为：“既然是产油国，不出售石油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像日本这样需要大量稳定进口石油的国家，对它们来说当然也是重要的主顾。”因此，大平主张不必那么惊慌失措，自己暗暗决定对这些舆论提出的要求始终冷静对待。

但是，石油冲击引起的恐慌仍在日本蔓延，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中近东政策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涨。大平虽然并不赞成改变日本的中近东政策，但他认为政府如果非改变不可，事先也必须与美国协调一致，若不能一致，至少要取得美国的谅解。

11月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出访中近东各国后，返回途中来到日本。大平向基辛格说明了日本政府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征求他的意见。基辛格反对日本改变政策，他对大平说：“你们轻率地接近阿拉伯国家，有可

能反而遭到他们的轻蔑。日本要做的事情，还不如站在消费国的立场上，对能源的技术开发与储存进行协助。”

但是，日本政府修改中东政策的决心日益坚定，大平外相在政府中也越来越陷于孤立状态。大平也只好服从大局，为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变作出安排。他向驻美国大使安川壮发出训令，要他顽强地去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美国国务院虽然反对日本政府改变政策，但经安川大使的耐心工作，最后还是为此事发表了一项声明：“虽然不能赞成日本政府修改中东政策，但对日本政府的这种不得不修改的立场表示理解。”这样，11月22日，以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的形式，宣布了日本政府修改后的中东政策，认为以色列应从1967年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上全部撤退，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表明了对阿拉伯一方友好的立场。但这种声明实际上是为了石油而作出的一种权宜之计的姿态，日本政府根本没作好准备，如何来与阿拉伯国家“友好”。所以当阿拉伯各国大使到外务省拜见大平外相，并逼问大平“在以色列与阿拉伯诸国的交战状态中，日本将会为我们阿拉伯做些什么呢？希望听听您的意见”时，大平竟不知所措，有十几分钟对此未作明确回答。因为改变中东政策并非大平本意，所以一向谨言慎行的大平遇到这种情况也很难随机应变地作出回答了。然而，作为对这一声明作出的最初反应，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决定把日本和菲律宾排除在限制供应石油的不友好国家之外，不再对这两国实行再削减5%供应石油的计划。在田中和大平安排下，三木武夫副总理于12月10日作为政府特使出访中东八国，以打开局面，到12月12日，通产省报告，国内库存石油还可维持全日本需要约57天，日本的能源已到相当危急的程度。1973年12月21日至22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中东和平国际会议。24至25日，在科威特召开了阿拉伯国家石油部长会议，决定从1974年1月开始，取消每月再削减5%的计划，反而增加产量10%，同时，承认日本等国是阿拉伯的友好国家，把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削减率从25%下降为15%。这样，日本的能源供应紧张的状况得到缓解。当然，从此以后日本购买的石油是按大大提高了的价格购进，引起了日本严重的通货膨胀。

作为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对这场石油危机有着更进一步的深恩。他在12月12日的“五月会”上作了题为《石油危机和日本外交》的讲演，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想法。

大平认为，石油危机既是政治问题，但更主要仍是经济问题，而且毫无异议是个长期的问题。由于中东战争，“石油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即使中东战争结束，这个问题也将继续存在。他进一步指出，“石油危机是个更广泛的问题”，一方面是石油减产，另一方面是石油价格暴涨；这种危机破坏了石油流通秩序。而日本获得石油必须通过有秩序的流通环节。所以“流通秩序现在混乱了，造成了非常大的危机局面”。

大平认为，“这个危机影响度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因为日本资源贫乏，必须与别国合作方能生存。而石油危机使世界各国目前自顾不暇，无法从事国际性合作。而日本比其它工业国家的石油储备少得多，现在是全力以赴才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营。特别是重工业、化学工业等产业受的影响尤甚。

怎样对付可能成为长期问题的石油危机呢？大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前日本是将手中的资源进行了最佳利用，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高度发展，提高了输出能力。但以前的成绩全靠充分保证了必需的资源，在此基础

上，日本的产业才出现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发展。但以前很有利的条件现在变成最不利的了，因此必须尽快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对于中东的民族纷争，大平外相极力主张奉行不介入的方针。因为日本作为不了解情况的第三国，根本无法预见事态发展的结果。何况历史问题不存在最终解决，只有无限延续下去的暂时解决。

在讲演的最后，大平外相提出了他标新立异的想法：这场危机对日本是很大的拯救。他认为这场石油危机促使日本人深思：“我们得以保持的产业结构是什么？能够容纳多高的生活水平？生活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财政能负担到什么程度？”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场危机不仅作为经济问题，也不仅作为财政问题，更是作为教育和文化问题，作为日本重新考虑、重新做起的转机。”大平说，他到各地讲演时，发现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不少人认为这场危机对于日本来说是很大的幸运。因此，大平认为，这场危机对日本是很大的拯救。

1973年的石油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社会经济混乱，使政府官员们穷于应付，疲劳不堪。大平正芳在大藏省工作时的朋友爱知揆一大藏大臣因疲劳过度而患急性肺炎，于11月23日骤然去世。田中内阁匆忙改组，由福田赳夫任大藏大臣，大平正芳留任外务大臣。这时的大平也感到十分疲劳，既患有肾结石，又染上了重感冒，医生嘱咐他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身负重任的大平外相此时还不能休养，一个艰巨的任务正等待他去完成。

## 日中航空协定的风波

1974年元旦刚过，身体欠佳的大平外相便带着医师按预定计划启程访华。1月2日，大平的飞机抵达香港。大平取道香港，是想表示日中之间的定期直达航线尚未开通，而这正是他此次访华要谈判的主要内容之一。抵达香港后大平于下午5时半在文华酒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了他访华的目的：

一、访华目的在于签署日中贸易协定，并利用这一机会就日中间的各种悬案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关于航空协定，如果也能通过会谈加深理解，那就万幸了。

二、希望航空协定与其他问题一样得到解决。

三、日台航线今后想维持下去，但必须按照新的日中关系的做法去进行。

四、希望能履行包括成套设备在内的对中国出口合同。

这次访华大平感到最棘手的就是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问题，因为它又涉及到日本与台湾的航线问题。大平很想在维持日台航线的状况下开辟日中定期直达航线，为此他决心在谈判中尽力争取，但又担心中国方面不同意，所以他在香港对时事社记者谈到关于航空协定的心情时，引用了《佐渡小调》中的一句：“我的心情啊，有如干草燃烧，而对方却是湿木不燃……”但他又接着补充道：“湿木也会熔于烈火的。”表示对航空协定的谈判充满希望。而且他还对记者说，在航空协定问题上，他与田中首相磋商过，二人之间没有意见分歧，“我将以自己的责任下决心”。

大平这次到北京的会谈对手仍是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1月4日上午，大平外相与姬外长会谈，下午又与周总理会谈。与周总理的会谈进行了

约3个小时。双方以最近发生的中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田中首相对欧洲，苏联、东南亚的访问等为中心，就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当然，也谈到了日中航空协定这一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内容没有透露。但会谈后大平外相对记者说，这是十分坦率而又重要的意见交换，在加深相互理解上是有意义的。周总理对日中邦交正常化一年多以来的时间里日中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满意。周总理还说：“十年前我说过‘同意外国元首直飞北京’，这句话永远不取消。我们的确已同意田中首相和你直飞北京了。”

1月4日晚，大平外相出席姬外长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发表了讲话。当他讲到希望早日签订日中航空协定时，中方几乎无人鼓掌。事后当记者问及航空协定一事时，大平外相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这些迹象都表明，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遇到了障碍。那么双方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原有的日台航线问题。中国方面强调应坚持两国联合声明中“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原则，要求台湾飞机不能使用过去的标记，日台航线可以改为地方航线，但不应承认台湾飞机的以远权。日本方面答应日航飞机不飞日台航线，只允许台湾飞机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成田机场建成后，中国民航飞机降落成田机场，在建成之前降落羽田机场，并与台湾飞机在羽田机场起降的时间错开。但未答应台湾飞机取消过去标记和不承认台湾飞机的以远权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是“中华航空”这一名称的使用，中国方面再三要求日本方面采取措施，不让台湾飞机使用这一名称在日本降落。大平正芳没有答应这一要求，认为这不属日本的责任。

双方的谈判难以有所进展。大平回到宾馆对自己的秘书官真锅贤二说：“谈判未像预期那样取得进展。但是，我不准备再作什么让步。”

1月5日上午8点半，应中国方面的突然安排，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大平正芳外务大臣，这一消息在随行的日本记者团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毛泽东让外国部长单独进入自己的宅邸，这才是第三次。毛泽东说：“日中关系在顺利进展，很好。希望今后也要靠理解和信任去建立友好关系。”当谈到两国航空协定的谈判时，毛泽东问大平外相：“为什么你没有乘直航飞机来呢？”大平答道：“还未签订航空协定，哪能乘直航来呢？”毛泽东说：“不必那样介意嘛！”接着他又同1972年那样问道：“你们吵完了吧？是不是为航空协定争吵了？”

谁知这一问，引起了大平外相与在场的周总理之间的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大平对毛主席说：“无论怎么解释，周总理都不予理解，我很为难。”坐在毛泽东身旁的周总理说：“比起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是件小事。”大平反驳道：“周总理总是这样讲，但既然是小事，不那么拘泥不是更好吗？”毛泽东见状对周总理说：“稍微让一点可以不可以呢？”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从书房里的藏书里取出唐代高僧、著名草书家怀素的《自叙帖真迹》影印本，赠送给大平外相。《自叙帖真迹》是怀素亲笔写成，记载了他写字的历史。

紧接着的1月5日上午，大平外相与姬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两小时的会谈涉及到了航空、渔业、海运等实务协定问题。但会谈后未宣布具体内容，显然是谈判遇到了障碍。

当天晚上10点半到次日黎明，大平外相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总理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在航空协定问题上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回到宾馆后，疲病交加

的大平外相对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说：“明天收拾行装回国吧。”

1月6日上午，太平外相向姬外长表示，如果谈判维持现状，就准备回国了。姬外长当即劝阻道：“请你再等30分钟。”过了一会儿，中国方面拿出了方案，照大平的说法，“与日本方案竟不谋而合。”中国允许台湾飞机使用过去的标记和“中华航空”的名称，同意准许台湾飞机自东京的以远权，但日本政府要发表关于台湾飞机的标记和名称的见解。显然，中国方面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研究了航空协定问题。并再次作出了让步，使这一障碍得以突破。大平事后认为，在毛泽东主席接见时，中国方面已准备打开僵局，大平的坚持最终获得了成功。

从5日晚到6日上午，太平外相实际上一点没睡，因此尽管谈判最终成功，他却显得毫无精神，疲劳到极点，刚上飞机就躺倒在过道上。原来他这次出发感冒就一直在恶化，他是带着极大的责任感抱病坚持谈判的。

1月6日晚大平返东京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通过会谈，双方共同确认，正确地加强日中关系，不仅有利于日中两国，而且对亚洲和世界都是不可缺少的……双方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扎扎实实地谋求前进。双方还一致同意，不仅要缔结各项协定，而且要积极地发展文化交流及其他方面的交流。”当记者问到航空协定一事时，太平外相只能含蓄地答道：“这次我访问中国不是以航空协定的谈判为目的……事实上，我同中国首脑就这个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但并不是说，已经就每个具体的项目达成了协议。”

1月8日，太平外相在内阁会议上作访华报告。他谈到这次访华签署了日中贸易协定，但航空、渔业、海运等问题未解决。关于和平友好条约，相互交换了基本的想法，将通过外交途径去深入研究。

太平外相的这些讲话，都未透露出航空协定一事已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看来他仍保持了稳健的老作风，待事情落实后才向外界宣布。

回国不久，太平又忙于到各选区声援参议院的补缺选举。这时他家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1月12日，他在东京濑田的住宅因失火而被烧毁，这似乎预示着今年他将遇到许多困难。当别人在这天夜里到他在板出市的旅馆里去安慰他时，只见他独自一人坐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发呆，显然心绪十分不佳。尽管如此，在公开场合记者询问此事时，大平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沉着地回答说：“据说中国称火灾为祝融，也就是重打锣鼓另开张之意。”他的一些朋友也认为“火烧旺运，这是替大平祓除晦气。”

但是，在日中航空协定问题上，太平外相却遇到了不少的风波。在大平回国之后，政府便决定了有关日台航空问题的方针，这一方针就是中国方面同意的那些具体原则。当2月1日在自民党总务会上提出这些非常照顾台湾利益的条款时，大平原以为自民党内的亲台派议员不会再有什么异议了。谁知在2月1日总务会上，自民党亲台派的中坚分子、青岚会的众议员滨田幸一等人带头反对，认为日中之间的谈判协议有损“台湾的尊严和权益”，并开始就此事猛烈攻击大平外务大臣，声称若大平不改变这些方针，他们将提出对大平外务大臣的不信任案。

大平正芳接连几天出席自民党交通部会、外交部联席会和总务会，说明日中谈判过程，请求党内谅解。大平派的议员佐佐木义武、伊东正义等人则准备将协定交给党的各个部门和下级组织逐个地求得赞同，同时争取了一些少壮派议员来做这项工作。当时在亲台派议员的猛烈攻击下，一些亲华派议员也有所动摇，但太平外相仍顽强坚持“即使粉身碎骨也要签订日中航空协

定”的立场。他的这种表现引起了自民党老前辈藤山爱一郎的高度评价：“大平很好地克服了党内外的严重困难。如果稍许说错一句话，也会出现骚乱，使日中航空协定付诸东流”

在争论尚未最后结束时，2月6日，大平前往华盛顿出席13个石油消费国会议。2月9日上午，椎名悦三郎副总裁、桥本登美三郎干事长等党的领导人就航空协定问题拟定了党的决议案，下午交总务会临时会议讨论，结果获得通过，反对者仅三人。桥本干事长就这一决议案的基本内容作了口头说明：

- 一、以日中联合声明为基础，缔结日中航空协定；
- 二、同时，用缔结民间协定来维持日台航线；
- 三、使这两项课题并行不悖地完成。

3月17日上午，田中首相在鸟取市内某饭店会见记者时说，政府希望尽快与中国签订民航协定，以便在将于4月29日结束的本届国会上获得批准。

政府的态度已非常明确了，但亲台派议员仍不甘心就此罢休。4月11日，当日中航空协定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青岚会的众议员藤尾正行在报纸上发表了外务省的公务电报，暴露了大平外相与中国政府之间有关日中航空协定的内容，企图以泄露国家机密的手段来攻击大平外相。历来稳重的大平正芳也被激怒了，对这种卑劣行径感到气忿。

4月16日，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与姬鹏飞外长在北京会谈，17日达成日中航空协定。也就在同一天，日中航空协定交付内阁会议讨论。在会上，由党内各派组成的内阁成员们向大平外务大臣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问，有些人甚至有意责难大平。大平外相为了日中航空协定已付出巨大努力，不仅在外交上要进行克服种种障碍的艰苦谈判，还要竭力应付党内国内的各种指责和攻击。加之2月访美时又出现天皇访美的“外交误会事件”和4月发生的“公务电报泄密事件”，搞得这位年过六旬的外务大臣心力交瘁。太平从这段时间起，人仿佛苍老了不少，他从脖子到下巴上的那条曲线似乎突然间松弛了，回答质问时嘴里絮絮叨叨，好像底气不足，有些穷于应付的样子。他深感外务大臣一职真是太艰辛了。很想立即辞去这一职务。当他把这一想法后来对田中首相表白时、田中大吼一声：“少说漂亮话！”不允许他打退堂鼓。大平便收回了辞职的想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大平正芳性格上懦弱的一面。

4月18日下午，自民党首脑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讨论日中航空协定问题。会议同意在北京谈判的结果。同意履行缔结日中航空协定的手续。

日中航空协定谈判最后达成的协议主要包括以下具体事项：

- 一、日中航线，以邦交正常化两周年为目标开设；
- 二、日台航线将通过日本和台湾的民间协议来维持。但是，日本应以大平外相谈话的形式表明如下认识，即“台湾飞机上的青天白日旗是‘中华航空’的标志”；
- 三、日本国内“中华航空”营业所的业务，在日中航线开设之前，一定要委托给代理店；
- 四、日中航线开通后，停止“日航”飞机飞行日台航线，由另一家民间公司代替“日航”；
- 五、在成田机场建成使用前，中国大陆与台湾飞机共同使用羽田机场，但日本政府就航班和时间问题，以中国民航为主体进行调整。

4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在北京共同签署了日中航空协定。台湾当局随即停止了日台航线。

当天下午7时，大平正芳在外务省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平先发表谈话，认为日台航线停止对双方说来都是不幸之事，很遗憾。但他又表示：“日台航线总有一天要恢复，而且我相信能够恢复。”当记者问到大平对签订日中航空协定的心情时，大平说：“今天，在围绕着日本的亚洲这一地区的国际环境下做些事情，任何问题都是不容易的。这次航空协定的谈判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问题，都很不容易，有关的方面都不满意。我们不能不认为，之所以只能在各方都不满意的情况下达成协议，是由于难以回避的历史现实所造成的……我不能说，我现在的心情像卸下了一个包袱那样，感到轻松舒畅，我今后还要不断努力。”

对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美国方面一直加以关注。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这次航空协定谈判，对大平外相是一块试金石，据此认为大平正芳是非常可能接替田中首相任自民党总裁的人。

日中航空协定最后于5月7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5月15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日台航线经过后来的交涉，于第二年7月9日重新开通。

### 协调与近邻的关系

日本外交除了美国之外，亚洲太平洋是最重要的地区。这一地区的重点当然是日本的两个近邻——中国与韩国。大平正芳自1972年重新担任外务大臣后，特别注意协调与这两个近邻的关系，但其效果却不大一样。

大平认为，中国问题对于日本外交来说，常常是出发点，也是终点。而且它在日本外交上与其说带来光荣，不如说留下了许多污点。特别是这百年，是日本外交在这一问题上反复失策的历史。中国问题在日本国内的舆论中形成尖锐对立，很难统一，因此，它不仅是外交问题，而且也与日本国内问题有联系。对于历届日本政府，中国问题如同一个“鬼门关”，稍一处理不慎便免不了出问题。若完全不管，则又避免不了内外压力，必须非常慎重。所以，大平外相在日中航空协定获得参议院通过后，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日中关系是我国外交的拱心石，如果把它搞错了，可不得了。”“政府希望日中间加强牢固的理解和信赖，建立互惠关系。”

大平在这里并非泛泛而论地玩外交辞令，而是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通过日中复交的谈判和以后的日中航空协定谈判等一系列与中国的外交往来，大平深深感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友好，体验到了中国领导人在对待日中关系上的宽阔胸襟。因此，大平不仅在各种场合宣传与中国应保持睦邻友好关系，而且在行动上付诸实施。在他当外相的两年间，日本驻华大使馆的规模扩大到了49人，仅次于驻美国大使馆。据认为，这是外务省重视中国的未来的一项措施。由于日本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大平外相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还产生了不小的国际影响。大平带头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活动，导致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以后，当大平担任了总理大臣，仍一如既往地奉行与中国友好的政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另一方面，大平对积极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中国领导人颇为敬佩，他在《我的履历书》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了他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

来的看法。

大平谈到，通过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感到毛主席“是一位高瞻远瞩、气魄浩大的伟人……他的谈话非常坦率，而且很幽默。我感到通过这些谈话，可以看到毛主席对于历史和民族所寄予的坚定不移的信任与感情。”

“至于周恩来总理，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极有才能的外交家，也是一位超人的行政家……周总理确实是一位对工作不知疲倦、精力充沛的人……我觉得他掌握的历史事实和有关最新情报的知识都非常准确，而且整理和消化得很好。

“周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一样，对中国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和自豪感，但同时对中国所具有的落后之处也有正确的了解……他对大国不惧，对小国不侮。

“周总理还以平民的姿态来待人接物，有时他也光临我们的住处，他总是笑容满面地和司机、警卫、厨师、女勤杂工握手，从不忘记和他们打招呼，而且能把人的名字记得很清楚。我们为了记住人的名字，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深深感到，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件最要紧的工作。因为谁都把自己的存在看成与地球同样重要，谁都希望别人承认自己的存在。而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位善于理解这种心理，并把它付诸实践的人。

“另外，在吃饭桌上，周总理也从不忘记细心地关照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也是表现了他那天生的外交家素质，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对方人格的承认、尊重和关怀。

“可是作为谈判对手的周总理，却是一位顽强的、难以对付的人……如今回忆起来，周总理在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时，看来他已患了不治之症。但他还是不分昼夜地把剩余的精力全部倾注于工作，献给了他的祖国。他曾经说过：‘中国虽然穷，但还可以请你们吃这样的饭’，‘中国应该向贵国学习许多东西’。这些谦虚的话使我很难忘记。然而，这位周总理却以中国所具有的那种难以侵犯的权威与坚忍不拔的独立自主精神，来对待美苏两个大国及世界列强，博得了全世界高度的赞扬和尊敬。”

大平认为，“没有这两位伟大的领导人的卓见与决断，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肯定不可能以那种方式，在那个时期完成的。”

大平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大概受到其精神的影响，在他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也为加强日中关系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日本与另一个近邻韩国的关系，在大平担任外务大臣期间，却呈现了不大融洽的状态。

在1965年12月18日，佐藤内阁时，日本与韩国恢复了邦交，并达成了渔业、经济合作、旅日韩侨法律地位、文物等协定。1967年又设置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日韩定期阁僚会议，日韩两国的经济、政治关系日益密切。

但进入70年代后，一些突发事件使日韩两国关系紧张起来。这时韩国朴正熙政权实行反民主的独裁统治，招致了其他政治势力的反对。原总统候选人金大中为首的反政府势力逐渐加强。朴政权面对这种情况，不是采取给民众以民主自由来获取民众支持的办法，而是实行镇压反政府势力的方针，以图维持自己的统治。这种作法招致美国议会和学者团体中许多人的不满，他们呼吁美国政府重新研究对韩政策，不少人把金大中看成是可以取代朴正熙的政治家，金大中也加深了对美国和日本的交往，这更引起了朴政权的嫉恨。

1973年8月8日下午1时；访问日本的金大中在东京皇宫大饭店2212室会见韩国统一民主党领袖梁一东、金敬仁。一时半左右，金大中走出房间时，被几名男子绑架了。这一天是大平外相陪同田中首相访美归国后的第三天，大平正在轻井泽休养，接到报告时，外相立即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事件，它既侵犯了日本主权，又涉及日韩两国的关系问题。

日本外务省当即询问了韩国驻日大使馆，得到的回答是，韩国政府与此事无关，希望保证金大中的人身安全。8月13日，金大中又被蒙着眼睛出现在汉城的私宅中。金大中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与梁一东、金敬仁两人吃过饭后，在走廊里被六七个人包围了，并且被注射了麻醉药。然后被拉上电梯，又被用小轿车运到似乎是大阪的地方。此后，他们用一艘很大的船把我带回了韩国”。

这件事成了记者们争相报道的内容，他们在采访大平外相时，纷纷提出询问，要求外相回答这一事件是否会发展为日韩之间的外交问题。这一事件使大平外相感到很不愉快，他说“好像有一种别人闯进自己家中的感觉。”但出言谨慎的大平回答记者提问时只是说：“在未查明事实真相时不可随便表态，首要的是查清事实真相。”

为此，大平与警方积极磋商，如何在尽量避免涉及到政治和外交的前提下获取证据，查实情况，如何对外公布调查结果等等，真是伤透了脑筋。大平外相为此事又添了许多白发。

韩国方面坚持此事与政府无关，但韩国总理金钟泌会见日本驻韩国大使后官虎郎时又表示“韩国人与此事有关是确实的，”他还公开表示将给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写亲笔信表示歉意。

9月初，日本警视厅特别搜查总部查明，在绑架金大中的现场有韩国驻日大使馆一等秘书金东云的指纹。这样，韩国政府介入了绑架金大中的事件这一点已经明确，这一事件已成为日韩两国的外交问题。日本警方通过外务省向韩国提出要金东云自愿出庭的要求，但此时金东云已不在日本。外务省也提出让金大中再次访日。韩国方面拒绝了这些要求。

这件事又给自民党内大平的政敌以攻击他的绝好机会，大平手下宏池会的年轻人也为大平担心。大平深知由于过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朝鲜人对日本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因此，现在此事要获得公正解决是很难的。但大平还是对新闻界公开表示：“因为双方都是对等的独立国家，从长远的友好关系出发，我们还要努力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此案正在通过后宫大使敦促韩国方面重新考虑日本方面的意见。”

经过反复的外交努力，直到当年11月，此事件才算获得基本解决。被软禁的金大中重新恢复自由。11月1日，韩国外长金溶植会见记者时承认金东云秘书有“涉及个人”的嫌疑，并说已解除了金东云的职务。第二天，韩国总理金钟泌访问日本，与田中总理和大平外务大臣举行了会谈，并转交了朴正熙总统的亲笔信，同时，就这一事件给日本带来的麻烦向日本政府和国民表示歉意，并保证采取措施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双方确认，金大中事件以此宣告政治解决。

大平事后表示，“虽然不能说已经解决得十分彻底，但这也是我们作出了最大努力的结果，希望国民给予谅解。”这样，党内对大平的指责之声才渐渐平息。到12月3日韩国改组内阁时，韩国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外交部长金溶植和驻日大使李潞均被撤换。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以后，日韩关系中又发生了不幸事件。1974年4月5日，在汉城的日本留学生早川嘉春和太刀川正树被韩国治安当局抓走，理由是他们企图同韩国国内反政府运动的地下组织“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领导人进行接触，有“违反总统紧急措施第四号之嫌疑”。

这件事因韩国政府未在逮捕前向日本方面充分说明侦查两名日本学生的经过情况，突然宣布逮捕一事，使外务省措手不及，受到很大冲击。

韩国方面于4月25日公布事件概况。韩国中央情报部长申植秀说：拘留中的日本大学生作为‘朝鲜总联’的间谍从事活动，并向‘民青学联’的领导人提供经费和物资，帮助其开展活动。”同一天，大平正芳会见记者时表示：“事前没有得到韩国方面就事件经过和有关事实所作的充分说明，这是令人遗憾的。”第二天，大平即指令驻韩大使后宫虎郎要求韩国政府作出“公正、人道而迅速的解决”。

但是，韩国没有理会日本的要求，于5月27日对两名日本学生起诉，6月15日交特别军事法庭尸庭审讯，7月15日依法判处20年徒刑。这一天也是大平担任外相的最后一天。但他在接见记者时仍就此事发表了谈话：“希望韩国方面从日韩友好的观点出发予以适当照顾”。

结果，此事于第二年以两名日本学生被释放而获得解决。

### 同美国的交往和“外交误会事件”

大平外务大臣一向认为日本外交的基轴是日美协调，“不仅在政治、经济、防务和贸易方面是这样，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是如此。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可以说是少有的，而且对世界拥有如此巨大影响也是罕有先例的”。

尽管如此，70年代日美关系这部乐曲中也往往会跳出几个不和谐的音符。如尼克松访华，就事先未同日本磋商；后来美国又单方面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对日本经济带来冲击。大平担任外相后，面临石油危机的冲击，为了日本利益而准备转变对中东政策时，又受到美国反对。特别是1974年2月，大平在华盛顿出席石油消费国会议期间，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外交误会事件”，差点弄得这位外务大臣下不了台。

1974年2月13日，大平正芳借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石油消费国会议之便，由日本驻美大使安川壮陪同，拜访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了约一个小时，双方就基辛格构思的新大西洋宪章交换了意见，基辛格就中东恢复和平的经过和今后的展望作了说明，大平也说明了一个月前的访华情况。

同时，双方还就尼克松总统访日和天皇访美问题进行了磋商。这是前一年8月田中和大平访美时，记载入《日美联合声明》中的协议。当时是这样记载的：

“总统再次确认以前向天皇、皇后两陛下发出的访美邀请，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日美双方都认为合适的时间访美。

总理大臣对上述邀请表示深切谢意，同时转达了日本政府对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访日的邀请……总统访日虽途经外国，但希望在1974年年底以前，在日美双方认为合适的时候进行。”

显然，联合声明仅就美国总统访日时间作了大致表述，但并未说明天皇访美的时间。大平与基辛格会谈结束后会见了日本各家报社驻华盛顿的特派

记者,记者们对相互访问一事进行了详细询问,会见经过登载于2月15日《读卖新闻》上:

大平外务大臣说:“关于天皇访美和尼克松访日的问题,互相确认两国的一贯立场没有任何变更。决定总统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内访日,关于天皇则已决定在今年年内访美。这一事实今天再予确认。”

当记者问到《日美联合声明》中没有说明天皇访美是在今年内,是不是今天的会谈确认了“今年年内”进行时,安川大使说:“不错,《日美联合声明》中关于天皇访美时间也写着在1974年实现。”但记者指出《联合声明》中并未明确时间,安川大使则坚持说:“的确是写着的,我可以打赌。”这时坐在旁边的驻美公使小杉照夫提醒道:“大使,还是不要打赌为好。在联合声明中没有写明天皇访美时间是‘今年年内’”。

记者又追问:“今天的会谈中,关于天皇访美的时间确实是使用了‘今年年内’这个表达方式吗?”大平外相说:“是的。”

特派记者们返回办事处后,将“日美两国外相确认天皇年内访美”作为一件重大新闻发回自己的报社。但过了一会,安川大使又接见记者,要求他们停止报道这一消息,并且更正道:“我先前的发言是误会了,我对天发誓,在今天的会谈中,关于天皇访美的问题没有确定在今年年内。”

安川大使一会儿对记者说“可以打赌”是今年年内,一会儿又“对天发誓”予以否认,这在外交场合是极不慎重的作法。因此,这件事立即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当然也就成为自民党中反大平派攻击政府进行《日中航空协定》谈判的绝好材料,青岚会的藤尾正行等人自然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宣称“外相和驻美大使犯了很大的错误”。党内指责外务省的气氛浓厚起来,某位福田派的干部甚至忍不住拍手称快他说道:“这样一来,恐怕大平也就无法参加竞选了吧”。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也将外务省事务次官法眼晋作叫去训斥了一顿,说“最近的外务省不像样子……外务省工作松懈之极。”

正在国内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大平外相于15日晚回国,他在羽田东急饭店接见记者时又被问到这件事的真相。大平尽管感到此事有失体面,但还是以政治家的气度对此作了解释并承担了责任:

“天皇访美在什么时候,我回答在今年年内。可是还不放心地查阅了《日美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写的是‘尽可能在双方没有困难的时候’,没有提到今年年内。因此,立刻要求改正。对于这种因弄错情况而造成的麻烦,表示歉意。……安川表示惭愧,但是,我自己不也是那样的吗?不是安川君一人的问题。”

第二天,大平外相向田中首相说明了这一“外交误会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再次表示道歉。田中首相说:“这是很重要的外交案件,你的问题不用担心。”这一“外交误会事件”最后以安川大使被首相训戒处分,外务省事务次官法眼晋作辞职而宣告解决。

尽管出现了这些不和谐的事件,但大平认为日美间的友好关系仍是不可动摇的,“美国现在仍然是对世界具有最大的影响和负有最大责任的大国。而且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友好国家和亲密伙伴。”大平在两次担任外务大臣期间,从事对美调整关系的工作,与迪因·腊斯克、威廉·罗杰斯和亨利·基辛格三代美国国务卿打过交道。虽然并非在每个问题上都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双方通过多次接触和共事,相互加深了谅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美国政治家也对大平外务大臣的努力工作表示了赞赏。

1974年2月，在有欧美和日本等13个主要石油消费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法国外长诺贝尔发生了激烈争论。美国因为本身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主张消费石油的西方国家应加强团结，对产油国的限制出口采取强硬态度。但其他石油资源贫乏的工业发达国家纷纷表示反对，法国外长诺贝尔就强调应同产油国加强对话。大平外务大臣在二者之间调停，并提出了译成英文的日本方案在会上宣读，引起了各国的注意。结果，欧洲共同体都赞成日本方案。基辛格参考了大平的想法，也对美国方案作了修改。他极力称赞大平外务大臣的努力：“各国都在一些距离问题的核心还相当远的细节上，为顾全本国的面子而在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但大平却与平时一样，不急于发言，只是热心听取别人的发言，直到会议快结束的最后一天才发表意见。而且由于他的发言，打开了会议的僵持局面。会议从而决定设立国际能源组织。国际能源组织作为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能源问题的常设合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平为能与几位美国国务卿一起共事并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和保持长期友谊而感到骄傲。大平与他们不仅对日美双边问题，而且还就中国问题、越南问题、能源问题、世界经济问题等进行过频繁的协商与合作，在任何场合都保持着相互谅解。所以大平说：“我高兴的是，在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从未出现过丝毫的懊悔情绪或不信任的阴影。我对自己能为日本与美国做到这一点而感到满意。”

大平第二次担任外务大臣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震撼战后体制基础的事件”，如中美关系解冻、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石油危机的冲击……作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发达国家的外长，大平每天都忙忙碌碌，四处奔波，“整天在各国首都的机场、饭店和会场之间来回奔驰”，难得有闲暇之时。但1974年5月，却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美国方面出于对大平外务大臣为日美关系友好作出贡献的感谢，邀请大平短期访美，一是在纽约的日美协会年会上作讲演，二是接受那鲁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次并非去解决任何日美间的紧迫问题，所以对大平来说，是一次难得的轻松的旅行。

与大平同行的有志华子夫人，大平的女婿、外务省秘书官森田、外务省原美洲局长大河、秘书官藤井等人。在纽约发表讲演后，5月19日，大平一行乘汽车穿过纽约市的金融、商业中心曼哈顿岛，沿赫德森河北上，前往纽约东北部的纽黑文。从车窗里望出去，在晴朗的天空下，眼前是一片碧绿万顷的大地，沿途都可看到怒放的茱萸花，在寂静的森林与湖泊之间点缀着白色的房屋，一会儿又出了一望无际的宁静的田园。在美国东部沿岸城市密集处能看到如此景色宜人的乡村风光，的确令大平夫妇叹为观止。大平后来回忆道：“过去我由于工作忙，没有余暇来观赏美国的大自然与农庄生活，这次偶尔一看美国的田园，却是如此幽静、整洁、广阔。”

抵达纽黑文已是傍晚，街上呈现出那鲁大学举行毕业盛典的节日气氛。由于世界各地来宾云集此地，饭店人满为患，大平一行只得驻郊外旅店。耶鲁大学校长及夫人举行晚宴，宴请了这一年将授予名誉学位的人士以及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一些知名人物。耶鲁大学毕业生、前美国驻日大使英格索尔知道大平外相到来，专程携夫人从芝加哥赶到纽黑文赴宴，使大平无比高兴。

宴会虽简朴，但大家在轻松的幽默中感受到了朴实的友谊，十分愉快。

19日晚，大平夫妇在纽黑文游览，观赏了大西洋沿岸的春色。

20日上午，大平出席了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举行典礼的大学广场上聚集了数千人。在校长致词、宣读毕业生名单等仪式之后，最后是授予名誉学位。学校为大平外相准备了博士长袍和带缨的四角帽。大平生平第一次穿着这样的服装，在全校学生及家长们的祝福声中，合着乐队的奏乐声，穿过长长的队列，向毕业典礼的主席台走去。校长宣读给每位获得名誉学位者的奖状，并把表明不同学位的彩带佩在他们肩上。这时从台下的教师、学生和家长们中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瞬间大平仿佛做梦一般，感到无比激动，也暂时忘却了作为外务大臣的艰辛岁月。

获得法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太平外相携夫人一起，与耶鲁大学校长布卢斯特、日本总领事泽木及夫人合影，以纪念这令人难忘的珍贵时刻。这时大平对女婿森田秘书官说：“怎么样？你是法学学士，而我却是法学博士。”

校长赠给大平的奖状上写着：“您在这个距离日益缩小、濒临险境而又须加深相互依赖关系的世界中，肩负着指导世界上一个最重要国家的外交政策的重任。您为创造基于各国间相互信任的国际协调，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您一直为因危机而带来紧张的世界谋求安宁。您在困难中所表现的沉着姿态，给日美两国的友谊增添了新的力量。耶鲁大学为能授予您法学博士学位而感到骄傲。”

奖状内容主要赞扬了大平致力于国际协调工作所作出的成绩，也表彰了他为日美友好作出的努力。在聆听校长宣读奖状时，大平沉浸在无限的感慨之中。他想，这学位与其说是赠予他个人，不如说是赠给日本和日本人的。

21日，大平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23日归国。

## 多极外交时代的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外交的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占领时期的日本当然谈不上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接受了旧金山体制以后，日本在军事上纳入了日美安全保障体系，经济上依赖美国的援助和对美贸易。因此，这一时期日本虽然独立，但在外交上仍听命于美国。大平正芳在池田内阁中第一次担任外务大臣时，开始摸索展开日本独立的外交。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美元大量流入日本，而美国在国际收支上则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赤字。肯尼迪政府为了调整日美经济关系，不得不给予日本以更为平等的地位，使日本能够逐渐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影响和制约。

进入70年代后，由于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极大地动摇了原有的战后世界体制的基础，日本的外交随着日中邦交的正常化而进入了多极外交时代。

大平正芳在田中内阁担任外务大臣后，曾在国会的外交演说，政务调查会的报告等场合中，数次阐述了这一时期日本开展多极外交所面临的任务以及日本在多极外交时代应发挥的作用。

所谓“多极外交”，即除了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外，日本将完全独立自主地同全世界各国开展平等的外交往来，这种外交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诸领域全方位地展开。

多极外交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在这一重大外交行动上，田中和大平虽与美国磋商，但并未受制于美国，整个复交的准备和谈判完全是独立自主的行为。大平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相互派遣了大使，签订了实务协定，相互加深了理解，并在贸易等领域扩大了交流。“政府已认识到，正确地巩固日中两国的关系，不仅将发展两国关系，也将有利于亚洲的和平。因此，将更加努力地促进两国实务诸问题的解决，扩展对话领域。”

开展对苏联的外交、是日本多极外交的又一重要内容。大平谈到，自从鸠山总理访苏以来，“日苏之间的互惠关系，以比我们当时预计的还要顺利的步伐而发展起来。”1973年10月，两国最高首脑又进行了接触，并就日苏和平条约的缔结问题阐述了双方的立场，进行了意见交换。目前，日苏之间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北方领土问题、渔业问题、经济合作问题等。大平强调，尤其是领土问题特别引起关心。他希望通过谈判，能早日解决这一问题，为两国和平条约的缔结扫清障碍。另外，大平也谈到日苏经济合作同样是特别令日本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只要苏联同意，日本愿意为协作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作出很大贡献。

大平外相在各种场合均一再重申，“与美国之间的亲密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外交的基轴，也应该是我国广泛推进多极外交时的基础。因此，我国和美国之间，为了进一步加深信赖和理解，除了政治和经济外，还应向其他领域拓展，不仅在政府间，也应该在学术界、经济界、舆论界之间进行广泛接触，开展不间断的对话。”大平总是强调“与美国的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是确保我国安全和繁荣不可欠缺的前提，也是维持亚洲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当然，日美之间也存在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大幅度的贸易收支不平衡。大平认为，为了日本经济的健全发展和维持和增进日美友好关系，在对外经济方面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力图使我国的经常性收支维持多极平衡，抓紧大幅度改善对美收支。”

对欧洲的外交也是日本多极外交重要的一极，大平正芳外务大臣曾在党的政务调查会的亚洲调查会上发表题为《完成首脑外交》的讲演，专门谈了与欧洲的外交问题。他认为，欧洲完全能很好地理解日本的亚洲政策，并且对日本的资本自由化达到百分之百的程度，对日本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给予了高度评价。欧洲与日本类似，也存在资源贫乏的问题，因此欧洲也非常理解日本的资源政策。1973年1月，欧洲共同体已由6国扩大到9国，已形成占世界贸易额四成的大经济圈。因此，必须认真考虑与欧共体加强交往。由于欧共体各国的国情与日本有许多类似之处，如国土狭小、资源缺少，人口密度大又经营着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明。这些类似的性质就具有类似的问题，尤其是现在令人头疼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也是共通要对付的课题。因此，日欧之间应扩大交往渠道，大力开展各项合作。比起日美关系来，日欧关系又有不同的特点。田中首相的访欧，就是为了探索新的日欧合作关系。

当然，日本多极外交的重点，仍是与日本距离很近的亚洲。除了与中国增进友好外，大平外相还分析了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外交政策。

对朝鲜半岛，大平表明“我国衷心希望朝鲜半岛实现自主、和平的统一和永久性安定。”“日本政府愿与韩国之间，在各个领域里更加努力地、坚实地发展在广泛的国民基础之上的公正关系。对于北朝鲜，今后也要根据国际形势的演变和南北对话的进展，考虑在经济、文化、人道、体育等各个领

域实行广泛交流。”

对于印度支那半岛，大平外相指出，日本已于 1973 年 9 月与越南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政府还准备为了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民生安定和战后复兴，今后应继续实行广泛合作。大平表示：“印度次大陆各国关系正向着正常化迈进，我国欢迎这种动向，愿为该地区的安定与发展尽最大努力。”

对于世界敏感的中东地区，大平外相表示衷心欢迎 1973 年 12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中东和平会议，并承诺，日本政府今后也要为中东和平的实现尽可能地发挥作用，特别愿意与中近东各国在人员和文化交流、贸易和经济技术协作的扩大等方面进一步合作。

大平外相还在他的各种讲演和报告中提到了日本与非洲、大洋洲、中南美洲及联合国应发展的友好与协作关系。他所谈到的日本的多极外交几乎遍及全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

那么，在多极外交时代，日本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起什么积极的作用呢？大平外相在他的讲演、报告中作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大平认为，日本与外部世界是相互影响的，“现在，我国的经济活动已扩大到世界性规模，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事，无论大小，都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和国民生活。反之，我国在国内外的经济活动也会多少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福利具有影响力。”“没有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就不能确保我国的安全和繁荣”。

因此，大平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坚持如下外交总方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扩充和强化国际间的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加深相互的理解和信赖。”大平指出，石油危机以后，这种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限于一个资源和能源问题，而且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保全人类环境的问题、粮食、通货、人口、海洋等诸问题上也存在。各国必须充分认识相互依存的纲目，不仅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而且要为发现共同利益，创造解决问题的框架而合作。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日本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出口大大增加，在对所有国家的贸易中几乎皆是顺差，这引起了许多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批评？大平认为，日本今后不仅要纠正贸易不平衡，而且必须在民间投资和政府援助的方式上特别下功夫。政府的开发援助要努力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0.7%，并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开发委员会等的国际要求，改善援助条件，努力废除附带条件的援助，扩大赠送，推进无条件借款。同时使援助形式多样化，扩大向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开发部门的援助。援助地区当然首先是亚洲诸国，另外对中南美、中近东、非洲各地区，也要根据各自特点推进经济援助。援助领域应重点倾向于农业、医疗、教育等提高普通民众福利的方面。

大平还强调，提供援助时，不仅要在经济领域贯彻互惠互让的精神，而且要全面地加深对受援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国情和心理的理解。作为日本政府，一是要整顿援助体制，拓宽经济合作领域。为此，政府除了新设置元任所国务大臣之外，还设立了国际合作事业团，得到民间帮助，加强经济合作事业的实施。

大平外相认为；“历来的外交，主要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领域，但现在我们必须扩展视野，使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为活跃，特别是应该促进广

泛领域里人员的交流。”作为政府，正在考虑接受留学生、研修生，派遣讲师、专家，进一步扩大学生和文化人的交流。”

这时的大平正芳，作为日臻老练的外交家，已能够从世界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全方位地设计日本外交的大政方针。

担任外务大臣不久的大平正芳，于1972年12月10日参加了他的第九次众议员竞选，结果获得89942票，以选区第一名当选。1974年5月30日，大平外相回到故乡，在高松市出席了耗资近700亿日元的香川灌溉渠通水典礼。故乡农村的缺水问题总算得以解决，大平作为香川灌溉渠推进联盟的会长，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感到由衷的欣慰。

1974年7月16日，由于政局突变，大平离开了外务大臣的职位，由外交转向了内政。

## 第七章 重归大藏省

### 严峻的考验

1974年7月7日，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议席由以前的70席跌到63席，仅比在野党的席位多7席，参议院进入了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不相上下的时代。选举结束后的7月12日早晨，副总理兼环境厅长官三木武夫批评了“金权选举”，并宣布辞去在田中内阁中的职务。其实金权选举是日本议会早已存在的事实，只不过在田中执政时更为露骨，引起了许多人的强烈不满。7月16日，福田赳夫大藏大臣也宣布退出田中内阁，同一天行政管理厅长官保利茂因劝说福田无效而辞职。田中内阁出现政权危机。也就在同一天，应田中总理要求，大平正芳由外务大臣转任大藏大臣。

大平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藏省。38年前，当大平从大学毕业，担任的第一项公职就是大藏省的官员，自从担任池田内阁官房长官离开大藏省，至今也有24年。大平现在作为大藏省最高长官又重回工作多年的部门，真是百感交集，38年前的往事仿佛历历在目。大藏省的官员们都热情欢迎这位大藏省“老人”的归来，沿用宏池会议员的作法，亲切称大平为“老头子”。

当时的大藏省所面临的财政工作形势非常严峻。日本由于是一个资源贫乏而经济又十分发达的国家，因此每年必须花大量资金到国外购买能源和各种资源，否则国内生产无法维持。但1973年10月以后，石油大幅度提价，日本为此必须付出多3倍以上的外汇去购买作为主要能源的石油，同时还得分得花大量外汇去购进各种必需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也往往因石油涨价而有不同程度的提价。因此，大平就任大臣时，大藏省的对外结算处于非常紧张的状况。1973年上半年时，日本的国际收支仍有8000万美元的黑字（顺差），但到1974年上半年，出现了57亿美元的赤字。”偿付大幅度涨价的石油及其它各种资源的结算期限毫不留情地到来，只好日夜忙于筹措这些资金。”大平大臣千方百计地接受短期资金以应付紧急局面，同时尽力确保中长期贷款。这样晕头转向地忙了近一个月，“到了8月上旬，才算找到了克服所面临的对外支付困难的线索。”

当时除了应付眼前紧急的国际结算外，大藏省还得从长远考虑，如何调整国家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日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由1973年秋的石油危机为契机，使一直存在着的资源问题表面化，与此相伴随的是国际金融形势变得不稳定，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蔓延，以此为背景而产生了国内物价飞涨，国际收支开始出现赤字。总之，可以说是面临着战后日本经济从未有过的困难局面。

大平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最应引起注意的是物价的急速上升问题，现在日本与一年前比较批发物价上涨30%，零售物价上涨20%，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首屈一指。由于政府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了抑制社会总需求的政策，到1974年初物价回落了5%。但由于春季罢工斗争，工资大幅度上升，加上能源和基础材料价格上升，势必带动物价上涨，除此而外，外币准备急增、国内金融机关贷款扩大，企业投资活跃，也刺激了国民的消费欲望，容易引起物价上涨。因此大平主张：“当金融政策运营时，伴随着现在的紧缩，应该贯彻抑制公共投资的方针，坚持现在的抑制总需求的政策。”

当然，大平并不反对今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迅速解除在石油危机

这种不正常状况下，所采取的冻结各种物资的价格以及所谓的个别物资对策”。他认为个别物资政策虽可以防止某些人乘机涨价、囤积居奇，但政府直接干涉个别物资价格的形成，以权力来冻结物价的作法，会破坏市场机制，不可长久维持之。反之，一些加重财政负担的物资还可通过调价来防止财政恶化。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平就任大藏大臣不久就处理了消费米价提高的问题。以前的米价之所以比较平稳，是因为财政上给予较多的补贴。长此以往，财政负担将不断增加，很难扭转财政走向恶化的局面。1974年7月26日，人事院提出给公务员增加工资29.6%的建议。工资提高后，国民对消费米价的提高就有了一定的承受力，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财政负担。为了减轻这种重负，大平大藏大臣不顾经济企划厅提出的控制消费米价的主张，在1974年9月决定将米价提高32%。与此相应，后来又开始认真整顿国营铁路、健康保险这些财政亏损部门。

大平决定采取这些措施，实属迫不得已。他曾分析了在石油冲击后经济萧条的当时处于左右两难的状况：“日本经济在扩大中央与地方的赤字财政，减少企业收益的情况下，却保住每个人的家庭生活的平衡，实际收入没有减少，存款的数额也未见下降。以财政与企业的牺牲来维持家庭的收入，这确实不能说是健全的状况，它给以后健全财政，恢复企业收益等都留下了难题。这些问题如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解决，可能不会带来多大困难；但要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谋求解决，无疑是个极其困难的课题。”正因为这一“课题”太难，从健全财政、恢复经济增长这一长远目标考虑，大平藏相才被迫动用了提价这一手段来减轻财政负担，以期减少今后经济发展的阻力。

当然，大平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坚决抑制社会总需求的方针，以避免因生产资料的涨价而引起其它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从而避免人心混乱。但他同时认为：在抑制总需求的过程中，不能忽略其中致力于健全经营的中小企业因紧缩政策而成为牺牲品的情况。在抑制总需求政策的大纲中，对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有必要继续给予尽可能的细心照顾。这种考虑使坚持抑制总需求的大方针能得以维持。

与控制物价同等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大平认为，“近年来以美元为轴心的国际货币体制动摇，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安定，以我国为首，世界各国每每被卷入通货危机之中。”由于石油价格猛涨，日本的国际收支出现了空前的大幅度赤字。因此日本处于既要保证必要的资源供给，又要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两难境地。但大平在田中内阁时期，尚未提出如何做到兼顾这两方面需要的强有力措施，只是呼吁“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必须进一步努力以获得国民合作”。

然而从短期目标看，经过大藏省和其它经济部门的努力，从7月至10月，日本的国际贸易收支开始出现黑字，输入物价虽上涨了71%，但输入数量逐渐减少，输出数量逐渐增加，大平在11月11日的内外形势调查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与其它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贸易收支的步伐，更为健全起来。”大平还指出，将明年消费者物价的涨幅，压制到15%以下。

## 政权更迭

正当大平大藏大臣为了健全日本财政而殚精竭虑之时，日本政局又发生

动荡，大平也不得不分出很大精力去应付自民党内出现的政治斗争。

1974年秋，日本的一家综合性刊物《文艺春秋》准备出一期秋季特刊，专门登载有关田中首相个人资产中的疑点以及田中与越山会“女王”佐藤昭的男女私人关系。田中的亲信闻讯后，企图用调解方式阻止此事的发生。田中首相于9月12日至9月27日出访美洲的墨西哥、巴西、美国和加拿大，出访期间还打电话回国询问此事。在加拿大温哥华，田中与出访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平藏相相遇，两人打了一次高尔夫球，并就人事改组问题进行了磋商。回国后，田中又命令有关人士与《文艺春秋》方面接触，希望能避免造成令人难堪的局面。

但这一切努力终归无效。10月9日《文艺春秋》第11期出版，上面刊登了政治评论家立花隆写的报告文学《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和人脉》，儿玉隆也写的另一篇报告文学《寂寞的越山会女王》，披露了田中首相的隐私。特别是立花隆的一篇，用令人信服的材料揭露了田中通过部下从事各种公共事业，操纵地价上涨而获得巨额利润的情况。这件事在日本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该期杂志被抢购一空，舆论纷纷批判“金权政治”，目标都指向首相，社会党、共产党还成立专题小组，开始正式研究“田中问题”。

在此形势下，田中于10月11日向大平正芳透露了“或许要辞职”的想法，但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在等着首相，如出访大洋洲，迎接美国新任总统福特访日、改组内阁等。田中询问大平该如何办才好时，大平鼓励这位政治盟友：“计划中的出访属于公务，虽然很辛苦也要完成。内外的情况都不怎么好，但现在决不能动摇。”关于田中的资金来源问题，大平说：“这首先是你个人的事情，你自己应该考虑采取什么措施，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大平也许并不知道，田中在金钱问题上已经深陷进去难以自拔了。

10月下旬在出访大洋洲之前，田中角荣在众议院大藏委员会上被在野党追究资金来源问题，自民党内的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的中青年议员组成了“重建自民党议员联盟”，要求田中首相公布自己的财产，并在临时党大会或两院议员大会上表明基本态度。受到逼迫的田中为了考虑自己的进退，于24至26日先后分别同大平、保利、众院议长前尾、参院议长河野、副总裁椎名进行了一系列磋商和会谈。当时的局势使许多人认为，田中政权前途暗淡，于是已在考虑田中以后的总裁人选问题了。

10月24日，椎名同前尾和滩尾两位自民党元老会谈，实际上已秘密磋商了田中总裁的后继人选问题，但并未引起大平一派的重视。田中首相对自己卸任后的总裁人选实际上也作了考虑。如果提名大平作继任人，肯定会受到福田、三木等人反对，因为大家心中都明白，大平与田中是政治盟友，大平掌权会被认为是田中政权的继续。田中又设计了另一方案，即先建立椎名悦三郎为总理的临时政权作为过渡，然后再建立大平政权。田中在与各方面人士接触后，探询了各方想法，但未作出决断便于10月28日出访大洋洲去了。

11月8日田中回国后，与大平会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其中也涉及到了内阁改组的人事安排问题。11月11日，田中内阁改组，大平留任藏相。但新一届田中内阁仅是看守内阁性质。11月18日至20日，美国总统福特访问日本。21日，各主要报纸均报道了田中首相决心辞职的消息。自民党内各派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推举本派首领去争夺总理大臣的宝座。

11月26日召开内阁会议。大平大藏大臣报告了1974年度的补充预算方

案，内阁会议通过这项方案后，官房长官竹下登宣读了田中总理的辞职声明《我的决心》，自民党内的总裁争夺之战拉开了帷幕。

被社会舆论视为最有希望成为田中以后的总裁候选人的三位政治家是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他们三位在 1972 年总裁选举时得票在田中之后分别列第二、三、四位，而且也是这时自民党内三个大派系的首领。福田是这三派中最大派系的首领，上次竞选又居第二位，他曾担任过自民党的“党三役”，即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和干事长，又担任过外务、大藏、农林等大臣，被认为是三人中最有实力争夺总裁职位者。大平派在这三派中居第二位，但他将会得到自民党最大派系田中派的支持，大平本人也担任过自民党和内阁的重要职务，故也具备争夺总裁职位的实力。三木虽是这三派中最小派系的首领，上次竞选总裁又排在福田和大平之后，但他资历最深，保守党合并后的 1956 年就曾担任干事长，在内阁中也曾担任通产相、外相和副总理等重要职务，加之三木公开反对田中的“金权选举”，给民众一种“清正廉洁”的印象，因而也是总裁的有力竞争者。这三派相互对立，又保持着密切接触，彼此牵制。

大平一派公开主张用召开党大会实行公选的办法产生新一任自民党总裁。这一主张实际上在田中正式表明辞职的 11 月 21 日就已提出，当天早晨各大报登载了田中准备辞职的消息后，大平派的自民党总务会长铃木善幸就先发制人，立即提出“继任总裁应该选举产生”的主张。铃木与田中十分接近，他深知若采用选举方法，田中一派将会支持大平正芳，大平派获胜的把握很大。田中表明辞职意向后，铃木又发表讲话，表示准备召开党大会实行公选。

福田派和三木派则认为采用公选方式将对自己不利，因此坚决反对铃木提出的主张，坚持应通过协商选出继任总裁，并声称如果实行公选，将抵制党大会的召开。这时田中角荣也动摇不定，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便出面收拾党内残局。而椎名本人也存在当总裁的企图，这样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微妙起来。

大平于 27 日与福田会谈，28 日上午又同三木会谈，各方坚持己见，使这两次会谈均无任何进展。28 日下午，椎名出面调解。自民党召开了顾问会议，会议上大多数人倾向于“协商选出总裁”。但大平仍坚持公选，他认为自民党现在如同一只打破了的茶杯，想用胶纸把它粘起来就是协商论，而公选就如同把它全部打碎然后烧制一只新茶杯。

11 月 29 日，椎名分别同福田、大平、三木和中曾根四位实力人物会谈。椎名向大平表示愿意执掌临时过渡政权的想法，而大平则反对成立这么一个过渡性政权。这又一次引起了椎名对大平的不满，这已是第三次发生两人之间的矛盾了。第一次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同时如何对待台湾的问题上，第二次是不久前人事改组时，田中未照椎名的提议改组党的领导班子，椎名怀疑这是大平从中反对所造成的结果，因而对大平十分不满。加之这一次大平又反对成立椎名掌握的临时过渡政权，所以椎名根本就不可能提名大平为总裁候选人，椎名甚至对田中首相说：“大平从中共那里领取津贴，所以要把大平排除在总裁指名的范围之外。”

椎名周围的亲信也对四名实力人物作了研究，认为若提名大平会被认为是田中政权的继续，肯定行不通，若提名福田，则会遭到大平派和田中派的强烈反对，而中曾根尚不具备出任总理的条件，于是只有三木较合适了。因

此，在 11 月 30 日五方会谈之前，椎名已内定了三木作为田中总理的后继人。

11 月 30 日，椎名、大平、福田、三木、中曾根五方举行会谈，从上午 10 点断断续续谈到下午 4 点，最后一致商定。无论由谁继任总裁，其他各派都应给予支持，以便建立举党体制。所谓举党体制，就是在分配新政权的重要职务时，应注意利益均沾，照顾到各派的要求。同时几方还同意新任总裁将实行下述政策：

- 一、重新建设党，确立举党体制；
- 二、克服通货膨胀，稳定经济；
- 三、确保社会公正。

直到 30 日夜里，大平还天真地认为，协商不会取得成功。因为椎名如果提出福田作下任总裁，自己会表示拒绝，提出福田以外的人则福田不会答应。这样最终还得进行公选。因此，宏池会的干部们还在作公选的准备。

12 月 1 日上午，椎名终于宣布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总裁继承人：三木武夫。三木听到后高兴得大叫一声：“晴天霹雳！”但大平感到奇怪的是，最有实力继任总裁的福田居然未提出任何异议。大平这才知道，椎名已分别与他们几位谈妥，自己有一种仿佛被人暗算了的感觉，但又不便当面反对，只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还显得太天真了。

紧接着三木分别与这三位实力人物会谈。会谈结束后，三木宣读了事先已准备好的接受椎名裁定的声明，这说明他事先已知道椎名裁定的结果。怅然若失的大平只是模棱两可地表示：“请让我再考虑一下裁定的内容，晚上我才能作出答复。”

大平离开了几位实力人物后，上午就赶到田中私邸，希望田中能对此事表态。但因这天是星期日，田中到埼玉县的俱乐部去了，让大平等待了很久。在等待田中回来的这段时间里，大平的思想反复斗争，一是考虑到自己若坚持不同意裁定结果，也许会引起自民党内的混乱；二是考虑到福田和中曾根都接受了裁定，自己这一派坚持反对很可能在党内陷入孤立；三是想到已近年末，大藏省的工作堆积如山，等待自己去处理，若陷于这场斗争，则政府工作将受到损害，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大平在心理上渐趋平静，已倾向于接受裁定结果了。

田中回来后也表示对此事无能为力，大平遂决定接受椎名裁定，但附加了一项条件，即在自民党总务会上提出一个提案：“继任总裁的选任应按党章规定实行公选，此次裁定作为例外，今后不得以此作为先例。”后来，总务会一致通过了这项提案，大平派总算挽回了一点面子。

12 月 4 日，三木新总裁得到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的正式承认。12 月 9 日，经过首班指名，三木武夫成为内阁总理大臣。政权更迭至此完成。

### 大藏大臣发出警告

大平正芳在三木政权中继续担任大藏大臣这一举足轻重的职务。但是，他被称为“孤立无援的大藏大臣”，因为三木首相对经济并不擅长，所以对大藏省的工作往往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大平在财政状况十分严峻而又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时，往往得不到首相支持。而担任副总理兼经济企划厅长官的福田赳夫，本是一位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被称为“经济首相”，但他与大平有矛盾，因此两人往往意见分歧，争论不休，对大平的工作支持不足，

掣肘有余。

三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即 12 月 10 日，三木就对大平说：“常在我身边给我当参谋”，显得对整个经济的把握缺乏应有的信心。而福田副总理则对控制经济显得过分自信，常常介入本应由大平主管的工作。当 1975 年度的预算案进入正式编制时，大平与福田之间便产生了龃龉。两人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在编制预算前夕，1974 年 12 月在内阁中成立了以福田为主席的经济阁僚会议。大平认为这是叠床架屋的多余机构，他最讨厌别人对自己的工作指手划脚；二是在公共事业办公费是否提高这一点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由于石油冲击后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公共事业团体若不提高办公费就无法经营。如果强行控制办公费，必须提高的那部分办公费则要由财政补贴，这势必增加财政负担。因此，大平当然不主张过度控制，认为对提高公共事业费的问题，政府不应进行不必要的干预，而应根据市场需求自行调整。但福田作为经济企划厅负责人则十分担心公共事业费的提高，会对家庭生活产生压力，同时带动其它物价上涨，因而主张编制预算时应尽量控制这部分费用。

最后，编制 1975 年预算时采纳了福田的意见，公共事业费仅略增加了 2.4%，而三木总理较重视的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费用却比前一年的年初预算增加了 35.8%，因此预算编制完成后，大平藏相不仅未感到松了一口气，反而使他的心情“像铅一般沉重”。

当时的政治评论界通过编制预算这件事，对福田和大平作了比较。评论家们认为，福田可以完全控制经济企划厅，而大平却不能完全控制大藏省，大藏省的事务被经济企划厅压制，只能步步防守。大藏省主计局编制预算时，尽量注意福田的态度，重要问题往往要先经福田同意，然后再转呈大平。因此，大平藏相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越是在这种困难局面下，大平就越是埋头于工作，以扭转局面，并努力忘掉不愉快的一切。

1975 年 3 月 4 日，预算案在众院通过，4 月 2 日在参院通过。在这之后不久的 4 月 15 日的众议员大藏委员会上，大平作了题为《当前的财政状况》的讲演，就日本当前面临的严峻的财政危机发出了警告，因此这篇讲演被称为“财政危机宣言”。在这篇讲演中，大平充分阐述了自己对财政的想法，不仅提及在石油危机冲击后日本经济缓慢发展的状况下财政如何运营的问题，而且也从长远考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建财政的设想。

大平藏相首先阐明日本财政之所以会出现危机，是因为日本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困难。自从 1973 年 10 月石油危机冲击以来，由于日本经济必须依赖国外进口能源和原料，从而导致国际支付成倍增长，企业创造的利润被这种成倍的支付所抵销，使企业失去活力，经营效益低下，税金无法按时按量缴纳，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削减。

接着，大平列举了具体的数字。1974 年的税收估计将减少 8000 亿元，而且由于经济发展处于稳定和缓慢时期，不可能像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一样，会出现财政收入大幅度的自然增加。因此，政府在财源方面将受到很大制约，势必要求尽可能削减财政支出，这一点也会影响到 1975 年度的财政支出。

但是，与这种财政收入十分困难的局面相反，财政支出却因石油等资源上涨所带动的物价和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必须大大增加。如公共事业费的实际支出、社会保险费、人事费、文化教育费等方面的开支都要求大幅度增加，这使国家财政陷于两面受压的窘迫状况，迫切要求减轻负担。

然而从 1975 年度的预算看，由于政府首脑里重视物价的意见十分强烈，公共事业费被无理地压缩，从而更加重了财政负担，使财政失去其应有的机动性而进一步趋向恶化。

大平藏相忧心忡忡地发出警告，若不改弦更张，想办法重建财政，国家财政将走向全面崩溃！

如何改弦更张，重建财政？当然是增收节支。这种想法不仅在这次讲演中，而且在历次国会的财政演说中，大平都屡次强调。他认为，要改善财政状况，首先应该确保政府的税收，因此，必须重新确保税收的方法。他具体提出了增加税收的办法：一是停止对一些税收的减免，二是制订法案提高烟、酒的价格。

其次，大平藏相认为应尽量压缩财政支出。关于公共事业费，大平提出在尽力削减其开支的同时，“有必要排斥简单地依靠财政的办法，根据由使用者负担的原则，规定出与成本相联系的适当水平的价格标准”，由具体使用者来支付其费用，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关于社会保险，大平也主张重新调整社会福利保险金的支付。

发出财政危机的警告之后，大平藏相便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善财政状况。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提高烟、酒的价格，以增加政府的财源。因此，大平非常渴望烟、酒提价的法案能在国会获得通过。6月5日，这项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能否在参议院通过还无把握，大平为此要求大藏省的干部加紧做工作，大平本人也拖着日趋发福的重达 80 公斤的身体在国会奔波。但在这届国会上提交的法案太多，除了烟、酒提价的法案之外，还有三本总理想方设法要通过的公选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则法修正案以及其它几个重要法案。而在审议法案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纠纷，被称为“胡闯乱撞的国会”，直到最后一天即 7 月 4 日才恢复平静。结果直到这天晚上三木总理希望通过的两项法案才获得通过。但河野谦三参议院议长考虑到在野党有可能反对，故设法拖延时间不表决烟、酒提价法案，在野党也拒绝审议，最终该法案未付诸表决。

大平藏相只得一方面力争召开临时国会通过该项方案，另一方面则另辟途径以谋求改善财政状况。

## 赤字国债与通货外交

未能获得新财源的大平大藏大臣于 7 月 21 日接到了财政制度审议会向政府提出的《关于稳定发展下的财政运营的中期报告》。这份报告用翔实的数据预测了今后几年日本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报告引起了不善理财的三木总理的重视，三木决心尽快召开临时国会，以通过补充预算和与其它与财政有关的法案。

9 月 11 日临时国会召开。大平大藏大臣督促部下尽快计算，以编制补充预算。但经过初步计算，得知由于经济不景气，1975 年度的税收缺额相当大，编造补充预算十分困难。经过努力，直到 10 月 9 日才将补充预算编造完成并提交国会审议。大平藏相于 10 月 17 日在国会的财政演说中对补充预算作了说明。

大平首先说明，若根据通常预算，税收大幅度减少，因此有必要加以补充。接着；大平列举出具体数据进行分析。1975 年由于经济不景气，税收将

减少 38790 亿元，扣除 1974 年度余额和减少的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将达到 34800 亿元。政府为了弥补如此巨大的财政亏空，不得不使用发行公债的办法。其中 11900 亿元，按照财政法第四条第一款，可作为追加建设国债发行，另外的 22900 亿元，打算通过别的途径提出《关于昭和五十年公债发行特例的法律》，按照这一法律发行。若不这样做，财政赤字将无法弥补。

大平提到的这 22900 亿元的特别债，是为了弥补赤字而发行的，被称为“赤字国债”。这是日本战后财政史上第一次发行赤字国债。大平藏相采取发行赤字国债这一举措，也是出于无奈。他在财政演说中分析当前日本的经济形势和财政金融政策时，对此也作了解释。他指出，由于石油冲击而引起日本的批发物价和零售物价大幅度上涨，政府为了应付非常状况，在财政金融上实施了严格的抑制总需求政策。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使物价、工资最近都显出下落的趋向，由于石油货款剧增而恶化的国际收支也逐渐得到改善。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经济活动沉滞，就业减少，使日本经济遭受很久以来都未经历的长期不景气。这种景气停滞的反应，就是不论中央或地方，都陷入了收入大幅度不足，面临着严重的财源困难，而作为政府，不仅不能大幅度削减支出和实行一般性增加税收，反而还要在财政金融两方面更加推进综合性景气对策。这样，政府不得不根据特别法律发行国债，同时向国会提出烟、酒、邮政收费提价法，希望能在此次国会上获得批准。

大平又进一步说明，根据这次提出的补充预算，昭和五十年（1975 年）度的国债发行总额为 54800 亿元，国债依存度达到 26.3%。但假如轻易依靠增加公债发行来开辟财源，将会导致公债累增，使财政失去健全性。而维持财政的健全性，不用说是提高国民生活和经济稳定成长的基础。因此，为了尽可能早日恢复不依靠特例公债的坚实财政，应倾注全部力量。

大平藏相在此已明确表示发行赤字国债仅是权宜之计，实属下策，目的是为了恢复经济景气。一旦有可能将取消这种作法。他说：“我们的方针始终把它作为有期限的立法，每年提请国会批准，而且力争早日废除这一特例。”他的这种想法在 1976 年 9 月出版的《财政学》中更有清楚的表述：“单纯的赤字公债必须减少，在 1980 年以前应该全部停止。因此，应该设法在三年之后停止赤字国债的发行，并按照这个目标加强对财政的管理。”

大藏省提出的 1975 年度补充预算于 11 月 7 日获得了国会的批准，但同时提交国会审议的发行赤字国债的特别公债发行法案（简称“财特法”）以及烟、酒、邮政费提价的法案未能通过。直到 12 月国会延期的时间里，在参众两院大藏委员会上，采取了强行通过的非常手段，才批准了这几个法案。

根据大平藏相 1976 年 1 月 23 日在第 77 届国会的财政演说中透露，1975 年实际发行公债 72750 亿元，其中根据“财特法”发行的赤字国债达到 37500 亿元，公债依存度达 29.9%。

由于这几个法案的实施，日本的财政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物价趋于平稳，就业率上升，日本成为最早摆脱石油危机冲击而使社会经济重新发展的国家。但另一方面，赤字国债的发行到 1980 年以前并未停止，这一点出乎大平正芳的预料。

除了解决国内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大平藏相还“不得不面临严峻的通货外交”。自从 1971 年 8 月，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以来，国际通货体制陷于混乱，世界汇兑制度改为浮动汇率制，加之 1973 年 10 月以来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各国的国际收支非常紧张，纷纷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及友好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以前，各发达国家财政部长要定期参加 IMF 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举行的会议，现在由于这种异常紧急的情况，各国财政部长参加的国际会议更为频繁。大平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曾 7 次出访，游历了 11 个国家。

IMF 是根据 1944 年 7 月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 1945 年成立的国际性组织，1947 年 3 月开始业务活动，同年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主要职能是协调成员国的金融政策，向成员国提供中期贷款，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稳定汇率。现在由于成员国的贷款要求增加，所以迫切要求增加 IMF 的资金数额。这样，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就需要经常在一起磋商。美国、西德、日本、英国、法国五国的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总裁多次开会，反复协商，制定了对策。

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些协商，IMF 将参加协商的国家由五国增加到十国。1975 年 1 月与 8 月，两次召开了十国财政部长会议，均由大平正芳担任会议主席。大平虽然英语说得不错，以前的学习也很努力，但在担任会议主席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语言的不便和知识的不足，同时重新认识到日本的责任与实力，并痛感到更为重要的是，日本要以勇气与诚意来对待国际经济问题。”

大平藏相还与三木总理一起，出席过 1975 年 1 月在法国、1976 年 6 月在波多黎各召开的五大国首脑会议。这些国际会议虽不能彻底解决世界货币问题和贸易问题，但大平认为它们在增进各国的相互了解与信任，避免世界性经济危机方面，起了值得肯定的作用。如他 1975 年初参加的华盛顿十国财政部长会议和 IMF 暂定委员会，就主要讨论了“面对因石油价格上涨而造成的国际收支结构的剧变和世界性通货膨胀，如何避免世界性的不景气，以及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克服所面临的困难。”又如大平 1976 年初出席的在牙买加召开的 IMF 暂定委员会，就继续研究了重建国际通货秩序，最终达成了 IMF 协定修正案。根据这个修正案，在以 IMF 为中心的国际协调体制下，各国可以自由地选择包括浮动汇率在内的汇兑行市，开辟了以后在世界经济稳定的阶段，向“稳定而又可调整的”平价制度过渡的途径。这次牙买加会议决定第六次向 IMF 增加资金，“以扩大其信用供给力，恢复对世界经济秩序的信心，为世界贸易的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 “洛克希德案件”的震荡

1976 年 1 月，国会常会顺利复会，并开始审议大平正芳提出的预算方案。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这平静之后，将会出现一次晴天霹雳般的震荡。

2 月 5 日，报纸上登载了一则外电，报道了“儿玉誉士夫从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受贿 21 亿日元”的消息。这一消息来源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该委员会披露了对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不正当支付推销资金问题的调查，指出洛克希德公司在向日本推销“三星”客机时，使用了 30 亿日元的推销资金，其中有 21 亿给了日本右翼政治家儿玉誉士夫，其余给了丸红和 ID 社。儿玉誉士夫在二次大战中曾从事对中国的侵略特务活动，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开除公职。后来他组织了日本国民党等右派团体，成为日本政界和财界的右翼黑后台。丸红是日本大型综合商社，ID 社是广告公司。2

月6

日，洛克希德公司副董事长库齐扬在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披露了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通过丸红公司高级职员松山厂、大久保利春、伊藤宏等人和日本国际兴业公司总经理小佐野贤治，向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贿赂6亿日元的内情，他于12日又说，为了推销“三星”客机，曾于1972年会见过当时的通商产业大臣田中角荣。

这一消息如重磅炸弹爆炸，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正在平静开会的国会顿时哗然，人们纷纷追问这里说的“政府高级官员”是指谁？自民党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三木总理历来都旗帜鲜明地反对“金权政治”，此次也毫不含糊地表示：“即使有损日本政治的声誉，也要查明这一问题。政府将搜集一切可以获得的材料，如果触犯了法规，将严厉惩处。”三木还表明：“对洛克希德事件的美方资料，原则上将不删去政府高级官员的姓名而予以公开。”

这件事成了新闻媒介集中关注的对象，社会上也闹得沸沸扬扬，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甚至有消息说，美方所称的政府高级官员就是大藏大臣大平正芳，是他从田中手里拿的钱。大平周围的人不相信这种谣传，但他们很想了解大平对这些谣传如何看待。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于2月16日到大藏省去找大平，试探他的看法。大平斩钉截铁地对伊藤说：“和田中的关系没问题，资金是从干事长那里领来的，都已申报完毕了，我问心无愧。”大平说这些钱已按照政治资金规定法履行了手续，而且他还提到，三木总理大概听到了什么传闻，亲自派国税厅长官中桥对大平进行调查，大平对前来调查的中桥说：“不要顾我的关系，放手搞吧。”而且大平还告诉伊藤，最近才知道《每日新闻》也动员记者来清查自己的所谓问题，然而什么也未查到。大平觉得非常恼火：“我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上的人们这样互相倾轧呢？”

也就在这一天，众院预算委员会将与洛克希德案有关的小佐野贤治、大久保利春、伊藤宏等七人召到国会对质，但这七人均否认对他们的怀疑。2月18日，日本政府又要求美国提供“包括政府高官在内的全部资料”。同一天，东京地方检查厅搜查了儿玉的住宅、丸红公司本部及公司干部住宅。通过这些初步调查，已消除了对大平的怀疑，攻击的目标逐渐转移到别人身上。

许多人也相信大平是清白无辜的。如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京极纯一就认为：“大平和田中是盟友，小佐野和田中是刎颈之交。若是追查洛克希德的线索，最后在美国就追到尼克松，在日本就追到田中角荣那里。”大平历来的政敌福田赳夫也说：“大平君是清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上上下下是统一认识而行动的。”

2月23日，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作出决议，请求美国把此案的全部资料提供给日本，三木首相也写亲笔信给美国总统福特，请求给予协助。大平对三木这一举动不以为然，认为诸如调查案件之类的事应交结实务人员去办理，而不必提到政治的高度，他说：“由实务人员严守中立地调查事实的真相，当真相大白的时候再由司法当局进行处置。这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政治对此既不应牵制，也不应加油。”

当记者问大平洛克希德案件应如何解决时，大平回答：“这将取决于整个日本民族的力量……超过国民力量的解决是困难的，但低于国民力量的解决也是不足取的。日本国民具有相当水平的判断能力和平衡感觉，因此，我认为日本国民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三木政权面临着两件必须处理的大事，一是每年必须进行的国会对预算案的批准，二是处理洛克希德案件。由于第二件事务的牵制，预算案3月间没有在国会得到充分审议，直到5月8日，1976年度的预算案才获得国会批准。三木总理大臣的主要精力放到了追查洛克希德案件所涉及的“政府高官”上。3月末，美国方面提供的有关洛克希德案件的资料，有一部分送到了三木手中，三木要“彻底追查”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但这时社会舆论因这一案件的披露对自民党政权日益不满，许多读者给报社写信，纷纷对自民党加以谴责：“出了这样的丑事，日本的前途可忧！”“我们上当了，我们不再纳税了！”“绝不再投自民党的票了！”而三木总理表示要彻底追查此案，本意是企图以此查清这届政府中是否有高级官员卷入此案，同时借此机会进一步加强本届政府“清正廉洁”的印象，以巩固政权。但三木的这种态度客观上助长了民众对自民党的谴责，从而引起了自民党内对三木的不满。椎名副总裁以前亲自将三木裁定为总裁，但这时也认为“三木闹得太过分了”。于是，以椎名为首的自民党内的反三木派别，开始了策划迫使三木总理下台的活动。

椎名秘密汇集了党内对三木政权持批评态度的力量，他在5月间分别与田中、福田、大平这三位自民党大派系的首领会谈，一致同意在大选之前逼迫三木下台。椎名本人及其亲信则准备在5月24日国会结束后立即行动，争取先成立椎名临时政权，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党的改革和选举的“举党体制”。

但是，日本的传播媒介真是无孔不入，许多“秘密”是很难保守住的。椎名及其亲信的计划很快被《读卖新闻》于5月13日公之于众，在政府中造成极度混乱。三木总理立即进行反击，表示“使政局陷入混乱的行为是为国家和国民所不允许的”。同时，三木又与福田和大平紧急会谈，使这两名阁僚答应当前与总理大臣合作。而椎名的行为则遭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认为他们逼迫下决心追查洛克希德案件真相的三木总理下台，是为了阻止调查，掩盖案件真相。

到这时候，自民党实际上围绕洛克希德案件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以三木总理为首的阵营，主张查明案件，并尽快解散国会，另一个是反三木阵营，主张不应急于解散国会，而应由现任政府通过辞职，向国民表示对此案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洛克希德案件成了党内斗争又趋激化的导火线。

大平正芳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他虽是三木内阁的重要成员，但历来在政治上与三木有矛盾，在竞选总裁上是政敌，这次洛克希德案件披露后，三木又对自己产生不信任，派员来调查自己是否受贿。若从这些因素出发，大平希望三木尽早下台。但大平通过对自民党多年的观察，深深感到自民党作为多年的执政党，由于长期执掌政权，已产生了骄纵情绪，精神沦丧，政治和行政陷于守旧的通病之中。其结果，导致纲纪松弛，最终眼睁睁地看到贪污渎职的罪行在党内发生。洛克希德案件就是其典型之一。因此，大平又希望早日查清案情，肃清党内隐患，并通过这件事重新整顿自民党。从这一点考虑，他又不希望三木早日下台，所以当三木与他会谈时，他又承诺合作。同时，大平也不希望三木解散国会，他认为“如果解散，检查厅的行动也就中断了，洛克希德案也将查不出头绪。”

在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支配下，大平在5月25日的宏池会例会上，作了以下发言：“现在，自民党正在因为洛克希德案件而受到全体国民的批判，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只有全党团结起来才能渡过这个难关。为此，必须把自

民党在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期间，在各方面积累起来的灰尘清洗干净。全党都要以袪褻的精神改革体制、进行反省、重新进步……特别是处在党和内阁领导地位的人，应该痛感自己的责任而引咎辞职，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这就是大平的“袪褻论”。所谓“袪褻”，是古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消灾求福的祭祀，大平提出袪褻论，意思是说现政权领导人（包括自己）应洁身隐退以清除政党积弊。他后来对记者解释说：“袪褻的主张不应只从党和政府首脑下台这一消极方面去理解，这里也包含着将来进行重大改革的积极方面。”讲了这话不久，大平又对其亲信说：“三木下野的设想不要操之过急，要慢慢来。”

6月22日，东京地方检察院逮捕了全日本航空公司的三名干部和丸红的专务大久保利春，报纸用整版作了报道。6月25日，河野洋平等六名中青年议员宣布脱离自民党，成立新的党派“新自由俱乐部”。接着，从6月29日到7月13日，一些行贿嫌疑犯陆续被捕。到了7月下旬，对洛克希德案的追查达到了高潮。7月27日清晨，在无任何舆论前兆的情况下，田中角荣前总理大臣突然被捕。田中在1972年10月，涉嫌通过丸红公司的干部，接受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推销资金的贿赂，并要求日本“全日本航空公司”购买下一代客机时指定购买“三星”客机。7月28日，《朝日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贪污嫌疑》。文章点了现任干事长中曾根康弘以及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前运输相桥本登美三郎，前运输省政务次官佐藤孝行等人之名。新闻媒介对此事的报道如雷鸣电闪，震荡着日本政界，震荡着日本全社会，也极大地震荡了田中的政治盟友大平正芳。大平得知这一消息后，痛苦得一夜没合眼。他一方面为调查引出如此结果感到惊愕，简直无法相信，另一方面他知道日本政局又将出现一次大的动荡。

### 政局不稳与“大福联合”

三木总理原以为逮捕了田中角荣，挖出了自民党内的“痛疽”，政权将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而愈加巩固，再也不会为田中一派所干扰，政局也将出现有利于自己的新形势。

但是，自民党内的反三木势力并不因此而退缩，田中角荣派作为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对三木现政权充满强烈的敌对情绪，并于8月4日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三木总理下台。其它反三木势力在田中被捕后活动更频繁，他们认为，这时反对三木已不会再背上“掩盖洛克希德案”的嫌疑。同时他们也有充分理由认为，三木政权查明了洛克希德案，已完成了该政权的历史使命，三木可以体面地下台了。因此，日本政局因田中的被捕不但未趋平静，反而更加动荡起来。

由于田中的被捕而显得心灰意冷的大平正芳也在十字路口徘徊。他曾对自己信任的伊藤昌哉说：“我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打算退出政界。”伊藤鼓励大平：“不能失掉斗志，现在你不是孤军作战。”大平也知道，单靠自己一派的力量是无法扭转政治局势的，要改革现行体制，必须要联合更强的政治势力。而以前与自己结为政治同盟的田中现在也靠不住了，至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再凭借田中派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大平倾向于同自己历来的又一个政敌福田赳夫联合，并为此进行了试探。

8月7日，大平在香川县会见记者时说：“自民党的党纪松弛，党势衰

退，由来已久，这次又遭到洛克希德案件的沉重打击……形势严峻且刻不容缓。为了使党的整顿取得成果，应该努力与党内的同忧之士虚心协商。我充分理解福田先生主张的要认真而大胆地进行重新起步的改革。”听到此话的记者们都将大平的这句话理解为“同意福田接替三木掌权”的意思。

大平的试探性讲话立即得到反响，福田听到后表示：“大平大藏大臣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二人均有了合作的意向。

同时，党内的一批议员以三原朝雄为首结成了“人心一新派”，他们要求三木总理利用天皇在位五十周年庆典之机，辞去总理大臣职位。但8月9日，三木表示“不辞职、不改组”，并说要亲自解散国会、主持大选。同一天，《每日新闻》根据洛克希德公司副总裁库齐扬的证词，列举了与此案有关的七个政府高官的名字：田中、二阶堂、桥本登美三郎、佐藤孝行、福永一臣、加藤六月、佐佐木秀世。这一下更引起了“人心一新派”的极大愤怒，三原等人发起了议员联合签名要求三木下台的运动。短短一周时间内，就有277名国会议员表示了赞同。这些议员包括了田中、福田、大平几个反主流派别，也有椎名等中间派别。签名议员组成了“确立举党体制联络协议会”，简称“举党协”，由前众院议长船田中和、前行政管理厅长官保利茂任召集人。

8月中旬时，大平的肾结石破裂，便血，十分痛苦。但为了使动荡的政治局面平静下来，大平带病与福田采取一致行动，分别同三木会谈了若干次，但毫无结果。8月12日大平同三木会谈后向记者表示，会谈未取得进展，三木坚持要掌握政权，因此无法保证党内是否会发生分裂。现在除认真听取大家的想法外，还必须维护自民党的统一和团结。

8月24日，举党协召开参众两院自民党议员大会，到会人员超过了自民党两院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会场上虽有人起哄喊“总裁下台了”，但并未通过对三木内阁的不信任案，只是通过了“刷新人事”的决议。

这次大会后，大平和福田又与三木举行了会谈，结果毫无进展。正如大平形容的那样：“就像弄坏了的电唱机，始终在一个地方打转。”三木只是保证在召开临时国会前不解散众议院。

举党协对此会谈结果十分不满，党内冲突更为激烈。在此形势下，自民党的几位负责人中曾根干事长、滩尾总务会长、松野政调会长、石田代理干事长、安井参议院议员会长于8月30日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但该方案因为没有明确三木总理的进退问题，故虽得到大平和福田的“理解”，却受到举党协的强烈反对，认为这只不过是三木的缓兵之计。大平和福田与举党协开始产生不和。

在自民党即将出现分裂之时，大平决心为避免这种分裂作出努力。他风趣地对记者说，党内各派之间的斗争，如同一对夫妻吵架，虽到了要离婚的程度，只要有机会协商沟通，仍可破镜重圆。

这时三木总理采纳举党协与党的负责人商定的方案，10月召开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并表示9月16日召开临时国会，在这之前完成党和内阁的改组，即所谓“刷新人事”。

为了挽救处于分裂边缘的自民党，在大平派的田中六助建

议下，大平与中曾根干事长进行了会谈。9月11日早晨，大平主动给中曾根挂电话，要求当面协商。两人单独会谈了约半个小时，经过彻底研究，两人对三木阵营与反三木阵营的妥协问题达成了共识，拟定出解决方案。该

方案兼顾了双方的要求，包括9月14日召开两院议员大会，10月召开党代会，在临时国会上相互合作通过“财特法”等重要法案，以及暂不解散国会等内容。三木总理及对立双方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激烈的党内斗争暂告平息，自民党总算避免了分裂。

9月15日，三木改组党领导班子内阁，赞同“举党协”

意见的阁僚除了大平和福田留任外，全被解职，三木总理有好感的人员被安排进入内阁，三木政权似乎得以稳固，但实际上也仅是掌权几个月的过渡性内阁。当党内斗争暂时平息，人事改组已经完成，本届国会任期届满，大选即将临近时，总裁和总理由谁继任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这次仍然与前次田中政权即将结束时所面临的问题一样，总裁是通过公选还是通过协商产生？自民党内普遍认为，若公选，则大平上台，若协商，则福田继任。这一点大平正芳心中也很明白。但是，大平更了解，自民党经过长时间的内讧，已精疲力竭，如果进行公选，各派势必又要大肆活动，很可能又会陷入长期纷争。国民对自民党的批判已日益高涨，再这样内斗下去，自民党还能稳固掌权，甚至还能很有生命力地存在下去吗？

在大平思想上矛盾斗争期间，福田派则积极活动，动员一切力量为通过协商让福田掌权而作最大努力。以新日铁董事长永野重雄为首的财界首脑为促成“大福合作”，安排了一系列政界要人会谈，包括大平——福田会谈、田中——福田会谈（田中于8月16日交了2亿日元保释金，获得了释放）、大平——河野会谈等。大平也同自己的心腹田中六助议员为此问题于10月初整整讨论了三天。大平还与本派骨干成员铃木善幸、小川平二、斋藤邦吉、盐见俊二以及亲信伊藤昌哉等人反复磋商，最后下决心放弃这届总裁公选，以协商的方式让福田当总裁和总理。大平对本派骨干们说：“只要现在举行选举，总理大臣这把交椅就是我的。但是，党不会因此而统一起来。所以，还是推举福田当总理大臣候选人为好。让宏池会来掌管自民党吧。”

10月6日，田中六助把大平的这个意思告诉了福田，福田很高兴，并表示自己掌权的时间一年也可以，一年半也行。田中六助乘势补充了一句：“请以后让给大平。”福田对此表示同意。田中六助立即向大平报告了这一情况。

10月10日下午，大平与举党协负责人保利茂打了一阵高尔夫球，保利事先已从福田那里了解到了大平的想法，但打算进一步确认一下是否可靠。他一边打球一边问大平，1977年、1978年这两年让福田当总理、总裁如何，希望这次能把党统一起来。大平允诺之后，保利很高兴地说：“你的决断使我得救。”随后保利茂又就此事去做了椎名的工作。

1976年10月20日和27日，自民党两大政治派别的代表福田赳夫和园田直、大平正芳和铃木善幸举行了两次决定性会谈，保利茂作为见证人参加了双方的会谈。会谈讨论的问题很多，如确认大平愿意让福田先执掌政权的意向以及如何对待当前政局的基本方针，如何消除自民党面临的危机，如何领导迫在眉睫的大选，如何重建受到长期腐蚀的党，如何分担今后的工作等，但最核心的问题仍是请求大平先支持福田执政。会谈之后，达成了以下协议：

一、大平正芳推举福田赳夫为三木总裁之后的新总裁和总理大臣的提名候选人。

二、内阁总理大臣和党的总裁由一人担任，但福田赳夫将委托大平正芳侧重负责党务。

三、在昭和52年（1977年）1月的定期党大会上修改党章，将总裁的任

期由原来的三年改为二年。

协议达成后，双方在这份备忘录性质的文件上签名画押，保利茂虽未署名，却叮嘱大平“千万不要把这份文件泄露出去”。但到了10月13日，《读卖新闻》还是将此事披露了出去，这天晨刊上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自民党已从抗争中“产生了一条福田任总理、总裁，大平任干事长的路线”。这样，大平正芳为了维护自民党的统一，再一次放弃了竞选总裁的机会。而保利茂和园田直则认为，两年之后，自己有责任促使福田将总理和总裁职位让给大平。

事后大平对他不参加总裁竞选作了解释：“石油危机以来的经济形势和处于伯仲状态的政治形势都是极为严峻的。而且，现在的这个自民党摔跤场也容不下我和福田两个人真正地摔一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固自民党这个摔跤场，等到这个摔跤场加固之后再行公选或摔跤也为时不迟。”

大平还谈到了“大福联合”这个社会关注的问题：“我和福田出身不同，经历各异。我们迄今为止的关系，与其说是亲密的伙伴，不如说是对立的同事。在外交、防卫，经济等各个领域，我们都各自代表着党内不同的政治主张。我们双方这次准备进行合作。极端不同的双方能够相互提携与合作，这倒是颇有趣味的。”大平这时或许又想起了大学时代中山伊知郎先生的平衡理论，他认为自民党就如同一个大椭圆，他与福田就是椭圆中的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须维持平衡，才能维持自民党的统一。

日本社会各界对“大福联合”从各自目的出发，都基本持肯定态度。田中虽不愿福田上台，但为了迫使三木下台，也只好赞成。财界作为自民党的后盾，自然对大福联合万分欣喜。当年底大选临近，大平与福田联名开出借款证，筹措选举资金时，财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大力援助。1976年的大选是在自民党经过近一年的内讧之后，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12月5日，选举结果揭晓，自民党出乎意料地惨败。在自民党公认的候选人当中仅有249人当选众议员，距单独在众院中过半数还差9席，加上发展了13名无党派议员入党才达到262席，比过半数仅多7席，这就是自民党内部斗争的恶果。众议院和参议院一样，在野党席位与自民党席位已非常接近，国会进入了“保革伯仲时代”。

大平正芳在这次选举中第十次当选众议员，在选区共得98412票，居第一位。但大平的哥哥数光为弟弟争取选票东奔西跑而累得病倒，于12月7日去世。

12月17日，三木总理发表了辞职声明。23日，自民党两院议员大会选出福田赳夫为自民党新一任总裁和总理的候选人。第二天，临时国会召开，选出福田为总理大臣。当晚，福田就任命大平为自民党干事长。从此，大平又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工作。

## 第八章 肩负重任的攀登

### 努力改革自民党

自由民主党的干事长在日本执政党内是一个仅次于总裁的重要角色，一般认为，干事长就是通向总裁的最后一道阶梯。虽然并非所有的干事长皆能当上总裁，但从自民党诞生以来的历史看，除了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两任总裁外，其他几位总裁均担任过干事长。大平正芳担任干事长这一职务，自然被认为是下一任总裁的最佳候选人。

按党章规定，干事长的职责是“协助总裁处理党务”，是与总裁最接近的人物，实际上是总裁的左右手。干事长在自民党内拥有很大的实权，他负责募集和分配党的基金，参与党内重要职位的分派，而且由于自民党是执政党，故在组阁时，干事长还要参与内阁大臣和政务次官的人事安排。每当选举时，干事长又成了自民党参与竞选的实际总指挥者，负责筹集竞选经费，确定候选人名单，安排竞选步骤，制定竞选战略方针等与竞选有关的事务。当然，干事长也要花大量精力来考虑党的建设问题，在这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大平比他的前任们花费了更多的心血。

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根据日本国民的要求，制定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但国民因各自处于社会不同阶层，故提出的要求存在很大差异，而且随时在发生变化，执政党必须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制定的大政方针进行调整，干事长就是这种调整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所谓党的建设问题，从根本上看，就是如何改变党在国民中的不良形象，通过党制定的各项政策，推动社会发展，取得国民的信任。

大平当上干事长后，于1977年1月26日在第32届自民党大会上作了《党情报告》，4月25日，在“自民党改革、跃进总奋起”临时大会上作了《关于改革党的报告》，8月30日，又在自民党夏季全国研修会上作了《转变时期的政治》的讲演。在这些报告、讲演中，大平分析了自民党在日本国民眼中的形象，强调了要努力改革和重建自民党的重要性。

大平认为：“现代是政党政治时代，是由政党而造成的民主政治的时代……各政党提出各自的政策，通过选举竞争优劣，形成了控制过半数的政党掌握政权的结构。将其称为由多数政党形成的议会民主制。

政党本来必须受选民的信任，因此，无论在其体制、组织、管理、政策各方面，都要努力达到自己认为的最佳程度。”

那么，自由民主党的状况如何呢？大平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对此作了剖析。大平首先肯定，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在我国战后经营上获得了成功。”自民党积累了广泛的见识和丰富的经验，成功地吸收了社会各界各色各样的人才。作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政党，从右至左，从大企业到小企业，通过所有地区、所有职业，把广大的国民各阶层吸收为同志，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成功而巧妙地渗入政治的政党。“我国战后经营的完成，这个政党起了主要作用，事实上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而且，战后经营面对着世界性的巨大考验，最终，当许多国家在战后经营中落伍时，我国成功地达到了经济的平衡和独立，这也可以说显示出自民党的应变能力很强。”

但是，大平接着又尖锐地批评道：“另一方面，回顾自由民主党的历史，也犯了许多过失和错误，如党纪松弛、思维、行动乃至政策方面存在的守

旧，尤其是还发生了数起丑闻。可以说又是一个最令人厌恶的政党。

因此，自由民主党这个政党，在近代意义上看，绝不能说是形象光辉的政党，也不能说是光明正大的政党。所以即使用偏爱的眼光看，也不能认为是受国民欢迎的政党。”

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究竟持何种看法呢？大平干事长通过对 1976 年末的众议院竞选自民党遭到惨败一事的评论，作了中肯的检讨：“建党以来，国民对我党的支持率呈逐渐下降的倾向，终于导致在去年年末的选举中的失败。我相信，这件事并不表明国民对我党保卫自由社会的基本立场持有反感，而是反映了国民对我党的政治姿态和体制乃至其活动感到很不满，从另一方面看，不支持任何政党的国民不知不觉地增加到将近全部选民的半数，这一事实也反证了这一点。我想这说明，我党作为第一大党未能适当地回答大多数国民的期待和要求。”

大平干事长坚定地声明：“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阻止我党形势如此低落的倾向和应变能力之不足，力图重建适应新形势的组织和具有活力的党。这次，设立了党的改革实施本部，就是为了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

怎样改革自民党？对于这一重要问题，以福田总裁亲自担任部长，大平干事长具体负责的自民党改革实施本部已多次审议、讨论，绞尽脑汁地思索怎样采取行动来推进改革。最后，确定了自由民主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一些具体对策。

关于这次党的改革的重点，大平认为就是“纠正从中央到地方日益显著的我们党的议员党式的闭锁性，消除派系间对立的弊害，将其象征性表现即总裁决定方式在制度上加以改正，以使我党重新成为在所有国民前开放的、充满新鲜活力的国民政党。”

关于这次党的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大平干事长从以下几方面作了阐述，并且在以后逐步得到实施。

一、扩大自民党组织和党的支持阶层，将自民党从议员式政党改变为对国民开放的政党。

具体对策是从中央到地方，通过议员及其后援会，在得到所在选区居民广泛支持的同时，将这些支持者充分吸收进党的组织。

自民党的党员人数历来都不大明确。1966 年公布党员有 190 万人，但其中按期缴纳党费的正式党员不超过 5 万人。以后虽逐年有所增加，但速度较为缓慢。自从大平担任干事长并提出扩大党组织的目标之后，正式党员的数量急剧增长。特别是在修改了总裁公选规则，每个党员都有权投票选举总裁之后，参加自民党的人更是成倍增加。到 1977 年底，已发展到 40 万名左右。1978 年 1 月 14 日统计时达到了 47.9 万多人。当时自民党全国组织委员会委员长竹下登说：“最后达到 100 万人也不是幻想了。”结果到 2 月末，党员数达到了 133 万人。其中当然不乏为参加选举总裁而“赶浪潮”入党的人，但也说明大平干事长的第一条改革方针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扩大党的支持阶层，也就是在自民党以外发展支持者，即所谓“党友”。大平要求应加强同那些与自民党有共通意识的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从事农、林、渔业者、工商业者、工人、家庭主妇、青年、宗教界和文化界等各社会阶层，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这些支持自民党的党友组成自民党的外围组织“自由国民会议”。到 1978 年 2 月末，这种党友达到了 18 万多人，扩大了自民党的支持阶层。

二、确立党的财政。大平指出，目前自民党的经费来源，是以财团法人捐赠为主，这未必是正常状况，但若立即全部改为个人捐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平主张，今后除继续仰仗更多的法人及个人的捐款外，还应通过增加党员的党费，收取自由国民会议成员的会费来充实党的经费，减少对企业的依赖。大平具体提出一个数字，把党费由每人每年1000元提到3000元，自由国民会议的会员一人一年缴会费10000元。同时，加强党内财政的民主化。

三、加强自民党的宣传活动。大平指出：“宣传活动是左右民主政治成败的重要机能之一，关系到政党的兴衰。充当党的组织化先锋的也是宣传活动。我认为，给党的机能以活力，在强化其组织维持方面发挥作用的也是宣传活动。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在此应加强宣传活动，研究提高其质量的对策，努力尽快找出当前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大平建议，应该充实党的机关报《自由新报》，实行全体党员订阅该报的制度，并考虑加强《月刊·自由民主》等各种刊物的出版活动。

四、改善党的活动管理，取消派系活动。关于这一点，大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本来就是派系性动物，三个集合就可产生两个派系。而且，这不仅在政界，而是在企业界、教育界、学术界、宗教界、体育界、艺术界及其他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皆可看到的现实。”“所谓派系，不能否定其作为情报和教育组织或者作为阻止党的独裁化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因此，大平干事长作为党内一大派系的领袖，并不把党内存在派系看成是坏事。但是他又认为，“派系所具有的自私和排他性，也很有可能损害党的主体，所以要决定解散现有的派系。”大平特别强调，自民党是掌握政权的政党，因此，国民将担心若根据派系的思维来行动，是否会损害政治管理的公正性。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以谦虚的态度停止派系活动。现有的派系无论有何种理由，也应取消。”

大平还指出，一部分人正批评“伪装取消”，但我们党既然要转变为对广大国民开放的政党，就不能允许以前那样的派系继续存在。况且，由于总裁公选规则的改变，从派系联合推选出总裁的途径已从制度上给堵塞了。

取消派系的主张大平在1月的党代会上已经提出。在4月召开的大会上，根据福田总裁的强烈要求，正式决定取消自民党内的派系。福田派早在这一年的3月8日已宣告解散，转变为政策研究集团。大平派的宏池会和中曾根派也于3月10日宣告解散，改为政策研究集团。这无疑为党内其它派系的解散提供了榜样。当然，日本政治评论界也有人认为，几大派系宣告解散改为政策集团，不过是改头换面。

五、改变总裁公选规程。根据以前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规程》，总裁是在党的大会上用秘密投票方式选出来的。参加投票的，有自民党所属国会议员以及各县联合支部所推选的一名代表，每人有一票投票权。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第一次投票获半数以上选票者当选总裁。如果票数较分散，候选人均未获半数以上选票时，则以票数较多的两人进行决选投票，决选中得票多者当选。

自民党建党以来，多数情况下都有两个以上的总裁候选人。而党内任何一个派系都无法单独获得半数以上选票。为了获得较多选票，各派系之间彼此合纵连横，暗地里使用大量金钱作交易。因此，每一次总裁公选都促使派系之间的斗争激化。所以大平在4月25日《关于改革党的报告》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历来的总裁公选规程与最初的意图相反，助长了派系的危害，

以至于部分人批评它是‘诸恶之根源’。”更何况还存在违反党章规定的“协商”产生总裁的变例。这一切不仅引起了广大普通党员和国民的强烈不满，而且也使大平本人亲受其害，断送了两次可能当选总裁的机会。因此，不仅广大党员群众，连许多有地位的政治家如三木、大平等皆感到修改总裁规程之必要。

为此，大平在1月召开的党大会上，就已提出要修改党的规章和总裁公选规程的主张。他说：“有相当多的县联合支部提出提案，应该引进总裁公选的预备选举，以在党的管理上反映出对地方党员的意愿的尊重。总部也已设立了有关委员会，反复审议，归纳出了大致方案。”在4月党的临时大会上，大平干事长又提出：“在这次改革中，接受了大多数党员的要求，在决定总裁候选人的选举中，要求全体党员都参加，获得票数居前二位者，再由党所属国会议员举行决定总裁的选举。相信这样做将会反映全体党员的意愿，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

4月的临时党大会决定，以后实行有全体党员和党友参加的自民党总裁公选的预选制度。在这以后，自民党党员发展速度极快，仅10个月即发展了90多万人入党。这样，要将成倍增加的党员明确划分为哪一个派系是几乎办不到的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派系活动给党的总裁竞选带来的影响。

大平正芳干事长以后就成为通过全国预选制所产生的第一位自由民主党总裁。

### 针锋相对，运筹帷幄

在党的改革中挑起大梁的大平正芳干事长，在国会活动中也展现出自己的强劲才能。大平担任干事长后，国会活动面临两件大事，一是1977年的预算案是否能顺利通过，二是半年后将进行的参议院改选。在这两大活动中，大平成了核心人物。他时而在与各在野党的预算问题谈判中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时而又在参议院选举中运筹帷幄，稳操胜券，使许多人对这位干事长不得不刮目相看，产生由衷的钦佩。

1月21日，第八十次通常国会复会。通常国会要审议和通过许多议案，其中每年要通过的财政预算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议案，因此，也常常是执政的自民党与在野党之间在国会中斗争的焦点。在野党因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中与自民党席位相等，因此在该委员会审查内阁大藏省送来的预算案时，往往发表不同意见，要求对预算案作较大幅度修改，否则不予通过。如果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中，政府提出的预算未获通过，提交到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也较难通过。那样，政府就得重新编制预算案，手续繁杂，颇费时日。而预算案的延期通过，将会严重妨碍日本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僵局，自民党与在野党在事先都要反复磋商，实际上往往是双方在幕后进行交易。

大平干事长在各派对预算问题的谈判中处于核心地位。他当时心情十分紧张，担心完不成谈判任务造成不良后果，他曾对周围的亲信说：“如果在野党提出要求重新编制预算方案的动议，就采取解散行动。福田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不过，我要与在野党进行谈判，不让他们提出修改预算案的要求。”

到了2月中旬，预算案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福田首相定于3

月 19 日访美，首相希望在这之前能在众议院通过预算案，因此，与在野党的谈判必须在 3 月上旬完成。几个在野党经过意见协调之后，联合提出对预算案的修改要求，减少 10000 亿元税收和增加社会福利费用。福田和大平事先作为接受修改意见的预备措施，已准备了 3500 亿元的财源，但与在野党提出的要求差距甚远。

3 月 7 日，执政的自民党与在野的五个政党的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举行会谈，在野党要求自民党首先应明确是否同意修改预算，自民党则提出，如果要修改，请提出修改的内容和目的。在野党毕竟是五个各自为政的政党，事先并未仔细研究对预算案的具体内容如何修改，提不出共同的修改方案，被自民党将了一军。

3 月 8 日，自民党总务会决定了“尽早通过预算及预算有关法案而努力”的方针，委托党的三位领导人全权处理，实际谈判者是干事长大平正芳。

3 月 9 日，自民党干事长太平与社会党书记长石桥政嗣、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民社党书记长塚本三郎、共产党书记局长石破哲三、新自由俱乐部干事长西风武夫就预算问题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从上午 11 时开始，共举行了四次。下午 5 点多钟第三次会议开始时，大平下决心在当天决出胜负来，他先发制人地来了一个开场白：“我现在的提案是没有一点水分的，不管你们再说什么，再多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请你们记住这一点。”

接着，大平详细地解释了自己拿出的妥协方案。在解释过程中使对手感到他已作了最大让步，不好再向他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了。大平在此大概又将他当外务大臣时的谈判本事发挥了出来。解释完毕，大平向几位在野党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只请回答一句话。”在休会的 15 分钟里，在野党进行了最后磋商。在第四次会谈时在野党表示，自民党的方案虽不能令人满意，但也只好如此。双方决定在众议院通过经大平修改后的预算案。

大平干事长事后谈了他当时的想法：“在第三次干事长、书记长会谈时，我下定了决心。福田可能很颓丧，认为对在野党让步太大了，把预算案的完成日期订在 3 月 19 日访美之前，结果是捆住了手脚。我原准备再与在野党方面力争一下，实在不行再让步。但是在野党依靠人多势众来压我，所以不得不妥协。本想采取解散行动，但迟迟下不了决心。我想从中间突破（即在众院大会上表决），但缺席人数可能会很多。于是我放弃了这些想法，亲自决定了妥协方案的内容。”

尽管有如此复杂的思想斗争，但谈判终归成功了，这届国会最大的难关被大平干事长突破了，对预算案的修改也在自民党和政府预定的范围内，而且在一天之内即完成了原以为将会是旷日持久的谈判，自民党干部们都很兴奋，齐声对大平说：“辛苦了。”政调会长河本敏夫事后称赞大平说：“那天，大平干事长的决断一举定乾坤。”公民党书记长矢野称赞大平：“他是一位目光远大、思想灵活的政治家。他充分认识到朝野势力相当这一现实，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也要倾听在野党的意见，但也有其顽强的一面。……是他的态度和远见使执政党和在野党势力相当的国会发挥了作用。”

会谈后的次日，报上刊登了大平干事长同共产党书记局长石破满面笑容地握手、其他四位在野党领导人同时在场的照片，注明为“新奇的照片”。大平本人也为这次谈判成功而高兴，他说：“我觉得搞政治挺有意思，而且越来越有意思。”大平觉得克服重重困难后获得成功，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

乐趣。

预算案于3月18日福田访美前夕在众院通过后才提交参院，自民党在国会中面临的又一大挑战便是7月将举行的第十一届参议院改选。大平干事长在1月召开的第32次自民党大会上已作为重要问题提出，并分析了改选形势。日本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其中的约半数席位。1974年第十届参议院只有议席252个，到1977年要改选133席，其中自民党要改选65席，在野党要改选58席，但当时自民党在参议院中有127个议席，仅比半数多一席。如果在改选中，自民党这65席不能全部保住，则自民党在参议院中的议席将少于半数，这对以后自民党提出的议案在参议院的通过将造成困难。因此，自民党无论如何要力争在这次改选中至少维持现有议席。

但是，1976年是自民党内部纠纷激化之年，党内纷争严重影响了参院改选的准备。参议院不存在解散问题，是定期选举，因此一般应从一年之前就定下候选人名单。但自民党直到1977年1月末，也仅定下了全国区的23人和地方区的42人，正好65人。但为防其中有人落选，还必须再多定约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大平在1月的党大会上就提出在全国区再定出五六名，地方区再定出十几名。为了寻找合适的候选人，特别是寻找全国区候选人，大平干事长在3至4月间四处奔波，真可谓含辛茹苦。由于自民党选定候选人的工作很困难，以致新闻舆论界都认为，这次参议院改选，在野党一定会获胜，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对比将发生逆转。所以在当时舆论界出现一边倒的预测，认为自民党和在野党联合执政的时代已经到来，还有些报纸登载了醒目的标题《执政党、在野党换位的可能性很大》。

这一切对大平干事长这位自民党参议院选举的总指挥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压力，但同时大平也产生了推动力，推动他像上足了油的马达，为了这次选举的胜利不停地思考、计算、奔波、动员、游说，仿佛身体内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完全不像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在候选人基本选定之后，大平反复思考的就是全国选区的投票率问题。因为全国选区推选出了数十名自民党候选人，不像地方选区每地只有一二名候选人，可以集中投该选区的票。全国选区如果选票分配不当，某位候选人可以获得大量票数而当选，而其他本可当选的候选人则可能因为得票不够而落选。因此必须算计好每位候选人应大致获多高的投票率方可当选，要求本党投票人不要过于集中地投某一个候选人的票。大平为此制定了周密计划，注意搜集各方面信息，及时地把握瞬息万变的形势，并充分调动手下的选举班子各位成员的积极性，使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进入四五月份之后，大平干事长逐渐忙起来了。他一方面忙于会见来自各地的成批的客人，同时又得会见外宾；一方面继续参加国会，一方面又利用休会时参加地方候选人的誓师大会，每隔一天就得出去跑两天，然后又赶回东京开国会，接着再出发去声援候选人……有的地方还去了两次。5月中旬到6月初，每日连轴转，几乎就没有休息时间。到了6月1日大平对记者估计选举结果时，表示保住65个议席是极有可能的。这时选举的各方面工作已基本就绪。

6月17日，参议院选举正式开始，7月10日定为投票日。各候选人纷纷出马开始争取选票。最难把握的是所谓流动选票，即一些政治倾向不明确的选民手中的选票。这种选票占全部选票的25%至40%，很有可能决定某一政党选举的成败。因此大平干事长绞尽脑汁地与同事们一起想办法，争取这一

部分选票不要流向在野党，将其吸引到自民党方面来。

为此，大平正芳决定改变通常的选举战术，不进行本党同在野党之间的政策论战，这种论战往往引起选民的反感。选民认为，双方不过是为了拉选票而使用一些漂亮的承诺来骗取人心。况且自民党若提出一个新政策，在野党则会提出更吸引人的主张。这样对争取中间选票没有好处。不提出新政策，反而在野党找不到攻击自民党的口实。因此在投票前三四天，社会党和民社党的一些负责人都说：“自民党真狡猾，不提出任何政策。”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自民党内部的不团结，大平干事长一再向党员宣传，存在着自民党与在野党在参议院中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可忧性，稍一不慎，这种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性，使全党有一种危机感。

同时，在选举开始后，大平又亲自去各地方的选举事务所，参加“开战仪式”，四处为候选人游说，特别是将重点放在两人区，从6月末到7月初，马不停蹄地奔波。值得一提的是，福田总裁对大平的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慷慨援助，显示出“大福合作”的强大威力。

大平的一番苦心和努力总算没有白费。7月10日，天气晴好，这对投票十分有利，因而投票率较高。到了晚上7时半开始开票。9点和9点半，大平干事长和福田总裁先后来自民党总部。福田看到当选者越来越多，脸上绽出笑容。而大平在未看到胜利之前，始终绷着脸，显得老成持重。

到12日，开票全部结束，自民党在全国选区共有19名，地方选区共有47名当选参议员，共有66名当选，自民党终于获胜，报纸舆论预测的“逆转”与“联合”均告落空，这种预测直到16年后才有了实现的机会。

政治评论界认为，这次自民党在参议院改选中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大福联合。正是由于这种联合，协调了党内矛盾，成功地发挥出自民党潜在的能力，不仅自民党，就连在野党也感到了大福联合的威力，社会党的干部纷纷说：“自民党这招干得太厉害啦！”

而作为这次选举实际总指挥的大平干事长，对这次参议院选举却有着更深的考虑。在8月30日党的夏季研修会上，大平对选举进行了总结。

首先大平对选举结果进行了量的分析，认为这次自民党比1974年选举增加了3席，全国选区减少了7%，地方选区增加了0.8%，仅是微小调整，说明政治基础没有大的变化。

应怎样看待这次选举结果呢？大平认为：“首先应该看到选民不希望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对现状没什么特别的不满，即具有所谓肯定现状的意识。

“这还可以说明，选民对在野党所宣传的在野党联合政权这一观念反应冷淡。在历次选举中，在野党之中皆会有人鼓吹建立反对自民党的联合阵线，以取代自民党政权，这次也不例外……可以认为，选民每次都未听信这种老调，这次选举也是如此。”

大平特别提醒大家：“根据最近的舆论调查，不支持任何政党的人数从20%急速增加到全体选民的40%。”这种无党派阶层急速增加的倾向，大平认为尤其值得密切注意，特别应注意家庭主妇、退休者和年轻人。

那么这次参议院选举有什么教训呢？大平认为，这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选民“并非认为自由民主党优秀而欲积极支持。自由民主党无论从体制、组织以及政策各方面看，都不能称为十分合格。但是，自由民主党若不牢固地成为核心，则谈不上政局的安定和政策的推进。因此，虽不能给自由民主党以压倒性支持，但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自由民主党的议席低于半数。右手灸治

的同时左手又鞭挞之，这可以说是选民对自由民主党的态度。我认为这件事显示出选民的‘绝妙的平衡感觉。’”

“选民的思想意识基本上是健全的，一方面阻止政党和政治家们过于自信和骄傲，同时又为了不致于过分破坏政局的稳定，凭着他们极为绝妙的平衡感作出了稳妥的判断。我也认为同时给自由民主党提出了警告和激励，告诫‘自民党不能骄傲’但‘自民党责任重大’。”

### 踌躇满志

1977 年对太平干事长来说似乎是好事不断。

首先是长期困扰大平的肾结石病突然不治而愈。1976 年 8 月，大平曾因肾结石破裂而痛苦不堪。1977 年元旦大平进皇宫朝贺，上厕所时，破碎的结石随小便排了出来。这一下把大平从长期痛苦和烦恼中解救了出来。他高兴极了，觉得这时身体什么毛病也没有了。同事们都说他“一开春就碰到了好运气”。

其次是 1977 年新年前夕，大平在东京都世田谷区濑田一丁目 28 番地 3 号的新居建成了。1974 年 1 月大平访华归国后不久，这里的原住宅被烧毁，大平一家一直借住在别人家。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新家，过了元旦又迎来了乔迁之喜。在同一个庭院，又分了一部分给二儿子大平裕夫妇盖了住宅。在大平住宅后面，女儿芳子和女婿森田一的家事先已盖成。大平夫妻对这样安排感到十分满意。

接着便是大平干事长在 3 月与在野党的预算问题谈判顺利完成，使自民党内阁提出的预算案在国会得以顺利通过，大平威望顿时提高不少。

到了 5 月，大平最关心的小儿子大平明的个人问题也得到解决。31 岁的大平明与大正制药公司董事长、参议员上原正吉的孙女上原吉子在这个月订了婚，婚礼将于秋天举行，殷实的小家都安置好了。大平干事长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11 月 4 日，由日本银行总裁森永贞一郎夫妇作媒人，大平明与上原吉子举行了婚礼，大平高兴得向每一个出席婚礼者赠送日本地图和世界地图作为纪念。

7 月参议院选举自民党的胜利，更是使大平干事长声誉倍增。他成了新闻传播媒介报道的中心人物，报刊几乎每天都登载他的言行。人们都顺理成章地将大平干事长看成是下任总裁和总理的当之无愧的人选，大平的政治事业蒸蒸日上。

这一年也正好是大平连续任众议员 25 周年，大平干事长和福田首相等九名议员一起于 7 月 27 日作为长年任职议员，在临时国会众院全体会议上受到了表彰。他们九人都是 1952 年 10 月 1 日大选中当选议员后，一直连续当选到 1977 年的同期议员，亲眼目睹了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日本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并为这种变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当他们受到表彰时，自豪的情怀油然而生。表彰过后，他们又到保利茂议长的休息室合影留念，大平夫妇和福田夫妇站在一起合影时，不禁使人联想到舆论界将这二位政治家的联合称为“大福蜜月”，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进入 8 月，大平开始了他的暑期休假。大平利用这个难得的闲暇机会返回了故乡，出席当地举办的为纪念大平正芳在众议院任职 25 年而举办的讲演会。大平受到了乡亲们非常热烈的欢迎，大平心中十分感动。他深知自从 25

年前，香川选区的选民们将自己这个不知名的候选人第一次选为众议员以来，每一届大选，乡亲们都要为自己的当选竭尽全力地奔波操劳，的确辛苦万分。大平也深深感受到，自己在政治上发展到今日这种地位，除了其他多种因素外，与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当然，大平家乡的支持者看到自己所拥戴的大平正芳已由一个无名之辈发展为著名的政治家，不禁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感到大家多年的奔波辛劳并未白费，更何况他们看到大平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很有可能实现从香川产生总理的愿望，乡亲们为此更加欢欣鼓舞。

大平为感谢家乡父老的培育和多年来的支持，总是想为故乡多办点事，留下点东西以资纪念。前面所述他开办西讚学素和担任香川灌溉渠推进联盟会长，就是这种愿望的体现。但大平觉得自己的恩人加藤藤太郎为香川县留下了加藤奖学财团，自己还应该为故乡留下点什么。他曾对秘书说过，希望充实现有的大平文库奉献给家乡的父老，但这愿望终生未能实现。

大平从故乡返回后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利用这个难得的休息机会，将1970年出版《旦暮芥考》以来，自己的演说、讲话、随笔等汇编成一本书，作为自己担任众议员25周年的纪念，也是对人生旅途一个重要阶段的总结。为此目的，大平带了许多资料到了箱根，住在箱根观光饭店，除了休息之外，主要就从事这项工作，当然也并未放过对时局的关注。他整理的书于1977年12月20日由鹿岛出版会出版（非卖品），定名为《风尘杂俎》，包括他1972年重新担任外务大臣以来的演讲、报告、建议、文章、随笔等，也包括了他这次暑期休假期间在自民党夏季研修会上的演讲。

大平这次演讲是8月30日在箱根作的，题为《转换时期的政治运营方针》。到9月上旬又作了三次。收录在《风尘杂俎》中的题目为《转换时期政治》这一章中。在演讲中，大平提出了查明洛克希德事件的真相是政府的任务，谈到了即将到来的众议院总选举，分析了怎样对待妇女、老人和青年这一政治课题，主张政治、经济应基本一致。他还谈到了社会上希望有公正、廉洁的政治，自民党应正确地把握事态等。然后大平着重总结了上月参议院选举的教训，对自民党进行了评价。讲演最后，大平提出了自民党改革的目标和具体对策。新闻界报道认为，大平在这次研修会上的演讲表现出了“今后执政的信心”。大概出席研修会的自民党干部们也有同感，他们纷纷要求大平题字并合影留念，像众星拱月似地把大平团团围住，大平离开会场都非常不容易。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大平从11月初起，开始为《日本经济新闻》的文化栏撰写《我的履历书》。该报第二版“履历书”专栏历来以评论名人而受读者欢迎。本来在1977年秋，这家报社就催促大平开始动笔，大平一推再推，到了晚秋时，报社方面对大平说：“明年1月的履历专栏为先生您保留着呢。”大平感到再也不能拒绝和拖延了，同时大平也感到工作虽忙，也应该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了。于是他便匆忙执笔，写下了《我的履历书》。从1978年元旦开始，分三十次连载于《日本经济新闻》。1978年7月，这些连载经大平稍加修改后，加上大平的几篇随笔一起，以同名的单行本出版，大平在单行本的后记中对履历书作了说明：“这只不过是一份‘履历书’，按照时间顺序，简单地记录了我的平凡的生涯。也可以说是一种素描，是以快跑的速度追溯了我所走过的山路中坎坷不平的每段路标。因此，对周围山谷的状况和山路的崎岖，叙述得不够充分。”

“……回顾往事，我能从战前、战时、战后这一空前绝后的激烈动荡时代平安无事地生存下来而至今日，真是感慨万端。感谢许多良师益友对我的情谊。在这个时期，虽然我没有取得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但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遭到致命的失败。

“我只是后悔少壮时代学得太少了。总之，今后我要认真学习，至少我也要窥视一下‘藏书邀友，积德邀天’之境。”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踌躇满志的大平正芳现在所想的，就是攀登上政治生涯中的最高阶梯。他在1978年1月9日对来访的高松高商同学太田诚三郎说：“我想今后要干的事情只有一件……要干就要拼全身力气，不仅不能顾及个人利益，也不能受一党的利益所干扰，要尽量多做一些好事……所以，我认为今年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决断之年。”

## 大福体制的裂痕

“大福联合”使日本自民党内出现了少有的平静，似乎各种纷争都烟消云散。大福联合体制在政治上发出的威力有目共睹，它不仅使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了胜利，而且在以后的参议院补缺选举和七个地方知事的选举中，自民党均获得胜利。因此，支持自民党的人们都希望大福联合的政治体制长期维持下去。

福田首相在各种场合一有机会就宣传“大福一体”、“大福体制滴水不漏”，表明二人关系融洽，无懈可击。大平干事长也公开说：“大福之间不会发生争执，现在自民党的严峻形势没有大福对战的余地。”两人统一口径，给人的感觉是大福联合的政治体制稳如泰山，不可能撼动。

但是，在这表面稳定掩盖下，大平和福田的联合已悄悄出现裂痕，最终二人由联合走向对立。大平与福田二人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首先是福田打算解散众议院，大平反对解散。福田在参议院选举自民党获胜后，就半开玩笑地说：“大选让我来搞吧。”7月31日，大平与福田举行了会谈，会谈之后，大平曾对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透露，会谈内容是关于改组和解散问题，福田主张解散众议院，大平对此表示反对，他对福田说：“我们目前拿不出解散众议院之后再举行选举的这笔资金，我们必须给兵将以休养生息的时间。”最后二人对此未得出结论，决定以后再商议。

福田为什么在参议院选举获胜，大福体制稳定的情况下解散众议院呢？这让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政治评论界推测，一个原因可能是福田看到大平指挥参议院选举获胜，威望急剧提高，所以自己作为首相，也想通过解散众议院，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向全社会显示自己的能力，以提高自己本来不高的威望。第二个原因是解散众议院后，总裁公选无法进行，福田便可自然连任下去，这一点党内许多人都认识到了。大平当然不会不理解。不过对这一点福田本人是不会承认的。他在会见记者时曾坚持说：“我福田决不是那种为自己连任才解散众议院的卑鄙小人。”但舆论界认为这种欲盖弥彰的解释不能使人信服。

福田打算利用1978年的预算问题寻找一个解散众议院的机会。按照往常惯例，自民党政府提出预算案后，在野党方面皆要提出修改预算的动议。福田就可坚持不作修改，使预算案无法在国会通过，福田便以此为导火线解散

众议院。

因此，安信晋太郎官房长官就曾代表政府就预算问题作了强硬的发言：“反正是越来越穷，预算如果被修改就解散……”

大平为了避免众院被解散，就必须设法让预算案能在国会顺利通过。1978年2月19日，在预算问题即将被提上议事日程时，大平说：“包括在野党方面提出的减少所得税的要求，只要是合理的，就要现实地对待。”大平的讲话受到大藏省以及总务会中福田派和中曾根派的反对。大平顶住这些反对，稳妥地按自己的计划就预算问题与在野党方面进行协调。

大平的计划是首先向在野党保证将本年度预算方案的正式修改工作转交给下届临时国会，如果有部分在野党同意，则自民党政府提出的预算案就可在本届国会不加修改通过。如果在野党不同意这种作法，则作部分修改，作为在下届国会正式修改的保证。通过时间差来达到不解散国会的目的。

2月24日，与一年前一样，大平干事长又同在野党的几位领导就预算案问题进行了交涉。在野党方面要求“重新编写预算书，拿出800亿的财源”。实际上大平已了解到，在野党之间在修改预算问题上并不统一。所以在会之前，大平已派田中六助去同新自由俱乐部协商，达成的协议是：“在预算委员会上即使否决了预算案，在正式会议上也要通过，并在正式会议上否决社会党提出的重新编制预算的动议。”大平心中有数，只要新自由俱乐部与自民党联合，就能在国会上获得稳定多数，预算方案将原样通过。所以大平按原计划向在野党提出了较为强硬的方案：对预算案进行修改的部分只限于执政党、在野党意见一致部分；在野党提出的减税和增加福利费等要求，将在有关小委员会上协商，协商结果在秋季临时国会审议补充预算时实现。这样，由于在野党方面本身意见不统一，所以预算案要修改部分极少，3月7日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众院解散被大平巧妙地避免了。以后福田又吹了几次“解散风”，但直到1978年底，众院仍未解散。

事后福田的一位亲信说，福田“原打算利用预算方案同在野党进行交涉的机会解散众议院。现在，预算案已按政府原来的预算方案得到通过。所以，现在的事态发展已与大平的调子协调起来了。”在是否解散众院这一问题上，大平比福田占了上风。

大、福不和的第二个问题是国民经济实现7%增长率的问题。1977年3月，福田首相访美时，在日美首脑会谈中曾表示，为了摆脱世界经济的停滞局面，日本应担负起作为世界经济的“三个火车头”之一的责任，因此要“实现7%的增长率”。但福田于3月25日访美回国后，在参议院会议上表示一定要达到6.7%的增长率。参议员们认为这是福田对美国总统卡特的保证。

大平干事长认为，“正因为政府明言要实现7%的增长率，所以日美会谈才达成协议，必须履行这个诺言。”因此在1978年1月的党代会上作党情报告时，大平就向与会代表宣布：“本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这是内阁向全世界许下的诺言。”在当时世界和日本经济都不大景气的形势下，如此高的增长率一旦公之于众，将使福田首相陷入尴尬的境地。福田立即要求党内取消这一许诺，他表示：“7%不过是提出了一个努力目标。”而大平则坚持认为：“政府与政府间作出的保证是公约，无论如何也要实现。”后来大平对别人说：“现在，国际社会关系紧张，在国际上作出的承诺，至少要有保证，这样可以避免国际信誉的崩溃。”

大平和福田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被新闻界抓住，报纸立即报道说：大平“以间接的形式谈到了不能实现7%增长率是福田首相和政府的责任问题”。福田一方也认为大平这种态度是为“动摇政权埋下伏笔。”大福之间的裂痕日渐扩大。

在福田内阁改组时的人事安排上，大平和福田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1977年11月中旬，执政近一年的福田内阁面临着改组问题。这次改组的焦点是党三役的人选。大平认为，现在的党三役即大平干事长，江崎总务会长、河本政调会长三位领导的组合非常恰当，三人都有威信，相互配合也不错，干起工作来效率较高，因此没有必要再更换了。但福田的想法却不同，他想起用与自己同是来自群马县的中曾根。本来福田和中曾根同属群马选区，在众议院竞选时还是对立的竞争者，一般人认为他们不会彼此联合。但福田考虑到若使中曾根一派支持自己，则连任总裁便有了很大希望。

在11月27日，福田和大平举行了4个半小时的会谈，全面研究了党和政府改组中的人事安排。当福田把起用中曾根的打算告诉大平并征求其意见时，大平并未反对，只是说：“中曾根是同总理一个选区的实力人物，起用中曾根任重要职务，可以显示总理的度量，不必客气。”

这样，就决定了党三役为大平干事长、中曾根总务会长和江崎政调会长。河本敏夫转任通产大臣。大平之所以没有反对福田的安排，是考虑到如果福田担任两年首相就卸任的话，这是他任内最后一次人事变动，应尽量尊重首相的意见。

但是，大平的让步却被舆论界作了歪曲的宣传，舆论界认为是大平对福田的人事安排抵抗无效，才出现了这种改组结果，认为自民党内出现了福田与中曾根的联合。果然，后来在修改预算问题上，中曾根就站到了反对大平的立场上。舆论界还认为，第二次福田内阁起用了一些与大平立场不同的人物，使福田改组内阁越来越具有反大平的性质。

## 对立的公开化

福田是否连任总裁的问题是大福不和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大福之间的对立终于走向公开化。大平与福田1976年11月达成秘密协议，推举福田为新总裁和总理大臣的提名人选，虽然没有在文字上确认，但福田事先已在口头上对大平的心腹田中六助表明了这个意思，这才有了让福田掌权的“密约”。因此，大平起初一直相信，福田一定会遵守两人之间的口头协议，在两年任期满后自动交出政权，推举大平出任总裁。

1977年10月末，自民党实行总裁预选的具体步骤出台，预选定于1978年11月1日开始，11月27日开票。在预选中先选出获得票数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再由自民党众参两院正式选举决定总裁。有预选投票权的党员限于1978年1月以前入党者，后来又将这期限延长到2月末。由于在公选期间，党费将由政治家负担，因此大批愿意参加公选投票者纷纷加入自民党，使自民党人数在短短几个月内翻了两倍。总裁公选的气氛一下浓厚起来。

但是，在这种气氛逐渐形成的同时，福田的态度却十分暧昧，既不明确表示要放弃参加总裁公选，将政权转交给大平，也不公开声明要连任总裁，而且时常出语矛盾，使一般人都猜不透他的心思。

早在1977年8月末，福田就说了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在私下的场合，他

一方面讲“必须刻不容缓地把政权转交给大平，否则无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讲“现在甚至连田中派内也有些家伙认为我参加总裁选举是比较合适的”。

总裁预选的步骤出台后的11月26日，福田在与大平所信任的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通电话时，要求伊藤“你只管对别人讲，如果福田参加选举，大平就不参加了”。但到了2月12日，福田又对伊藤说：“10月份，我将宣布推举大平参加公选。”使人感到福田有些出尔反尔，反复无常。

大平这段时间的思想也十分矛盾，他当然希望在维持密切合作的大福体制的前提下，不通过你死我活的总裁竞选，而由福田主动履行1976年的君子协定，将政权和平地转交给自己。所以，1978年元旦，《产经新闻》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大平谈话：“在竞选中不欲与福田总理进行争夺，而想通过协商得出结论。”但到了2月13日，大平又意识到：“虽说有两年之后换班的协议在约束着我们，但现在福田已经翻脸不认帐了，他已下定决心，争取连任。”

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大平决定一方面积极行动准备参加总裁公选，另一方面又密切注视政局发展及福田态度的变化，不到最后关头，尽量避免与福田公开决裂。

2月18日，大平正芳干事长回到家乡，出席了自民党香川县党部临时大会。大平在会上就总裁公选一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总裁公选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大事，必须做到守秩序，光明磊落，洁白无私。公正地进行选举比谁当选总裁更为重要。”大会通过了“希望实现大平总裁决议”，当天的报纸就报道了大平被香川县联合支部“推选为总裁候选人”的消息。

这种情况使福田有些焦急，他尚未公开表示自己将出马竞选下任总裁，却让大平抢了先，这无疑会干扰他企图通过协商连任总裁的计划。于是福田只好亲自出面阻止大平。1978年4月26日福田即将访美之前，大平与福田举行了会谈。福田直截了当地对大平说：“如果我参加竞选，你就不参加，希望你公开表明这种态度……我想修改党章，把总裁的任期定为三年。如果两年，什么事也办不成。”

对于福田的这种表态，大平早有思想准备，他回答福田说：“我的同仁们坚持要我参加选举，不过，我想自己决定自己是否参加选举。你不必顾虑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啦。”

4月30日，福田启程访美，5月5日发表日美联合公报。这一天，福田返日途经夏威夷时会见记者，并谈到了大福关系和公选问题。福田表示，“由于大福联合，所以政局稳定”。“我和大平干事长一致认为，我们两人不互相争执，是日本政治的最大课题。至于如何迎接总裁选举，是年底要考虑的事。到那时，大福将会协商处理好这个问题。”福田这里已暗示，将通过协商方式决定统一的候选人。报纸立即刊登出“大福互不争执，首相有意连任”的新闻，对此大加报道。

这一天是日本的5月6日，大平正芳也在这一天决定了自己的基本战略：暂不公开出面，由宏池会下级提出要大平参加公选的要求。这样到11月底之前，维持现状，自然进入公选。当天晚上，大平会见记者时说：“总裁公选的舞台已经开始转动起来了。公选是进行党改革的支柱，必须实行，要作好准备。”

5月10日，大平一派的年轻议员和干部召开联席会议，铃木善幸、小

川平二、佐佐义武等大平派骨干均参加了会议，决定在总裁公选中拥立大平，并表示“在福田首相的任期中要支持福田，但按照党大会的决议实行公选，才是对国民的回答”。5月25日，大平在内外形势调查会上作了讲演，在这之前，大平又为了香川县知事的选举问题作了讲演。报纸对这两次讲演作了分析，5月26日的《读卖新闻》发表了题为《大平决心参加公选》的报道，舆论界普遍认为大平出马竞选总裁的态度已很明确。

面对大平派紧锣密鼓的准备活动，福田首相似乎有些猝不及防。福田立即请大平于5月27日到名古屋的一所饭店里进行协商，两人达成“大福政治休战”的协议：将公选问题搁置到秋季，全力以赴处理当前政局，总裁公选一定实施。当福田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到这些原则时，大平当场表示“有同感”。这就表示同意实行“政治休战”。

在政治休战期间，大平一方面继续作竞选总裁的准备，一方面应《每日新闻》评论员、著名评论员田中详之助的请求，于6月26日与田中详之助进行了一次长篇对谈。这篇对谈后于9月3日以《复合力的时代》为书名作为单行本由生活社出版。对谈涉及到了经济、政治、国防、外交、教育、新闻出版、社会道德、个人信仰等诸方面问题。大平干事长以较为风趣的语言就这些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是对日本内政外交诸方面问题作了一个总的发言，为下一步竞选总理作了一个政治表态，让国民对自己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虽达成了“休战”协议，但双方并未真正休息。大平和福田一面在作参加公选的准备，一面又保持频繁接触，加强相互对话。在这期间，福田继续作出相互矛盾的姿态。6月10日他曾说：“我想把政权让给大平君，我决定不参加公选……大福相争将会导致两败俱伤。”一个月后，他又说：“现在有人放风说我已作好连任的精神准备，正中下怀……什么密约，根本不存在。”7月20日福田对大平说：“我解散了众议院之后，就辞去首相职务。明年的首脑会谈大概得由你大平以首相的身份出席啦。”但不久以后他又对大平说：“我搞个大选，把政局稳定下来以后再交给你吧。”

与此同时，福田总理积极地解决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问题，以提高自己在国民中的威望。先后签订日韩大陆架协定，启用成田机场，又派外相园田直前往北京，于1978年8月12日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尤其是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一重要行动，受到了执政党中大部分人和在野党的欢迎，使福田在国民中的支持率大大上升。但当时的政治评论界认为，福田纠夫在对外政策上一贯是以“鹰派”的代表人物著称，在担任外相时曾为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出力，后来又因亲近台湾而阻挠“鸽派”代表大平正芳与中国接近，现在竟主持与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显然是为了争取连任而施行的政治战略。但无论福田主观目的如何，客观上却使舆论的天平偏向了自己一边。

这时福田认为，不用解散众议院自己也能连任了。9月份召开的临时国会除了批准补充预算案外，还要批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迎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0月访日交换条约批准文书，因此不可能随意解散国会。加之福田担心解散国会反而会招致党内议员的反对，不如维持现状更为有利。

在临时国会上，大平干事长又同新自由俱乐部联合，巧妙地使政府的补充预算案顺利通过，彻底避免了国会的解散。现在，大平正芳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公选了。

在 8 月 31 日时,已统计出有资格参加总裁预选投票的自民党党员和党友共有 150 多万人。从这时起,大平正芳、福田纠夫、中曾根康弘、河本敏夫四位欲参加总裁公选预选的政治家的阵营,便开始深入到各地选民中争取选票。各种报纸也开始搞所谓民意测验,分析各位候选人的可能得票率。这次预选采用计分制,一千票一分。各种报纸的预测结果均显示福田将会得到比大平高得多的分数。这也反映出选民们希望大福联合的政治体制继续维持,以保证社会的稳定。

按预选步骤, 11 月 1 日开始预选, 11 月 27 日开票。选票是邮寄到选民手中, 选民拿到选票约是 11 月上旬。如果估计 11 月 10 日是投票高潮, 10 月 10 日以前大平就应该发出选举战斗命令。但大平迟迟不发出命令, 宏池会的干部们已躁动不安。而预测福田将取胜的报道却一天多于一。10 月 10 日的《读卖新闻》根据民意测验抽样分析结果, 认为“福田首相握有过半数的选票”, 这更刺激了宏池会的干部们。大平的心腹田中六助甚至说出了有失君子风度的话: “如果这样沉默地眼看着福田当选为首相, 我就要闯入首相官邸痛打他一顿再走!”

其实, 大平又何尝不想早日发出战斗命令。作为一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 当然梦寐以求的是能够登上可以最大限度实现抱负的政治顶峰。因此, 当一名想登上权力之巅的政治家面临人选或落选的紧要关头时, 就恰如一个人走到生与死的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 必须当机立断。但此时的大平, 并非不想出任总理大臣, 而是不想通过残酷无情的竞选来夺得这一职位, 他心中还惦记着当初与福田之间的“密约”, 期待着福田在最后时刻能遵守信义。所以当大平派的干部们催问他为何还不发出战斗命令时, 大平说: “到 11 月份, 情况也许会变的。”

但是, 大福对立公开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舆论对大平也日益不利, 若再不采取行动, 将会坐失良机, 情况已十分紧急。到 10 月 11 日, 大平派已是群情激昂, 从各地支持团体那里也纷纷发出疑问和请求: “福田派已下令要各地方团体支持福田”、“福田已经行动了, 大平派该如何行动, 快下指示吧”、“大平太天真了, 就因为政治休战而一直未作竞选准备。哪有竞选候选人不发表自己政见的?” 在周围亲信的劝告下, 大平才下决心“结束政治休战”。

10 月 13 日, 大平经过反复考虑, 想出了一个竞选宣言: “结束大福体制, 集结新的势力”, 并征求了本派干部的意见。这一宣言实际上还是不愿表示同福田彻底决裂, 只是申明大福合作的第一阶段结束, 今后还将以新的形式合作下去。这一想法本身并不错, 但大概反映出大平还对福田“交权”抱有一线希望。宏池会的干部们虽然觉得宣言显得有些软弱, 但还是决定发布。

13 日晚, 大平秘密会见了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 向他说明了 1976 年与福田订立所谓“密约”一事, 还说明了他出马竞选总裁的理由, 希望能心平气和地搞一场竞选。

14 日在德岛举行政治经济文化酒会, 大平干事长会见了记者。大平在肯定了大福体制发挥的作用后, 宣布: “大福体制由于在这次公选中将产生新的政治势力而告结束。”

这一宣言的发表, 使宏池会的干部们放开了手脚, 各自都回选区去进行预选的准备活动。

10月20日，大平与福田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大平向福田表明自己在第二天将正式发表出马竞选的声明，福田无奈，只得表示谅解。但提出了两点希望：一、今后大福之间应继续合作；二，希望大平不要与田中派合作。大平虽然应允，但以后的形势发展却未允许他这么做。

大福之间的最终决裂是在10月24日。10月21日，临时国会闭幕。这一天，大平正芳出席了大平派议员的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拥立大平参加总裁公选的决议，大平向社会正式公开宣布出马竞选总裁。同一天，中曾根康弘、河本敏夫也宣布参加竞选。福田因为要接待将于10月22日来访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故暂未正式宣布。大平宣布了竞选声明后，在对记者谈话时，仍然表现出对福田的尊重，认为出马竞选对二人的信赖关系毫无影响。10月24日，大平正在家中与新闻记者们闲谈时，突然接到了福田打来的电话。记者们并不知道电话是谁打来，也不知道电话内容。但见大平放下电话后，脸色发青，似乎很气忿。呆了一会大平对记者们说：“虽然我身上有一个摆脱不掉的羞怯弱点，可我从内心羡慕福田的毫不妥协的刚强劲。”记者们感到莫名其妙。由于大平马上要去会见来访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因此也未对记者作任何解释。当天，大平对他信任的人透露了电话内容。福田在电话中对大平说：“我们这边已无法控制，所以前次的协约已不能再遵守下去了。”大平说：“是由于我们这边的原因吗？”“不！不是你们的原因。”

大平这才知道自己太天真了。两年前福田为了当上总理曾许诺任满后向大平交出政权，实际上只是缓兵之计。自从1977年7月参议院选举胜利后，福田感到政权稳固了，已在考虑连任的问题，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说了不少自相矛盾的话，其目的不过是阻挠大平竞选总裁，以达到连任的愿望。秉性忠厚的大平感觉自己受到了长期的愚弄，真有些怒不可遏。两天后，福田托人捎话请大平再同自己面谈一次，大平说：“事到如今还有我和福田见面的必要吗……”大平对福田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大、福关系最终决裂。大平决心全力以赴参加公选，完成这肩负重任的最后攀登。

## 第九章 登上权力之巅——第一次大平内阁

### 殊死的决战

大平与福田公开决裂之后，以铃木善幸为首的大平派的干部们便毫无顾忌地投入了为大平竞选总裁的活动中。宏池会的议员们都返回各自的选区，动员党员和党友投大平一票，特别是要注意那些新近入党，政治倾向还不太明显的“中间派”党员。同时，开始着手起草大平竞选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归纳起来大致有三方面内容：

一、将多年来大平的维护和平的主张，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形式加以具体化；

二、重申大平于1972年出马竞选总裁时的政策主张“建设田园城市构想”；

三、用“充实家庭基础”这一计划来建设新型社会。大平于10月26日和28日，分别发表了“田园城市构想”和“充实家庭基础”计划。10月30日，大平又在日本电视台采访自己时，否定了传说中的“大福密约”，他说所谓的“密约”即便有过，没有被遵守，也就等于没有，不成其为什么问题。

10月31日，福田正式发表出马竞选的声明。

11月1日，发布了总裁预选公告。11月4日是报名结束之日，当天举行抽签，抽出顺序为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河本敏夫、大平正芳。以后的电视辩论会就以此为顺序进行，有关几名候选人的宣传报道也以此为先后顺序。

这次选举的预选以得分多少为序。每个选区的分数是固定的，约1000个选民为1分，全国总分为1525分，即有投票权的党员和党友共有1525千左右。最后以全国得分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进入正式选举。每个选区的分只由在该区获得选票最多的前二名按实际得分率分配，第三名无论得多少票也计零分。这样，得票与得分不一定按一比一的比例计算。所以，候选人必须在有把握的选区争取得票数居前二名才能获得有效的分。这是一项相当伤脑筋的计算工作，也是一场艰难的攻心战。为此，大平选举班子拟定了精细的战略战术，大平派的全体人员都按这一战略战术开始了不辞劳苦的拉票工作。

大平派首先大造声势。11月1日竞选开始的下午，在东京新大谷饭店，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拥立大平正芳总裁候选人誓师大会”，会场前面挂着横幅，上书“实现香川县民的愿望——大平内阁”。从大平的家乡来了几百后援人员，他们先到达会场后，排成两道人墙，鼓掌欢迎陆续到达会场的人，使与会者一进入会场就感受到热烈的气氛，自己也禁不住情绪激昂起来。结果，到会者共有7000人左右，将会场挤得针插不进。司仪宣布开会之后，首先由大平派负责人铃木善幸代表“大平正芳总裁候选人推荐本部”讲话，接着田中派的西村英一代表这个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发言，表示要将支持大平竞选这件事“作为我们自己的事情进行战斗”。财界代表、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会长樱田武也对大平出马竞选给予了热情勉励。大平对大家的支持和鼓励非常感激，他说：“感谢大家给我这个光荣的机会，我要竭尽全力，奋斗到底。”

11月4日抽签后，大平又花了几天时间参加了电视辩论会。从电视辩论

会的情况看，大平的演讲技巧又大有进步，改变了平时“啊”“嗯”拖腔的毛病。而福田在演讲中似乎有点喊空洞口号，给人以虚张声势的感觉。

接着，太平开始了全国巡回演讲。演讲从田中派的骨干金丸信的家乡山梨县甲府市开始，因为金丸信与福田较接近，故大平派作这样安排以争取先入为主。大平在演讲中注意避免讲空话，他对选民说：“只是高喊前进！前进！已不能从事政治了。必须大胆改变现在的政策基础，要把过去时代的高速发展的数量大胆转换为提高质量。”这样，大平在选举期间的半个月左右，在全国巡回演讲行程达 1.8 万公里，接见党员、党友 5 万多人。

11 月 10 日左右应该是预选投票的高潮时间，各种报纸对预选从很早起就作了各种预测，到这时似乎更有把握了。11 月 10 日的《朝日新闻》就用大字标题刊登了“福田得分过半数”的字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福田必胜”。福田派看到这段

时间的报纸上的各种消息都对自己这一方有利，似乎也有些飘飘然了，摆出了一副已经稳操胜券的架势。而在 11 月 8 日，怀有这种心态的福田首相作了一个发言，他说：“如果预选能得出清楚明了的结论，在正式选举中也应予以尊重。”实际意思是，如果大平在预选中得分居第二位，就应该放弃参加正式选举。

但是，福田派似乎忘了大平正芳向来以稳健、务实著称。

大平虽不擅长玩弄权术，但却常努力去争取实际效益，做不到的或尚未做到的事，绝不夸夸其谈，满足于虚无缥缈的“战果”。因此，大平在听到福田的这番讲话后，一方面进行了反驳：“只要当选的前两名候选人中没有一方辞退，就要经正式选举而不是通过协商来决定，应该按既定规则行事。”另一方面，大平又指示本派干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工作，要他们不要为报纸宣传所迷惑。

大平派的议员们回各自选区接触了大量选民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报纸所宣传的那样似乎福田派已获得多数支持而稳操胜券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党员和党友对自己拥有的投票权看得极为神圣，他们要充分了解各个候选人的全面情况和政策方针后，再决定如何投票。这种持慎重态度者将近占到选民总数的一半，因此给各候选人做工作留下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这种信息反馈回设在东京短波广播大楼的大平竞选本部后，使大平派的骨干们信心倍增，原定争取选票的活动于 11 月 17 日结束，因为估计 11 月 27 日开票，在这之前邮寄投票得用去约五六天，实际上 11 月 21 日投票便截止了。但大平的盟友田中建议：“到 20 日还有百分之十的选票没投，直到最后都别松劲。”大平选举本部根据调查分析，决定将争取选票的工作做到 24 日，以争取东京本地的流动选票，这些选票邮寄只需一天时间。而且增加了一个新的“电话战术”，动员了十几名女学生来半工半读，在市内一所装了十几部电话的房间里按选民的名单，依次打电话给这些选民，请他们支持大平。对方若是对大平有好感，就对大平派表示鼓励；对方若支持其他候选人，回答便很冷淡。这种战术收效甚高，先在东京施行，后来在神奈川和大阪也设立了电话中心。

与此同时，田中派的秘书团也从 13 日起，在东京都内到处游说，逐户拜访党员，替大平拉选票，这一举动大大鼓舞了大平派。宏池会的议员们更加努力地四处奔走，互相督促：“大平已落后了，赶紧让部下支持他！”“要与时间竞赛！”有的错找到对立派选民家中，还有的甚至被逐出家门或挨了

打，但仍忍辱负重地工作。大平本已周游全国演讲回来，到11月17日又再次出发去大阪、京都、岐阜等地作最后的竞选演说；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形势的变化逐渐对大平有利，报纸上虽仍然报道“福田领先，大平紧追”，但有些报纸已敏锐地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如《朝日新闻》在11月18日就表示：“在此之前，《朝日新闻》的报道百分之七十都是从福田那里得来的情报，现在正在纠正这一倾向，等我们看清形势后，将会全力支持大平。”

这时福田派也感到形势有些不妙，特别是11月18日长崎、兵库这两个河本敏夫的地盘的投票情况揭晓，河本第一、大平第二，福田第三而不能得分。福田派觉得很可能发生逆转，于是便不断放出话来：“不得不进行正式竞选了。”这实际上就否定了福田十天前的讲话，即如果预选获第二名的候选人应退出正式选举。同时，福田也打电话给田中派元老西村英一说：“这样进入正式选举，我担心党会变成什么样子。”

进入下旬以后，形势更为明朗，大平派取胜的信心更充分了。而福田派则对大平派出乎预料的进展感到有些恐慌。11月22日，福田首相在同部分议员座谈时，批评了总裁预选中的弊端：“与当初的目的相反，展开了物质战术，产生了派阀扩散到地方的消极面。”福田实际上是暗示大平和田中派在这次预选中使用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质。大平对福田的讲话给予了反驳：“只要福田和我能公正、廉洁地搞选举不就可以了么？我不认为我的阵营搞了特别激烈的物质战术。”这时大平不仅感到预选很可能获胜，而且已开始考虑如何参加正式选举，如何在不远的将来组建新的党的领导班子和新一届内阁。

11月26日，全国性的投票基本结束，只有北海道尚不太清楚。结果这一地区的三木派议员地崎与大平派建立起统一战线，很早就决定在预选中投大平的票，所以大平肯定能夺得第二名。

11月27日，决定胜负的日子到了。早晨7时，收音机里就放出了广播说，今天是竞选结果公布日，提请国民注意和关心。

度过了最艰苦的20多天的大平派议员们，疲劳不堪地睡了一觉之后，带着倦意来到了宏池会看开票结果。一向沉着的大平也比平日起床稍早。当记者问他心情如何时，他轻松地回答：“和平日一样……总之这是第一次考试。”至于得票数估计是多少，他说：“谁都不知道才有意思，暗中摸索更有乐趣。”

上午，大平到宏池会会长室里和本派干部们一起看开票结果。从各地不断传来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几乎在所有预计能获胜的地方都获得了胜利，不少地方分数还略高于估计，令人担心的地区大平得票也进入了第二位。宏池会里笑声朗朗，每当一个县的分数算出来，确知大平在该县获得胜利后，宏池会干部室里就会发出一阵欢呼声。这时田中派的议员也不断打来祝贺的电话。到下午1点左右，新闻记者前来询问晚刊的标题时，大平派的干部们告诉他们《大平处于翻身之势》，《大平占优势，第一已成定局》等。

下午3点刚过，不知从哪里送了一份《四国新闻》的校样。校样宛如号外，通栏标题是《大平政权诞生》，下面是几位候选人的得分情况：大平正芳，748分；福田赳夫，638分；中曾根康弘，93分；河本敏夫，46分。

而实际开票直到下午4点左右才全部结束，得分情况与《四国新闻》所载一点不差，该报真是信息灵通！

大平在预选中获胜了！而且比第二名福田多了110分！这是大平和宏池会的干部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胜利。连计算精明的田中派也未曾预料到，所有的选民和新闻舆论界也未预料到。但是，当大平出席宏池会庆贺胜利的聚餐会时，脸上并无轻松的表情，他还得考虑下一步参加正式选举之事，所以晚餐时仅说了一句“感到选举期待重大”，晚餐结束时便回家去了。

福田派当然更未料到会遭到如此惨败，对此结果简直瞠目结舌。福田派的干部们纷纷赶到首相官邸，把福田围在总理室大发雷霆，中川一郎等强硬派坚持主张参加正式选举，但盐川正十郎等人又坚决主张退出正式选举，乱哄哄地争吵了3个多小时。福田首相欲脱身出来而不得，只好一边听着这震耳欲聋的吵闹，一边反复思考着自己的进退问题。经过思想上剧烈的矛盾斗争之后，福田首相下决心作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但颇有政治家气度的选择。晚7时半，他从被围困的总理室出来到自民党总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和沙沙的电视摄像机转动声中，福田首相对记者们艰难地说出了他的抉择：“看到那种结果，我坦率地说，感到吃惊。我早就说过应尊重预选的结果。我决心退出正式选举，败军之将不责兵，我想神也有说错话的时候……”

福田实际上也就表明了自己即将下台，这就意味着只有大平一名候选人竞选总裁，大平也实际上成了自民党的新总裁，但还得由党大会正式确认。在福田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应记者团的要求，大平立即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大平在招待会上对福田总理退出正式选举的决断表示赞扬，他说：“我认为总理这是出于爱党精神，对此深表敬意。”太平接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说：“内外局势都很严峻，为此，党必须团结一致……要尽可能把党内人才调动起来，建立一个清新而强有力的领导体制是我当然应该完成的任务。”最后大平感慨地说：“有时一瞬间也有意义，有时十年也无成果，历史真是奇妙！”

## 组阁前后

预选结束后，大平正芳并未得到好好休息的机会，他要接待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新闻舆论机构的采访，起草在党的临时大会上的总裁讲话等。《朝日新闻》11月29日报道了即将就任自民党新总裁的大平正芳发表的“政策纲要”，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

通过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战略来维护和平；建立环太平洋连带关系的外交；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经济管理和开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重建财政；充实家庭基础；建设地方田园城市等。

关于行政改革，大平提出：削减办事批准手续；废除已失去作用的行政机关；重视中央的调整政策计划的机能。对财政方面的重要问题，如重建财政的根本，大平提出要彻底清查经济高速增长长期预算支出的各个项目，力图朝着“构成能适应新时代的预算”这一方向转换。对当前的重要课题——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的对策，大平提出：

- 一、通过扩大国际流动货币基金的特别提取权的机能来吸收过剩美元；
- 二、建立合作体制，以便使美元价格稳定；
- 三、大幅度放宽关于发行欧洲美元计价证券的限制，促进其在太平洋地

区的流通。关于租税，太平提出要以“和岁出相平衡的负担”为目标，纠正不公正税制，把重点征收直接税改为向重点征收间接税过渡。

12月1日，自民党召开了第35届临时党大会。由于福田退出正式竞选，太平正芳以唯一的候选人当选为自民党第九代总裁。大平新总裁接着发表了讲话：

“现在，我被本届党大会选为自民党总裁，我感到无上光荣，从内心里感到激动。”

大平对福田赳夫前总裁为重建自民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对福田在这次总裁公选中，“为了保证党内和睦与团结，主动辞去候选人资格”，再次表示敬意。

太平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目前对于自民党最重要的，“是谋求党内和睦与团结。如果说从前有过不和、隔阂、抵触，今后就应该清除它。”大平要求全党必须站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全党团结一致，努力壮大党的力量。而且大平自己首先向全党保证：“我决心站在全党的立场上，使党的工作做到公平、明朗，同时进一步推进已经着手进行的改革，重建一个廉洁而富有生命力的党。”

大平知道，要做到这一切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这次总裁公选，使很久以来就存在着的自民党内部的裂痕进一步扩大，要弥合这种裂痕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在讲话的当天，大平就对身边人说：“我要拿出大部分时间去消除隔阂。”但是，大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当上总裁，就在党的领导人的组成和内阁人事安排上，受到福田派、三木派和中曾根派等自民党“非主流派”的挑战。

关于“党三役”的组成，大平本来拟定的是由大平派的铃木善幸任干事长，福田派的仓石忠雄为总务会长，三木派的河本敏夫任政调会长。但12月2日的晚报即将这一方案报道出去，引起了福田派的强烈不满。福田派深知，铃木善幸虽是大平派负责人，但与田中派关系密切。在这次总裁公选的预选中，铃木善幸是大平派选举的总负责人，为太平的取胜起了决定性作用。福田派当然不愿意让铃木这位“大平派的第二号人物”担任自民党干事长这一关键职务。本来大平在预选开票后的第二天即11月28日就曾主动找福田商议，就大平政权建立后的政局运营问题进行了协调。当时福田保证对新总裁“将百分之百地给予合作”。大平也认为，福田任总裁时，自己并未提出任何强制性要求，并给予福田政权以积极支持，这次福田既然承诺，也一定支持自己。但现在福田竟然会反对自己，在

党内制造新的混乱，实在出乎预料。而且他又得知福田派的中川一郎正同民社党协商，在国会提名河本当首相，不投大平的票。

12月5日，下午2点，大平再次同福田会谈。会谈中大平请福田加入新一届内阁，福田拒绝了。福田再次明确反对铃木任干事长，并提议本派的安信晋太郎任干事长。大平只好请铃木于5日下午5点到濑田家中来商议如何处理。铃木知道自己不能出任干事长后，就竭力推荐现任副干事长斋藤邦吉出任干事长。斋藤邦吉属大平派，但也与田中派关系密切。商议之后，大平把撤销原方案而重新起用斋藤邦吉任干事长一事用电话通知了福田，福田表示：“只要不是铃木，其他人谁都行。”大平于是又用电话将此事告知斋藤。斋藤稍加推辞后就应允下来。

12月6日是召开众院全体会议提名总理大臣的日子。这一天各报晨刊的

头版头条刊登了斋藤受任干事长，田中六助将出任官房长官的消息。但是这样一来，福田派又坚决反对斋藤任干事长，而主张起用安信晋太郎，并且还和三木派和中曾根派商议，若大平要起用本派成员任干事长这一要职，就将拖延总理大臣的提名。本来定于12月6日中午12点召开的提名总理大臣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便因之一拖再拖，直到下午6点仍未召开。大平打电话给福田希望按照前一天商定的条件即由斋藤任干事长将事情结束，但福田却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于是就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件：提名总理大臣的众院大会被迫推迟举行，大平组阁受到阻碍。

12月6日夜里，福田派代表到大平家中与大平协商，未达成协议。12月7日上午8点半，大平应福田要求前往福田私邸，两人再次举行了谈判。大平为了党内团结的大局，也为了不使政治出现空白，作了很大让步：同意福田的两点要求，第一，设立党的改革委员会；第二，斋藤暂定为干事长，从总裁派系中出干事长只限这一次。午后，大平又回到总裁办公室，与前尾、滩尾、椎名、三木、中曾根、西村等自民党元老们会谈，三木派和中曾根派也同意了这一协议。于是决定在12月7日下午召开众议院大会。

1978年12月7日下午5时，日本众议院为提名总理大臣而召开全体会议。经过议员投票选举，大平在所投的419票中获得了254票，超过半数而当选为第68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当保利茂议长宣布大平正芳当选时，大平激动得迅即站起来，频频向议员们鞠躬致谢。散会时，大平站在门口同自民党议员一一握手。一出会议大厅，大平便被记者们团团围住，在强烈的令人眩目的闪光灯照耀下，大平对记者们说了一句：“真是感慨万千！”他感到又渡过了一道难关。

拜会了众参两院正副议长和各党领袖后，晚上7点，大平前往首相官邸——这座象征着日本最高权力的建筑物。步入官邸正门，踏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楼梯拾级而上，上完楼梯向左一拐，右侧便是令许多政治家向往的总理大臣办公室。办公室内摆放着别致的办公桌和一套沙发，办公桌上竖立着日本国旗和地球仪，墙上挂着裕仁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大平虽不是第一次看到办公室中的这些景物，但今天作为总理大臣看到它们，心中别有一番滋味。此时的大平正芳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回想自己经过数十年奋斗，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登上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国的权力之颠，在觉得十分荣耀和骄傲的同时，不禁深深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决心不负众望，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

接下来的迫切任务便是组织内阁，铨选阁僚。这一工作已经作了反复思考，大平总理原以为会很顺利，但实际上颇费周折。大平总理为此与“党三役”、德永参议院议会议员会长以及田中六助官房长官进行了反复磋商和调整。原打算任命的法务大臣因当上了小佐野贤治的律师而不能任命，最后换上了古井喜实。原打算起用中曾根派的桧垣德太郎任农林水产大臣，但因他与大平派骨干伊东正义皆是农水省出身，且桧垣是晚辈，伊东正义没人阁，桧垣便无法安排，最后只好换上中曾根派的渡边美智雄。大平派的入阁人选也在不断变动，如金子岩三就由运输大臣换成了科技厅长官……

经过反复协商和调整，晚上9时，大平内阁正式组成。他们是：首相大平正芳，法相古井喜实，外相园田直，藏相金子一平，文相藤誉三郎，厚生相桥本龙太郎，农水相渡边美智雄，通产相江崎真澄，运输相森山钦司，邮政相白滨仁吉，劳动相栗原祐幸，建设相渡海元三郎，自治相涩谷直藏，行

政管理厅长官金井元彦，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经济企画厅长官小坂德三郎，科技厅厅长官金子岩三，环境厅长官上村千一郎，国土厅长官中野四郎，总务厅长官三原朝雄（以上各厅长官均为国务相），内阁官房长官田中六助。

晚上 10 时半，新政府成员前往皇宫，举行了首相上任仪式和阁僚认证仪式，接受了天皇的任命书。在这之前，大平走出官邸时被记者围住，并回答了记者提问，大平在回答中认为本届内阁的特点是起用了许多新人，是“重视实务类型的内阁”，这与大平一贯的务实精神是一致的。

从皇宫回到首相官邸后，已是 12 月 8 日凌晨零点 25 分，但重视效率的大平接着又召开了新政府组成后的第一次阁僚会议，会议结束时，大平总理发表了谈话：

“现在，我担负起了内阁总理大臣的重任。我决心诚实地和谦虚地完成历史赋予我的重任。

“战后 33 年，我们国家从战败后的废墟上站起来，并且能够享受今天的自由和幸福，这完全是我们的先辈努力奋斗的结果。特别是福田前内阁总理大臣，在解决国内外各种悬案方面，发挥了杰出的领导才能。我决心继承这些前人的成果，为把日本建设成坚不可摧的国家而竭尽全力。

“我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想法。我将坦率地告诉国民，政治能够做到什么和不能够做到什么，政治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最大限度地尊重国民的自由创造精神和活力，迎接走向 21 世纪的这个重大转折时期。切望各位国民予以谅解与合作。”

大平离开首相官邸回家时，已是凌晨 1 点过。当他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出官邸，环视着黎明前的夜幕下周围的景物时，不禁想起了自己参加总裁竞选的声明中的一段话：“经过长时期的痛苦历程，黎明终于来临了。我们的周围虽然还是黑夜，但如抬起头来向前看，就会发现未来的曙光。向后看是原地不动，现在应该向前进，去迎接光明。”

## 不平静的开端

大平正芳的总理生涯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12 月 8 日早晨，仅休息了几个小时的大平就开始接待客人。9 点半接受记者采访一小时。当记者问大平完成组阁之后的心情时，大平回答道：“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心情，要谈也只是一场暴风雨过后的虚脱感。”大平总理接着对记者解释了自己当政的口号“信赖和一致”。这一口号是大平于 12 月 1 日当选自民党总裁时，对《每日新闻》记者谈话时提出的。大平当时说，信赖和一致就是互相信赖、协商一致的意思，与宽容与忍耐是一样的。现在他又进一步详细解释了这一口号的含义：一、应当尽量缩短政治同国民之间的距离，“使政治和国民成为一体。政治不应当是简单地行使权力，应该与国民成为一体，与国民同甘共苦。”

二、政治不应向国民散布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要让国民对政治抱过大的期待，应该实行被政府与国民双方理解、对双方有利的政治。

大平所说的“信赖与一致的政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大平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政治上实行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实行自由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前提下，维持现行的综合安全保障体制。大平认为，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速，就是因为保守政权坚持了

这三个体制。因此他对记者强调：“战后以来，我国从贫困走向复兴，由复兴走向繁荣。在此期间，时代发生了激烈变动。民主政治已经根深蒂固，自由经济也无可争议地成了国民的一致愿望，安全保障的基本轮廓正在成为国民的一致意见。”大平认为，保守政权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就是因为其坚持这三个体制的政策与大多数国民的意愿一致。到70年代，在野党也都逐渐转向支持这三个体制。所以，大平政权也应继续坚持这三个体制，以保持与国民之间的“信赖与一致”。

会见结束后5分钟，大平就接到美国总统卡特打来的祝贺电话。先通过译员对话，一会儿大平取消了翻译，直接用英语与卡特交谈起来。在这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中，卡特祝贺大平就任首相，希望维持日美友好合作关系。卡特表示：“我自己也要努力促使东京首脑会谈取得成功。为此，希望日美之间交换意见。”大平邀请卡特在东京首脑会谈之前访问日本，尽早进行日美首脑会谈。

12月10日，冲绳举行了知事选举，自民党前众议员西铭顺治击败了野党候选人当选，结束了革新势力长期控制冲绳政权的局面。第二天，《朝日新闻》公布了大平内阁的支持率已达42%的舆论调查，而以前福田政权的支持率从未超过30%，因此内阁记者团认为大平内阁“出师顺利”。但大平仍对记者说“感到还是如履薄冰”，他已预见到本届政府未来的前途是严峻而险恶的。

果然，过了几天，这种险恶便显出了征兆。12月15日，日本各大报晚刊同时发表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道格拉斯公司向外国高官不正当支付800万美元现金的消息，次日又继续报道说所谓外国高官包括日本政府官员。这无疑又是“洛克希德案件”的重现！以后，这些报纸又公布了美国古拉曼公司的同类问题，使大平内阁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12月17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大会上，因受伊朗革命所造成的石油减产的影响，该组织决定在1979年，分四个阶段把石油价格的上涨幅度由开始的5%提高到最终的14.5%。对于必须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经济，这无疑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使成立伊始的大平政权受到非常严峻的考验。

12月18日下午5点过，当大平总理与内阁记者团座谈后，走出首相官邸正欲乘车时，一名手持利刃的年轻男子突然向大平扑来，企图刺杀这位新任总理，被旁边的记者和保安人员及时抓住，大平幸免于难。有两名保安人员被刺伤。据警方说，这名男子自称名叫广田，21岁，东京人，先前是右翼组织“国防青年团”的成员。他假冒记者在天未亮之前越墙进入官邸，然后混在记者群里准备行刺。这件事暴露了首相官邸的保安工作尚存在漏洞，令总理大臣周围的人事后仍心有余悸。

12月20日，中国驻日大使符浩到外务省拜会园田直外相时，递交了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邀请大平首相访华的请柬，上面写着：“正式邀请大平首相访问中国，具体日程随后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大平这位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的政治家刚一当上总理，中国方面即作出了友好表示。日方对此表示感谢。

大平刚上任不到两周，就遇上了如此多的不寻常事。这似乎预示着大平内阁的前途将会是喜忧参半，坎坷不平的。

## 智囊团与大政方针

大平总理为了减少制订政策的盲目性，加强决策的科学性，采取了历届内阁都未采用过的措施，即召集专家、学者、企业家、官员组成“政策研究会”，对国家的基本政策进行研究。大平想尽可能广泛听取这些有识之士的意见和建议，为各省、厅拟订具体政策指出相对正确的方向。这个政策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大平内阁智囊团，大平正芳就成为自民党政权第一个不靠个人智慧而拥有多个智囊团的总理。在政策研究会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大平的女婿、内阁首席秘书官森田一，以及来自大藏、通产、外务三省的总理辅佐官长富裕一郎、照山正夫、内田胜久。研究会共分为9个专题研究小组。许多政治评论家认为，这9个研究小组中最受大平总理重视的是环太平洋合作研究组，它是为了研究大平总理早就提出的“环太平洋合作”的战略思想而设立。该小组成员是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大来佐武郎为首的23人。大来以后在第二次大平内阁时被任命为外务大臣。其他8个研究小组是：田园城市设想研究组，以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长梅棹忠夫为首的15人；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组，以东京大学教授内田忠夫为首的19人；关心多元化社会生活研究组，以统计数理研究所所长林知己夫为首的20人；充实家庭基础研究组，以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伊藤善市为首的23人；综合安全保障研究组，以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所长猪木正道为首的22人；文化时代研究组，以东京大学教授馆龙一郎为首的27人；科学技术历史的展现研究组，以国立公害研究所所长佐佐学为首的27人。

从研究小组所研究的课题可以看出，大平不仅局限于本届政府所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利益，着眼于21世纪的日本的长期发展战略。因此，大平设立政策研究会的目的，并不在于如何维持自己掌握的政权，而在于从根本上考虑日本的远期发展，这表现出大平总理不同于以前的日本政治家的更为博大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大平总理在百忙之中，总是抽出时间参加研究小组的会议，听取小组的研究人员对当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研究报告，有时还将这些研究人员叫到家中听取意见和建议，有时还在研究小组会议中插入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平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信息和知识，为制定国家政策和进行外交谈判提供了不少有利的依据。大平总理还鼓励学者就更长远的日本的21世纪发展战略展开自由讨论，提出合理化建议，即使这些建议与现政府意见不同或不属于本届政府应完成的任务，大平也认为没关系，只要对日本的长远发展有参考价值就可以。大平认为，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如果成天埋在政府各部门送来的文件堆里，忙于处理各类具体任务，长此以往，“势必与世疏远……因此我考虑，如果能够增加一些与外界的交往，在知识领域进行一些交流，对我说来是再好不过的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大胆地、客观地、畅所欲言地提出意见，而不要顾及政府，也不要受内阁框框的限制。”在大平当政时期，政策研究会召开过134次全体会议。

当然，也有政治评论家认为，大平这一措施并不一定高明，因为许多涉及内阁政治责任的问题不能按学者的意见行事。从大平内阁施政一年后的情况可以看出，现在已经不是单凭完整的智囊团和大企业、财界的支持，就能维持内阁安定的时代了。

除了设立“智囊团”以图确保政策制定的正确性外，大平认为，向国民

公布政府施政方针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此，大平作了详细而周密的准备。他自己先写了提纲交给首相秘书官，秘书官们再将提纲内容具体化，拟成一篇演讲草稿，然后征求干事长、各政策研究会小组负责人的意见和有关政府部门的意见，最后形成正式的施政方针演说。

1月25日，大平在第87届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作了施政方针演说。

在演说的开头，他充分肯定了日本社会的巨大进步，提出了他的“文化时代的到来”这一充满“大平哲学”意味的全新概念。他说：“战后三十余年，我国专心致志地在追求经济繁荣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已获得显著成果。这也是以欧美各国为榜样、经历了明治以来百余年的现代化的精华。我们现在正享受着的自由与平等、进步和繁荣，是在此期间国民不懈努力的结晶。”大平紧接着谈到日本社会发展的不足之处以及时代的转变：“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自然与人类的协调、自由与责任的平衡、深深扎根于精神之中的生活价值等等，我们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今天，在国民中，对这些问题的反省已高涨起来。

“这一事实表明，高速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和建立在现代合理主义基础之上的物质文明本身已达极限。

可以说，应该将现在视为从现代化的时代转变到超越现代化的时代，由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转变成重视文化的时代。”大平总理所要努力达到的是个怎样的社会呢？他在施政方针中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描述：“我们今天希望的新社会，是克服怀疑和对立，培养理解和信赖，同时又在家庭和地区，国家和地区社会的一切水平上追求真正的人生价值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将被激发，勤劳将得到真正回报，另一方面，法律秩序将受到尊重，个人应遵守的义务和节制、对他人的理解和关怀都将是无微不至的。

“我的方针就是把重视文化和恢复人性作为一切政策的基本观念，通过充实家庭基础、推进田园城市构想等，致力于建设公正而有品格的日本式福利社会。”大平总理施政方针的第二部分是“地球社会的时代”，在这一部分里，大平从全球发展的高度来分析怎样确保日本安全的问题。

大平首先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即当今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作为一个共同体，相互依存的程度正在增加，彼此之间的影响日益敏感。”因此，政治家考虑大政方针时，如果不把全球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大平指出，“如果不消除对立与抗争，而依赖于相互理解与协作，人类将很难生存。从世界的现状看，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倾向正在加强，其中不安定因素正在增加。”

大平接着又具体列举了这些不安定因素：“在战后四分之一世纪里支撑着国际经济秩序的关贸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IMF）体制，发生了巨大动摇，世界正在为此探索新的对策。资源问题和民族主义使世界的形势变得异常紧张，进一步扩大了南北之间的差距。”

因此大平总理认为，围绕地球的这些现实十分严峻，不允许对世界抱有乐观的认识和苟且偷安的应付。他强调，“我们必须把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来看待，并按照我国对世界的作用和责任，认真地实施对内和对外政策。”这些对内对外政策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如何确保日本的安全问题，大平认为这是“政治的最高职责”。

那么如何确保日本的安全呢？大平总理除了强调应继续坚持目前的安全保障体制，即有限度的自卫力量和对比作为补充的日美安全条约之外，“还必须从对世界现实的冷静而严肃的认识出发，在有秩序、有活力地开展国内建设的同时，积极地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作出外交上的努力。”这就是大平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思想。

大平总理施政方针的第三部分为“信赖与协商的政治”。在这一部分里，大平实际上再次表明了他的“信赖与一致”的政治口号中的“三个一致”的内容：政治上实行议会民主制，经济上维持有秩序而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通过内政外交确保综合安全保障。大平在演讲中承诺：“我将按照民主的法则，谦虚地说实话，直率地通报面临的困难。并且，在对国民信赖的基础上，针对严峻的现实采取有效的对策，用缓和的方式，把形成更广泛的国民协商作为政治的基本姿态。”大平还表示，在他领导下的政府行政，将促使国民活力的蓬勃展开，将使行政更为简便和高效。为此，将采取措施推进机构改革，限制行政人员的增长和减轻庞大的行政机构带来的过重的财政负担，同时整顿公务员纪律。

在施政方针的第四部分，大平总理专门阐述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大多是重申了日本一贯的外交方针，如维持日美友好关系是日本的外交基轴，进一步推进日中和日苏之间的友好关系，期待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努力维护在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定，加强日本与西欧各国的协调与合作关系，进一步增进日本同中近东、非洲、澳洲、南北美洲诸国的友好合作等。

接着，大平总理在施政方针的第五部分谈到了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他主要就四个方面阐述了本届政府的方针。首先是维持世界贸易平衡，这里主要是不点名地谈到了日美贸易摩擦的老问题。大平指出，为了维持贸易平衡，日本“必须努力不断扩大内部需求，向各国提供更容易参与的开放的市场，同时注意在贸易伙伴所喜爱的输出上力图做到对外经济均衡。”其次是日本的对外援助问题。大平总理承诺，以前制定的“三年将政府援助加倍，努力改善援助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方针，即使在财政困难的状况下也要贯彻下去”。

第三是维护正常的国际货币秩序。大平指出，货币形势经有关主要国家协商与合作之后，现已有所好转。但今后以形成更有希望的货币秩序为目标，各国为了改善和整顿基础性条件，有必要根据各自的立场进行合作。

第四是除了推进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之外，大平认为，日本更应在文化领域推进国际化，政府期待在各个领域里将有大量国际性人才能广泛地活跃起来。

有关日本当前的经济运营，是大平总理施政方针的第六部分重点阐述的内容。这一部分大平着重谈到了三个问题，即保持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抓住重建财政的契机。大平总理指出，稳定物价应该是不断坚持的目标，在就业对策方面，应细心周到地考虑中高年龄者和离职者等的就业扩大，同时极为小心地实施中小企业、结构性不景气行业的对策。特别重要的是重建财政的问题，大平总理认为这是日益紧迫的课题。他指出，“财政的现状，仍然是从前年度起就不得不依存于大幅度上升的公债的状况……对于这个问题，政府决心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岁入岁出，积极地进行研究。财政能够适应所有人的要求只是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梦幻，必须放弃这种幻想。我站在这种观点上，强烈希望国会内外深入讨论有关引入一般消费税等租税负担

的问题。”大平总理这里提到的“引入一般消费税”，当时并未引起舆论界的注意，但没想到后来却给大平内阁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大平总理在施政方针的第七部分“长期的展望”中，谈到了日本社会长期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确保能源和资源、综合而稳定地保证国民粮食供应、振兴渔业、维持森林资源等。

最后，大平总理又谈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远景规划，即施政方针的第八部分，“建设有活力的日本式福利社会”。大平这里所说的就是要建设“保持着日本人具有的自立自助的精神、富有同情心的人际关系、互相帮助的结构，并配合以适当的公共福利的公正而有活力的日本式福利社会。”大平认为这种社会应该是全国都布满着“被绿色的自然界所环绕，充满安宁，由热爱乡土的人们和谐地生活着的地区，大城市、地方城市以及山乡渔村都发挥出各自地区的自主性与个性的同时，又形成均衡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国土。”大平表示，他就是按照这个最终理想，“反复斟酌了公共事业计划、住宅对策、福利对策、文教对策、交通对策、山乡渔村政策、大城市政策、防灾对策等各种政策，并考虑了它们的顺序，决心努力推进其实现。”

大平还进一步指出，充实的家庭是日本式福利社会的基础，因此，政府已开始整顿以住宅为首的用以充实家庭的各项设施，并努力使老人对策、母子对策等政策有所进步。在这里，一贯重视教育的大平总理再次提出了他对发展教育的看法：“我认为应该尊重教育的自发性和活力。相信从多样化的充实的教育中，才能培育出具有个性的、学到丰富的创造力和出色的国际感觉的年轻人。”

大平总理的施政方针演讲引起了舆论界较强烈的反响，但对其评价并非都是肯定的，不少评论家认为这个演讲太理想化，似乎带有“评论家的观念论”的色彩。多数评论认为这一演讲充满了“大平哲学”，颇具新颖的特色。

### “部分联合”行得通吗？

大平总理作了施政方针讲演后，于1月29日和30日接受了各党代表对这一演讲提出的质询。1月30日，众议院议长保利茂田因健康原因向大平总理表示辞职。3月4日，保利茂田因心脏器质性病变而逝世，“大福合作”的见证人不存在了。大平总理赞扬保利“作为议长而作出的裁决简直像著名艺术家的精湛表演”，他是“保守党的守护神”。滩尾弘吉接替了保利出任众议院议长。

这时以大平总理为首的自民党政府正面临着必须全力对待的两件重要的事务，一是通过1979年度的财政预算，二是参加4月举行的第九次统一地方选举。在这两件事上，都存在着执政的自民党与在野党是否进行“部分联合”的问题，但最后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1月5日，大藏省提出了1979年度的财政预算草案，1月11日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了这项草案并提交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审议。这时大平政权面临着比往年更为严峻的财政形势，既要维持经济的发展，又要想法重建财政，因而必须削减财政支出，增加税收。这两方面是相互矛盾的，这个预算草案就反映出政府所处的财政上的两难境地。预算财政总收入为386000亿元，比上一年度仅增加12.6%，是14年来增幅最低的一年。这些收入中有152700亿元是发行的国债，这样国家财政收入对国债的依存度为39.56%，达到了历

史最高水平。出现这种预算方案是因为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日本经济长期景气不振所造成的结果。而要偿还大幅增加的国债，势必要求经济有较高速度的发展。但从整个经济形势看是不容乐观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尚存，第二次石油危机又已到来。特别是1979年1月伊朗发生革命，势必进一步带动石油价格的上涨，使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更加困难。为此，如何重建财政，日本政府必须尽快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但在如此困难的财政状况下，自民党政府提出的1979年度财政预算草案仍未取得在野党的赞同，在野党都对此预算案提出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方案，社会党要求提高老人福利年金，共产党主张减少所得税和居民税，新自由俱乐部要求减少教育税、削减优待医师的补助金，公民党和民社党要求减少所得税、增加老年人福利年金。各在野党要求对预算案进行修改的总金额达23400亿元。

大平总理针对在野党提出的修改方案，要求自民党政调会长、国会对策委员长等负责人对这些要求进行研究，同时于2月28日和3月1日分别同五大在野党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当记者询问大平总理“你指示自民党研究形式修改，是不是总理大臣也倾向这一方案”时，大平回答说：“我是让他们研究一下有无这种可能，并不是说我也倾向于这种考虑。”自民党起初认为在野党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拒绝对提出的预算草案进行修改。后来经过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国会对策委员会这一级的讨价还价，同意作部分的形式修改，连修改的内容也大体确定下来。公明党和民社党还表示，如果自民党接受形式修改，两党不仅支持预算案，而且支持政府提出的全部法案。

大平与在野党领袖会谈之后的3月1日晚，召开了自民党干部会。会上就是否修改预算案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应慎重行事，多数人认为作形式修改是不可避免的。大平让大家回去休息，待头脑冷静后再研究。

当晚，大平总理就此问题作了反复思考和权衡，并暗自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一早，大平就对副干事长佐佐木武说：“不搞形式修改了，干这种事毫无意义。”佐佐木吃惊地说道：“党内的气氛与你的想法差距太大了。如果已经决定，则必须很好他说服有关人员。”

当天上午的内阁会议决定将是否修改预算案的问题全权委托首相处理。上午10时，大平总裁在自民党总裁办公室召开了党的干部会议。大平在会议上就自民党在预算案问题上能否与在野党联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与民社党、公明党或新自由俱乐部在个别政策上可以采取共同的立场，但预算草案是规定政府在一年时间里的全部政策的重要议案，必须慎重对待。如果答应修改而使自民党与公明党和民社党采取相同的立场，就等于在全部政策上达成了协议，成了照此办理的协定。如果今年这样做了，那明年就还可能这样做，甚至可能一道编制预算。显然，这种作法大大超越了部分联合，而很可能导致联合执政。接受这项提案，会使民社党和公明党对自民党抱有更大的期待。现在自民党内还没有让公明党和民社党人阁的一致要求，同公明党和民社党之间的关系也还未成熟到这种程度……如果进行形式修改，在程序上需要10天左右。临时预算会对经济建设产生不良影响，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种局面。自民党在预算委员会不占多数，如果我们这样决定了，预算草案可能在预算委员会里遭到否决，但在全体会议上我们是可以通过的。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必要去答应修改预算呢？”自民党的干部们对大平总裁

的这番解释议论纷纷，有的赞同，有的抱怨，还有的表示不满。如国会对策委员长金丸信，直到3月1日晚还在为形式修改奔波，现在他的努力全付之东流，因而忿忿地说：“如果总理大臣稍早一点讲清楚不修改预算书，我们也不必得罪这么多人。这实在是令人遗憾之事。如果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再设国会对策委员会。”大平总理只得一再解释和说明自己的想法。

大平总理的决定引起了在野党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公明党和民社党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十分恼怒，因为事先他们已同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会达成了协议，眼看本党已逐渐接近政权，却顿时化为乌有。两党认为大平背叛了他们，从而引起对大平总理的不满。

大平认为自己的作法是正确的。他对记者说：“像这次这样的决断，对于我来说太少了。”的确如此，大平历来的作风是遇事尽量征求各方意见，力求将事情解决得圆满，使当事者心理上保持平衡。因而大平在政界历来被认为是一只“鸽子”，但这件事却让人认为他变成了一只“鹰”，使人们看到了他作为最高政治领导人的魄力。当时的政治评论界就有人认为，这次“可以说是大平第一次作出了一个符合总理、总裁身份的决断。”

最后，1979年度预算案于3月7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但同一天在众院全体大会上以14票优势获得通过，随后送往参议院审议。当然，预算案也不是丝毫未作修改，政府根据在野党的意见，决定增加1100亿元的预算，用以提高老人福利年金。当时的政调会长河本敏夫对这一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总理大臣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从结果上看，他的这一决断是正确的。”预算委员长竹下登也说：“那次决断已到了政治的极限，虽然很艰苦，但还是明智的。”大平正芳对“部分联合”也作了进一步解释，他对记者说：“部分联合是指对每一个具体政策共同赞成而言的。改写预算则是范围更广的、涉及政府全部工作的协定，如果同意了，就等于签订了政府协定。再前进进一步则是联合组阁，最后则是合并。这次的形式修改超出了部分联合的范畴，我们没有同意这种做法。”在预算案问题上虽未实现部分联合，但在参加第九次统一地方选举中，自民党和在野党则实现了部分联合，并取得了成功。

这次地方选举是大平内阁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各党都作了认真准备。自民党希望在选举中夺回由革新势力把持的东京、大阪这两个日本最大城市的知事职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平总裁决定采用与在野党部分联合的方式参与选举，目标重点是与向现实主义路线转变的公明党和民社党联合。

1月下旬，大平正芳总裁与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举行了秘密会谈，共同推荐原东京都副知事铃木俊一为东京都知事候选人，并对东京都将来的施政方针政策作了协商和调整，取得了较一致的看法。

3月14日开始，东京、大阪等15个一级行政区进入了选举过程，其中日本国首都东京都知事的选举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参加这一职位竞选的候选人有由自民党、公明党、民社党联合推荐的铃木俊一，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推荐的太田薰，社会民主联合推荐的麻生良方。

为了使铃木俊一能当选，大平总理不辞辛劳，亲自与竹人义胜、佐佐木良作一起，站在东京街头上，向过往行人发表竞选演说，强调东京城的重要性，指出东京尚存在的问题，阐明三党在重建东京城的一致对策，呼吁选民

们投铃木俊一的票……

4月8日，统一地方选举中最重要的一环——一级行政区的知事选举投票。自民党拥立或推荐的全国15个改选的知事候选人全部当选。在这之后，接着进行的是县级议会和市长、东京都区长以及区议会的选举。在市长选举中，自民党推荐的22名候选人有19名当选，自民党与革新政党联合推荐的11名候选人有10名当选，自民党与公明党、民社党共同推荐的候选人15名中有12人当选，充分显示了执政党与在野党部分联合的威力。

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曾就“部分联合”一事对大平正芳进行过评价：“如果极而言之话，大平应该算是自民党里提倡部分联合论的改革派。但是，当了总理就不能是改革派了。他的作法只是与在野党中的适当党派就国会议案进行合作，始终停留在国会对策的水平上，没有向联合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大平只能在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和国会议案上就具体问题与在野党实行部分联合，而在掌握中央政权和全国性大政方针上，大平仍维护自民党的利益，不愿进一步发展与在野党的关系。

### 减缓摩擦的出访

战后历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就任后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必定是美国，大平总理也不例外。但从大平内心来讲，他是十分讨厌这种对美国“朝拜”式的访问，所以他当总理后拒绝了外务省提出的立即访美的请求。但日美之间有许多问题是需要通过两国首脑会谈去解决的，特别是日美间的经济摩擦，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由来已久。日本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促使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导致了日本国际收支的顺差，这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批评，甚至形容日本为“经济动物”。大平正芳在1978年6月26日与田中洋之助对谈时，就对欧美人的这种形容反唇相讥，认为欧美各国才是真正的“经济动物”。在1979年4月19日会见西方记者时，大平针对欧美各国批评在国际贸易收支中出现巨额顺差一事说，仅在1976、1977和1978年中，才“出现有利于日本的真正的巨额顺差”。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日美之间出现了摩擦，这是大平上台后必须解决的问题。

同时，美国要求日本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以增加国内需求，扩大对外市场，以便利美国商品的大量进入。福田任首相时，就曾向美国总统卡特许诺要使日本的经济年增长率达到7%。但实际上由于石油危机的冲击，根本就不可能达到。大平就任总理后会见记者时，也公开表明日本很难达到这一目标。大平的讲话引起美方不满，卡特总统亲自写信给大平，批评日本放弃7%增长率的目标。大平表示本届政府并未放弃这一目标，但要达到则很困难，只能尽可能争取较高增长速度，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和降低国际收支的顺差幅度。这一点也需要对美国加以解释以争取获得谅解。

日美经济摩擦在1979年初面临的具体问题就是美国希望日本开放国营电信电话公司（简称电电公司）的器材进口以及汽车、皮革等产品的进口，而日本一时难以应允，于是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又引起摩擦。

为了减缓日益加剧的日美摩擦，也为了与卡特总统讨论对苏问题、越南难民问题等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大平拟定4月底5月初访问美国，选择这一日期是考虑到4月29日至5月5日有天皇诞辰、五一节、日本端午节和两个双休日，大平总理可利用日本的连休日访美，尽量少耽误正常工作。

1979年4月30日午后，在烟雨濛濛的日本羽田机场上，停着一架即将起飞的日本航空公司的专机，机内设有会议桌、餐桌和卧铺等设施。日本总理大平正芳将乘这架飞机前往美国访问，随同访美的有志华子夫人、园田直外相、三名国会议员以及各省厅有关局长和各种随行人员近一百人。下午3时，飞机载着大平一行离开机场。大平在飞机上仍抓紧时间工作，或阅读文件，或与各省厅干部磋商事务，或与记者座谈，一直忙个不停，很少休息。当地时间4月30日（日本时间5月1日），大平总理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美国的新闻舆论界很重视日本总理的此次访美，纷纷对此加以评论。有的认为大平总理访美是“希望在日美贸易顺差问题上避免同美国发生可能的对抗”；有的则认为大平访美将主要与卡特总统讨论日美两国困难重重的政治关系，而不是着重讨论眼前的经济问题；还有的人认为大平首相将主要同卡特总统磋商东南亚局势，将提出建议召开使柬埔寨中立的国际会议……

5月1日，美国有影响的大报《华盛顿邮报》社长举行早餐会，大平首相应邀出席，并与该报有关成果进行了座谈。该报对大平总理访美进行了突出报道，大平一行抵华盛顿之前，该报就连续介绍了大平的人品和主张，使美国公众对大平有了较深的印象。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作了充分准备，除了对日美贸易摩擦的有关问题作了筹备以保证两国首脑会谈能顺利进行外，还把大平写的《我的履历书》英文版和介绍大平总理的小册子事先交给了美国，为大平的访美大造声势。

5月2日上午10时，大平总理携夫人乘车来到白宫，卡特总统和夫人在白宫南草坪为来访的日本贵宾举行了20分钟的欢迎仪式。大平在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两国间的贸易冲突是“严重的”，并说自己“决心尽最大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日美双边关系，大平希望能够结成“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

欢迎仪式结束后，接着就举行了日美首脑会谈。会谈是在极为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开始的。卡特对大平说：“我在日本第一次同你见面时，临别之际我曾说过‘下次在白宫相会’，可是你却没说‘作为总理大臣与你相会’。但今天我们还是在此见面了，真是妙极了！”

大平总理这才想起那是1975年的事了。大平当时担任大藏大臣，卡特作为第二年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前去日本与大藏大臣会谈，由于当时卡特在日本并不知名，大平又正好在开会，所以卡特足足等了45分钟才得以与大平见面。想到这里，大平觉得很不好意思，“呵”了一声后用双手捂脸，引起哄堂大笑，一下子就冲淡了会谈前的严肃气氛。

上午举行的第一次会谈用时100分钟，两国首脑就亚洲形势，特别是中国问题和东南亚问题交换了意见。另外还就中东局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防卫问题、日美经济关系以及即将召开的东京七国首脑会议等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卡特对大平说，美日以后将处于一个“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在保持地区的和谐关系方面，日本应“起较大的作用和承担较大的责任”。大平则鼓励卡特代表美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他说：“如果世界民主和自由的领袖美国不履行它的国际责任的话，我们甚至会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值得居住的。”大平还对卡特说：“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是一个难民的国度，全世界向往自由与平等的难民都涌到美国，这里是民主主义的大本营。这难道不是美国的实际情况吗？希望美国振作起来，要有信心。”大平在会谈中有意处处抬举美国，强调美国的重要地位，目的在于让美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力图减轻日本

的压力。

下午接着举行了两国首脑的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几乎长达3个小时。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两国间的经济摩擦问题、卡特总统访日、如何调整双方对东京七国首脑会议的立场等。双方商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解决“有争论的双边经济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有可能威胁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卡特总统对两国未能就终止日本一贯的贸易顺差的办法达成协议表示“深为关切”。因此在会谈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仅泛泛地提到了双方一致同意日美两国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为实现日美经济关系的平衡采取共同行动，设立日美有识之士会议，磋商今后日美之间的经济问题。关于日美经济摩擦问题，交给较低级的事务当局去研究解决：关于日本电电公司从美国进口资材的问题，双方也同意在对等原则下谋求解决的基本方针。

大平与卡特会谈还涉及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苏联扩张”的问题，实际上又涉及到为了对付这种扩张，美国又督促日本加强防卫力量的老问题。大平知道，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武力威胁，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因此，大平作为总理大臣，与战后各届日本内阁首相一样，不愿意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大幅度提高国防经费，主要想依赖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来维系日本的防卫。在访美之前，当记者询问大平在目前情况下日本是否考虑增加防御费用时，大平回答说，日本的防御费用一直在增加，但他又强调：“重要的不是预算上钱数的多少，而是军事能力的内容和实质。”此次与卡特会谈时，卡特特意请了一位军事专家向大平谈了有关苏联的扩张和日本应加强防卫力量的问题，大平听后未置可否。

尽管未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首脑仍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当天晚上，大平出席了卡特总统的露天晚宴和宴会后的音乐会，因会谈顺利而一下子放松下来的大平总理，竟在听音乐会时睡着了。

会谈结束后的次日，全美最有影响的大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两位领导人会谈的照片，这与过去日本总理访美时，大报仅在外交版发一条消息的作法成了鲜明对照，表明美国舆论界对大平的访美给予了高度重视，以及对日美首脑会谈结果的格外关注。

5月3日，大平出席了美国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午宴，大平在午宴上用英语作了演讲。

大平首先谈到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问题。他指出，在当前这种政治、经济的国际环境中，“我国为了确保生存，除国际协调外无路可走”，因此日本的经济政策必须负起国际责任。

紧接着大平就谈到了日本推进对外经济政策时，要考虑的五个重要目标。即：

（一）扩大内部需求，充实国民生活内容，扩充社会公共设施。随之促进经济收支上黑字幅度的削减，以适应可持续的国际贸易。

（二）在贸易方面“进一步推进更为开放而自由的贸易体制”。在输出方面，促进商品的高附加价值化和市场的多元化。在输入方面，尽早实施东京周围地区协商降低关税。

（三）积极协助各国稳定货币的行动，促进国内汇兑管理的自由化。

（四）努力整顿流通机构。

（五）为更加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借民间力量转变日本的经济构造。

大平还对记者们谈到了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问题。从援助数量上

看，日本政府 1978 年表明的 3 年倍增计划正在顺利进展。从质量方面看，今后除重视资本和商品输出外，还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输出。

大平总理郑重向记者们宣布：“我重申，在建立更广泛和更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这个我们共通的课题中，我国将面向 80 年代，以坚定的决心积极尽到责任和作用。”他还强调：“特别是位于亚洲的我国，正在考虑为阻止亚洲地区的动荡，促进稳定倾向，积极地尽到自己的国际职责。”

大平还重点谈了日中关系的同等重要性，他认为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从而促进真正的世界和平与安定，是日本与美国的共同使命。

在谈到了朝鲜半岛局势、亚洲各国区域协作、东南亚的稳定、印度支那难民问题、中东能源问题之后，专门谈到了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大平认为：“在我国推进外交政策时，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不可欠缺的前提，日美两国的伙伴关系，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大平向着众多有名望的记者就今后的日美关系提出了希望。他认为美国在亚大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上起着决定性作用，最近在处理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能源等问题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决定受到了较高评价，因此期待着美国今后为了更有成效地处理世界上的此类问题而再次进行努力，“我国作为美国的伙伴，将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而作出积极贡献”。

大平在演讲的最后还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日美两国关系。他说：“日美间的伙伴关系的历史，已经历了一又四分之一世纪。其间，两国经受了数次考验，发展至现在空前的紧密联系。日美两国共同具有民主主义、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基本的价值观，但在其他方面如传统文化和处事上存在明显差异。我知道，在多样性中谋求秩序，是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因而我认为，日美之间在多样性中谋求调和是很重要的……日美两国文化和传统的不同，并未成为我们两国全面合作的障碍。反之，如此的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更丰富了日美间的伙伴关系，使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更加广阔，变得更加宽容。这样的日美伙伴关系，与亲密的朋友同志关系一样，一方并不强迫另一方改变个性与追求。两者是站在共同的立场上，为完成共同的事业，将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使其变得越发强大。我相信，这也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

大平的演讲引起了记者们的热烈反响，大家认为，一位日本总理敢于在众多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老练的记者面前用英语发表演讲，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且演讲生动易懂，更使大家对大平总理的人品和魅力有了良好的评价。

演讲结束后，大平又回答了记者提问，回答时反应敏捷，富有风趣，平时所显现出的忠厚甚至木讷的外表荡然无存。下午，大平又拜会了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

5 月 4 日，大平一行到纽约访问，出席了大通曼哈顿银行会长洛克菲勒举行的午餐会，见到了许多美国财界和企业界要人，一些人还是大平总理的老相识。5 月，大平前往洛杉矶访问。然后带着一种访问圆满成功的感受乘飞机回国。

### 棘手的受贿案件

自从 1978 年 12 月 15 日各大报发表了美国道格拉斯公司和古拉曼公司

向日本高官行贿的消息之后，大平内阁在这一问题上又面临与三木内阁相同的处境，即如何处理令任何一届政府都感到棘手的高级官员受贿问题。如果放任不管，会引起国民及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如果严厉追查，又会被自民党内部的非主流派抓住把柄，导致政局不稳。大平总理再三权衡之后，决定低调处理此事。在1月25日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大平就提到“最近，围绕购买外国飞机的嫌疑，在国民中引起极大议论。这件事也是关系到政治信赖的问题，政府将尽最大努力将事态解释明白。”

2月1日，因检查厅追查古拉曼公司行贿事件，参与此事的日本大众公司日商岩井的岛田常务跳楼自杀。政府接着冻结了购买E2C飞机的预算，国会中开始有在野党议员提出传讯涉嫌受贿的前首相岸信介和原防卫厅长官松野赖三到大会作证，受到自民党反对。

当自民党与在野党就是否传讯岸信介和松野赖三而争论不休时，检查厅的调查却有了迅速发展。日商岩井公司的干部和职员陆续被捕，案件很快追查到日商岩井公司原副经理海部八郎和原公司职员有森国雄。检查机关根据海部日记查知，日商岩井公司在1967年至1971年间，为进口美国战斗机曾向一位政治家捐赠了5亿元现款。这位政治家海部未指明是谁，但据调查嫌疑最大的是原防卫厅长官松野赖三。因此，尽管自民党反对，国会最后还是决定传讯松野作证。5月24日和5月28日，松野在众院和参院所设立的航空特别委员会上接受质问。松野承认他接受了5亿元对个人的“政治捐款”，与是否进口飞机没有联系。由于受贿时间已超出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加之，松野赖三已没有担任防卫厅长官，因此他没有受到法律追究，仅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到7月，自民党将松野开除出党，松野后辞去议员职务。

大平正芳总理在受贿案件的调查和审理过程中，始终是高调表态，低调处理。他一方面重申对此事必须彻底查清，不能留下任何疑虑，另一方面又不愿政府介入此事。他认为，日本是三权分立的国家，调查受贿案件应属调查和司法部门的职责。政府应该相信这些职能部门，不能干预他们的工作。因此大平总理在公开场合总是说：“政府相信调查当局，在注视调查情况的同时，倾注一切努力。对于国会的国政调查权，政府将尽力给予协助。”尽管有人批评大平总理对此事的态度不积极，大平仍坚持这一点。深谙日本政治特点的大平正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按行政当局的意见公布个人秘密的做法，当其与特定的政治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导致偏袒权力，就会在民主主义体制中加强专制主义的因素，困而是十分危险的。”

大平总理对这一棘手案件的低调处理，并不意味着他纵容受贿案的继续发生。从主观上看，大平总理还是力图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出现。政府于5月22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设立“有关飞机涉嫌等问题的防止对策协议会”，其职责是为首相提供有关问题的咨询，研究如何行之有效地防范购买飞机受贿案再次发生，同时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怎样确立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协议会成员由有关大臣和社会贤达组成，这些贤达均是大学教授，法学专家、新闻界元老等有识之士。

5月31日下午，大平总理参加了该协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向大平总理提出了建议。建议指出，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根本上在于“净化政治”，为此，政治家首先应该洁身自好，努力确立政治伦理，建立保障这种政治伦理能被政治家接受的制度。建议为达上述目的还提出了四项具体对策：

- (一) 净化政治的对策；
- (二) 确保企业伦理的对策；
- (三) 确保行政公正的对策；
- (四) 健全和加强对官员受贿的制裁法规。

大平认为这些建议的内容很好，但对待这类问题，不能太理想化，而应“凭借现实的政策争取稳定进步”，即应逐步解决此类问题，不可操之过急。这实际上符合大平一贯的稳健作风。

但是，大平的这种低调处理与稳步防范的作法，却埋下了至蚀政权的隐患。这种腐败的隐患虽在大平政权之前早就存在，但大平当政时，未能用一剂“猛药”对其医治，致使后来又出现了类似事件，成为动摇大平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 应付复杂的国际局势

一贯重视对美、对华外交的大平正芳总理，也深知对苏和对东南亚外交的重要性。作为外交上著名的“鸽派”人物，大平奉行对外友好的政策，当然，对有可能出现的地区紧张局势，大平也表示出忧虑和不安，总是企图缓和这种紧张局势。

对日本邻近的大国苏联，大平在当总理之前就一贯主张与之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同时又常对苏联的威胁表示担忧。1978年6月，即将出马竞选总理的大平正芳干事长在同田中洋之助对谈时，就重申了他以前的对苏主张。他对田中说：“苏联在世界上是最强的国家之一，且与日本相邻。因是日本邻国，故与之保持何种关系，是日本外交的最大课题之一。然而，苏联就在近旁，并构成较大威胁，而日本想搬家也搬不了……所以，作为永久的邻居，我们与苏联只能交往下去……我想，日苏关系是可以改善的。”

刚担任总理大臣几天的12月13日，大平在首相官邸会见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谈到日苏关系时，大平总理对定于17日访苏的飞鸟田表明了对苏联的基本态度，即本届政府将促使两国关系取得进展。大平还请飞鸟田向苏方转达自己的诚意：“热烈期望葛罗米柯外长为举行日苏外长定期协商会议而早日访问日本……对日苏关系和对日中关系一样，在发展友谊方面无任何区别……”

1979年4月17日大平总理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讨论了苏联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日益增长的问题。大平和其他日本官员还对基辛格表示，他们认为苏联企图对日本从中东取得供应品的脆弱的供给线施加压力，他们为此深感不安。两天之后大平在会见美联社和西方记者时，又谈到了苏联在远东加强军事力量一事，大平总理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说：“我猜不透这是一种好战的意图呢还是出于自卫，但是他们正在这个地区拼命加强军事力量，我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因此我认为，就日本而言，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侦察能力，还要拥有尽可能大的威慑力量。”当记者提到，苏联一艘航空母舰开进了印度洋，有消息说苏联飞机和舰只在越南降落和停泊时，大平说，他在即将同卡特的会谈中，不会忽视苏联在这一地区加强军事力量这一点。

在这种担忧的同时，大平总理仍奉行对苏友好的政策。5月19日大平会见来访的苏联副外长费留宾时，双方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彼此确认要发展日苏睦邻友好关系。大平再次表示希望通过葛罗米柯外长的访日，早日举行

两国外长定期协商，并期待着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等苏联首脑访问日本。大平总理对费留宾副外长说：“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如何发展日苏关系，我正在把它作为最大的关心事项加以考虑。”

但是，大平总理伸出的橄榄枝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日苏两国的关系发展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日本最关心的北方领土问题不但未得到解决，反而于当年9月传来消息，苏联在色丹岛上建立了军事基地，虽然大平就此事对记者说，政府将采取“适当行动”来处理这一问题，但实际上日本对此也无可奈何。搁置多年的课题——签订日苏和平友好条约也就无限期拖下去了。

东南亚历来是日本外交的重点地区。大平当上总理后不久，正逢邓小平访美归国途经日本。1979年2月7日早晨，大平总理会晤了邓小平，双方围绕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朝鲜和柬埔寨局势交换了意见。事后据大平透露，双方除了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外，在越南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由于当时越南多次在中越边境挑衅，中国坚决主张采取惩罚行动，邓小平向大平总理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立场。但大平总理则希望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和中越边界争端。大平知道，中越争端的背后，有中苏对立的阴影。日本正在努力开展“与中苏保持等距离”的外交，因此力图避免陷入中苏对立及中越争端，大平说，日本要坚持“日本独立自主的立场”，邓小平对此表示理解。到2月18日，大平得知中国已开始对越实行反击，他又说，“比原来预料的提前了”，表示非常关心中越两国争端如何演变，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作为“鸽派”的大平不愿开罪于任何一方，只能小心谨慎地应付。

中越争端之前，已有不少难民流出印度支那半岛。中越争端发生之后，难民数量有增无减，引起了各国的严重关注。到6月25日卡特总统访问日本时，两位首脑就印支难民问题进行了磋商。大平总理表明了日本对此问题的积极态度，他指出，对急剧增加的难民采取对策是极为重要的。他认为，考虑难民问题时，首先应考虑难民流出国的问题，因此不久前已派外务省亚洲局次长到越南，转达了日本政府关于防止难民流出的希望。大平还与卡特研究了难民定居比例，对难民的资金捐赠和建立难民中转站等短期措施。7月12日，大平又在首相官邸召见了外务省事务次官高岛和亚洲局长柳谷，就日本参加定于7月20日至2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印支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的基本方针进行了磋商。

对于印支半岛和难民问题，大平首相也很重视与东南亚联盟国家领导人进行磋商。1979年6月7日至8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访问日本时，大平首相就与之讨论了这些问题。双方对印度支那半岛继续发生武装冲突的紧张局面有可能对整个东南亚产生的影响深为关切，真诚希望各方用和平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大平与苏哈托一致认为，印支难民问题非常重要，必须紧急处理。大平首相再次表示，日本将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积极贡献。苏哈托对大平谈到愿在印度尼西亚建一个难民转运中心，大平表示非常欢迎。大平还高度赞扬和支持东盟各国为实现印支和平而提出的倡议。

大平首相把苏哈托总统的这次访日看成是加强日本与东盟关系的良机，他对苏哈托重申了前首相福田1977年8月18日在马尼拉提出的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三项原则：

（一）日本决心坚持和平，不作军事大国，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贡献；

(二) 同东南亚国家在广泛领域内建立“心心相印”的信任关系：

(三) 日本作为“平等合作者”与东盟国家积极合作，同时谋求与印度支那国家形成以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关系，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而且大平还表示，他打算进一步密切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大平首相说：“日本政府理解群岛国家原则对印尼的民族团结、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防能力的重要意义，因此也支持印尼在本国运用这些原则的政策。这些原则已变成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非正式谈判文本的一部分。”双方一致同意为解决各种南北问题而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为了日本能和平地发展社会经济，大平总理要做到在外交上谨慎从事，甚至与相互对立的国家都尽力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的确有些勉为其难。但他毕竟通过努力使日本外交的航船越过了一道道暗礁险滩，使日本的国际地位较以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 东京首脑会议

大平正芳担任总理后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日程，就是主持召开东京七国首脑会议。参加会议者有美、日、英、法、西德、意、加七国元首或首脑，以及欧洲共同体负责人。这是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主要讨论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跟随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的一般有各国两名部长，如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等。大平正芳任大藏大臣时，曾跟随三木首相出席过 1975 年 11 月在法国朗布依埃召开的第一次五个主要发达国家首脑会议。

这次的主要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五个方面，即一般经济、能源、南北问题、贸易和通货。由于这七个国家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 70%，因此能源问题成了此次会议的核心问题。1978 年 12 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分段提高石油价格，加之 1979 年 1 月的伊朗革命，促使石油价格猛涨。1978 年 12 月每桶原油价格为 12.5 美元，到 2 月就已涨到 30 美元。石油消费国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立即作出了反应。2 月 1 日至 2 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三十八届国际能源机构理事会决定削减 5% 的石油进口量。

日本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大平总理在 3 月 15 日召开的推进节约能源和资源对策会议上，决定了节约石油 5% 的方案，督促各省厅彻底贯彻执行这一决定。

但是，石油价格仍在继续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又定于 6 月 26 日至 27 日在日内瓦召开全体会议，以牵制东京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因此，着重讨论石油及能源问题，针对此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并协调石油消费国之间的行动，成了东京首脑会议的当务之急。

在召开会议之前，大平正芳首相先进行了两项重要的外事活动。首先是从美国回国后的第三天，即 5 月 9 日，大平又前往马尼拉出席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参加东京首脑会议的上个国家中，仅有大平一位首脑出席了马尼拉会议。会议共有七千名代表参加，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大平总理想通过参加马尼拉会议，搜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国际贸易和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等问题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在东京首脑会议上向发达国家转达。在马尼拉会议上，大平总理用英文发表了约半个小时的演说，谈到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南北贫富差距问题，日本在解决

南北问题中能起的作用等。

其次是在东京接待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卡特。卡特利用参加东京首脑会议的机会，于6月25、26两日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次访问既是对大平总理访问美国的回访，也是为东京首脑会议所要涉及的议题与大平总理进行预先磋商。

25日和26日，大平与卡特在东京首相官邸和大矶的吉田茂前首相故居举行了两次会谈。会谈内容除了印支难民问题外，还包括南北问题和能源问题。关于南北问题，大平总理根据在马尼拉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主张“即使在先进国家首脑会议上，先进国家也将对南北问题抱有积极关心的态度，应当努力使这个问题取得进展”。

能源问题自然成了日美首脑会谈的重点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会谈用了较多时间。两国首脑认为，国际经济秩序出现混乱，其根本原因在于能源危机，特别是石油大幅度提价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因此，他们就如何节约能源，采取什么方法控制石油进口，控制的指标等交换了意见。大平总理强调了日本对石油的依存度特别高，这一点希望美国能给予充分理解，因此在限制石油进口时，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最后双方在两点上取得了一致认识：

（一）节约石油是重要的；

（二）各国应控制进口石油。这实际上只是两项大原则，两位领导人决定，由主管部长通过事务一级会谈，具体协商并确定今后努力的目标和实现控制的办法。双方均认为，能源问题是东京先进国家首脑会议最重要的课题。

为了这次在日本第一次举行的各国首脑会议，以大平总理为首的日本政府作了周密的准备。第一次充当这种会议主席的大平实际上心中也没有底。他除了指示各有关部门慎重而周全地作好准备外，还与外务省及其他有关省厅开过五次讨论会，搜集各出席国的想法及动向。为了取得主持会议的经验，大平先后拜会了曾作为日本政府首相出席过此类会议的福田赳夫和三木武夫。另外还听取了在野党和工会方面的意见。在大平总理亲自督促下，日本外务省、首相官邸、内阁官房、警视厅等部门都动员起来，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若稍一不慎，有某位出席会议的首脑发生了意外，大平内阁将立即垮台。因此从日本总理大臣到每一位普通保安人员，心里都格外紧张。

6月26日至27日，出席东京首脑会议的加拿大总理克拉克、欧洲共同体委员长罗伊·詹金斯、西德总理施密特、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先后抵达东京。27日，大平总理从上午至下午分别同克拉克、詹金斯、施密特和德斯但举行了会谈，就会议进行程序征求他们的意见。直到晚上11点半，大平总理还在与外务审议官宫崎弘道商议会议的一些具体细节。宫崎以大平首相的私人代表身份，在会议期间负责与各国事务官员进行协调。

就在这两天内，在日内瓦召开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又作出了决定，将石油价格再度提高20%。

6月28日，第五次主要发达国家会议在东京开幕。首先从7时45分开始在首相官邸举行了早餐会，以商讨会议日程。9时45分，会议在“羽衣厅”正式召开。

大平总理作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词，对各位首脑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便开始了第一轮综合性发言。各国首脑的发言都表示，在目前的形势下，要讨论经济发展问题必然离不开讨论能源问题。待大家的第一轮发言结束后，大

平总理代表日本作了发言。他强调，发达国家对中东政治形势的认识过于乐观，没有充分估计到第二次石油危机会如此迅速而猛烈地降临，因而未能充分重视长期能源对策的制定。现在应该抛弃幻想和侥幸心理，对经济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能源结构这些以前未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采取积极对策。大平还谈到了能源问题与转变生活态度的关系问题，认为因能源短缺这一问题时常威胁着日本国民，因此，应该改变生活态度，将其作为文明文化问题来加以应付，即不仅严肃对待，也应轻松、愉快而机智地去对付。大平说：“自从波恩首脑会议以来，我们已经解决了几个最困难的问题，当我们遭受第二次能源危机打击时，我们开始有了明确的观点。”

但大平总理没想到，这次会议将在能源问题上使日本受到很大的压力。第二天上午的会议只是讨论了一些经济上的原则问题，尽管能源问题也是议论中心，但没有具体化，仅商定不仅解决短期而且要解决中期能源问题，确认了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话的重要性以及开发替代能源问题。谁知在午餐桌上，各国首脑就开始围绕石油进口的目标问题展开了3个多小时的激烈论战，直到下午4时10分第二次会议开始。原订于3时开始的第二次会议集中而具体地讨论了能源问题，主要包括如何节约能源，控制石油进口的具体办法，应该把哪一年作为限制石油进口的基准年，控制石油进口的期限应是哪几年，欧洲共同体是作为整体来限制石油进口还是以其各成员国来确定等等，首脑们热烈争论了3个小时仍未取得一致意见。美国主张石油消费国统一在1979年和1980年按照国际能源机构节约5%的要求控制石油进口数量。从1980年至1985年，以1977年的石油进口数量为基准，每年协商一次进口数量的限制问题。而欧洲共同体则要求1980年至1985年间，把域外石油进口数量控制在1978年的进口数量之下，并要求其他国家也照此办理。

大平总理深知日本的国情有别于美国和西欧，美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可不依赖进口而发展本国经济；西欧需进口石油才能发展经济，但共同体内有北海油田，可以缓解石油危机的冲击，特别是在几天前的6月22日，共同体召开了首脑会议，决定增加区域内的石油生产量，引进替代能源，使欧共体各国更可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日本则全然不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占十分之一，如此发达的经济需要大量能源，而日本国内几乎没有石油资源，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和西欧各国。因此大平总理虽原则同意与其他石油消费国采取统一行动，限制石油进口，但希望限制进口仅限于1979年至1980年，这就与欧洲共同体的要求相距甚远。

激烈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时，已到了晚餐时间。各国首脑于晚7时出席在皇宫丰明殿举行的晚宴。晚宴之后，首脑们去休息，而各国事务官员们则为了拟定东京宣言的内容开始忙碌起来。多边的磋商一直持续到次日拂晓，日本的主张仍未被各国同意，只得再次交由首脑会议去讨论。但在磋商过程中，传出了一个消息，即美国和西德也同意法国极力主张的将石油进口限制持续到1985年，如果进口数量也按法国要求降到1978年的水平之下，日本经济将从不景气走向进一步混乱。

大平总理29日早晨得知这一消息后简直难以置信，表示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并说“我理所当然地要通过谈判避免这种事态的出现”。

就在29日早晨8时半，美、英、法、西德四国首脑聚集到法国驻日大使馆，协商东京宣言问题，日本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果然，大平认为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终于发生了。在29日上午9时50分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

法国总统德斯坦提议制定直到 1985 年的进口目标，并将石油进口量限制在最近一定时间的水平年。其他几国居然都同意了法国提议！这令大平首相感到震惊。他再三向各位首脑诉说日本在能源方面的特殊情况，表示日本不能接受法国的提议。但大平孤掌难鸣，无人支持。最后决定将这一问题交给这次参加会议的各国主管能源的部长去协商。大平对出席会议的通产大臣江崎真澄发出指示：“我还将继续作出努力，你们也要顽强谈判。”

各国主管能源的部长及首脑私人代表就会议未解决的问题继续进行激烈争论时，各国首脑出席了大平首相在迎宾馆“游心亭”举行的午餐会。各国首脑一边在蒙蒙细雨中观赏美丽的庭院风光，一边品尝着精美可口的日本饭菜。只有主人大平首相忧心忡忡，“根本无心吃东西。”他穿插于席间，与各国首脑协商。他对各国首脑表示，如果要他提出日本进口石油的数字，这肯定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如果不提出数字，这次东京首脑会议就没有成功，因为最终未达成协议。他说：“只有日本受到特别的打击，我是不能同意的……虽然现在我们在这里共进午餐，到那时，恐怕情形就远非如此了。”

几国首脑听了大平首相的一番肺腑之言，都说请大平不必担心，可以提出一个适当的数字来，他们对日本的实际状况表示基本理解。

6 月 29 日下午，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大平总理在会上提出了日本对石油进口限制的目标，希望大家给予理解。这一目标虽远低于德斯坦提出的要求，但美、法、西德仍表示没有异议，于是与会首脑们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最后通过了《东京宣言》，宣言对石油进口问题作了如下表述：“与会国一致同意，在短期的石油进口数量方面，实现确实反映国际能源机构上致通过的 1979 年的节约消费的进口水平，并把 1980 年的进口数量限定于 1978 年至 1979 年的水平之下，不仅如此，而且为了明确长期性的政策指针，还确定了 1985 年的目标：美国以 1977 年或 1979 年的进口数量为标准，欧洲以 1978 年的进口数量为标准，日本以平均每天不超过 630 万桶至 690 万桶为标准。实际上，宣言在石油进口问题上将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区别对待了，这是大平总理坚持不妥协的结果。

除了进口石油的规定外，宣言还涉及了其他基本问题。在一般经济问题上，提出了履行波恩会议协议和努力提高生产率；在能源问题上，还提出了规范石油市场交易。加强石油储备、扩大开发煤炭和原子能的利用；在贸易问题上，各国一致同意维持自由贸易体制；在通货问题上，各国同意应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汇兑市场的监督作用；在南北问题上，各国主张对受到石油危机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给予照顾。

29 日下午 4 时 15 分，各国首脑一致同意下次首脑会议在威尼斯举行，接着宣告此次会议闭幕。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平总理作了发言：“作为日本国的总理大臣，提出直到 1985 年的长期努力的具体目标，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作出这一决断，是为了有效地应付石油恐慌这一全球社会问题的同时，建设我国稳定的经济基础……世界经济完全是一个整体。我希望通过新的责任感和新的伙伴关系来推动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当天夜里至次日中午，七位首脑相继离开日本，前去送行的大平总理目睹加拿大专机最后消失在云端时，心有余悸他说：“那个时候，真是形势逼人，大有大平内阁垮台或与首脑会议决裂之势。”

## 衣锦还乡与协商解散

成功主办了东京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虽然感到有些疲劳，但又立即开始考虑新的重大政治行动，即解散国会的问题。解散国会是内阁总理大臣的“杀手锏”，根据宪法第七条，凡当上总理大臣者，都有权向天皇建议解散国会。但是，总理大臣也不能无视政治形势的发展随意强行解散国会。在福田内阁时，大平作为干事长是极力反对解散国会的，但现在当上首相才半年多，为什么就要打算解散国会呢？其中有两个原因值得考虑。

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本届国会的运转过程中，由于在野党势力接近于自民党，致使自民党的方针政策难以实施，最重要的预算案在预算委员会里被否决，后来又因松野赖三的受贿问题引起在野党的追究，致使自民党政府提出的许多法案无法在国会讨论而成为废案，严重影响了政府权力的行使。大平总理因勺在预算案问题上显出魄力，以后又在统一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接着又成功地访问美国和组织召开东京首脑会议，所以想凭借这种有利的形势解散国会，使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席位通过重新选举而有所增加，以利于今后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能顺利实施。

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大平内阁组建过程中，就出现了自民党内不同派系的严重对立，使大平的计划往往不易贯彻，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常受非主流派牵制。因此大平一派的骨干和亲信早就鼓动大平尽早解散国会，通过选举增强宏池会的力量。大平本人也深有同感，因此打算在适当时候解散本届众议院。

大平及其亲信们从7月开始就将政局和舆论逐渐导向解散国会的方面。7月3日，大平就同斋藤邦吉干事长和田中六助官房长官协商了今后几个月的政治日程，决定于9月召开临时国会。7月4日，法务大臣吉井喜实又宣布“10月选举”。各报纷纷对此加以报道：“可能在临时国会的时候解散国会”，“松野除名，9月解散”。

这时，大平总理又决定回故乡一趟，一来稍事休息，二来可寻机在非正式场合表露解散国会的意图。返乡时间定在7月7日和8日两个双休日。

这次是大平正芳当上总理大臣后第一次衣锦还乡。大平并不打算张扬，只希望能“静悄悄地”进行。但故乡的各界父老乡亲早就作好了准备，迎接这位香川县产生的第一位总理大臣，在大平总理预定要发表演讲的八个会场，都修建了拱门，升起了气球，四周彩旗随风飘动。

7月7日是周末，大平总理早晨8时40分离开羽田机场，10时15分到达香川县首府高松市。休息仅一刻钟，大平就会见了记者，谈到目前的形势与解散国会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我听到有人提出要解散国会……目前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内政和外交的各种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散国会，刷新体制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大平总理委婉地表露，使舆论界关于解散的报道顿时增多，解散的气氛也一下子高涨起来。这正是大平希望达到的效果。会见记者后，大平总理立即出席了当地政府和财界组织的有两千人参加的欢迎会，并在会上致词。当天下午，大平回到了出生地丰滨町，参拜了刻有大平祖先题字的八幡宫。路过老家时，与姐妹们和亲戚们进行了亲切会谈，会见了自己多年来的支持者们，并参拜了祖坟。下午5时，大平到了丰滨町小学。在这所自己多次为竞选议员而发表演讲的小学里，大平第一次作为首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讲话中，大平首先衷心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多年来对自己的支持。他说：“昭和 27 年的选举，正好是 27 年前的事，我第一次出马竞选众议员，大家对我这个无名之辈给予了极大支援。当时大家或许在想，这个人能成个人物呢，还是不能干出个令人满意的样子来？我想不要说总理大臣，就连想到我能成为大臣的人也许都没有……我出马竞选是想从政；做一件正经的工作，承蒙全叮支持，我第一次当了议员。”

大平在描述了第二次当选议员的艰苦情形后说：“直到今天，无论是风雨之夜，还是寒霜之晨，始终都受到了大家密切的支援。承蒙大家关照，我一次选举也未失败，一直坐在众议院宝贵的议席上。在这 27 年间，有一半议员失去了席位，其中有一半是党的干部或内阁大臣。而我却凭借第一次经验一直幸运，到去年底担任了最高职务。”大平希望大多更进一步给予自己支持和鞭策。

接着，大平总理谈到了从事政治的艰难之处，回顾了战后 30 多年日本发展的历程，肯定了为解决衣、食、住这人类生活三大要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他同时又指出，在社会发展的另一面给人们带来的不利和危害：“世界上也不尽是好事，大企业的发展使公害增加，交通的便利使噪声加大，我们的生活水平一提高，就会增加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原料和燃料。它们的价格便宜还好，价格一提高，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不乐观了。”大平向乡亲们报告了两次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认为政治上“非常困难的时期已经到来”。然后他再次重申：“我担任首相之际，就希望大家不要对政治寄予过高期望，我即使拼尽全力，也不可能照大家的那种期待完成工作，但我还是要鼓足干劲拼命干。”大平表示他是一位正直的人，绝不会说漂亮话。

大平总理在对大家表示祝福之后，又欢迎大家对自己的活动加以监督，他说：“一成为（首相）官邪的主人，往往备受注意而与社会疏远，但人并不因此就变得伟大。”表示要以谦虚的态度每天坚持学习。

最后大平满怀对故乡的深情说道：“关于丰滨町的发展问题，我如果有什么愿望，会通过合田町长提出来。这是一座对我们大家都不可欠缺的、长眠着祖先灵魂的重要城镇，希望大家让我作为叮民的一员，祝愿该町和平与繁荣。”

大平总理的讲话多次被听众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父老乡亲们对大平的感情溢于言表。此后，大平总理到大平事务所所在的观音寺市住宿。当晚，观音寺市响起了鼓声，还放起了焰火对大平表示热烈欢迎。次日，大平又到善通寺市的中央小学、丸龟市的东中学校、板出市的川崎重工体育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接着又出席了高松市自由国民会议成立大会，并在高松市民会馆演讲。下午 3 时以前乘飞机从商松返回东京，准备在星期一又投入繁忙的工作中去。

返回首都之后的大平首相现在除日常事务外，集中精力考虑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之事。为此必须做的有三件事：尽力统一党内认识并与在野党协商；安排解散和大选的日程；制订自民党参加大选的政策主张。

大平首相返乡时吹出的解散国会之风，引起党内的非主流派——福田派，三木派和中曾根派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三木和福田，在担任首相期间，都未能行使解散国会的权力，当时的大平曾千方百计阻止他们行使这一权力。但太平刚当上总理才 8 个月，就鼓吹解散，实在使这两位前总理大臣心

理不平衡，因而反对大平解散的主张。为了保证自民党能在这次大选中以稳定多数获胜，大平力图统一党内认识。他于7月20日应福田，三木的要求，与这两位非主流派首领会谈。他们两位均表示了对解散国会持反对意见，大平觉得他们口径一致，是商量好以后来共同对付自己，于是便拒绝采纳他们的意见。其实两位非主流派领导人并不坚决反对解散，他们已指示本派人员开始作参加大选准备了。

何时解散和举行大选比较合适？这也是大平需要精心安排的问题，当时在自民党内，普遍存在着这次大选自民党必胜的气氛。自从大平内阁建立之后，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特别是4月进行的地方选举的胜利，使不少自民党议员陶醉于大选也会胜利的幻觉之中。不仅大平派议员如此，连非主流派也有这种认识。三木就对大平说：“解散、总选举后，你若不能取得270个席位，就很难说是成功。”福田也估计：“自民党在这次的选举中大概能拿到277至280个席位。”这种气氛使一向稳健的大平正芳也有些乐观了。因此当某些有识之士劝告他“现在解散和大选是否太早了”时，他也听不进，执意尽早解散国会。本届众议院议员的任期要到1980年12月才期满，若要提前解散，要么选择本年秋，或者选择第二年夏。但第二年夏是参议院改选，最好能避免众参两院同时选举，加上已吹出解散之风，时间拖延越久，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多。因此大平决定本年秋天解散。具体日期起初定为9月3日，即第88次临时国会开幕那天就宣布解散，但这样一来，在国会上既不发言也不对任何提案作审议，势必会引起党内和在野党的反对，因而大平取消了这种考虑。后一种方案考虑9月17日解散，10月14日投票，但大平总理从10月8日起有一系列接待外国政府首脑的安排，不能与已定的外事活动发生时间冲突。最后通过与党内和在野党的反复协商，决定于8月30日召开临时国会，总理大臣发表政见演说，并接受各党代表质询，通过一些法案之后于9月7日宣布解散。大平本打算9月30日投票，但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一再请求延期一周，目的在于暗中打算多动员力量来支持自己。大平不明真相，便答应了竹人的请求，决定于10月7日投票。大平没想到这一日期的更改会给自民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但他更没想到，自己原打算取信于民的竞选政策主张会给自民党争取稳定多数席位带来致命的打击。

### “重建财政”不受欢迎

1979年9月3日，大平正芳总裁在第88次临时国会上发表了政见演说，实际上就代表自民党宣布了参加大选的政策主张。这个演说包括应付面临的紧急课题、今后的经济运营以及今后的国际社会与日本的作用。其中与现实的关系最密切的是演说中的第一部分即“应付面临的紧急课题”。在这一部分里，大平总裁谈到了社会关心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对能源问题的挑战，二是恢复财政的适应能力，三是确立政治伦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平首先肯定东京首脑会议对石油进口的限制措施，在稳定世界石油需求和发展世界经济上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并认为“我们已经迎来了生活方式和产业构造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的时代。”他接着宣布了政府的能源对策：作为短期对策，政府在推进国际能源组织和东京宣言规定的节约石油消费5%的同时，谋求石油供给来源的多样化，尽全力稳定石油制品的需求。作为中长期对策，打算在80年代中期把现在对石油依存率的

75%降为 65%，十年之后下降到与西欧一样的 50%。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开发新的能源，如原子能、煤炭，乃至太阳能、地热等。大平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向新的能源挑战的历史。政府决心在我们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上，加上新的创造力和国际性研究开发合作，为确立 21 世纪的能源基础而倾注重大的努力。”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确立政治伦理的问题，大平表示，购买飞机受贿者的刑事责任，已被有关部门了解，但与此相关的政治道义方面的责任，国会和舆论在继续追究。政府对此将义不容辞地尽力协助。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以恢复对政治的信任。大平认为首先是政治家应该自戒，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预防。大平列举了一系列措施，如使政治资金公开化、整顿确保企业伦理的监督职能，为确保行政公正而使行政手续和责任明确化，他特别强调应强化制裁法规的整顿。

给自民党带来麻烦的是大平演说中的第二个问题，即“通过重建财政以恢复财政适应能力”。这是大平认为最能取信于民的政策，但恰恰在这里出了问题。

大平指出，日本的财政在经济显著发展的支持下，在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一直维持着高度的行政水平。但由于 1973 年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陷入深刻的萧条之中，财政出现巨大赤字。在如此艰难的财政状况下，政府仍维持了以前的高度行政水平，并为了通过克服萧条、恢复景气而稳定就业，实施了发行巨额公债等积极的财政方针，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财政规模因此而膨胀，国民收入后来也没能与此相适应，使日本财政被迫继续大大依赖逐年累增的国债。这种由负债而带来新的负债的财政方针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把更为庞大的债务推给后代是不允许的。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扰乱国民生活，损害社会公正。大平呼吁：“财政应该为后代着想，迅速改变自己的体质，恢复其适应能力。在这种意义上，重建财政已成燃眉之急。”

怎样才能“重建财政？”大平认为应在收入和支出两方面采取新的严厉措施，精简行政机构，削减行政经费，谋求摆脱庞大的国债尤其是特例公债。大平宣布，政府为了在 1984 年实现上述基本目标，“决心改善财政的公债依存体制”，为此将采取三项具体措施。

一、在下一个年度预算中，压缩公债发行的绝对数额，把国税的自然增收部分优先用于抵充国债的减额部分。

二、通过重新制定税务特别措施等办法，推进税务负担的公平化。

三、竭尽全力削减支出，“但弥补必需支出所短缺的财源，正在考虑得到国民理解，不得不谋求增加新的负担。”

大平提出的这三项措施，的确出于被迫，国家收入这时对国债的依存度已到了近 40% 的空前高度，财政已到非常严峻和危急的时刻。但当他一提出这项措施，立即在舆论界引起轩

然大波，他虽未指明“增加新的负担”是什么，但使人们很快联想起他在 1 月 25 日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的为了重建财政，请国会深入讨论导人一般消费税等税务负担问题。所谓一般消费税，就是指国家对除了饮食等部分商品以外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所进行的课税，课税的直接对象虽是商品出售者和服务收费者，但都通过提高消费价格的形式转嫁给了消费者。

实际上，大平对于“重建财政”的方针是提出的一整套措施，并非强调主要靠增税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在这次演说前的 1979 年 7 月 30 日，大平在

同电视台记者的对谈中，就特别解释了这一点。他说有人讲“大平主张增税，毫无道理”，但我并没有讲过增税，而是说财政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必须重建财政。为此，必须裁减行政人员，削减财政支出。同时，应该在现行税制下充实课税。如果还不足以应付财政收入，也请研究一下增税问题。即使要实行一般消费税，大平也主张等国民对重建财政问题形成了一致的成熟意见之时再实行。

但是，日本舆论的宣传往往并非全面而翔实，新闻媒介常常善于抓住国民最关心的问题大做文章，挑动国民那敏感的神经。大平的演说中完整的考虑和步骤被阉割，报刊只择其有关增加负担的部分大肆渲染，并联系到大平！月在第87届国会上的演讲，宣传“大平决心实行一般消费税”、“大平暗示增加所得税”，似乎大平的“重建财政”就等于“增加税收”。政治评论界也有人认为，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增税实际上成了政治家宣传的禁区，因为选民都是纳税者，要增税势必引起他们的反感从而影响他们的投票，所以增税与投票水火不相容。经济评论家对大平提出的“重建财政与相应的增税”大加赞赏，但政治评论家却认为这对选举无异于是最拙劣的政策，认为大平犯了一个错误，即太相信学者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到差距甚远的实践中去。

但大平作为一国之总理，不仅仅要考虑执政党是否能在选举中获胜的问题，而且更应从国家和国民的长远利益着眼，扭转有损于这种长远利益的被动的财政局面。所以大平在临近解散国会时，仍对自己亲信说：“尽管国民不喜欢，有些事还必须做，这就是政治。”他认为，在选举期间为了争取选票就回避增税问题，在选举之后又增加国民负担，这种玩弄权术的作法是违反“信赖与一致”原则的，是对选民的背叛。大平认为，只要讲清道理，国民是会理解的。

然而，大平没想到舆论偏颇的宣传，引起了党内党外对“重建财政”方针的强烈不满，大平本人也被当作“增税狂”而受到攻击。大多数自民党候选人为了在这次大选中能当选，在向选民宣传时纷纷表明自己是反对增税的：“我是反对首相的增税论的，希望能让我当选。”政调会长河本敏夫在9月12日自民党全国县党部干事长会议上说：“如果下半年的经济管理不失误，50000亿日元的自然增收是完全可能的。”言下之意是可以既不靠增发国债也不增税便可重建财政。三木武夫前总理大臣也于9月13日批评大平说：“独断专行地实行增税是令人费解的。”大平首相听到这些后无可奈何地说：“难道向国民说明重建财政的必要性不是自民党候选人的任务吗？”

自党内的意见不一致被在野党抓住了把柄，他们认为自民党已处于不稳定状态，正是在野党争取大选胜利的良好时机。于是纷纷攻击大平的财政方针，宣传发行赤字国债和产生财政危机是政府的财政方针失败所造成的，大平总理提出的要国民增加新的负担来重建财政是“毫无道理”的，中小企业团体、农业团体、消费者团体都纷纷表明了反对实行一般消费税的态度。

就在这社会舆论纷纷扬扬、群起攻击增税的时候，9月8日的报刊公布了这样一件事：代替国有铁路的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以虚假的出差名义将巨额资金用于支付本公团的工资。这种浪费由纳税者承担的公共经费的行为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同时也使攻击增税的气氛更为强烈。在解散国会后到开始选举的这段时期内，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浪费公共资金的文章和评论，除了针对铁道建设公团的行为外，还涉及到了各官厅之间的相互

宴请和虚报出差费等政府机关的腐败行为。舆论一致要求政府严明法纪和作出深刻反省，认为这才是重建财政的先决条件，而不是靠增加纳税者的负担。

日本的一些政府机关和公共事业团体浪费公共经费的行为由来已久，并非始自大平当政时期，这一点大平上台后也多次表明要从根本上加以治理。但现在舆论把对这种行为的批判与攻击大平重建财政的主张联系起来，形成了对自民党非常不利的竞选局面。大平首相虽然从心底里仍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政主张，但也意识到目前国民心理上的承受力还很不充分，作为大选政策的提法应该更稳妥一些。本来他在国会演说中提出的方针并非个人之见，而是采纳了政策研究会专家们的意见，经过与大藏省和自民党税务调查会充分研究之后才提出的。但现在既然舆论倾向于反对这一方针，就不得不考虑修改政策提法了。

9月17日是大选正式开始之日，大平在上野车站发表第一次竞选演说时，就提出“要重建财政，防止通货膨胀，如果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达到目的，就根本没有必要拘泥于采用一般消费税。”第二天大平在札幌又进一步表示：“在编制预算之前，将作出能为大家接受的结论。请大家相信这一点。”9月24日，在东京都演说时，大平再一次详细阐释了政府的本意：“如果得不到国民的理解与合作，在现在的状况下，即使断然实行一般消费税的政策，也不会取得成功。政府和自民党从未讲过要采用一般消费税。与此相反，政府和自民党正在不遗余力地研究即使不增税尤其是不采用一般消费税也可以重建财政的方针。我们不会在未得到国民的理解与合作的情况下轻率地采用一般消费税或实行增税。”在后来的竞选演说中，大平都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但是，大平的这些表白事先并未同大藏省协商，而是在估算了大约今年可以自然增收40000亿元后提出的个人意见，使人听起来似乎是为了应付当前的选举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因此在野党群起而攻之，向人们宣传“这是把增税隐藏起来的骗人把戏”，号召人们不要投自民党候选人的票。在野党的宣传和鼓动，给自民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当时尚未显现出来，并未引起自民党竞选总部的注意。

## 大选受挫

这次大选自民党一共推选了321名候选人，决心通过奋斗，力争获得稳定过半数议席，即在511个众议院议席中获265席以上，而上次在三木当政时仅获249席。尽管大平总理提出的“重建财政”的方针受到反对，但报刊上仍接连不断地报道“自民党暂居优势”，助长了自民党候选人和竞选指挥部的乐观情绪和麻痹思想。

然而老天似乎不作美，瑟瑟秋风裹挟着阴雨，从投票前两天就使人有郁闷的感觉。10月6日投票的前一天，大平首相还冒着秋风细雨，到东京附近的摩多地区，连续站立5小时，作了最后一次竞选演说。回到家时已是晚上7点。十分疲惫的大平问心无愧地说：“该做的都做了，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只求能够确保稳定的多数。”当他打开电视机时，天气预报告之，第18号台风正从日本南部海面北移。大暴雨随大选同时来临。

10月7日投票这一天，受台风影响，整个本州上空被降雨云团紧紧笼罩，瓢泼大雨从凌晨起一直下到当天下午。上午大平首相在夫人陪同下到住宅附近的濑田小学投票站投票时，记者们问及恶劣的天气是否会对投票产生影

响。大平也担心这场雨会对自民党议席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它将使参加投票人数大大减少，投票率急剧下降。从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的议席比例看，自民党比例大，投票率的下降，席位绝对数下降较多的肯定是自民党。大平似乎有些后悔当初不该答应竹人义胜延期一个星期投票，否则也不会碰上这么个倒霉的天气。现在后悔无用，只得祈求老天保佑了。大平当着记者，脸上流露出向老天求情的神态说：“我希望雨下得小些，赶快天晴，投票率越高越好。”但是，天并未放晴，投票率也未上去。据事后统计，这次因天气恶劣，投票率仅为68%，呈战后历次选举中第二最低点。

晚上9时，大平首相前往自民党总部，观看电视的开票报道。刚开始时，自民党当选人数比较多，每当得知某位候选人肯定当选时，大厅里立即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大平首相和斋藤干事长等自民党领导似乎也有了一丝宽慰感。

但是，到了10时半，形势急转直下，自民党当选的人数徘徊不前，许多原先预计可以当选的候选人在选区以微弱的票数败给了在野党候选人。大厅里的欢腾气氛没有了，大平的心情越来越沮丧。他现在已降低了获稳定多数的期望值，只期望不要少于三木当政时的249席。当他回到家时，已是夜晚11点。大平并未休息，而是怀着焦虑和期待的心情守候在电视机前，一直注视着开票情况，直到8日凌晨，仍未见开票情况有所好转。

这时，大平心里翻江倒海，真不是滋味。由于预先期望值很高，估计可拿到265席以上，现在距目标太远，虽然当选者还未最后全部揭晓，但看来希望不大了。大平感到自己抱有很大决心和信心，力排许多阻拦，坚定解散国会并举行大选，力图重新获得众院稳定多数的举动是失败了，结果是得不偿失。他真觉得愧对全党，不知如何作出交待……

10月8日早晨，大平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如果加进元党派的当选议员，至少还可以确保稳定的多数。”实际上含蓄地承认自民党大选失利。快10点钟时，大平来到自民党总部。他显得坐立不安，一会儿到总裁办公室，一会儿又到选举对策总部，一会儿又来到干事长办公室，以苦涩的心情注视着剩下的选区的开票情况。每当看到某位自民党重要人物如前尾繁三郎等落选时，大平总要叹息一声。这种痛苦表情被记者镜头播放到电视上。

中午大平在同记者座谈时，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疲惫地对记者们说：“现在还有两三个议席定不下来，如果加上无党派的入党议员，也许能够过半数。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这是非常严重的临界状态。”显然，大平的估计又比早晨退了一步。当记者问到选举失利的责任问题时，大平只好含蓄地回答道：“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不能轻易地做出结论。我将慎重地承担责任。”当时从内心讲，大平的确已闪过了辞职的念头。记者们根据他的表情将“倾向辞职”报道了出去。

下午2时，大平主持了欢迎阿根廷总统比迪拉的仪式，然后回到自民党总部的总裁办公室内，等待着最终的开票结果。这时他接到了伊东正义、田中六助、佐佐木义武等大平亲信打来的电话，他们是听闻大平倾向辞职的报道后打电话来鼓励他的。

8日下午，大选结果揭晓，自民党共获248席，比1976年底的选举减少一席。其他各在野党的议席数各有升降，下降最多的是社会党和新自由俱乐部，前者获107席，比上次减少16席，后者获4席，比上次减少13席。上

升最多的是共产党，获 39 席，增加 22 席，另外民社党增加 6 席，公明党增加 2 席。选举之后，自民党立即吸收了 10 名保守派的无党派议员入自民党，使自民党议席数达到了 258 席，超过半数 2 席。

怎样看待这次大选结果呢？公正地看，此次大选自民党并不能算失败，只能算是小受挫折。因为议席仅比上次减少一席，这种增减极少数议席的情况在大选中经常出现，仅是一种微小调整，不能看成失败。况且从实际投票人数看，自民党此次得票率达到了 44.6%，比上次还多出 2.8%，因此更不能算是失败，若按此比例，投票人数再多一些，也不至于仅获 248 席。这一点国际舆论的评价较为公正。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自民党最终还是单独控制了过半数，“按照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原则，大平总理在这次选举中还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大平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解散国会的目的是要使自民党在众议院中获得稳定过半数席位，而远不是现在这种结果。因此，大平认为自己发起的这场大选是失败了，内心有一种深深负疚的感觉。带着这种负疚感，大平于 8 日下午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就大选结果发表了讲话。

大平首先对大选结果谈了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说，我们党受到了出乎预料的严厉的审判。我们一定谦虚地认识它的结果，在今后治党治政时充分加以注意，不犯同样的过失。”记者问到大选失败的原因时，大平答道：“大概还要进行种种分析，把它弄清楚。不过坦率地说，我觉得在政策上的提法、选举的态势、运动等方面仍然有不周到的地方，我想是各种原因合到一起了。我考虑要冷静地分析，把这方面的问题弄清楚，作为今后的指针。”

接着，大平总理再一次阐释了他的财政主张以及下一步打算：“我们并不是（性急地）提出增税，可重建财政是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如果采取种种措施，以后还是不能减少赤字公债，那么作为合符逻辑的归结，就唯有请国民来负担。在选举期间，我也一直说明了这个意思。然而大家只把最后的归结当作了问题，是有点出乎意料。如果事先会料到这样；就会再注意一点政策提法了。事情未被国民充分理解就结束了，令人遗憾。

“我想，今年下半年能源供应关系将变坏，因此要竭尽全力去实行下半年的能源对策。重建财政问题，将以 1980 年度为第一步编制预算，作出具体的答复……我已

经提出，在编制 1980 年度预算时，将不依靠征收一般税的办法……为了防止腐败，必须修改政治资金限制法等，一定要做这件工作。”

关于这次选举失败总裁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大平回答道：“我是总裁，处于担当政权的地位，进行选举，搞成了这种结果，我必须比谁都更深刻地认识这种结果。我想我应该做的事情是，根据这一结果，充分掌握国民意志在什么地方有所反映，在今后施政上加以运用。”

大平的讲话表明，他认为这次大选自民党是失败了，同时也表明自己要承担责任，但并不打算辞职。另一方面，大平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仍坚持了自己重建财政的主张，这反映出他一贯的主张，即政治应对国民讲实话，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不该做。难怪大平派内有人责怪大平“太仁慈忠厚了”，都已出现这种结果了还在说实话。不过大平也注意到了应在政策提法上更慎重一些，这是他此次大选中得出的教训。

日本国内的舆论对此次选举结果议论纷纷，大都认为这次选举是自民党惨败，并预测政局将进一步动荡。如共同社评论说，此次选举“对于争取稳

定多数的大平首相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读卖新闻》认为“自民党意外地形势不佳，已无望确保稳定多数”、“围绕党和内阁人事问题，大平、田中两个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的党内抗争必将重新展开。”《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大平首相把增税路线推到前面的选举战术失败，是自民党当选人数难以增长的首要原因”、“首相想通过这次选举来加强党内领导力量，谋求政局稳定的意图已难以实现。”

日本财界作为自民党的后台，对这次大选结果也感到不满，发出种种忧虑的评论。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说：“选举结果令人感到意外。”看来财界对此次大选的期望值也很高。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会长大槻文平皆表示：“没有达到稳定的过半数，令人遗憾！”同时，财界和企业界对自民党提出了要求。永野重雄说：“必须在国会内能反映出国民的意见。”大坂商工会议所会长佐伯勇说：“要虚心接受国民的严肃裁决，应该回到建党的起点上来，以求改善素质。”

此时的自民党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形势，迫切需要全党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整顿纪律，从根本上改变党在国民中的形象。但是，自民党内部却陷入了严重的相互抗争之中。

### 抗争白热化

这次选举的结果正如报刊所推测的一样，在自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党内的非主流派三木派和福田派原本就对大平执政以及执政不久就解散国会表示不满，这次大选的结果一方面使这种不满达到极点，另一方面也给这两派攻击大平找到了口实。由此，在自民党内出现了派系抗争，这种抗争是由协商、对立乃至公开决裂而逐渐走向白热化的。

首先表态的是非主流派首领三木武夫前首相，他在10月8日就表示应追究大平总裁的责任，强调“政治家应严格承担自己的责任”。另一名非主流派首领福田赳夫前首相则站在更高角度说：“在谈及大平的责任问题之前，自民党应该谦虚地进行反省。”言谈中也包含了要追究责任之意。处于中间的中曾根康弘前干事长未明确表态。在这一段时间内，自民党内和社会舆论虽然谴责大平领导的这次大选失败，但并未要求大平下台。

但到了10月11日，被称为福田派别动队的前农林大臣中川一郎为首的“自由革新同友会”开始严厉追究大平的责任：“大平总裁不能逃避招致严重后果的责任，只有明确责任才能重建自民党”，公开要求大平下台。三木也积极响应。福田一方面慎重地表示对这种选举结果“只能坐视”，另一方面打电话给大平的亲信田中六助，催问“大平什么时候辞职”？大平则对自己亲信表示：“我辞职比前进更困难。”在这种气氛之下，副总裁西村英一从11日起开始调整自民党内的意见，决定15、16、17日大平分别同三木、中曾根和福田会谈。

大平与三木于15日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三木一再强调“要区分出首相的政治责任，按道理来解决”。三木所谓的“道理”是什么意思呢？三木认为自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已无法再领导日本，按“道理”应该把政权交给在野党。大平也听说过这一点，因而立即反唇相讥：“你的意思是把政权交给在野党吗？”三木连忙退缩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16日大平与中曾根会谈，中曾根就时局提出了一个方案：“大平总裁应

就大选失败一事正式向全体党员表示歉意，并应尽早研究建立全党体制的问题。作为具体步骤，可成立一个由少数实力人物组成的协调机关，由这个机关全权处理大平的进退问题。若该机关仍选大平担任总裁，则他还可以继续掌权。”大平听后表示不能同意，理由是在自民党执行部以外不能再重叠设立新机构。

最关键的是大平同最大的非主流派首领福田的会谈，安排在 17 日下午 2 时起，地点是总裁办公室。’大平在等待福田到

来时，听到手下人报告，福田“准备以同归于尽的决心进行会谈”。而大平则为了这次会谈与亲信作了较长时间准备，主要研究如何吸取选举教训，对自民党进行改革等较深远的问题，打算就这些问题同福田深入商讨。但他未料到，与福田的会谈还未涉及到这些问题便谈崩了。福田认为首先应该追究大平的责任问题，并建议大平“根据大选的结果即国民审判的严厉程度，采取易于为国民理解的措施。”

大平马上追问：“你的意思是让我辞职吗？”福田答道：“不胜惶恐。”大平坚决表示：“我不认为我的责任已达到了国民要求我下台的程度。在困难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解决难题才是尽力尽职的出路。没有党的机关的决定，我不会辞职。让我下台等于让我放弃责任，让我去死。”福田说：“这些问题还需要党的机关裁决吗？难道不应该由自己作出决断吗？”

这样，双方根本就未讨论如何收拾当前政局，如何从长远考虑自民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仅就大平是否下台一事紧张地讨价还价，一直持续了 100 分钟。大平坚持要在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上讨论自己的进退问题，福田则主张先在众院大会上决定由谁来重新组阁，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达到势不两立，无法协商的地步。

会谈以后，大平经过深思，为了顾全大局，愿作一些妥协。他派伊藤昌哉前去了解福田本来在会谈中想说些什么。伊藤从福田那里了解到，福田原打算与大平就党内派阀问题、总裁预选问题、明年的参议院选举如何竞争、大福一体论以及政治责任问题等进行协商，但却一开始就纠缠于最后一个问题，结果谈崩了。大平得知福田的真意后，通过伊藤对这几个问题作了回答：

一、派阀有传达情报信息、教育党员、支援选举筹各种各样的机能，应该把这种机能徐徐引到党的方面。这样就有可能消除派阀的弊害。

二、大福在预选问题上看法有分歧，福田主张废止，大平主张存续。但是，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达成一些妥协，达成每隔几年选举一次的协议。

三、不管参议院选举如何竞争，我们都能获胜。

四、双方对大福一体论的看法差距不大。

五、在政治责任中也包含有大平引退的意思。

福田根据大平的这一回答，断定大平有辞职之意。于是 10 月 20 日福田与西村英一副总裁会谈时，要求大平将进退问题全权委托给西村副总裁，以此作为与大平再度举行私下会谈的先决条件。但是，大平若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辞职交权，按党章规定，只有总裁发生事故时才能这样做。大平考虑之后，只是委托西村有权进行党内协调。

这时的自民党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大平的进退问题上、完全脱离了自民党建设的大政方针。大平也不是完全没考虑过辞职，但他总觉得自民党这次大选受挫自己就立即辞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他知道党内有人存心要自己下台，但这些人并非完全出于公心，不是为了自

民党的团结与发展，而是出于在以往的政治生活中对自己积下的私怨。真正自己辞职了，也不会出现党内团结的局面，只会引起更大混乱。他有一次就对官房副长官加藤蛇一说：“处在总理和总裁地位的我，即使有辞职的愿望，也没有辞职的自由。如果我辞去总裁职务能使自民党完全统一起来的话，我一点都不留恋。但我不认为我一辞职党内的混乱就能够结束。问题的关键在于辞职能够统一还是不辞职能够统一。”

10月21日，大平给最主要支持者田中角荣打去电话，征求田中的意见，是否将进退问题全权委托西村处理。田中表示反对，并说：“大平身为总裁，为什么要把决定进退之策的权力全都交给西村副总裁呢？西村为什么又非与福田商量此事不可呢？身为总理和总裁，应‘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彻底’。”大平受到鼓舞后，更倾向于不辞职了。非主流派则认为大平是迷恋政权，想赖在总裁宝座上不下来。

10月24日，在西村的斡旋下，大平与福田再次会谈。关于福田提出的前四条有关党的建设问题，双方分歧不大，但一涉及到大平的政治责任问题，双方又出现了分歧。会谈3小时后发表公告说：“会谈既没破裂，也没吻合。”25日又举行了大平与三木和中曾根的分别会谈，仍无结果。会谈后大平表示“决不引退”。

这时，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鉴于大平不辞职的态度较坚决，决定三派联合起来，推倒大平政权，另外推选总理大臣。按照日本宪法第70条规定，众议院举行议员大选后，第一次召开国会时，现任内阁必须宣布总辞职，重新选举首相，即所谓“首班指名”。被选举为首相者必定是众议员，他必定属于某一党派，按照政党政治的规则，当选首相者肯定是在众议院中拥有多数议员的政党的魁首。所以自民党在众议院议席数超过了半数，自民党的总裁理所当然地就在第一次国会上被指名为首相。三个非主流派联合起来后就成了针对现政权的党内反主流派，他们打算在最近将要召开的首班指名的特别国会上在大平总裁之外另外推举一位总理大臣候选人，这在自民党历史上尚属第一次。这实际上要造成总裁与总理分离的状况。

大平总理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政党内阁制原则，为了维护这一原则，他反对这种做法，并再次作出让步。10月29日，大平向自民党干部会提出最终方案，全权委托西村副总裁进行协调，包括处理政治责任问题和大平总裁的进退问题。大平认为自己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做到这一步已是仁至义尽了。但当西村要求三个反主流派也全权委托自己协调时，被三派拒绝。这样，西村副总裁只得停止了协调，让双方在国会上去一决雌雄。抗争至此达到白热化。

10月30日，第89次特别国会开幕。31日，三个反主流派联合，成立了“重振自民党会”，与大平为首的自民党总部对峙。自民党处于分裂的边缘。11月1日，反主流派推举福田赳夫前首相为总理大臣候选人，这就违背了宪政的常理；即一个政党只推举一名统一的候选人，政治评论界认为，从这一天起，自民党实际上就分裂为大平自民党和福田自民党。双方都决心在国会的最后投票中获胜。大平认为只有取胜，才能避免自民党的彻底分裂，因为取胜后的大平可以容忍反主流派继续留在党内。

现在的形势是，如果召开自民党众议员大会，提出统一的总理候选人，反主流派可能略占优势；但若召开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大会，大平派可能略占优势。最后，自民党总部决定11月2日上午11时30分在自民党总部召开

两院议员大会，提名统一的总理候选人。而反主流派则要想办法阻挠这次大会的召开，他们派了一些“重振自民党会”的少壮派议员和一些秘书占据了会场，把桌椅重叠起来，高筑防栅，阻挡与会者进场。主流派的国会对策副委员长滨田幸一议员闯进去，连推带踢把防栅拆散了。这一切均被转播到电视上，让国民目睹了自民党的这场闹剧。结果这天到会场的有125名众议员，75名参议员，其中包括渡边美智雄等5名中曾根派议员。由于有130多名众议员缺席，两院议员大会无法召开。这130多名众议员于11月2日上午11时到了国会大厦，自行召开了自民党众议员大会，推举福田为自民党的总理大臣候选人。就在这一天，反主流派的一些议员已明确表示打算组织新的政党，令主流派和在野党均大吃一惊！自民党已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

11月2日众议院正式大会无法召开，3日是文化日，与4日星期天连休，决战只好拖延到下周进行。双方都在表面进行协商和争取多数的同时，私下与在野党联络，以便获得其支持。各在野党除新自由俱乐部之外都决定推举自己的总理大臣候选人，不卷入自民党的内部斗争。大平立即派田中六助官房长官和佐佐本义武副干事长同新自由俱乐部接触，5日晚大平与其领导人河野洋平进行了会谈，河野洋平表示全力支持大平。尽管新自由俱乐部在众议院只有4个席位，但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这4票将起决定性作用。

11月6日，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临，提名总理大臣的众议院大会于下午一时开始。经过投票，大平正芳以135票居第一位，自民党另一位候选人福田赳夫获125票居第二位，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得107票居第三位，其余各位候选人所得均不到百票。按规定，若第一位得票不过半数，需在第一位和第二位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获简单多数票者当选为首相。下午2时20分又进行了第二轮投票，在野党全投了废票，反主流派中一些议员转投大平的票，最后大平获138票，福田获121票。大平正芳再次当选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选举结束后，大平总理在国会大厅里走了一圈，然后进入首相官邸会见记者。他对记者说：“我感到仿佛在热水里泡了很长时间后终于获得了解放。但是，今后还必须进到更热的水池里，因此前途仍然非常严峻。”大平此时感慨万端，不禁想起了前首相岸信介说过的一段话：“总裁生活的第一年要医治本届总裁选举中派系斗争的创伤，在第二年又要为准备下届总裁选举而耗费其精力，几乎没有时间去从容地考虑正当的政策问题。”而自己当总裁不到一年，已耗费了如此多的精力在医治创伤上，大平深感当这个总裁真是太难了！

## 第十章 名人的家庭与情操

### 一往情深

大平正芳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自己的亲人怀有特别深厚的情感，无论是对父母、兄弟还是姐妹。大平的妹妹富江就曾回忆起哥哥刚有了工作时给自己寄东西的事：“他刚到大阪的桃谷公司工作时，常给家里寄东西有一次他来信问我：‘这次发了工资，给你寄点什么呢？衣服、化妆品或是零花钱？’我因为喜欢衣服，就写信向他要了。结果他给我寄来一件斜哗叽外衣。我高兴极了，几次跑到路上去看邮递员来了没有。”富江后来和姐姐哥哥一起，为正芳竞选议员竭尽全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平最敬重哥哥数光。哥俩只相差一岁，体力和学力不相上下。大平在《我的履历书》中曾回忆道：“我们俩经常打架，但还是一对和睦的兄弟。”哥哥和弟弟扭在一起吵架时，常常是正芳出来调解。数光不仅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重担，以便让两个弟弟求学深造，而且在当地颇有名望，曾担任过三届丰滨镇的镇长。而且他还为了正芳弟弟的从政而四处奔波。有一次大平正和伊藤昌哉谈话，数光走进来伸出手掌给伊藤看：“我的手相是得天下的手相，这条手纹一直通到手腕。”言下之意是“大平正芳定能掌权”。1976年底，在帮助弟弟正芳第十次竞选议员时，数光每日东奔西忙，累得病倒。12月3日大平到自己选区时马上去医院看望哥哥。数光一见正芳便关心地问大平派议员能当选多少。12月5日大选揭晓后，数光得知正芳以选区第一当选时，拍手称快，并说：“我的病好了，赶快送我回家去吧。”但12月7日晚，数光因心肌梗塞突然发作而与世长辞，没能见到弟弟达到光辉的顶点。临死之前，数光不停念叨“电子计算机”，原来他还在惦念大平派议员有多少人当选，关心弟弟的政治前程。大平正芳12月9日赶到丰滨小学参加了哥哥的安葬仪式。他对别人谈起这位仅大一岁的兄长时，总是满怀思念和敬重之情。

大平与夫人志华子的月老是渡部纲忠和大平的堂兄大平秀雄。渡部纲忠是铃木家亲戚，他觉得大平人品不错，而秀雄发现铃木三树之助家的次女志华子各方面条件较好，他们便撮合大平和志华子二人见了面。他们一见钟情，见面27天后便结了婚。志华子的父亲铃木三树之助原是岩手县南部的酱油酿造商，后来到东京当了粮食交易所职员。不久以后又经营证券业，开了三木证券交易所。三树之助虽然经商并积下万贯家产，但他却和一般商人有所不同，他喜欢旅游，吟咏俳句，气质高雅，风流倜傥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志华子在学生时代除了穿学生制服外，从未穿过什么西服之类。三树之助自己也经常穿补丁衣服，对子女以身作则。在经过对大平的经历和人品调查之后，他对这个女婿格外器重和喜爱，对他关怀备至他见大平当了税务署长还穿着便宜的本地西服，便为大平做了夏季礼服和西服。有一次大平请几位年轻同事参观自己的办公室时，这几位同事看到大平的西服和袖扣格外漂亮，感到大为惊讶。

志华子于1916年出生在东京，毕业于东京本乡区的樱荫女子高等学校。结婚前她正在学当家庭主妇的知识。志华子择偶的标准不是看家庭出身贵贱，而是看本人条件如何。因此她觉得大平人品不错，前途有为时，便毅然嫁给了这位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青年。新婚不久，大平前往横滨赴任，并在离海很近之处安了家。1938年2月，她生下了长子大平正树，做母亲的幸福

感油然而生。但这段时期也有些小的遗憾。志华子原以为官吏工作很有规律性，但大平在横滨任署长后，经常出席工作性宴会，志华子每天都盼望丈夫能早些归家，却常等到很晚，而且大平特别喜欢逛书店，好容易有个节假日，大平却携夫人去买书，大平选书常用很长时间，让怀孕的志华子等得不耐烦。

在战争期间的1939年10月和1941年12月，志华子又生下次子大平裕和女儿芳子，这时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志华子初为人母的幸福感逐渐淡化，更多的是抚育子女的艰辛和责任。特别是由于战争，大平被借调到兴亚院而单身前往中国张家口时，她一个女人拖着孩子克服了许多困难。1945年，在东京牛込的家被烧毁，志华子只好让大平一人呆在东京，自己带三个孩子疏散到了岩手县的一位亲戚家中。尽管颠沛流离，饱尝辛酸，但志华子仍有值得庆幸之处，因为大平的许多朋友都应征入伍上了前线，但大平却始终未接到入伍通知。1946年9月，志华子生下了一个胖得滚圆的儿子大平明，这是大平夫妻俩的最小的孩子，也是他们家中唯一幸运地降生在和平年代的孩子。

战争结束了，志华子只希望重新过上安宁、平静的家庭生活。但是，大平作为一个男子汉其抱负远不止于此。志华子终于发出了怨言：大平要辞去在大藏省的官职而竞选议员，这完全出乎志华子预料。她虽身为家庭主妇，也略知从事政治的残酷，而她与大平结婚并没有期望作政治家的妻子，只想丈夫做一名勤奋、踏实、地位稳定的官员。因此志华子极力劝阻大平，说他弃官从政，是违反当初誓约的。但大平决心已定。志华子毕竟属于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只好服从丈夫的选择。

但志华子没料到，从此以后她就过上了一种十分不自由，有时甚至使人感到有些卑恭屈膝的日子。志华子为了使丈夫能当选议员，从大平第一次竞选议员起，就跟随他跑遍了山野、海岛和街道、乡镇，有些地方大平不能亲自前往，志华子就代表丈夫前去，因为竞选时只有最直系亲属才能代表候选人。志华子斯文、端庄的城市人容貌和潇洒的风度，征服了许多选民的心，也提高了大平的形象。同时，生性腼腆、不善演说的志华子，总是在公开场合对选民低头鞠躬，使选民对她的谦虚为人抱有好感。因此，虽然志华子不能像许多政治家的夫人那样口苦悬河地发表演说，常常在公开场合躲在大平身后，一个人参加大会时还常坐立不安，手足无措，但她总能为丈夫赢得不少选票。这一点，大平对妻子怀有深深的感激。特别是第二次选举时，由于离上次选举刚过了半年，许多工作准备很不充分。为了迎接前来助威的吉田首相，志华子亲自到高知。接到首相后，第二天又乘早晨第一班车赶回观音寺去布置欢迎会场……这次最艰难的选举终于获胜，志华子夫人功不可没。

大平成为议员后，许多事务必须得到夫人支持才能正常开展。当时处于战后经济复兴时期，从各地选区到东京办事的人找旅店很不容易，于是都住在当选的议员家中，大平家中也常常成了旅店。志华子夫人回忆说：“那时我像旅店老板娘一样。由于我们的住处比较宽敞，常常在十五张席子和十二张席子的房间里铺上被褥，让许多人住宿。有时一次炸了200个从广岛送来的牡蛎给大家吃。”

“从家乡到东京来为皇宫服务的团体分住在本乡的旅馆时，我们要到每个住处去问候，真像艺人一样。最初做这些事几乎要掉泪。”为了丈夫的前程，志华子真有些忍辱负重了，这对于出身于有钱人家的小姐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对大平真挚的爱才能做到。

当然，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妻子，志华子也不仅仅是付出，她有时也会得到一些回报，那也是她感到荣耀和愉快的时刻。1962年11月30日，大平率团出访美国，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二次日美经贸混合委员会会议。由于前一年在日本箱根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美方部长们均携夫人前来，故此次日方外相大平正芳、藏相田中角荣、劳动相大桥武夫、通产相福田一、农村相重政诚之和经济企画厅长官宫泽喜一均携夫人前往。志华子夫人有幸第一次出国访问。在飞机里，优待妇女，夫人们均靠窗而坐，以便观赏外面的景物。到华盛顿后，夫人们跟随丈夫到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家和副总统约翰逊家，受到盛情款待。

1963年8月25日到9月10日，大平外相携夫人访问了欧洲五国和伊朗，志华子此次大饱眼福。给她印象特别深的是对英国的访问。应英国外相霍姆邀请，志华子跟随大平到格拉斯哥郊外别墅住了一宿，大平与霍姆去打雷鸟。志华子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狩猎时非常寒冷，在山坡上铺上大约十余条毯子吃午饭。带来许多保温瓶，用热咖啡和开水来温暖身体。当晚我们被请到霍姆先生的住宅，在晚餐会上用打到的雷鸟作菜。由于没有服务员，霍姆先生在牛津大学读书正在准备考试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担任服务工作。雷鸟骨头多，不容易吃。我把盘子里的青豆碰掉在桌子上了。可是霍姆先生装作他碰掉似的拾到自己的盘子里，对他这种亲切的照料真是难以忘却。在国外所受到的款待中，这次恐怕是最高的了！”

大平当上总理后，志华子对这件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非常高兴，这可以说这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时候。她曾跟随大平晋见了天皇，也曾随大平再次访美，与卡特总统夫妇站在白宫阳台上向市民致意，并与卡特总统挽臂而行……志华子感到很满足了，对大平也非常感激。

志华子有一桩心事，那就是觉得大平的身体太结实了，似乎不大正常。当然他患过尿路结石，轻微糖尿病和痛风病，但这些病都与生死无关，对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算不了什么。而大平虽然相信现代科学，却对自己的疾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警惕，志华子也受丈夫思想影响，觉得他没什么病。实际上1979年1月中旬大平在虎门医院检查身体时，医生对大平的心电图作研究后，认为“此人心脏有毛病”，并告知了大平。但这并未引起大平夫妇的警觉。

每当有人询问有关大平的事时，志华子总是说：“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啦。”志华子并不是因为大平地位高才这样说，而是因为大平也非常爱她和敬重她。每当采访大平的记者们问及大平夫妻的寝室房间的布置时，大平总是说：“即使各位都是熟人，也不能让你们看那间屋子，因为那是我们夫妇的神圣城堡。”大平对记者们说：“无论我多么忙，至少一个月要有一次只有我们夫妇两人一起吃饭的机会。”大平为了表达对妻子的真挚的爱，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的圣母玛丽亚》，发表在1978年10月16、17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

大平在文中认为，男人一生中要接触到许多女性，有的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理想化女性，有的是现实中接触到的有魅力和美德的女性。但没有一个能像自己的妻子那样可以被自己全面地了解。因此，他在文中对志华子作了深情的评价：

“我同妻子的生活，自结婚以来，已超过41年。生活一直平稳。妻子和我都是平凡的人。但是，若要问圣母玛丽亚是谁，我就从我妻子身上感到了

女性特有的一些美德。它们虽是朴素的品行，但对我却是无可代替的宝贵东西。

“我首先感到妻子对我和孩子们的认真奉献。这种献身精神虽不是结婚誓词，但它的确‘无论在健康之时或患病之时’，也‘无论在得意之时还是失势之时’，都不曾改变。所谓献身，就是把献身对象之事看得比自己的事重要，为了那个人奉献出自己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

“妻子不分昼夜地为我的健康操心，除饮食外，对于运动、休息、睡眠也都毫不懈怠地持续关注。不仅对我身体健康很敏感，而且对我的精神健康更敏感。这正是女性的美德，对我说来，正是圣母玛丽亚式的宝贵德性。

“带孩子是女人的很大负担，但同时也是极大的骄傲。对于女性来说，生孩子最能体现人生价值，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作用之一。有了孩子的女性形象才是圣母玛丽亚的属性中最高贵的一种。妻子也有幸生了4个孩子，虽不那么健康，但却顺利出生了。孩子们很听母亲的话，可以像朋友一样共同行动，那种情景真美好！孩子们都已各自成家，现在只有我们老两口一起生活。但每当有事，妻子又可与孩子们聚在一起，那时妻子总是处于一家的中心，似乎也是她最得意之时。

“与亲友们交往，大多是妻子的事，交往场所如人生的绿洲。在那里，尊敬和评价对方是很重要的，而为对方服务的亲切之心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短暂人生中遇到的机缘，无论它多么细小也应重视……”

“妻子的作用，就是珍惜地保持与这些机缘的连接，并不断给它浇水、施肥，妻子不厌其烦地干着这些事，从不因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贫富之差而改变态度。由此，将给干渴的世上以滋润，给喧嚣的世上以平静，给矛盾尖锐的世界带来缓和，我想，这就是上天对女性所期待的重要作用。

“打扫房间和庭院是妻子的重要工作。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妻子在道德上的纯洁超过了我。对事物的道义上的鲜明度比我更敏感。我想，也许审美感的细致，道德上感觉的敏锐，正是女性所特有的杰出的能力吧。在维护人类世界的秩序上，女性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大平眼中的志华子，真是一个完美的化身。

## 住宅与财产

大平与志华子组成家庭后，住宅发生过多变化。大平刚结婚时，新居安在东京杉并区和田本町，但不久就前往横滨地区担任了税务署长，在矶子区芦名桥租了住房，将志华子接来居住。“这是一个多少带点海滨气息的恬静的住宅”，志华子在那里生下了长子正树。这是大平夫妻第一个长久居住的安乐窝。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大平从蒙疆回来。因怀念第一次长久居住的横滨，便在横滨中区本牧三之谷268号安了家，女儿芳子就出生在这里。

由于战局对日本日益不利，大平在战争快结束时，从横滨搬到了东京的牛込，住在岳父隔壁。1945年美军空袭东京时，牛込的家又被烧毁，大平在东京世田谷区临时租房居住。1945年9月下旬，大平的岳父铃木三树之助在东京驹込林町105号买了一套面积很大的住宅，大平全家就与岳父搬到一起居住了。这套原属贵族的住宅占地约4000平方米，除客厅被炸坏以外，其他房间基本完好。房屋比较气派豪华，还附带停车房、车夫休息间等。战争刚结束时，一些与大平家和铃木家有关系的人因无法在东京找到住房，便挤在

这里一块儿住，包括大平的同事伊东正义也曾住在这里，最多时同时住九家人。大平一家在这甲一住就是 20 年，这 20 年大平在宦途上经历了许多沧桑之变，长子正树也在这里去世。1965 年 11 月，大平因不愿再住在正树曾生活过的这座住宅里，以免触景生情。在与风水先生商量后，大平一家搬到了东京世田谷区濑田高台的新居。

搬家之后，大平从丧子悲痛中逐渐解脱出来，心情有所好转。在这里住了 9 年。1974 年初，刚访问中国回来后一周，大平在濑田的住宅又因失火被烧毁。当记者问他对这一遭遇作何感想时，大平喃喃地答道：“这是第二次火灾了。第一次是在昭和 20 年 5 月的战争年代，那时我帮津岛寿一躲避了灾难……”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主席送给大平的怀素《自叙帖真迹》影印本，由于事先被志华子夫人存放在一位知己的书法家那里，从而没有被烧毁。这次火灾之后，大平一家一直借住在邻近的森村家的房屋。

1976 年底，大平生平第一次计划并建设的私邸在东京世田谷区濑田一丁目 28 番地 3 号落成，大平家有了永久性住宅。建房时大平说，“孩子们都要各自建立家庭独立生活，盖一所只供老人住的房子就可以了”。但在实际建造过程中不断扩大，最终建成一所与其旧宅差不多大的房子。

大平刚参加工作时，月薪是 75 元。结婚后不久，大平被提为高等官，月薪升为 137 元，这比起其他许多大学毕业生高得多。但是，对于出身在有钱人家的志华子来说，靠这点薪金生活并不宽裕。加之大平喜好交友，晚辈们常要大平掏钱请客，往往弄得家中人不敷出。实在有困难，志华子只好请父亲铃木三树之助接济一下。

以后进入政界，随着职务的升迁，收入也大大增加。战后国会议员待遇较高，每月数十万元收入，特别是到池田内阁时代，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民收入倍增，大平家的生活也十分优裕了。

大平当选为总理大臣后，按规定应向国民公布私有财产。据 1978 年 12 月 2 日《读卖新闻》报道，大平总理于 12 月 1 日公布财产：

不动产部分：大平私邸在世田谷区濑田一丁目 28 番地 3 号，占地面积约 1155 平方米，地价约 1.9 亿日元。1974 年因火灾，大平私邸全烧毁。1976 年 10 月底，新建一幢住宅，面积约 264 平方米，据大平说，“建筑费不到一亿日元”。在大平的老家香川观音寺市，有大平选举事务所，约 200 平方米。另外，以志华子夫人的名义，建了一幢别墅。

动产部分共分为三类：

（一）存款 1500 万日元；

（二）股票：岳父的三木证券公司 36 万股。赞岐罐头公司 3 万股。马渊电动机公司 84 万股。从津岛寿一处转买的亚洲航空测量公司股票，由于一再追加资本，已达 62 万股，时价约 2 亿日元，大平已成为该公司第三大股东。由于大平即将成为总理大臣，12 月 1 日这一天，该股票价格上涨 25 日元，收盘价达 325 元。

（三）工资月收入：国会议员 81 万元，文件交通费 65 万元，立法调查费 40 万元（全部交给党），即将担任的总理大臣月薪 155 万元，总计一月薪金 341 万元。

尽管收入颇丰，大平还是说：“把薪金袋原封不动地交给我的内人，衣服口袋里的零用钱只剩下 10 到 20 万元了。”大平抱怨道，婚丧嫁娶，年节祭日的开支太多，“一年的报酬怎么也不够”。1977 年大平申报的收入约为

2300 万日元，约合 11.5 万美元。

虽然大平抱怨收入不够承担庞大的开支，但普通国民看到报道太平财产的消息后，仍禁不住惊叹道：“到底还是一位过着远远超过普通百姓生活的大人物！”

## 孩子们

大平夫妻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东方人的观念看，“儿女双全”是很完美幸福的。大平和志华子对孩子们要求并不严厉，基本上采取放任主义。但孩子们总是细心观察和模仿父母，大平夫妇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对孩子们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大平夫妻对铃木三树之助很孝顺，孩子们也都很孝顺父母。

大平夫妻非常疼爱孩子，总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健康、幸福地成长和生活。但世上的事往往很难全遂人意，不幸也降临到了大平夫妻头上。1964 年他们失去了心爱的长子正树。大平为此在 1966 年专门写了《与长子正树永别》的文章，饱含深情地回忆了正树短暂的一生。

正树出生于 1938 年 2 月 6 日。战争末期，他进了九段晓星学园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由于在这所学校的学习，正树后来信仰了基督教。大平回忆说：“他背着书包，走下神乐坂，经过国营电车饭田车站前面的那副天真的模样，至今仍叫我难以忘却。”1945 年 5 月东京大空袭时，大平带全家进了防空洞。但正树不听劝阻，从洞中溜了出去。这时炸弹像雨点似的倾盆而降，把东京的夜空映照得像白昼一样。正树看到这个情景，拍手大叫：“爸爸，真好看，快出来看啊！”后因空袭太频繁，大平将家属疏散到了岩手县志华子的老家，正树也在岩手县一所小学走读。9 月转回东京另一所小学，四年级时又回到最初的晓星学园。

在晓星学园读完小学和初中，正树又进了成城学园上高中。在高中三年里，每天都乘火车上学，他那从小就多病的身体到高中时代也健壮起来。每个星期回家，正树都要到基督教堂去作礼拜，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一直保持终生。后来他去世时，告别仪式也是在教堂举行的。

1955 年春，正树高中毕业后考入庆应大学法律系。大学里有各种体育运动小组，正树参加了“合气道”小组。“合气道”原是日本柔术中的大东派柔术，后演变成为一种拳术。在这个小组中，正树交了许多朋友，在为人处世上正树也大有进展。

在与人的交往中，正树非常细心周到，体贴入微。大平说：“他对我的健康所给予的照顾胜过我妻。”对弟弟妹妹，正树从不耍哥哥的威风，也不指责他们的缺点，而总是赞扬他们的优点，常给予鼓励。他对外公的照顾也非常细心。外公眼脚不灵，正树就成了外公的眼和脚，扶着外公走遍了各地的温泉和风景区。对于不幸的人，正树充满了同情心。上大学时，他每星期都去护国寺附近的盲人学校，为双目失明的高中生读书。还多次把这些盲学生请到家中，请他们吃饭或听音乐。有几年时间，正树把自己的零用钱挤出一部分来，帮助家贫的同学缴学费。

大学毕业后，1959 年 4 月，正树根据父亲的安排，到加藤藤太郎在家乡办的神崎造纸公司工作。大平打算让他在那里工作三四年后，再到自己身边来工作。正树用了几个月时间学习了造纸工序的管理，然后进入计划室搞成

本管理。大平提醒正树说：“虽说是工厂，也是一项艰巨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工作。所以，要同在各道工序中工作的人结成真正的朋友，彼此要相互接触和了解，相互建立感情。”正树对父亲的教诲言听计从。他在公司工作期间，只有放假或过新年才回家来，而且从不向家里要零花钱。

在这期间，年轻的正树还为父亲的政治前程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1960年11月，大平正芳第五次参加众院大选时，由于担任官房长官一职，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回选区进行竞选演说。于是22岁的长子正树就代替父亲在竞选大会上演说。他把演说稿夹在画板上，一页一页地翻着演说。这样虽不是很精彩，但却令许多选民感动得流泪。甚至连大平的竞争对手也对正树说：“你父亲成了大人物，你也够辛苦了。”结果大平以第一名再次当选为议员。

在神崎造纸公司工作三年后，大平把正树接回家中。志华子想让儿子去德国留学，但大平认为没有必要，“到外国留学不是单纯学习外国，不过是借机更好地了解日本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用不着在外国呆那么长时间。”结果采取了折衷方案，让正树去国外旅游。正树自己也订了一个庞大计划，打算周游40国。

1962年7月1日，正树欢天喜地从日本羽田机场出发，飞往美国夏威夷。在他动身后不久，池田内阁改组，大平正芳由官房长官改任外务大臣。正树在洛杉矶知道此事后，觉得以外务大臣儿子的身份去打扰驻外使、领馆不大好，便在旅游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到北美和南美各地旅行后，正树到了纽约，与正在那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父亲见了面。

在以后的两周里，正树作为太平外务大臣的私人随员，周游了欧洲各国。一路上，正树为父亲换洗衣物，承担了所有的生活琐事，照料着父亲的起居。虽然大平认为正树的“英语法语都很差，遣词造句不大好”，但正树胆子很大，他用外语不仅能应付日常会话，而且同被访问国家的外长和官员谈笑风生，特别与荷兰外长伦斯谈得很投机。大平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暗想：“我将有个好接班人。”他对儿子正树真是充满了期待。后来，他又带正树去谒见了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正树感到非常紧张，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又觉得十分荣耀。

不久以后，父子两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分手，正树继续他的旅行。在维也纳，正树开始行走不便，“夺走他生命的难治之症，已在开始侵袭他的身体了。”他不得不去日本驻维也纳使馆向内田大使求助。在内田大使夫妇及其家属的细心看护下，正树的病稍好一些。尔后，他又前往非洲、中近东和东南亚旅行，按约定于圣诞节前一天回到家中。

1963年春，大平安排正树到香川选区问候选民。他到达香川的坂出市时，借宿于妹夫森田的父母家。森田夫人是眼科医生，她发现正树的眼球出血，原因不明，就提醒正树病情不可轻视。正树急忙赶回东京，去东大医院求医。经检查，才知道是一种世界上不多见的难治之症，叫做贝泽蒂斯氏病。这样，正树住进了东大医院。但是，病情却日益恶化了。

大平夫妇俩为正树的病绞尽脑汁，想了各种办法为他医治。注射、服药、指压、按摩，乃至烧香祷告，“真是千方百计，全力以赴”。然而，正树的眼出血仍然不止，右眼接近失明。疾病又逐渐侵袭到下肢神经。正树逐渐临近了死亡的深渊，一天大在病床上同死神作最后的斗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没忘记关心父亲的健康，向家里人交待如何照顾父亲的饮食和睡眠，也一再劝父亲尽快辞去外相这个繁重的职务。同时，他还努力使每天都过得

很有意义。他请照看他的护士念书，收听电台广播，欣赏音乐，评论大平在国会上的发言……

1964年5月，东大医院扩建，大平让正树搬回家住，请医生出诊治疗。正树在家中除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外，还以乐观的情绪努力生活。他曾口述一首和歌，由护士记下来，请按摩师转交给大平：“母亲的信来自遥远的故乡，大雪覆盖，故里茫茫。春来雪融、水清，幸福的鸟儿，在日本高翔！”他希望自己的病能早日痊愈，自己能像自由的鸟儿一样在大自然中尽情地欢乐。但是，病魔已逐渐侵入他的心脏。8月6日，大平出门之前来到正树的病床前询问病情，正树说：“脚有点儿疼。”大平便为他按摩了一会儿。到中午，正树发起了高烧，大平全家守候在他的床前。到晚上，正树对小弟大平明说了一句：“我要去旅行，给我准备鞋子。”就再没说一句话便去世了。

大平把正树葬在铃木三树之助留下的多摩陵园，让正树抱着圣经和喜爱的玩具与他崇敬的外公一起长眠。正树生前非常佩服一位名叫保罗·三木的少年，在基督教传到日本时，保罗曾殉教而死，所以正树受洗礼时，以保罗·三木作为自己受洗礼之名。大平在正树的墓碑上写着：“保罗·三木大平正树”，下面署名“父亲、朋友大平正芳”。

失去长子的大平异常悲痛，他深深地怀念说，“同正树的永别，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然而，它已变成无情的、难以动摇的现实了，作为凡夫的我，已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希望与热情。对于我来说，他几乎是我的一切，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这巨大的悲痛宛若一把锋利的钢刀，至今还剜割着我的心。尽管岁月流逝，但这把钢刀依然那么锋利。”

大平向来以冷静、稳健著称，但失去爱子的悲痛使他不能自持，即使当着前来安慰他的池田首相和前尾干事长，他也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只能呜咽地说声“谢谢”。他将正树的照片挂在自己书房里，经常端详，寄托哀思。志华子作为母亲，虽没有像大平那样被悲痛压得精神恍惚，但她连正树的遗像都不敢看，怕自己感情受不了。

好在其他二子一女非常体贴父母，他们总是用自己的孝顺来抚慰父母受伤的心。1966年，他们的次子大平裕结婚了。大平裕在庆应大学毕业后，在古河电气工业公司海外事业部工作。1965年，大平夫妇的老朋友远藤福雄先生的长女把正在圣心大学读书的妹妹远藤公子介绍给裕，二人见面后觉得情投意合，便订下了这门亲事，1966年10月14日公子大学毕业后，由古河电工总经理植松清夫妇证婚，在大仓饭店举行了结婚典礼。大平正芳为纪念次子结婚，出版了新著——回忆池田政权的随笔集《春风秋雨》。小儿子大平明后于1977年11月成家，夫人是上原吉子，已如前述。

大平夫妇对女儿芳子的婚事也比较满意。芳子很机灵、在总裁预选时，她为父亲跑遍了全国，对大平正芳预选获胜起了很大作用。她是1961年结婚的，夫君是香川县坂出市的森田一。森田一的父母皆是医生，一家都是大平在政治上的支持者。他本人从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大藏省主计局工作。由于是大平的晚辈，又是老乡，所以森田经常出入大平的家中。志华子第一次见到森田便有了好感，觉得森田这个小伙子思考问题冷静，待人又温和热情，对大平在工作上的事敢于提出不同见解，提完之后又能配合大平工作。志华子很喜欢他，每次森田在大平家都能受到特殊待遇。

看到母亲对森田如此偏爱，芳子心中已经有数，“母亲准是相中这个人作女婿啦！”芳子本人对森田也颇有好感，森田也觉得志华子教育的孩子都

很有教养，知书识礼，待人接物十分得体，他也对芳子姑娘情有独钟，而且暗想：芳子肯定能与自己母亲和睦相处。

既然双方都有此意，事情便很快定了下来。1961年10月30日，由大平的前辈津岛寿一夫妇作媒人，芳子与森田在官殿饭店举行了婚礼。太平对此婚姻很满意，他对芳子说：“女孩子不学习也可以，令人喜爱，早点出嫁也好。”虽然天下所有的父母都不情愿把女儿轻易嫁出去，但大平却对森田一这个女婿特别喜爱，在担任外务大臣和大藏大臣时，特意把森田一要来充当自己的秘书官。

森田不仅很爱芳子，而且对大平这个岳父十分尊敬，总把大平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重要。芳子曾嫉妒地开玩笑说：“森田如果不是跟我，将会和大平正芳结婚。”对大平夫妇来说，森田是个打着灯笼都难寻的乘龙快婿。志华子常把森田看作是正树的替身，对他非常依赖。在大平正芳晚期的政治生涯中，森田发挥了很大作用。

## 读书与认识世界

大平正芳作为自民党内的“才子”，很大的嗜好就是读书。在记载大平总理活动的日志里，常常看到星期日记载着“终日在家中读书”。他无论怎样忙，每星期都要去书店买两三本新书回去。甚至在当上总理出访美国时，也突然改变原订日程，走进曼哈顿大街上的一家书店，在那里停留了六七分钟，并且在店主的劝诱下，买了一本名叫《预言家》的诗集。后到中国访问时，也去王府井逛书店。

但书买得多并不等于有许多时间读书，大平说：“好不容易买来的书，不读它太可惜了。并且，我正是为了阅读才购买的。可是实际上，不但我忍痛拿出来读书的时间不足，而且头脑平庸，毅力也不够。我大致浏览一遍目录，然后挑选其中引起我兴趣的章节来读。”

正如前述，大平读的书大多是翻译进来的，因为他觉得西方和中国的著作各有其特点，而日本人写的东西基本上是忠实地介绍甚至模仿东西方文化。大平认为，与战后恢复和平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日本更多地倾向于西方思想，即所谓“洋学”，现代日本学问的重心就放在洋学上面，它对日本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偏重洋学虽然在日本的物质方面的现代化开出了绚丽的花朵，但形成其基础的西洋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日本人的血肉，是否对引导日本人的实际生活起了作用，我心中还是没底。”

所以大平认为，现在日本人仍处于精神上的饥渴状态，而且无法决定向何处寻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依托，“真正是日本人的，我们引以为自豪和自信的固有的日本思想，究竟是什么？这个课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在更深的文化领域中，都没有得到解决，也未确立下来。”大平认为正因为这一点，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焦躁情绪，新出版的书简直多如牛毛，目不暇接，形成了乱出书，乱卖书和乱读书的现象。“因此，近来我认真地考虑不要乱读。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书籍，凡是经受了历史风霜的考验，仍然放射出强烈异彩并具有生命力的少数书，就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生活的伴侣，认真阅读，很好地消化。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我们精神上的渴求。”

大平看到有些人虽然读书不多，但在认识历史和时代以及判断问题时却不犯错误。所以大平认为不应该炫耀书架上摆的书如何的多，“而应该寻求

几本给自己的实际生活带来坚定的信念和光明，像珠宝一样珍贵的书……因为读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寻求文章的精雕细刻，而在于寻求自己生活实践的明灯。”

大平认为，读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世界，指导自己在世界上的实践活动，那么，喜好读书的大平正芳是如何看待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呢？大平通过观察，发现有不少人为无法建成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无法建成一个生活更加舒适的社会而感叹不已。但历来就崇尚务实的大平认为，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为了满足人们而构成，“我觉得世界对我们虽然并不特别怀有好意，但也不是特别怀有恶意。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适应这个世界。”

大平认为，从历史上看，人们总是生活在苦恼的深渊之中，而且多次奋斗，多次改革，企图摆脱这种苦恼，但都失败了。偶尔改革成功高兴了一下，但很快又陷入新的苦恼，常常为希望的幻灭而悲伤。怎样看待这种状态，采取什么方法逐步改变这种状态呢？

首先，大平认为不要轻易断定今不如昔。他说：“仔细研究一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拿任何一个时代来与今天相比较，看来没有一个时代是完美的。在任何时代，似乎都是憎恶与争夺胜过信赖与和平，生活的痛苦大于生活的乐趣。”所以不能笼统地说今天这个时代不好。

其次，应该找出产生痛苦的原因，仅仅发牢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必须冷静地追究使人们产生苦恼的根源，否则，不但不能找到改善处境的头绪，搞得不好，处境可能比现状更糟。

第三，如果过于性急，要求一下子实现比较好的境遇，一旦不能实现，便感慨万端，甚至自暴自弃，这样生活是不明智的。应该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考虑怎样做才能不使处境比现在更坏。

第四，大平认为一切改变世界的手段都包含了利和弊两个方面，绝对有利的手段是没有的。应该从现实出发，找出一种利多弊少的手段。

第五，大平认为，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首先应想着别人而不是自己。“我想，人的真正喜悦不在于责备别人，而在于为别人做点事情。这个社会的改良与进步，首先取决于每个人对别人做出多大贡献。”

大平正芳对读书、对世界的这些看法，虽不是气势磅礴的宏论，但却是处处闪烁着人生真谛的至理名言，发人深思，催人奋进。

## 花甲之年的自勉

稳健、务实的大平正芳，其人生观也是非常现实的。他在1970年3月12日年满花甲之时，撰文回顾了自己这大半生所经历的沧桑之变，并阐述了自己对“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重要问题的看法。

太平在这篇题为《花甲之年和自诩》的文章中，引用了孔夫子的名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平认为自己这一生，“既无如此崇高之理想，亦无坚定不移之信仰”，“既无巨大的飞跃，也无惨重的失败”，一生平平淡淡。但他认为“始终保持平淡是最难得的，而且无论是得意之朝，还是失意之夕，都能处之泰然，也确实不凡。”

大平曾经读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版的田边元博士写的《历史的现实》一书，他读后深受感动，并认为书中的观点“以后似乎已成为我对事物

的看法与想法的重要指南”。按一般人理解，时间就像流水，从过去流到现在又流向未来，是直线进行的。然而，田边元博士却认为，时间在任何时候都是“现在”，而这个“永恒的现在”，总是处在趋向未来的力量和留恋过去的引力这两种朝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力紧张地相互抵消与平衡之中。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间永远是“现在”，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个永恒的现在。

所以大平正芳认为，“对我们说来，首先只有现在，才是在无限选择的可能性中被选中的唯一宝贵的东西。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对待这个现在，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生存的办法。”大平既反对不顾现实而单纯地追求未来，也不同意一味地留恋过去的时光，认为这两者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他认为，“人生只不过是每日每时不间断地进行认真的实践而已”，只有现在的实践，才能创造现实的生活。

大平认为孔子的述怀，将人生划分为各个阶段，目的是阐述自己通过每天的实践，在某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信念。年届花甲的大平审视自己，是否在过去每一天的实践中都无愧地竭尽了全力呢？

大平回顾了六十年来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包括两次残酷的大规模战争，日本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改变……他庆幸“在这段时间，我没有遇到大的波折，顺利地生活过来了。”

的确，大平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尽管生活贫困，还是得到了父母兄弟的慈爱和理解，“没有遇到特别不顺心的事，生活上也没感到痛苦。”后来上大学又得到资助，进大学后又获许多良师益友相助，大学毕业后又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并在大藏省结交了许多好友，积累了各种宝贵经验。而且在战争中居然被免除了兵役，全家都保全了性命。在和平时期，失去了长子，但其他几个孩子都顺利长大成人。在1952年进入政界后，每次大选都取得胜利，连续任众议员至今。而且由于受前辈知遇，曾历任一系列重要职务。

大平认为，自己为这个社会也做了许多应该做的事，他列举了不少为故乡推进的公共事业，如开办学校、整治河流（修筑堤坝、建设公路、兴修香川灌渠，兴建濑户大桥等，而且还着手兴办三丰围海造田工程。“关于我作为一名议员乃至党员，抑或是一名国务大臣乃至党的干部，通过内政外交，过去对国家和党所做的工作，任凭世人去评说……老实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勉强尽了公与私赋予我的义务，没有犯过大错而已，但也没什么值得自豪的功绩。”虽然如此，大平还是觉得自己得到的要比付出的多，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倘若我在这里开一张借贷对照表的话，恐怕记人借方的数字会很大，而记入贷方的数字与之相比就太小了。”

现在年过花甲，今后该怎么办呢？大平在这里勉励自己，今后的任务，“要竭尽全力抵消借方的数字”。在六十岁这个一般人都应退休的年纪，作为政治家的大平正芳却雄心勃勃。他根据西方的一句谚语：“人生从七十开始”，表示自己“六十立志不算晚”，并设想了今后的打算。

首先，“要力戒骄奢与怠慢”，要多为他人着想，以宽厚诚实待人，而不受对方地位高低或自己好恶的约束。其次，对于工作，“不管公私与轻重，也不管忙闲与难易，都要认真对待。”“钻研工作应深入，处理事情要客观。”另外，要不断进一步努力学习，“话到老，学到老”。大平最后给自己订下了今后自诩的座右铭：进退由天，荣辱从命。在以后的总裁预选时，大平使用这一座右铭来勉励自己，并最终达到了预定目标。

## 第十一章 在暗礁与险滩中奋进——第二次大平内阁

### 一波三折的起步

1979年11月6日，大平正芳再次当选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这是一个月党内抗争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抗争的结束。由于各派的抗争在继续进行，致使新一届内阁的组成和党的领导班子的安排出现了一波三折、困难重重的局面，这预示着新一届大平政权今后的施政将遇到来自内部的更大阻力。

在当选总理前的11月5日，被党内抗争搞得疲惫不堪的大平曾对自己的亲信表示，若当选总理再组建内阁，“只可依靠大平派和田中派来组阁，要竭尽全力控制这两派的人阁人数，多多起用在野的人。”但真正当选总理之后，就不得不考虑党内各派系人阁人数的平衡，否则就无法正常执政。因此11月7日各报晨刊均报道说：“大平首相已经考虑要建立举党协内阁，在人事安排上也将采取灵活态度。”这是因为大平在当选总理的当天下午，就在首相官邸召开了自民党五领导会议，即总裁、副总裁和“党三役”参加的核心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举党体制的方针，并委派大平连夜拜访三位反主流派领导人三木、福田和中曾根。虽然抗争仍在继续，但大平为了顾全政局的稳定，使组阁减少阻力，仍拖着疲乏的身体走访了反对派领袖，请求他们给予协助。

按照惯例，每届内阁组成前应先确定自民党的三位主要领导者的人选，即先确定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然后由这“党三役”与官房长官一起，会同总裁决定内阁成员名单。但此次安排却受到反主流派的极大干扰，反主流派提出，如果直接同福田对话很困难，今后就通过三本派的众议员井出一太郎传话，但“党三役”的人事安排由三木、福田和中曾根决定。大平得知后觉得十分恼火，对官房副长官加藤纮一说：“究竟想闹到什么地步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只能和有良心的在野党人士合作了。”大平经过反复思索，想出了一个很妙的方案。因为现仕“党三役”的任期未滿，完全可以在不更迭党三役的前提下先组建内阁，后安排新的党三役。

11月8日下午，经过反复磋商，第二次大平内阁组成。其中文部大臣的人选颇费周折。大平本来想与新自由俱乐部联合，邀请河野洋平或田川诚一入阁担任文部大臣，故先打算自己兼任这一职务。但新自由俱乐部的下层反对与大平政权联合，因为新自由俱乐部是批判了田中角荣的“金权政治”后脱离自民党另组新党的。现在他们认为大平内阁受到田中影响很深，故反对本党领袖入阁。最后确定谷垣专一担任文部大臣。第二次大平内阁成员如下：

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法务大臣仓石忠雄，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大藏大臣竹下登，文部大臣谷垣专一，厚生大臣野吕恭一，农林水产大臣武藤嘉文，通产大臣佐佐木义武，运输大臣地崎宇三郎，邮政大臣大西正男，劳动大臣藤波孝生，建设大臣渡边荣一，自治大臣后藤田正晴，总务长官小渊惠三，行政管理厅长官宇野宗佑，防卫厅长官久保田园次，经济企画厅长官正宗启次郎，科技厅长官长田裕二，环境厅长官土屋义彦，国土厅长官园田清充，官房长官伊东正义。

这次内阁人事安排有一个突出特点，除了仓石忠雄、竹下登和佐佐木义武之外，其余大臣均为第一次入阁。新闻舆论评价这次内阁的组成，说第二

次大平内阁大体达到了降低阁员平均年龄的目的，可以说是“轻量级、务实型内阁”。特别是起用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研究小组组长大来佐武郎担任外务大臣这一重要职务，引起舆论界关注。大来既非自民党员，又非国会议员，但他是国际经济评论专家，日美智囊团成员。起用他反映了大平总理对日美关系的重视。舆论还指出，这次组阁是在冻结三位党的领导人选的情况下进行的，“组阁困难重重”。在阁员的派系构成上，除首相外，田中派和福田派各占4名，大平派和中曾根派各占3名，三木派占2名，中间派和无党派各占1名。因此舆论界认为这次内阁仍是故态依旧的“派系均衡”的人事安排。当然，这也反映出大平首相为了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局所作出的让步。政治评论界指出，“在朝野政党势均力敌的国会这一基础上，背着党内一分为二这一沉重包袱的大平新内阁，今后在内政、外交以及党内等所有方面，势必要被迫进行极为艰苦的政局管理，可以说其前途比过去任何一届自民党内阁都要严峻和充满曲折。”

完成组阁的当天，大平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招待会，表明对新内阁的期待：“让年轻人入阁，是想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我一直很着急，想早日组成内阁，不给行政留下空白。组阁晚了，很对不起。我想赶紧填补迄今留下的政治空白，不辜负国民的期望，推进政策的实施……”在9日的内阁会议上，大平首相更具体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特别国会上的总理提名和组阁的拖延，带来了政治和行政上的停滞。我对此深表遗憾，并愿向全体国民由衷地表示歉意。”“确立政治伦理，严明行政纪律，是这次大选中明确表达出来的国民意志，我将以此作为施政的基点，努力恢复国民对于政治和行政的信赖。”

11月16日，自民党总裁大平正芳最后订下了党三役的人选。党的三位领导人由于其职位极为重要，成为党内各派系激烈争夺的目标。一向支持大平的田中角荣本来想让本派的二阶堂进任总务会长，但大平周围的人因二阶堂是有受贿嫌疑的“灰色高官”而极力反对，田中又主张让大平系的中间派福田一担任干事长，最后田中推荐的这两个人都未能进入党三役。大平经过反复斟酌，决定中曾根派的樱内义雄担任干事长，这样一来可避免违反以前与其他各派达成的“干事长不从总裁派系出任”的协议，二来樱内为人诚实，对团结和协调党内各派很有利。总务会长由大平派的铃木善幸担任，福田派的第二号人物安倍晋太郎担任了政调会长。大平这样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就得罪了历来的盟友田中角荣，引起了二人间的不和。

反主流派对这样的安排经过协商之后，有条件地表示赞同，条件是打破金权体制，冻结预选，修改公选法。

这样，党内持续40天的抗争总算告一段落，大平新内阁一波三折地起步了。

## “大平行政改革”

鉴于这次大选国民对自民党的严肃批判，第二次大平内阁一成立，大平首相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推进自己早就计划的、国民也热切希望进行的行政改革。关于这一点，大平在第90次临时国会的政见演说中进行了特别阐述。

第89届特别国会在首班指名后，没有发表新任首相的政策主张便于11月16日闭幕。11月26日，再度召开了为期两周的第90届临时国会，大平

总理于 11 月 27 日发表了政见演说。

大平在演说一开始就表明：“我认为，如何维系国民对政治的信赖，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政治课题。”接着大平对这次大选结果作了一个表态，表示要虚心听取国民意见，谦虚承担国政。

大平演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保行政和政治的严正”，强调要按照在选举中所表现出的国民的意愿，严明行政纪律、确立政治伦理。对于在政府机关内的受到国民指责的行为，大平责令有关省厅继续查明真相，对其责任者要严肃处分。同时，为了消除纪律的松弛和根绝不正当使用预算资金，“有关政府及政府机关，除了对预算总额及其执行再进行检查外，还期待着内部监察的彻底和勤务体制的严正。此外，对于公共团体职务的奖金状况，也要进行能被国民所理解的改革。”

如何确立政治伦理呢？大平在演说中提出要使政治资金公开化，整顿企业的自主性监督机能，明确行政上的手续和责任，整顿和加强制裁法规。他说，政府已经在进行准备，修正有关法规，并向国会提出法案。在国会的帮助下，正在锐意研究公正而不花钱的选举。另外，公布政治家的资产，应交国会研究和审议，但“政府对此将充分协助”。

大平认为，基本政治和所有的政策、决定和管理，都应充满公正的精神，贯彻清廉的态度。因而他在演说中保证，“以我为首，阁僚要严戒把自己凌驾于政治之上，必须清除今天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仰。新内阁组建时，我对各位阁僚发出保持纪律的具体指示，就是基于上述考虑。”

大平首相演说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行政的革新”。他指出：“整顿和简化行政之类的革新，是国民要求最强烈的课题。今天，无论从节约庞大开支还是维持社会经济的活力来看，在经济高度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我们行政的臃肿和过度介入，都必须严格清除。”他郑重地向国民申明，政府决心进行改革，使行政简化而提高效率。具体措施是，在扎实进行 10 月 12 日决定的裁减定员的同时，根据实情，花力气转变职能的配备，重新估价行政机构的存在方式和职能，在年内制成计划，对特殊法人、省厅的附属机关及地方支分部局进行合并和撤销。有关批准制度等行政事务，要排除历来的惰性，积极推进其整顿和简化。

大平的这些有关行政改革的真知的见不久便转化为实际措施。根据大平总理的指示，新一届内阁有关成员就上述问题制定了具体执行方案。（一）彻底清查政府机关的不正当收支及其他违纪行为，严肃处分违纪人员；（二）禁止政府机关之间请客送礼；（三）杜绝谎报差旅费及其他浪费预算资金的现象；（四）年内制订出整顿特殊法人和政府部门附属机关及其地方分支机构的计划；（五）年内制定出调整政府补助及行政事务的计划；（六）主动控制内阁成员工资的增加幅度。

为了减小行政改革的阻力，大平有意在内阁中安排了较多的年轻大臣，而安排了资历稍深的宇野宗佑为行政管理厅长官，以便使宇野能没有顾虑地放手从事行政改革。

由于大平总理对行政改革下了很大决心，有关内阁成员迅速即投入行政改革的工作中去。11 月 22 日，大平首相同竹下登藏相、宇野行政管理厅长官、伊东官房长官磋商了行政改革问题。12 月 18 日，内阁会议通过了裁减 160 名特殊法人干部的方案，使特殊法人干部有半数以上是民间人士。这项方案受到政府各部门内的有利害关系者的强烈抵制。但内阁官房长官伊东正

义全然不顾这些阻力，坚定地执行了内阁会议的决定。

在此基础上，12月29日，内阁会议又提出中期行政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包括，1986年以前撤销26个法人机构；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合理安排人事；削减四分之一的政府补助金。

到1980年3月，内阁10个省厅的35个机关决定对目前按地区按部门设置的地方性分支机构加以整顿，并积极采取行动，对1200项批准和认可事项进行清理，对1500项报告事项进行废除或简化。大平内阁组建后仅3个月，就在行政改革方面有了如此之大的举动，使日本国民看到了希望，他们将这一系列的计划和措施统称为“大平行政改革”。以后，行政改革便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 日中友好的使者

第二次大平内阁成立后，大平首相在外交上的日程安排首先就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在第一次大平内阁成立不久就得到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的。

大平历来主张与中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在他担任首相之前就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这种主张。在担任首相之后，无论是在会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时，还是在政见演说中，都一再重申这种一贯的主张。这种主张不仅仅是在政治上作原则性的表态，而且随着日中友好关系的逐渐深入和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大平总理还打算在具体的两国经济合作上有所作为。1979年9月3日，大平总理与来访的中国副总理谷牧进行了会谈。谷牧提出：“为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希望得到日本的大力合作。”大平以积极的态度回答说：“日中间的经济关系过去主要是以民间方式进行的，今后日本政府将参加到这一行列中去，实现直接合作。日本将以向前看的态度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时中国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希望得到26亿美元的日本政府贷款，帮助中国的交通和能源开发建设。谷牧这次来日本，带来了八个国家建设项目，包括扩大煤炭生产，建设水电站，铁路和港口设施，请日本政府提供资金。大平政府与民间团体于9月6日协商后，决定各自派代表团在9至10月访华，同中方商讨向中国提供总计约55亿美元的日元贷款的具体内容。政府代表团将在9月派出，与中方商讨向中国的建设项目提供贷款的具体事宜。

大平再次当选首相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过双方努力，两国间的各种实际业务协定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都一个接一个签订，所以日中之间目前没有急待解决的外交悬案。因此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一是同中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世界局势特别是亚洲局势交换意见，以加深相互理解，加强友好关系；二是协商日本如何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特惠关税的问题。日方准备将这两个问题作为对华经济合作的两大支柱，以密切两国经济关系。

大平首相11月29日上午在首相官邸召集了各省厅负责人就访华一事召开碰头会，经磋商之后，确定访华时要签署日中文化交流协定。在这之前大来外相曾对记者说，大平首相已定于12月5日访华，届时将向中方表示愿提供15亿美元贷款。帮助中国的六项工程建设，包括新建三条铁路、三个海港和一座水电站，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

12月1日傍晚，大平把外务省一些局长和课长召到濑田家中，举行了第三次学习会，为5日访华作最后准备。

国内外舆论对大平访华也很重视，日本各家报刊称大平访华为“使两国关系走向新时代的第一步”，英国卫报称“太平这次访问将使日本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

1979年12月5日，作为日中友好使者的大平正芳总理乘专机前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战后太平第三次访问中国，而且是以日本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华，对于太平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感受。随同大平一起访华的，有大来外相、二阶堂顾问、志华子夫人、次子大平裕夫妇等。这一天，隆冬的北京出现了小阳春，下午1时5分，大平总理一行乘坐的日航专机在风和日丽的北京机场降落，大平总理走下舷梯后，受到了总理华国锋等中国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从机场到钓鱼台国宾馆的沿途，大平总理受到北京居民的夹道欢迎。

下午4时半，太平总理来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国准备送给日本的雌性熊猫“欢欢”的情况介绍表。1972年大平随田中访华时，中国为了表示友好，将视为国宝的一对大熊猫“康康”和“兰兰”送给了日本。但雌性熊猫“兰兰”不久前病死，中国决定这次又再送一只去。大平对此表示感谢，并代表日本赠送给中国猩猩和牦牛。互赠仪式结束后，两国总理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涉及到了朝鲜半岛问题，印度支那局势，对苏关系、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问题等，大平在会谈中重申了日本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立场。当晚出席中国总理的欢迎宴会，大平在致答辞时，希望中国“承认”两国内政的不同。

12月6日上午9时半，大平总理一行向毛泽东纪念堂献了花，接着又参观了周恩来纪念展。10时半，太平总理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举行了会谈。邓小平一开始就对大平总理访华给予高度评价：“即使从国际上考虑，大平首相的这次访问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再过一个月就要进入80年代，这次访华是关系到80年代的重要事件。”大平答道：“自关系正常化以来，多方面的日中交流日趋活跃。两国领导人能进行坦率的会谈，在80年代前夕，这是有意义的。”

双方主要就双边关系进行了会谈。邓小平表示，维持日中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双方的立场不同，看待事物的方法也不同，但这不会影响大局，中日友好是大局的要求。80年代、90年代也要求两国保持友好关系。邓小平还对大平说，“这次是我同阁下第四次会面……作为老朋友，我希望见到你。坦率地谈吧！”

太平对访华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说，“对于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我国愿意尽可能进行合作。”并表明，经研究日方决定对包括医院在内的七个项目提供合作。同时大平申明了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三项原则，即（一）同欧美协调；（二）同亚洲特别是东盟保持平衡；（三）不搞军事合作。邓小平回答说：“理解日本政府的想法……此次这种合作得到了保证，令人高兴……”大平又谈到了自己最伤脑筋的日本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关于同台湾的关系，日本政府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规定的限度内，按民间实际业务关系处理的。”邓小平表示：“我知道。我认为，中国也希望日本按民间实际业务关系处理。”太平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双方还就对苏、对越、对柬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结束后大平觉得很

满意，还对记者谈了他对邓小平的看法：“邓小平先生是充满信心的，我看不他惧怕任何人。”

当天下午，两国总理再次举行会谈，主要就两国经济合作交换了意见。大平在会谈中正式提出日本政府对华贷款事宜：一、在本财政年度（即1979年4月至1980年3月）提供500亿日元，约合2亿美元，分30年偿还，年息3%；二、日本将向中国提供一般优惠待遇。

会谈结束后，两国总理还出席了由大来外相和中国文化部长黄镇签署两国文化交流协定的仪式。日中双方还缔结了一项开发利用渤海湾石油和天然气协定，并商定尽早开始就签订科学技术协定问题举行谈判。

12月7日上午，大平总理在中国政协副主席乌兰夫陪同下，在中国政协礼堂向1100多名听众发表了讲演。讲演题目为《以新世纪为目标的日中关系》。由于这是外国首脑在中国的初次讲演，所以当天下午讲演通过电视和广播传到了中国各地。大平总理在讲演中回顾了老一辈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日中邦交正常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在复交过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的“求大同，存小异”的极大度量。他还提到邓小平副总理为完成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专程赴日，日中两国再次宣布永远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之事。大平还赞扬了十亿中国人民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表示对叶剑英委员长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表现出的克服困难、争取光明前途的决心很受感动。

对于日中两国双边关系，大平总理郑重声明：“我们曾共同宣誓，日中两国要遵循两国共同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作为友好邻邦，将来要永远维持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我们已达成协议，不仅在80年代，而且要面向21世纪，应该在所有的领域发展和更深入、更广泛地谋求两国间良好而稳定的关系。并且确认，这样的日中关系，应该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

大平总理又诚恳地指出，80年代绝不是允许乐观的时代，各国都面临着各种各样深刻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也会面临许多困难。然而，现在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仅靠一国就能完全解决的。今天的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不深深地相互帮助就无法生存的时代。“我相信，所有的国家都相互帮助，进而分担责任，就能确保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大平说，世界各国都在向中国的现代化政策祝福，希望出现更加富强的中国。日本之所以坚定地提出与中国的现代化合作的方针，就是基于这样的期待。

大平总理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国民的心与心之间结成的坚固的信赖，为这种信赖作保证的，应该是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日中两国一衣带水，有两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但并不意味着两国人民不用努力就可以相互理解。在思维方式、人生观和处事方法上，日本人与中国人还存在着大的差异。因此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努力增加交往，如文化交流、技术交流等，还有相互学习语言，以增进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大平接着回顾了历史上的鉴真和尚和大量日本留学生越过汹涌波涛，冒着生命危险，相互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以证明日中间继续交流的必要性。

最后大平呼吁道：“在迈向21世纪的时代，还会有许多狂风巨浪的袭击。在这些狂风巨浪中，日中之间也许会出现意见分歧和利害冲突。然而，只要回顾两千年来两国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保持今天我们所具有的相互信赖之心而作出继续努力，我们的子孙就会在世界上为两国间永久的和平

友好关系而自豪。我衷心祝愿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永远保持下去，并愿意同各位一起在两国交往中为寻求新的深度和广度而共同努力。”

太平总理的讲演在礼堂中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正式的日程安排结束后，太平在7日下午到北京市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参观，逛了书店和点心店，还在一家餐厅与北京市民一起吃水饺，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志华子夫人则在邓小平的夫人卓琳陪同下参观了北京的动物园。熊猫“欢欢”从屋内走到露天来，但看到许多欢迎志华子夫人的小朋友后，害怕得转过身去背对着观众。卓琳对志华子说：“欢欢还害羞呢！”志华子说：“日本人在等待欢欢的到来。”欢欢或许是听到了这句话，终于把脸转了过来。志华子高兴地说：“多可爱啊！今后务必生个小熊猫。”观赏了约10分钟后，卓琳问志华子：“新娘子长得怎么样？”志华子深深点一下头说，“好极了。”然后依依不舍地又去参观别处。

12月8日，大平总理又前去向往已久的西安访问。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一朝古都，隋唐时期有大量日本留学生到这里学习，史称“遣隋使”或“遣唐使”，他们将不少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带回了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巨大变革。太平正芳在少年时代就听说故乡赞歧有个真言宗祖师空海，号称弘法大师，就是在804年到达唐朝首都长安的，因此很早就有访问西安的愿望。前两次访华因任务太重无暇顾及，此次总算得偿夙愿。

8日下午1时40分，大平总理一行到达西安。从西安机场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沿途37公里大平总理都感到西安市民欢迎日本客人的热烈气氛，在进入市中心的几公里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排成了人墙，使隆冬的西安仿佛气温也升高了若干度，其热烈程度简直出乎太平总理的意外。随行记者开玩笑说：“首相在日本受欺负，但在中国却大受欢迎，西安这里的支持率起码有百分之八十。”大平也开玩笑回答说：“这种欢迎场面令人吃惊，是否应该把我的选区移到西安来。”中国人民对这位日本总理的欢迎，既肯定了大平在中日和平友好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也表达了对中日永久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的期待。

作为一名中国古典文化的爱好者，大平总理并不掩饰自己对访问西安的渴望，他在欢迎他的宴会上致辞时表示：“我和我的妻子长期以来就一直幻想着此生能有机会访问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古都西安。”在西安的两天，大平总理饱览了他极欲了解的名胜古迹和中国古代文化。在秦始皇兵马俑坑，约有六千个兵马俑正在出土，大平总理下到作业现场仔细观看，对这一人类奇观感叹不已：“这样的规模在日本简直无法想象……”接着太平一行又参观了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描写的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次日，大平又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在著名的“碑林”，大平一行欣赏了中国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等人的手书字帖，还看到了唐代十三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重要历史文物。应主人的要求，大平总理写了“温故知新”四个大字，并不好意思地以手遮脸说：“真是班门弄斧。”大平一行还来到兴庆公园，参观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阿倍仲麻吕是遣唐使之一，到中国后改名晁衡，与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成了至交。接着大平总理等日本客人又来到慈恩寺，看到了《西游记》中三藏法师玄奘的经书，并登上大雁塔，眺望了西安全景。

9日下午2点，大平总理一行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离开西安飞往上海，在上海转乘日航专机回国。

关于此次访问，大平总理对记者说“取得了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相

互确认为共同点和分歧点，建立了新的友好关系”。 “两国相互补充的方面很多，愿今后进一步开拓相互补充的关系。”

日本舆论也高度评价了大平总理的这次访华，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会谈“相互承认由于意识形态和立场不同而见解不一致，但又超越不一致确认了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格局。” “双方都认为，现在已进入了扎扎实实的合作关系时代”。这次访问“表明了日中两国的关系在世界中的份量增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1980年新年过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就按计划出访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澳大利亚近年来逐渐由一个英联邦成员国逐渐向一个独立的太平洋地区国家转化，在过去20年间，与日本的双边年度贸易总额增加了20多倍，成为日本一个极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太平这次出访，其目的之一是增加日本与大洋洲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二是要向澳新等国领导提出自己多年的构思，即“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并寻求实现这一构想的可能性。

关于“环太平洋合作”的构想，大平已思考多年，并在担任外相时在国会外交演讲等场合提出过。这一构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根据大平的设想，政策研究会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研究小组研究了一个中期方案，其内容大致如下：在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中，日本与太平洋圈内各国要团结起来，认真对待和努力解决以下重要问题：

- 一、建立石油联合基地和紧急通融体制；
- 二、共同开发新能源和建能源资源联合研究所；
- 三、建立太平洋圈内的资源、粮食产品的贸易中继地；
- 四、作为建立这个基地的前提——建设第二条巴拿马运河，由日、美、加、澳按一定比例出资，并在7月召开的国际会议中同总计划一并决定。

大平首相这次访问时准备向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详细阐述这些内容和实施这些内容的原则。这是大平首相首次在正式外交场合公开阐述他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随同大平首相访澳的有夫人志华子、大来外相、加藤副官房长官等。1月15日傍晚，大平一行从冬季的日本抵达正当夏日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次日上午9时50分，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议会前广场举行了欢迎仪式，10时开始两国首脑的第一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谈中，双方主要讨论了国际局势问题，特别是1979年发生的两件重要的外交事件：伊朗扣押美国驻伊朗使馆人员和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大平首相在前一问题上表示了支持美国的基本想法，并说日本将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具体研究对策。对第二个问题，大平的基本态度是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

1月16日下午，两位首脑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双方就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大平首相向弗雷泽总理具体说明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说这一构想的总目标是要使太平洋地区各国建立一种“不涉及政治和军事而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中心的开放的、松散的联合”。弗雷泽总理对此表示赞成。两位首脑还就资源和能源问题进行了磋商，大平首相希望澳大利亚能继续向日本提供煤炭、铀、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弗雷泽总理表示澳大利亚将作为“可靠的供应国”，最大限度地给予合作。

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长达 30 页的新闻联合公报，公报确认两次首脑会谈巩固了太平洋时代新的“创造性关系的基础”，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公报说，在第二次会谈中，双方在加强两国的互补经济关系和推进“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问题上看法一致，确认了两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责任和作用。大平首相向弗雷泽总理说明了设想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五条原则：一、以文化和经济合作为中心，不搞政治和军事两个领域的合作；二、不想建立坚实完美的机构，只打算使之成为松散的联合；三、进行开放的合作，不排斥愿意参加的国家；四、需要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五个先进国家（日、美、加、澳、新）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合作；五、通过民间机构推进联合，这些机构不受政府方针的约束。弗雷泽总理对这五项原则表示赞同。

17 日上午，大平总理一行由弗雷泽总理陪同前往墨尔本。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以前曾是首都。当天下午，大平总理在墨尔本国立美术馆弗雷泽总理举行的午餐会上，用英语发表了题为《太平洋时代的创造性合作关系》的讲演，公开阐明了他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大平在讲演中毫不隐讳地承认，拥有 1 亿人口和狭窄国土的日本对仅有 1400 万人口，但领土相当于日本 20 倍的澳大利亚，在能源和资源上具有依赖性。虽然两国的人种、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大相迥异，但过去 20 年间，两国间的往返贸易额增加了 20 多倍，日本的煤炭和铁矿石有半数来自澳洲，粮食也在很大程度上从澳洲进口，日本已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过努力，没有任何摩擦。而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教育水平、科学技术和价值观念诸方面都存在不少共通处。在此基础上，两国在 80 年代，将在更广泛多层次的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

大平指出，日澳两国关系的未来，本质上具有亚洲太平洋地区多边合作的性质，因此，“作为我的政治理想之一，提出了‘环太平洋联合构想。’”大平分析了实施“环太平洋联合构想”的条件和可能性。首先，当前国际社会最主要的倾向，是“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这一倾向不仅表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而且渗透进了文化和国民心理之中。其次，在这种相互依赖加深的关系中，近年来，环太平洋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显著发展，“今天，在这一地区，正在发展着最有生气的经济，盛开着绚丽多彩的文化之花。”第三，由于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发达，横越这些国家的太平洋，已成为安全、自由、高效率的交通要道。

大平接着又区分了他的这一构想与以往地区合作之区别：“过去的地区合作，大多是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传统等同一性为纽带而加强相互之间联系的，因而或许有人会怀疑，在具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和历史的背景，经济发展又各不相同的环太平洋各国之间，果真能够在新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新的文明吗？”

“我认为，可以根据下列线索来考虑解决这些困难的课题。即这是在理解和信赖各国文化的独特性和政治的自主性的基础之上，实行的地区合作，而且是符合全球社会时代的开放的地区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太平洋各国的联合，决不是形成排它的集团。其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太平洋各国，而是为了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幸福和繁荣。”

大平认为日、澳两国分别位于太平洋圈的南北两个关键地点，所以日、澳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双边关系，应该从亚太地区的角度去考虑这种关系，两国的利益是符合环太平洋各国利益的，因此两国可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方面

发挥作用。两国友好关系的加深，将促进太平洋地区合作所带来的稳定、和平与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建立‘太平洋时代的创造性合作关系’。即使说实现这一愿望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试验，也不是言过其实。”

17日晚，大平一行抵达新西兰访问。18日与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举行了两次会谈。马尔登对大平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表现出积极态度，并愿意起推进作用。双方还签订了日、新航空协定。19日大平一行访问新西兰的奥克兰后，返回澳大利亚的悉尼。20日在归国途中，大平在莫尔兹比港短暂停留，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举行了会谈，双方就“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交换了意见。

访问大洋洲取得圆满成功的大平总理，于1月20日傍晚返回日本。等待他的是堆积如山的国内事务。

## 跨进 80 年代

在大平正芳任总理大臣的1979年，日本经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进口的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相当于前一年的两倍，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两方面影响。在国内经济方面，由于以石油为中心的原料、燃料价格上涨达68.2%，导致国内批发物价上涨16.6%，商品零售物价上涨11%。在对外贸易方面，四年以来日本的外贸首次出现入超，国际收支产生赤字，1至11月，出口贸易为922亿9222400万美元，进口贸易为9905800万美元，入超723400万美元。日元也由此比上一年贬值24.5%。政府由于担心石油危机会引起通货膨胀，预先采取了紧缩银根的对策，致使企业到银行贷款更不容易，造成1979年全年倒闭企业达16000起，超过了1978年，仅次于1977年。尽管如此，由于公共事业投资和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个人消费的增加，造成生产活动扩大和企业经营业绩提高，日本经济仍呈现发展趋势，如矿业生产，就增长了8%。而且外贸入超是由于用在购买石油上的支出就达81亿美元，如果不发生石油价格暴涨的突发事件，这一年的国际收支应该出现8亿多美元黑字。到1979年下半年，日本出口开始增加，外贸生产扩大。

日本如何面对存在种种危机的80年代？这是摆在大平政权面前的最重要课题。1979年12月30日，大平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曾简单涉及这一课题。当记者问到“你认为80年代将是怎样的年代”时，大平首相答道：“80年代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它将成为关系列能否顺利地度过难关迈向21世纪的一段准备期间和助跑期间。”1980年1月1日大平出席自民党总部举行的新年庆祝会并发表讲话时说：“我认为，80年代将面临困难的局面，要度过这种局面，需要对世界作出积极的贡献；在国内，要致力于发展地方，兴建不使用石油的产业，确立有节制的生活方式。”而与此有关的正式的方针政策，则体现在1980年1月25日大平总理在第91次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

由于刚跨进80年代，大平的这次演说的主题就是如何对待国际社会。演说的第一个标题就是《80年代的目标》。大平在演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终于在80年迈出了第一步。面对这个新时代的黎明，展望内外形势之时，我们看到了光明与黑暗两种要素错综交织。”接着大平列举了许多国际局势紧张的表现：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的变化、国际贸易中摩擦的增大、国际通货不稳定、能源和资源更加紧张、各国都受到通货膨胀和失业威胁……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协调，出现了打开困难的动态。在国内，经济增长虽带来了富裕生活，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后遗症，如公害、资源制约、城市过密、人口高龄化……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必须立即进行改变。

大平总理指出：“人类现在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渡过这个困难的年代，将迄今所取得的成果在 21 世纪继承下去。我想，我们在 21 世纪能否确保富有活力的生存，将取决于这 80 年代的十年间我们的智慧和努力。”

为了渡过错综复杂的 80 年代，日本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改革和对策呢？大平总理认为应该实行以下的改革和对策：

一、为了维持面临重大考验的国际基本秩序，应积极担负起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作用和责任。为此，全面综合地实施内外各项政策，对国际问题从被动应付转变为主动解决，是当前最迫切的课题。

二、果敢地向技术核心挑战，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必须大胆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谋求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是当务之急。

三、应该依据迄今已取得的现代化之精华，建设发扬民族传统和文化的日本式福利社会。这就必须努力通过人工和自然的协调，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四、作为经受这些严峻考验的基本条件是，政治和行政必须公正廉洁，以适应国民的信赖。为此，提高政治伦理，端正行政纪律，对时代的变化和国民的要求作出准确的展望，这些努力都是不可缺少的。

大平说，“我认为，有必要把这四点作为 80 年代的路标，以指导内外政策的展开。”

大平总理演说的第二部分题为“独立自主地对待国际社会”。在这一部分里，大平重申了日本一贯的外交立场，并对 1979 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表了态。对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事件，大平认为是“威胁国际社会基本秩序的不法行为”，强烈希望尽早释放人质，和平解决此事。对苏联侵入阿富汗，大平表示支持联合国紧急特别大会决议，要求苏联迅速撤军，让阿富汗人自己解决国内问题。

大平演说的第三个部分是“向着脱离石油的构造改革”。他指出，由于去年石油价格上涨 1 倍，引起日本国际收支恶化，日元贬值，批发物价上涨，妨碍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稳定。去年政府希望节约 5% 的石油消费，今年进一步提高为节约 7%。“展望 21 世纪，我们必须确立把能源供应结构从依赖石油的形式中脱离出来的战略。”大平提出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将石油进口依存度从现在的 75% 在 10 年内减少至 50%，在替代能源的开发上尽可能地开动脑筋和投入资金，为此，1980 年度有关能源的预算大幅度地提高了 31%，同时设置了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但是，目前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石油作能源，因而石油价格上涨就将收入从日本转移到了产油国。这种增加的经济负担势必由各阶层适当分担，希望国民能理解，政府也将在尽力维护物价稳定的同时，对电力、煤气等也不得不适当提价。

大平总理在演说的第四部分“创造面向 21 世纪的国家”中，再次阐述了他的田园城市国家的设想，提出了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障措施，主张面向 21 世纪，积极地推进宇宙、海洋等新领域的研究开发。在第五部分“恢复政治和行政的对应能力”中，提到了最近发生在防卫厅的泄密事件，表明政府不仅要迅速地查清此事，而且要全力防范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大平再次强调了在上届国会中提出的确立政治伦理的主张及其措施，也包括“大平行政改

革”中所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关于财政，大平宣布，为了改变对公债的过分依存，面向80年代恢复财政的对应能力，在1980年度预算中，比前一年减少公债发行10000亿元，支出规模有所增加，但压缩在最近20年最低的标准以下。在收入方面，通过避免新的增税和整顿与企业有关的租税特别措施，以确保必要的财源，跨出重建财政的第一步。

大平总理在演说的最后说道：“正当跨进80年代之时，我发誓将总结70年代的经验教训，在与国民协商的基础上，选择我们的前进道路，向着建设不可动摇的社会勇往直前！”

## 预算案与物价

第二次大平内阁刚一成立，作为首相的大平正芳立即督促大藏省加紧工作，争取在年内编制出1980年度的预算。为了向国民表明政府不依靠增加新税而重建财政的决心，政府决定1980年度公债发行减少10000亿元。大平总理在11月27日的政见讲演的“恢复财政的对应能力”这一部分中，宣布了政府的这一决定，用税收自然增收部分抵充国债减少部分，但未明确具体数字。12月29日，内阁会议决定了预算草案，其中一般会计规模为425888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3%，投资为180799亿元，比上年度增加8%。

大平总理在第91次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后，国会就开始审议政府提出的这一预算案。按惯例，自从在野党与执政党在国会中实力接近以来，每年的预算案都不会很顺利通过，总要发生一番讨价还价的争吵，今年也不例外。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三党在众议院有近二百个席位，三党打算在即将到来的参议院改选中，联合起来与自民党决战。因此作为这种联合的预演，三党在预算问题上也互相磋商，要求预算案修改的幅度大大增加。三党一致决定，要求在预算案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6500亿元，增加财政支出6050亿元，修改总金额为12550亿元。三党的这一修改要求被自民党完全拒绝，于是三党议员拒绝参加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对预算草案的审议，共产党也参加了这一行动，使国会的审议无法进行。

在这种形势下，执政党与在野党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渠道进行了反复协商和私下交涉。社会、公明和民社三党威胁说要提出重新编制预算的动议，共产党也表示将采取同样行动，这时有传闻说，前首相福田会见了民社党的春日和小平两位众议员，考虑要提出这一动议。这种紧迫的形势使滩尾弘吉议长亲自出面作调解工作，双方达成一定的妥协后，众院预算委员会又从2月29日起复会，商议预算案的具体修改内容。

大平首相同往年一样，坚持不对预算案作大幅度的修改，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实质性的小规模修改方案，即在物价补贴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增加1400亿元的实质性修改。大平首相从1月至2月多次到众院预算委员会，说明这一修正预算方案，执政党最终与几个在野党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这一修改后的预算案在3月8日下午1时半的众院预算委员会上仍被否决，但晚上7时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

这时，国会中又出现引起舆论哗然的消息，自民党主流派的众议员滨田幸一在美国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赌债，被怀疑是由洛克希德案件的主要行贿者小佐野贤治支付的；另一名大平派众议员、前邮政大臣服部安司有接受“电电公司”贿赂的嫌疑。这两件事被报界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使大平政

府处于相当被动的境地。后来，滨田辞去议员和自民党全国组织委员长职务。服部退出以后的选举，以这样的方式暂时了结此事。

第二次石油危机所带来的日本物价高涨，也是摆在大平政权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1979年12月，石油价格比一年前翻了一番，日本的批发物价随之上涨，观其趋势，全年涨幅不会低于20%。消费物价尽管相对稳定，但到1980年2月，也较去年同期上涨8%。

面对物价上涨和继续上涨的趋势。日本国民不免感到忧心忡忡，在野党也纷纷要求政府实行行政干预，因为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政府就曾采取措施，用行政手段冻结了与石油有关的物资价格，同时保证了公共经费支出不变。

但大平首相此次对物价上涨却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对策。大平认为：“稳定物价的根本在于增加供给，稳定需求。”他还针对国民的忧虑进行抚慰说：“物价将于6月份穿过复杂气流，转入平稳飞行。”在进一步节约能源的同时，以大平为首的政府采取了市场调节物价的手段，适当提高了石油产品和煤气，电的价格，尽量压缩公共支出，以减少货币投放量，而且在国会审议预算案期间，通常认为不能变动贴现率的时候，果断地提高贴现率，将贴现率从1979年的3.5%逐步提高到1980年3月的9%，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月19日，大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综合物价对策，大平在会上特别强调了要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由于这一系列措施，批发物价在4月涨到24%这一最高点之后，5月开始，物价上涨指数有所下降，日元也开始升值，整个社会的物价形势逐渐趋于平稳。大平政权的航船又避开了一处暗礁。

### 提前进入状态

1980年7月是参议院改选的时间。1977年大平任干事长时，成功地组织了自民党参加参议院选举，获得了改选的126个议席中的66个席位，阻止了“保革逆转”，一时传为佳话。这次改选，如果自民党获得61个席位，就可在参院的252个席位中超过半数。尽管如此，大平总理还是雄心勃勃地表示：“如果得不到63个以上的议席，则达不到126名改选人数的一半。将尽最大努力，争取获得过半数的席位，从而承担起自民党的责任。”

遵照大平总理的指示，自民党有关人员从1979年底，就开始为参加参议院选举作准备，分析选举形势，制订选举的政策口号，确定选举的战术和具体日程等，实际上大平正芳和自民党已提前进入参院选举的准备状态。

关于选举的政策口号，大平经过思考之后，决定仍采取同三年前参院选举一样的战略，即不提出新的政策，以免在野党提出更新颖的口号从而引起朝野论战。因此大平仍提出了以前的方针，即“三个保障”——保障国家安全、保障国民生活、保障未来发展，和“一个誓言”——重建自民党。选举战术是着重抓地方选区，特别是“一人区”，即只产生一个席位的小选区。当时的形势是，在全国选区，自民党可确保50个议席中的18席，在地方的二人区或二人以上区可指望有23人当选。如果要达到61席以保住参院的议席过半数，就必须在剩下的一人区的26个议席中争取获得20席，仅丢掉6个席位。显然，这是很难达到的。如果要达到大平63席的目标，困难就更大。因此，自民党要花很大气力做好一人区的竞选工作。关于选举的日程，

由于上次众院大选自民党因大雨而影响了得票数，此次参院选举的投票就应尽力避开恶劣天气。自民党选举总部为此花了不少精力全面研究了过去的天气情况，发现6月底或7月初正逢梅雨季节，这段时间有一半多为雨天。如果投票时间往前提，则正逢6月22至23日在威尼斯召开七国首脑会议。若推到7月中旬，或许晴天会多于雨天，但容易遇上突发性暴雨。经过反复权衡，初步定在7月6日或7月13日投票。后来党的三领导又经研究，决定6月29日投票。

与此同时，各在野党也提前进入了选举状态。特别是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总想通过选举，在议席上超过自民党，以达到联合执政之目的。去年众院大选只取得了局部胜利，在野党议席逼近半数，使这三个在野党看到了一线希望。因此，三党对此次参院选举特别重视。在第二次太平内阁刚一组建，三党就开始协调关系，消除分歧，逐渐联合起来。预算案上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三党联合与自民党斗争的一次尝试，也是参院选举的前哨战。三个在野党十分清楚，要阻止自民党在参院中议席超过半数，主要精力应投入一人区，因为1974年自民党就曾在一人区丢掉了8个议席。此次若能再创此佳绩，则可在参议院中实现“保革逆转”。

大平总理去年企图通过大选，改变执政的保守政党与在野党在国会中势均力敌的状况。但出乎他预料，大选中自民党受到挫折，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他对这次参院选举抱有较大希望。他知道，去年大选后党内抗争留下的伤痕现在尚未愈合，恐怕在较长时间内也难愈合。因而会给自民党参加参院选举带来不利影响。在这种形势下，自己要尽量多发挥作用，以减小这种不利影响，争取选举胜利，巩固党内的政治阵地，稳定政局。

据当时报纸的舆论调查，国民对大平内阁的支持率为27%，维持原状不变，对自民党的支持率达42%，低于去年夏天，高于三年前。在此状况下，大平充满斗志，信心十足地开始准备竞选演说。3月12日，大平总理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之余，度过了他的70大寿。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天一早，大平同期进入东高高等商科大学的同学们聚会，为大平庆祝寿辰。然后大平就赶往参院预算委员会。中午，一些比较接近大平的记者在大仓饭店为大平举行祝寿酒会。担任司仪的时事通讯社记者宏泉说：“这次酒会是我们这些跟班记者与大平总理进行的最后一次亲切交谈”。记者们送给大平总理一件乳白色上衣作寿礼，上衣胸前绣着“七十”字样，表达了记者们的愿望，“希望古稀之年的大平能够健康长寿”。大平总理穿上衣服后，以平易近人的口气说了一番感谢的话：“我只是徒增马齿……现在已经70岁了。虽然年已70，但精神还只有60岁。经常考虑今后应该做些什么。在我思考的问题中，大量的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担负起未来日本重担的政治体制。”晚上，大平一家为他祝寿，斋藤邦吉前干事长等自民党议员也陆续到大平家中向大平祝贺古稀寿辰。

进入4月，大平总理更加忙碌。每天早上6时起床，第一件事是读报和听当天的新闻报道，早餐后赶往首相官邸所在的永田町。每天至少出席两个会议，与他人会谈至少十人以上，还要会见各界代表，接见外宾。晚上下班赶回家吃过晚饭后，必定将一天内的各种会议经过，会谈内容再进行整理、消化、综合，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最后带着疲乏的身体就寝。临睡前，常自言自语道：“又过了一天！”仿佛有一种“解放”的感觉。第二天一早，又睡意朦胧地起床，开始新的一天的忙碌……到了星期六和星期日，当普通百

姓家在工作一周后开始休息和郊游时，大平又忙着出发到某地去发表竞选演说，足迹踏遍全国大部分地区。

待 5 月 18 日，国会闭幕，各候选人、各党派都将为参院竞选发起最后冲刺。

## 在冷战旋涡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大国虽未直接发生战争，但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冷战”却不断发生，日本处在冷战旋涡中，往往小心翼翼但仍感左右为难。日本既要维持日美友好。又不愿过分得罪苏联；既要考虑美国的要求，又必须首先顾及日本自身的利益。大平政权也正是在这种充满暗礁和险滩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努力开展日本的外交。

1979 年 1 月伊朗发生革命后，巴列维国王被迫出国，后来为了治病，被推翻的国王又到了美国。这一消息传到伊朗后，伊朗革命派学生在伊朗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运动。运动发展到极端时，11 月 4 日发生了占领美驻伊朗大使馆，扣留使馆人员作人质的事件。正在被自民党内抗争搞得疲惫不堪的大平总理听到这消息后大吃一惊，连连说道：“出麻烦了，秩序乱了。”

美国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同伊朗谈判以谋求人质获释，但遭到伊朗断然拒绝。美国立即对伊朗实行制裁，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伊朗则决定没收美国在伊朗的财产，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这时，传闻美国正在研究要求发达国家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大平首相获悉这一消息后，觉得十分担忧，他深知，虽然伊朗发生革命后，日本已从伊朗减少了石油进口，但日本进口石油仍有 13% 来源于伊朗。如果完全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而日本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寻找到新的石油来源，就会使日本经济受到巨大打击，日本国内立即会大乱。而且日本政府正在援建伊朗的石油化学工程也将中途停止，其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政治影响也极不好。因此，大平总理既想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又想尽量不影响日本与伊朗的正常关系。所以在 11 月 27 日第 90 届临时国会发表政见演说时，对此事件如何表态真是煞费苦心，最后为了尽量不刺激伊朗，大平听取了外务省的意见后，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表态：“对于最近出现的美国和伊朗关系的紧张程度的加剧，我国深表关注，强烈希望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早日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日本从伊朗进口石油并未终止。

日本对伊朗的这种消极言行引起了美国对日本的不满。12 月 10 日，在巴黎出席国际能源机构部长理事会的美国国务卿万斯，指责同时到会的日本外相大来说：“伊朗的人质事件尚未解决，日本却从伊朗大量购买高价石油，简直是麻木不仁。”翌日，美国共和党的一些议员在参议院提出了谴责日本的决议案。

针对美国的批评和谴责，大平首相采取了谨慎的态度。12 月 11 日大平对记者说：“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日本将来也可能限制进口。”第二天，大平总理召见了日本驻中近东 18 个国家的大使和驻美大使东乡，在首相官邸举行午餐会，会上大平表示担忧地说：“不能因为这个问题而损害日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大平要求大来外相和佐佐木通产相以及有关人员磋商，看日本能够做些什么事来帮助美国。大来外相在 13 日就会见了美国驻日大使曼斯菲

尔德，双方一致同意作出进一步努力保持两国友好关系。15日和17日，大平首相分别会见了曼斯菲尔德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克兹维尔，一再强调了保持日美关系友好的方针，尽力缓和美国对日本的不满情绪。12月30日，大平首相在举行新年记者招待会时又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正因为80年代是动荡的时代，所以日美关系变得更为重要。“在日美之间应该有不相互猜疑的那种彻底的理解。必须慎重，不能乘美国与伊朗发生纠纷之机专门谋求日本的利益。今后必须更加努力调整对美关系，让国民放心。”后来，太平在第91次国会演说中，用较为严厉的措词谴责了伊朗扣押人质的行为。大平的这一系列行动，使美国对日不满有所缓和。1月28日，大平又表示，日本作为联合国等国际社会的一员，认为联合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是理所当然的。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作了大量调解工作，均未奏效。1980年初，为了找到解决人质问题的线索，瓦尔德海姆又成立了“巴列维罪行调查委员会”，但到了3月仍未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到了4月，伊朗将人质从学生手中转交革命评议会管理，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但4月7日，伊朗决定拒绝向美国移交人质。美国当即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决定对伊朗实行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并要求日本与西方国家一起采取共同行动。

太平首相面对美国采取的这种强硬措施，认为日本在基本方针上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协调一致，但又担心日本若采取强硬措施，会遭到伊朗方面的反制裁。因此，大平召开了内阁特别会议，与有关阁员研究了专门的对策。会议结束后大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事态非常令人遗憾，美国一直以很大的耐性来对待，但我认为没等到底就采取了行动。人质问题是有其根源的，我希望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4月21日，欧洲共同体各国和日本驻伊朗的大使们联合向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提出释放人质的要求，但未能奏效。

人质事件发生后，日本一直没有再增加从伊朗进口石油的数量。3月，伊朗要求日本把4月以后长期合同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2.5美元提高到35美元。如果不答应这项要求，伊朗就将从4月21日起停止向日本供应石油；如果答应，日本又将违反已经参与的“限制进口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石油”的国际承诺。大平首相对此感到“真难办啊”！后与佐佐木通产相磋商之后，决定拒绝伊朗方面的要求。伊朗的石油供应从4月21日起停止。尽管如此，大平在同一天会见美国大使时仍希望美国采取克制态度，以和平手段来解决人质问题。并说为了恢复国际秩序，日本也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

4月25日，大平首相突然接到一份报告，称“美军特种部队在伊朗强行解救人质失败，”大平首相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他几天前会见美国驻日大使曼斯菲尔德时，曾要求美国在人质问题上尽量采取克制态度，而现在却出现了这种局面。26日大平对记者说：“我也感到非常吃惊，但美国已经忍耐很长时间了，采取这种行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通过种种努力均未奏效之后，5月17日，欧洲共同体在那不勒斯外长会议上决定对伊朗实行第二次经济制裁。5月22日，大平首相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与欧共体采取一致行动，即除粮食和医疗用品之外，原则上停止执行在人质事件以后日本与伊朗签订的出口合同。

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的事件，直到1981年1月底才得以解决。

1979年12月27日，阿富汗发生政变，组成以卡尔迈勒为主席的新政权。

同一天，苏联宣布根据新政权的请求，派军队侵入阿富汗。美国立即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卡特总统于次日就谴责这次入侵是“战后以来苏联为统治邻国而采取的第三次军事行动”。29日，卡特又直接打电话给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这一事件又让日本陷入了两难境地，使日本在冷战旋涡中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制定对策。大来外相立即代表大平首相对此表明了日本的基本态度：“日本政府深切希望苏联政府尊重阿富汗的独立和自主权，立即停止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

1月4日，美国宣布对苏联实行制裁，停止向苏出售尖端技术和战略物资以及粮食，并要求西方国家给予合作。左右为难的大平首相同一天表示，苏联和美国的行动是影响美苏两大势力范围的问题，我非常担心……日本政府将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个问题进行审议，以便探讨和平解决的途径。8日，大平又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以对美协调为基础，但也充分照顾到与苏联的关系，慎重地采取措施的总方针。

根据这一总方针，日本政府于1月12日确定了批评苏联行动的态度：

一、目前仅采取限制日苏间人员往来的措施，具体就是推迟众参两院院长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的访日邀请，推迟日苏文化协定的谈判。但不同意美国的经济制裁措施。

二、今后将一方面注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舆论的变化，一方面采取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同的对策。舆论认为，日本政府的这种表态，是担心如果对苏扩大制裁，会受到苏联的猛烈反击，使日苏关系陷入严重境地。

1月19日，大平在澳大利亚访问时，突然接到国内报告，日本警视厅公安部于18日下午逮捕了三名日本人，被捕者是前陆上自卫队准将宫永幸久，中央资料队本部企画班中尉香椎英一，调查部第二课准尉大岛经利，同时从三人家中搜出了防卫厅的防卫情报等秘密文件。经审讯和分析搜查到的文件，获知这三人向苏联驻日首席武官尤里·科兹洛夫上校递送了秘密文件，内容主要是防卫厅和美军搜集的中国军事情报。防卫厅长官久保田因这件事而辞职，由细田吉藏众议员接任。这件事使处于冷战旋涡中间的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起来。以后，此事又成为在野党在国会中攻击大平政权的口实。

1月22日，访问欧洲归来的大平首相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午餐会上发表讲话。对防卫厅官员充当苏联间谍一事大平表示，政府将根据搜查进展情况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在谈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时，大平说：“政府不想对苏联进行制裁和报复，不过，以何种形式对苏联介入阿富汗表示不快的心情，以及如何对付此事，各省之间正在协商。”大平还谈到了自己对苏联的看法：“苏联是个巨大而高深莫测的国家，也是防御型的，处事慎重，外交老练，我想苏联不是轻举妄动的国家。”大平首相的这一讲话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认为这一态度显得太乐观。

1月28日，大平在众院答辩时说：“阿富汗问题，从世界和平的立场看，令人不胜忧虑。美苏两国都说无意打破缓和的格局，我国也希望如此……关于在阿富汗问题制裁苏联的措施，正在从涉及日苏贸易和日苏联合开发西伯利亚等种种问题的各个角度进行研究，要注意有关国家的态度，慎重考虑。”

与此事有关的是日本是否参加1980年在苏联举行的夏季奥运会问题。1月6日，沙特阿拉伯奥委会率先发表声明，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以表示

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的谴责。1月20日，美国总统卡特致函美国奥委会，呼吁苏联军队如果在一个月之内不撤出阿富汗，其它国家奥委会应采取协调行动，共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所以大平首相1月22日讲话时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表示重要的是日本奥委会将作出怎样的判断，政府想与奥委会充分交换意见。

2月1日，官房长官伊东正义代表日本政府向日本奥委会转达了官方意见，即希望奥委会考虑政府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的态度，对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一事采取适当对策。2月13日，大平首相在岐阜市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表示支持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并说政府无意改变2月1日暗示日本奥委会不参加这一届奥运会的看法。4月2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宜派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日本奥委会起初表示拒绝，后来许多西方国家表示抵制的态度后，日本奥委会才于5月24日作出不参加奥运会的决定。

## 最后的出访

在应付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的同时，大平首相安排了利用4月底5月初出访的日程，这是太平推进一系列“首脑外交”活动的重要一环。伊东正义官房长官考虑到参院选举已经临近，应保证大平首相的健康。所以建议大平出访距日本较近的东盟各国。但外务省从多方争取石油供应考虑，建议大平出访墨西哥。大平从国家长远的利益考虑，采纳了外务省的意见。先定下访问日程为墨、美、加，后又改为美、墨、加。但这种改动后来引起了墨西哥方面的不悦，影响了墨向日提供原油的积极性。

1980年4月30日，大平总理离开日本，出发进行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对外国的访问。随同大平出访的有志华子夫人、大来外相、加藤副官房长官、鹿取外务审议官、森田秘书官等人。

大平对美国的访问属非正式访问，但由于1979年发生了若干重要事件，有些还影响到日美关系问题，因此，日美双方对这次首脑会晤非常重视。4月27日，大平首相在广岛的自民党政经文化酒会上，谈到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变化：“美国如今已从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普通大国。对美国的威慑力量寄予期望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到今天为止，一直同美国结合，成功地维护了安全。要进一步密切同美国的协作，加强合作的纽带。”

当地时间4月30日下午，大平首相抵达华盛顿。5月1日，大平与卡特举行了会谈。在伊朗问题和阿富汗问题上，大平向卡特表示，日本将与美国“同甘共苦”，他知道卡特现在因人质问题和营救失败而焦头烂额，因此，打算给卡特“鼓鼓劲”，让他充满信心地考虑世界上的事。大平的表态使卡特感到宽慰，觉得日本与美国处在同一条船上。

会谈涉及到了日本的防卫问题和日美汽车摩擦问题。关于前一问题，大平仍坚持他历来主张的综合安全保障体制，认为1980年日本的军事预算已达80多亿美元，占世界第八位，所以不能再增加了，而主要应该坚持以往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来维护亚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当卡特表示理解增加防卫预算“在日本国内尚有制约”时，大平说：“我们理解充实防卫力量的必要性已经增强，但我们已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美方理解在充实防卫力量方面日本有各种制约，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我们将认真研究作为一个盟国应该怎

样做，并将继续为此努力。”大平实际上任何具体保证都未作出，只是就努力方向作了原则性表态。他认为是否增加防卫力量，必须根据日本的国民舆论、国家财政状况以及所处国际环境，进行综合考虑后再作决定，而不能事先就决定其增幅。

关于后一个日美汽车摩擦问题，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交由实务部门去处理。双方还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两国要在研究和发​​展运输、卫生、环境质量、控制疾病和空间等方面进行合作。

会谈结束后，卡特总统在白宫南院玫瑰园举行欢迎仪式。

卡特在欢迎词中提到了伊朗的“国际恐怖活动”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事。大平总理在用英语致答词时说：“我只想向你们保证，日本随时准备表示它对美国的声援，并同其他朋友配合一致，竭尽全力使人质尽早和平释放。”“今天我们讨论苏联对阿富汗军事干涉时，采取了同样严肃的态度。总统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必须非常坚决地对付苏联侵略所构成的挑战，也应当帮助希望和平与稳定的中东以及亚洲国家。关于这一点，我向总统转达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即在目前的状况下，不可能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最后大平充满友好态度地说：“对于贵国来说，日本将继续是一个最为坚定的、值得信赖的友邦，我确信贵国对于我国来说，也将是同样的友邦。”

5月10日晚，大平总理一行离开美国前往墨西哥访问。5月2日，大平总理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举行了会谈。大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得到墨西哥增加对日本出口石油的承诺，具体说就是希望由平均每天向日本出口10万桶增加至30万桶。大平首相在会谈中除了阐述日本政府对南北问题、伊朗和阿富汗等问题的立场外，再次提出希望墨西哥能增加对日本的石油出口。但洛佩斯总统对此反应冷淡，或许是大平改变了首先访墨的日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吧。

当天下午双方首脑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之后，大平获知墨西哥不仅不愿意增加对日石油出口的数量，而且对日方援助墨方建立钢铁厂的贷款大大超出了日方预先的提案。晚上，大平首相召集随行人员紧急磋商如何处理好增加对日石油出口和日本对墨西哥的援助贷款的关系。磋商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尚未得出一致意见，最后大平首相决定，根据墨方原油供应量的增加情况，来决定日方提供援助贷款的数额。

5月3日上午，双方首脑再次举行会谈。大平再次向墨方表示：“日本正在多方谋求石油来源，请墨方予以协助。”洛佩斯总统回答说：“我懂得了大平总理讲话的意思，墨西哥对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抱有很大期待。我将从政治上考虑，作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最后，这两个问题均未达成具体协议。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增加石油供应一事作了这样的表述：“墨西哥从政治高度表明了将在长期综合发展范围内考虑日本要求的决心和善意。”对于日本援建墨西哥钢铁厂项目资金问题，声明提到“一致同意在两国之间尽快开始谈判”。

连续访问两国的大平首相，拖着疲乏的身体于5月4日离开墨西哥前往加拿大访问。在经过纽约上空时，传来了一个预料之中的消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逝世。铁托总统病情日趋恶化已有较长一段时间，大平出访前，伊东正义官房长官就曾对他说：“如果铁托总统在你出访期间去世，你最好亲自到南斯拉夫吊唁。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久就要召开，到南斯拉夫可以会见施密特总理。”但现在年过古稀的大平已经有些疲乏，不大愿意再飞到地球的

另一边去。随行人员中加藤、鹿取、森田都建议大平首相亲自参加铁托葬礼，只有大来外相说：“如果您累了，我就代表您去吧。”大平也考虑：“身体是可以的，但要尽快回国作选举准备。”加藤纮一副官房长官用电话征求了伊东正义的意见，伊东官房长官还是力主总理亲自参加为好。大平最后决定访加之后便亲自前往。

5月5日，大平首相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会谈，就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当天下午，大平首相在加拿大议会用英语发表了演说，题为《太平洋两岸的邻居》。6日上午，大平首相访问了加拿大西端的温哥华，两国首脑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7日上午，大平首相乘专机离开温哥华，经过连续3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抵达贝尔格莱德，参加了南斯拉夫总理铁托的葬礼，同时会见了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首脑和领导人，继续开展“首脑外交”。8日晚上，大平首相一行又抵达波恩。

9日上午，大平同西德经济部长举行会谈，讨论了能源问题和汽车出口等问题。中午，参加施密特总理的欢迎仪式，然后共进午餐并会谈了两小时四十分钟。双方在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就更为广泛的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10日，大平又同西德外长根舍举行会谈。然后，大平首相打了一次高尔夫球，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打高尔夫球。

11日下午，历时12天，行程5万公里开展首脑外交而已感到十分劳累的大平首相，结束了他最后的出访回到了日本，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参议院竞选活动，但他万万没料到，一个暗礁已挡在了他前进的道路上。

## 出人意料的剧变

大平回国后，等待他的是一个星期后即将闭幕的国会，必须就国会形势和自民党在国会中的提案能否通过等重要问题与党和政府负责人进行研究。因此这位年逾古稀的总理大臣尽管旅途劳顿，却不能好好休息一下，一回到家便同早已恭候在家的樱内干事长、伊东官房长官、田中副干事长一起研究有关国会对策。

在大平出访期间，自民党与社会、公明、民社三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达成协议，即在这次国会上，“除四党一致赞成的法案外，其他提案全部作废”。实际上就将自民党和大平内阁单独提出的许多重要提案变成了废案。大平总理对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要求有关人员为通过这些法案继续努力。

这时的国会形势，对自民党和大平内阁是相当严峻的。从自民党内部看，反主流派不予合作；从外部看，在野党与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席位旗鼓相当，要通过由自民党单独提出的法案是很困难的。正在这时，各在野党已开始就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展开微妙的交易。5月13日下午，众议院大会决定把本次国会会期延长到27日。大平总理决心利用延长的这段会期，力争通过酝酿已久的限制政治资金法案，修改公职选举法案，调整地方分支机构法案，为重建自民党，整顿政府机关而创造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社会党已经决定即使公明、民社两党不参加联合提案，也要单独提出对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并决定5月16日采取行动。

这时，在自民党内部，反主流派于4月2日成立的“自民党刷新联盟”（刷新联）已在大肆活动，攻击大平政权，打的旗号是查明滨田幸一在拉斯

维加斯赌博事件和传闻的“电电公司”行贿事件，实际上是将福田、三木、中曾根、中川等派联合起来，扩大反大平的力量。

5月14日，大平分别在党的外交调查会、安保调查会和参议院作了出访报告，并接受了参议员的质疑。5月15日，大平总理与来访的斐济总理马拉会谈，当晚又举行欢迎宴会。在同一时间，民社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决定有条件赞同社会党提出的不信任案。

5月16日，是决定大平内阁命运的一天。上午10时，自民党在党总部召开了众参两院议员大会，大会原定有三项议程：通过党风宪章草案、改组党纪委员会、成立修改党章委员会。但由于反主流派议员大多数不到会，不够法定人数，后两项议程无法进行。大会通过了党风宪章草案，并决定全党团结一致，否定在野党的不信任案，全力投入参议院选举。上午10时半，社会党办理了提出内阁不信任案的手续，这项决议案将被提交下午的众议院大会付诸表决。不信任案由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署名提出，大致内容包括：

- 一、大平内阁的经济政策失败，使得国民生计受到严重威胁；
- 二、对政治腐败毫无诚意改革；
- 三、追随美国走加强军事大国的道路，放弃自主性的和平外交路线。

“刷新联”中对不信任案的态度并不统一，有的主张支持，但更多的人持否定态度。福田派于中午12时召开干部会，一致同意将此事全权委托福田裁定。三木派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不信任案持保留态度。中曾根派则于下午2时45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不信任案持否定态度。大平总理对否决不信任案一事很有信心，自从1955年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案通过以来，在野党曾多次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几乎成了一种例行公事，但没有一次获得通过，大平认为此次也不过如此。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会也估计至少将以10票优势否决不信任案，各大报也一致认为自民党内反主流派不会与在野党采取统一行动，“不信任案将在傍晚被否决掉。”

5月16日下午1时，众议院运营委员会决定于3时30分召开众院大会对不信任案投票表决。在15日晚和16日上午，“刷新联”通过党的领导机构要求会见大平，但被樱内干事长拒绝。后来“刷新联”又要求派两三名代表会见大平，在伊东官房长官等人建议下，大平同意会见一次。在出席欢迎马拉总理的宫中午宴之后，大平于16日下午2时50分在樱内干事长、田中副干事长陪同下，会见了“刷新联”代表。几位代表提出了三项要求：

- 一、传询滨田幸一到国会作证；
- 二、成立整顿风纪委员会，查明电电公司事件；
- 三、撤回田中六助副干事长5月13日关于“成立刷新联是为了沽名钓誉”的讲话。大平对这三点要求作了解释，但受到代表们指责。正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告：“在野党称最多只能等候一小时。”会见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尽管大平始终保持冷静，但仍未阻止对骂场面的出现。“刷新联”代表威胁说：“如果召开全体会议，我们不阻拦，也不参加。”大平为了争取“刷新联”，答应同党的领导机构商议后再答复这三项要求。

紧接着大平首相召开了党的领导机关会议，西村副总裁、樱内干事长、铃木总务会长、安借政调会长、田中副干事长、金丸国会对策委员长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对上述三项要求进行了商议，大平亲自写了答复：

- 一、滨田的问题交由国会航空特别委员会作出结论；
- 二、指示领导机构研究有关设立整顿风纪委员会的问题；

三、关于田中六助副干事长的讲话，如调查属实，将予以撤回。

樱内干事长将大平总裁的答复用电话逐字逐句转告了：“刷新联”，但仍未得到谅解。这时，绝大部分反主流派议员已聚集到第一议会会馆会议室周围，众议院则延迟到下午5时开始。下午4时20分，几位反主流派领导人福田、三木、中曾根和中川与“刷新联”成员举行会谈。

下午5时，众议院大会开始，反主流派议员到会者寥寥无几，但这种现象未引起大平首相的警觉，他认为反主流派议员在表决不信任案之前会进入会场的。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在会上宣读了对内阁不信任案的内容，自民党议员大野明表示了反对不信任案的意见，各在野党均表示支持这一提案。这时由于自民党反主流派议员大多数未到会场，在野党议员在人数上明显占优势。中曾根派议员森下元晴请求推迟开会，被滩尾弘吉议长拒绝。过了一会儿，樱内干事长从大局出发，离开会场去说服福田、三木和中曾根，但未奏效。会场里一片混乱。

5时25分，见反主流派议员仍无到会之意，加藤副官房长官向伊东官房长官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大会是否仍照这样开下去”。伊东把纸条递给大平。大平这时已觉察到形势不大对劲，但仍回答说：“按既定方针办”，即如果通过不信任案，就解散国会。根据日本宪法第69条规定：“内阁在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案或信任案遭到否决时，如十日内不解散众议院则必须总辞职。”大平知道这样做是非常残酷而痛苦的，从内心讲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自己也曾于1953年吃过“混帐解散”的苦头。因此大平这时还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在最后一刻，反主流派的议员们会到会参加投票，否决不信任案。大平在外交上是位行家，在“内斗”上却似乎是个外行。

为了避免出现无可挽回的局面，樱内干事长于6时10分再次前去说服反主流派，福田握着樱内的手笑着说：“你辛苦了，加紧干吧。”樱内知道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在关闭会场前的几分钟，安倍政调会长被人推着出了会场，而中曾根和本派干部却走进了会场。形势微妙复杂，变幻莫测。

下午6时35分开始投票表决不信任案，结果以243票赞成，187票反对获得通过。这是战后第三次通过内阁不信任案。当宣布投票结果的一瞬间，大平首相一时陷于茫然若失的状态，脸上充满怒意，双手不知所措，因为这一剧变太出乎意料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一声不响地走出会议厅。看来无论多么痛苦，也必须作出抉择了。

### 痛苦的抉择

在众议院大会开会时，大平已作好了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的准备。下午7时6分，在大平总理主持下，临时内阁会议召开。大平总理首先以沉痛的语调发言说：“大家都在为国家努力工作，结果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实在令人遗憾。依据宪法规定，现在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解散国会，要么全体辞职，二者必居其一。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可以委托给我，也可以共同商定。”场内经过短暂而压抑的沉寂之后，有些大臣建议委托总理全权处理，有的大臣直接主张解散国会。休会时，大平同党的领导干部商议后，在重新复会的内阁会议上宣布“解散国会”。这一步虽然充满痛苦，但终于跨出去了。内阁会议一致通过了解散国会的声明，并决定6月22日举行众参两院同时选举。

日本政府决定解散国会的声明大致如下：“今天，在众议院会议上通过了在野党提出的不信任案。在这次国会会议上，政府为了制定下年度预算方案，使国民的生活稳定，对制定各项政策，如能源对策、稳定物价等等，尽了全部力量……”

“然而，社会党一提出毫无道理的不信任案，在野党就表示赞成，并且由于部分自民党议员扰乱党纪，缺席会议，使不信任案得以通过，这实在令人遗憾。”

“政府决心按照其信念，断然解散众议院，问信于各位国民，借以根据宪政的大道去锐意争取政治的刷新和政局的安定。”

在野党则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协商今后的对策，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在讲话中强烈逼迫大平总理下台，他说，大平总理应该干的事，不是解散众议院和大选，而是内阁总辞职。

当晚，日本经济界首脑土光敏夫等举行紧急记者招待会，对不信任案的通过和解散议会表示极为震惊，同时强烈批评政治空白导致的政局更加混乱的现象，认为在当前经济上存在着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国际局势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希望自民党解除内部纠纷，尽快稳定政局。

日本政治在 80 年代究竟如何发展？这是摆在大平正芳首相和自民党面前的紧迫课题。5 月 17 日，大平对记者说：“我将以严肃的态度稳定政局，推行政策。希望能得到国民的理解。”

5 月 18 日，大平首相在家度过了一个星期天。他似乎有某种预感，把女儿芳子叫来帮忙整理了自己的藏书，交待芳子一些书留在家中，一些书送给香川县大平文库。下午，大平在随从记者一再请求下，与他们进行了座谈。大平以超然的平静态度表示，政党就像夫妻一样，发生一些争吵也没什么了不起……政党总会不断分化和改组……你们认为这次选举是分裂选举，其实没有哪一次选举是一声令下全党奋战的。

5 月 19 日下午 1 时，众议院议长滩尾弘吉向各党代表宣读了天皇解散国会的诏书。接着，大平首相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解散国会的抉择作了说明：“由于目前通过了对内阁不信任案，根据宪法规定，今天解散众议院。”

“自去年秋天大选以来，我为了不辜负国民的重托，一直把全力倾注于内政外交上。在此期间，我通过三次出访，加强了同美国、中国以及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并处理了阿富汗和伊朗的对策问题，为维持世界和平作出了努力。”

“在国内，为确保国民生活稳定提高，我竭尽全力抓了能源对策、稳定物价对策以及其他各种措施。而且我认为，国家政治的起点必须是：政治和行政公正而廉洁，以赢得国民的信赖。我一直努力振刷行政内部的纲纪，同时热心刷新政治伦理和成立有关行政改革的各项法案。”

“提出不信任案在宪政上理应是最慎重的手段，但这次的不信任案是由一部分在野党草率提出来的，而且，其理由是内阁完全不能接受的。在那次众院全体会议上，竟在一部分自民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不信任案，这是完全没料到的。我已下定决心，重振执政党的态势。但是，既然通过了不信任案，就应该回到政治的起点上来，依靠国民作出判断。因此，决定解散众议院。”

“我希望这次的大选和参议院通常选举，有助于政治刷新和政局稳定，以适应国内外重大时局。同时，决定更新思想，不辜负国民的委托。并且打

算在选举期间，内阁全体阁员一致竭尽全力，使整个内政外交不发生任何微小迟滞。”

大平总理不仅这样表态，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他在决定解散众议院的5月16日，就对大来外相说：“让我们按期进行我们的外交活动”。因此，在5月下旬这段时间，大平总理既要忙于接待来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又要积极准备众参两院选举的演说，同时还得协调自民党内的矛盾。

5月20日，反主流派的安倍晋太郎和河本敏夫创立了“自民党再生协议会”。自民党总部领导机关与“再生协议会”于22日晚进行了协商。双方商定，在选举期间，冻结党内抗争，“再生协议会”停止活动，在这次选举中，照过去的方针公认候选人和协助选举。实际上原打算对这次众院大会上不参加投票的自民党议员进行党纪处分一事，因为达成这一协议而取消了，没参加投票的违纪议员重新获得议员候选人资格。这是以大平为首的主流派为了维护自民党团结所作出的又一次重大让步。当自民党领导干部将这一协议向大平总理汇报时，大平表示同意，并说：“全党一致参加选举，是件好事。”5月23日，大平又会见了河本和安倍，确认了协议内容。

5月27日，大平总理接待了来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两国总理于27日和28日举行了两轮会谈。在涉及双边关系问题时，大平向中国方面说明了日本的社会制度问题，说明日本国土狭窄，人口众多，无法实行社会主义。只能在自由主义制度下，让每个国民充分发挥各自的个性，努力工作，才能创造出高效益的经济，并依靠这种经济对邻国发挥有益的作用。中国方面表示理解，并希望在社会制度不同的中日两国能保持长期睦邻友好的关系。

在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大平见到了几位出席宴会的在野党首脑。民社党的春日一幸拉着大平的手说：“真佩服您的魄力，这次总选举的胜利将会是属于您的。选举之后请多关照。”说完深深地鞠了一躬。公明党的竹入义胜用手指着站在别处的飞鸟田对大平说：“由于他不了解内情，干出那样的事，结果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自民党会获胜的，今后请多关照。”

5月29日，大平总理夫妇到首相官邸出席了“充实家庭基础”研究小组举办的酒会。会上大家谈起了第二天即将开始的众参两院竞选的演说，大平带着惯常的腼腆表情说：“诸位千万不要来听我的演说，我不好意思让大家来看。”与会人员发出哄堂大笑。大平同大家随意谈起了人生道路、读书乐趣、家庭生活、人物评价等广泛的问题，在严峻的总选举即将开始之前情绪显得分外平静。但出席酒会的人谁都未料到，这是大平正芳一生最后一次出席首相官邸的集会了。

5月30日上午9时，大平总理送走中国政府代表团后，立即走上街头开始发表竞选演说。

## 第十二章 尾声——最后的辉煌

### 出师未捷身先死

5月30日上午9时28分，自民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来到自民党总部前。这里人头攒动，手执彩旗和花环的人们正聚在这里举行自民党参加众参两院同时选举的“出征仪式”。大平总理从容地走到临时搭起的台上，面对人群向上弯曲双臂，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攥成拳头挥舞着，脸上充满斗志，信心十足地向参加仪式的人们发出了投入竞选的出征命令。上午11时，他又前往新宿，声援自民党候选人安井谦，在宣传车上向过往群众高声发表了讲演：

“参议院改选从今天开始。不久，我们还要请大家同时参加众议院大选……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的斗争，在家庭、工作岗位和所有集团中都常有意见分歧，这才能创造美好的事物，发展人类生活，我想这就是民主政治之道路。”

“自民党也不例外，建党以来发生过多次争论和纠纷，但在保卫国民安全、维护生活和对日本未来负责这类大事上，未敢有丝毫误差。”

大平接着从四个方面强调了自民党的竞选方针：

第一，保卫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以前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以制止战争为背景，根据我国情况努力配备高质量的自卫能力。这一外交政策得到了83%的国民的支持。如果像社会党和共产党所主张的那样否认安保体制，那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都会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那就只能牺牲我们今天的繁荣和生活。

第二，保障国民生活。大平指出，经过自民党政府与国民的共同努力，日本成功地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所造成的困难，比起美英等国来，日本物价上涨控制在一位数以内，经济运转形势良好。与去年相比，石油制品库存增加了23%。这些事实证明，“搞活市场经济，国民认真努力，政府善于引导的自由经济体制是正确的。”大平说，日本的这种自救能力令世界各国瞠目，并受到赞赏。

第三，确保未来发展。为孩子们准备可靠的未来，保证老人们安度具有第二次人生意义的晚年。日本既无辽阔领土，又无丰富资源，“所具有的只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劳力、我们的工夫、我们的精神”。大平认为，政治就是要把这些无形的力量集结起来，以确保未来发展。

第四，首要的是必须确立政治伦理，端正行政纪律，保持政治清廉，以取得国民信赖。

大平指出，上述这些只有自民党能做到，在野党不可能做到，因此希望选民投自民党候选人的票。

大平的讲演用了约半个小时，他的亲信在看电视转播时，发现他在新宿讲第一句话时，声调便有些异常，声音仿佛是从头顶挤出来的。可以看出，这位年逾古稀的政治家已为了这次选举而竭尽了全力。结束讲演后，大平总理感到相当疲劳，一个月来连续进行的全球出访、内部斗争及准备竞选，已耗尽了他的精力，发表这样的演说真有些勉为其难。他上车时对秘书和卫士说：“太热了，喉咙也很疼。”回到自民党总部休息时，大汗淋漓的大平总理躺在沙发上，饭也不想吃，只尝了一点水果解渴。秘书想请医生来看一下，

大平说：“已经好些了，请他晚上到我家来就可以了。”助手们经过研究，打算请大平取消下午的讲演。但大平认为这会对整个自民党的竞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打算仍按原计划进行。

当天下午，大平首相又来到横滨市，计划在这里发表四次演说。助手们劝他一次只讲5分钟，但大平每次都讲了20分钟，他为了党的利益而使尽了平生最后一点力量。

傍晚6时半，心力交瘁的大平首相回到了东京濑田家中。医生立即为大平作了心电图，发觉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立即神情严肃地悄悄对志华子等人说：“有心绞痛或心肌梗塞的可能，他是一直硬挺到现在的。照这样下去，他会不行的。”接着请来几位心脏病专家，经过会诊得出的结论是：“绝对休息，立

即住院。”这时，大平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怀疑以前已经查出的心脏病可能发作了。在发表演说时，他已觉得胸闷异常，不使劲往外挤，声音就出不来。如果当时自己声称胸部疼痛，完全可以中止演说。但大平对谁也没吭一声，坚持到演说完毕。志华子也开始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她深深责怪自己没有重视丈夫的心脏病，被大平“身体结实的外表给麻痹了”。

官房长官伊东正义闻讯于晚9时赶来。协助医生们办好了去虎门医院的住院手续。为避开记者探询，用邻居的名义叫来了救护车，并决定对外宣布首相病情时，就说是“因疲劳过度而引起一时心律不齐”。接着，田中六助副干事长也从外地赶回，并向少数几位自民党干部通报了大平首相住院的消息。大家七手八脚地将大平用担架抬进了救护车，救护车飞快地驶向虎门医院……

6月1日，大平总理的病情趋于稳定，气色变好，心情安静，并开始用早餐，只是脉搏偶尔不正常，由于正在服用镇静剂，基本处于睡眠状态，睡梦中还运动手臂、嘟哝几句，来探望的孙子们说：“爷爷还在选举呢。”除了会见伊东官房长官外，所有要求会见首相者均被医生谢绝。

志华子虽对丈夫的病情深感不安，却束手无策，所有治疗事务均由伊东官房长官、田中副干事长和森田秘书官同医生商量，志华子只能坐立不安地守候在大平病床边。

6月2日，大平首相神智更加清醒，他让秘书介绍了目前选举的进展情况。这一天是众议院大选正式开始的日子，原计划大平首相应在大阪发表竞选方针。但由于突如其来的患病，大平只能在病床上请别人代传口信，希望国民支持自民党。这天上午11时，医疗小组向记者公布了诊断结果，认为“大平所患疾病是因疲劳过度引起的心绞痛。现在情况良好，病情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很小。”

6月3日，大平的病情明显好转，开始询问所关心的日元比价、物价、选举等问题，并同来探视的樱内义雄干事长进行了交谈。有关选举问题，大平对樱内说：“加重了你们的负担，要好好干，务必取胜。工作要细。”在自己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大平首相仍惦记着政局变化和党的命运，这使樱内深受感动，他一句不漏地记下了大平的嘱咐。

6月4日，在病房中安放了一台电视，医生每天允许大平欣赏30分钟的高尔夫球和曲艺节目，田中六助副干事长东奔西走，搜集选举情报，但在向大平汇报时，将可能刺激病人的事全隐瞒了下来。大家很注意让大平心绪平静地恢复健康。当铃木善幸总务会长来探视时，大平对铃木说：“医生很慎

重，我实际已经痊愈了。”6月5日，病情进一步好转。法务大臣仓石忠雄代表全体阁员探望了大平首相。但根据这一天的心电图判断，出现了可以断定为心肌梗塞的异状。这一天，大平开始病后第一次浏览报纸。

6月6日下午，内阁会议处送来一份会签文件，大平总理从病床上欠起身，在文件上签了名。7日清晨诊断时，医生提请大平道：“总理不管干什么事，都想快，今后要慢一点。”女婿森田秘书官说：“什么事都要像老牛拉破车那样干。”大平苦笑道：“是啊！”上午9时30分，西村副总裁与伊东官房长官前来探望。大平对西村说：“你站在第一线指挥吧！”下午大平浏览报纸时，看到社会、公明、民社三个在野党分别提出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的设想时，他批评说：“乱七八糟，想干根本不可能干的事情。”

大平的突然患病，引起了财界的极大忧虑。财界特别担心首相若不能出席6月22日在威尼斯召开的七国首脑会议，日本将无发言权，会使困难成堆的能源、金融等问题更加恶化。财界内部纷纷传出各种看法：“自民党进行新老换班反而好些”、“自民党分裂就不给钱”。为是否出席七国首脑会议一事，总理下属的官员与医疗小组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伊东、田中和秘书官们认为如果条件许可，首相还是应亲自出席会议，但医疗小组却坚决反对，双方还发生了激烈争吵。新闻界也对大平首相的健康状况作了各种猜测，连日来聚集在虎门医院会客室的记者们，一直想见首相而不能遂愿。他们提议首相在健康允许的前提下应亲自接受一次采访，以消除不必要的猜测。医疗小组认为在人数少、时间短和医生陪同下，首相可以接受采访。大平本人也同意了，时间定在8日上午。

会见记者前，志华子夫人给大平撤掉了毛巾被，换上一件刚刚洗净的深蓝色浴衣，请人给大平刮了胡子、理了发。大平看上去显得精神多了，与刚入院的憔悴面容形成了鲜明对照。8日上午9时24分，大平接受了内阁记者会三名记者的采访。这是他住院后第一次、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会见记者。记者们拍照后，同大平交谈了两分钟，当记者问：“住院期间您考虑过什么问题”时，大平回答“全部是选举问题”。当记者问“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大平表示，是早日离开病床，早日康复，早日工作。第二天，报上登出了大平在病床上会见记者的照片，他笑容满面，神采奕奕，许多人看到照片，对首相的健康感到放心了。

的确，大平首相的身体状况看上去一天比一天好转，他常同医生护士开个玩笑，还为前来探望的朋友吟诗作赋。而且，他已意识到保养身体的重要性。9日医疗小组会见记者时，就公布了首相本人对此问题的意见。大平首相在意见中表示，尽管病情恢复良好，但自己也接受医疗小组意见，注重疗养，暂时停止竞选游说。是否出席22日的七国首脑会议，将根据医疗小组意见慎重行事，并在17日前作出决定。

6月10日，大平首相发表了呼吁必胜的告全体党员书，向全党呼吁道：“没有痛苦就没有胜利，没有苦难就没有荣光！”6月11日，大平听取了樱内干事长等人有关全国各地的选举情况汇报，汇报时间很长，中途被迫停止。这时，大平从内心还是希望能出席威尼斯首脑会议，内阁决定派佐藤秘书官奔赴威尼斯了解会议安排情况。11日晚9时，大平服了最后一次药。

6月12日凌晨2时25分，心电图监视器突然报告大平心脏出现异常。护士急忙跑进病房解开大平的上衣使劲捶打他的胸部，此时大平已进入昏迷状态。睡在隔壁的森田秘书官被叫醒后，急忙通知在家休息的志华子夫人、

大平裕夫妇和大平明夫妇，伊东和田中也被叫到医院。这时，手术、药物和电子设备对恶化的病情皆无济于事，两名医生使足力气为大平做人工呼吸，对着大平胸部又按又敲，几乎要将他的肋骨弄断。田中六助再也不忍心看下去，对着医生怒吼一声：“停手吧！他会疼的！你们不觉得太残忍了吗？”两名医生停止了人工呼吸，原先还微微摆动的心电图指针完全停止。这时，是1980年6月12日凌晨5时54分，医生向志华子夫人宣告大平去世。志华子“哇”地一声痛哭起来，悲伤地扑向还散发着热量的大平的遗体，森田用梳子梳理大平的头发，田中六助则跪在地上抚摸大平的手和脚。但这一切，再也无法挽回已逝去的生命……

## 挽救自民党

大平正芳走了。他是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人世的。这是日本战后第一位现职总理去世，当“大平首相逝世”的讣告发布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惊。

日本政界反应强烈。田中角荣前首相说，感到大吃一惊，迄今为止，大平首相日程安排得太紧张，这非人力所能及。樱内干事长说，大平首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是国家的政务和选举一定要取胜。

日本经济界感到忧心忡忡。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说，太出乎意料，目前选举正处于高潮，国家正面临重大时刻，却失去了一位重要人物……希望自民党能继承大平首相遗志，全力以赴地对待选举，断然抛弃令人厌恶的权力斗争，努力使政治尽快重新得到国民的信赖。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说：“目前时局正处于重要时期，失去了政治领导人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首相不惜生命，为稳定政局操劳到最后一息，甚至在病床上还在挂念选举问题，自民党需要继承首相这一遗志。”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土光敏夫说：“大平先生可能是过分疲劳了，不巧得的是心脏病，实在太可惜了！自民党派系抗争的情况，希望能借此机会彻底消除，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平之死是为了消除派系而作的一种牺牲。”

国外政界也对大平首相的突然去世感到惋惜。中国对这位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和密切中日友好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的逝世表示由衷的哀悼，同时期待后继内阁继承大平首相的未竟事业，努力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美国总统卡特发来唁电：“获悉大平的逝世，感到震惊，深为悲痛”，“他是他本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是美国的好朋友，也是我尊重的朋友。我认为他的逝世是日本和全世界的重大损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唁电中说：“日本的朋友们将会记住他几年来为争取建立一个较完美的世界大家庭而作出的努力，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能够为国际留下比这更合适的遗言。”

6月13日上午，大平的灵柩被送回家中，当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两千多人参加了仪式，其中既有步履艰难的老人，也有天真纯朴的稚童，人们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前来吊唁，在灵堂外冒雨排成了长长的队伍。14日举行家葬仪式，有四千多人参加，并向大平遗体献花。

1980年7月9日，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为大平首相举行了追悼大会，有108个国家和两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六千人大会，其中美国、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泰国、韩国等14个国家派出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代理首相、治丧委员长伊东正义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回顾了大

平正芳的生平和他所作出的贡献。

由于大平正芳的突然逝世，缓和了党内矛盾，自民党反主流派也规矩起来，谁也不好意思在大平遗像前争吵了。整个自民党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投入了两院选举。自民党候选人在各自办事处里挂着系有黑绸的大平遗像，并带着黑袖章开展竞选活动。这无疑赢得了不少同情票。6月22日，众参两院选举揭晓，自由民主党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众议院，自民党获得284席，比8个月前的大选增加36席！远远超过了265席的稳定过半数。在参议院改选中，自民党获得69席，加上未改选的共有135席、也大大超过原来刚过半数的127席。走向分裂的自民党因大平的去世而重新统一，摇摇欲坠的自民党政权因大平的去世而重新稳固。在“和为贵”思想的指导下，自民党经过平静协商，推举了大平派的第二号人物铃木善幸为新一届首相，大平所信任的伊东正义担任了外务大臣，田中六助担任了通产大臣。

大选的结果，使持续了6年之久的朝野势均力敌的局面被打破，眼看就要成为现实的在野党联合政权顿时化为乌有，自民党又继续执政下去，大平正芳用自己的牺牲挽救了自民党。当然，关于这位著名政治家70年的风雨历程，28年的政治生涯，个中功过将由后人去细细评说。但无论如何，大平正芳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即“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生活比作为政治家更为重要”。

## 后 记

此书虽无扑朔迷离的惊险疑案，亦无跌宕起伏的风流韵事，但它却真实地叙述了一个贫农的孩子，如何在特定环境中，通过自身的奋斗，抓住机遇，勇于进取，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了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日本的总理职位的事迹，读后或许会令人深思，给人以某些有益的启发。

不少朋友常问我，为什么二次大战后，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能在一片废墟上复兴，并以不可思议的超常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甚至对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同时，日本政局为何常常动荡，内阁更迭较他国频繁？其实这也是长期以来著者很感兴趣的问题。我想，读了这本书后，这些一言难尽的问题，也许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答复，朋友们的疑团或许能得以冰释。因为这部传记的主人公太平正芳的政治生涯，几乎与日本战后历史发展的轨迹相吻合。同时，他也在日本战后一系列重大的内政外交决策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太平正芳一贯主张日中友好，并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本书因而在这方面着墨较多，这也算是本书的“中国特点”吧。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邹英女士、许英鸿小姐、罗绍林小姐为誊抄书稿做了大量工作。许梅先生、钱大同先生为书前照片的翻拍而四处奔波。若无他们的帮助，也许很难完成这部差强人意的书。著者谨向他们致以衷心谢意。

许晓光 1996年10月

## 主要参考书目

- 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編集《大平正芳回忆录》鹿岛出版会东京 1982年
- 大平正芳《风尘杂俎》鹿岛出版会 1977年大平正芳、田中洋之助《复合力的时代》生活社出版 1978年
- 各类报刊摘要集《大平正芳政策纲要资料》大平正芳著、辛华、雅飞译《我的履历书》北京出版社 1979年
- 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编。武大伟等译《大平正芳传》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年伊藤昌哉著、安志达等译《自民党权力斗争内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
- 吉田茂著、孔凡、张文译《激荡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 1980年日本现代评论社编孙雷门、申泽福译《昭和宰相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今井久夫著、魏复译《宰相之妻》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 1985年
- 井上清著、天津历史研究所译校《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6年
- 井上清著、天津历史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译《战后日本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2年
- 正村公宏著、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译《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福井治宏著《日本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的制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年
- 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北京 1980年
- 永野信利著《日本外务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木村武雄等著、复旦大学历史系译《日本财界集团及其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日本政府机构编写组《日本政府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
- 官坂正行著、耕夫、王之顶译《战后日本政治舞台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年
- 阿米·沙尔科夫著、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译《日本与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
- 竹内理三等编《日本近现代史小辞典》角川书店东京 1978年

## 大平正芳简历

1910年3月12日出生于日本香川县三丰郡和田村大字和田甲1082号。

1916年4月进和田村立大正普通高等小学校（现丰滨小学）学习。1923年3月毕业。

1923年4月进香川县三丰中学（现观音寺第一高中）学习。

1928年3月毕业。1928年4月进高松高等商业学校（现香川大学经济系）学习，次年接受洗礼信仰基督教。1932年3月毕业。1933年4月进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经济系）学习。三年级时参加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试合格。

1936年3月毕业后进大藏省任职。

1937年4月15日与铃木志华子结为夫妻。

1937年7月1日任横滨税务署长。

1938年6月25日任仙台税务监督局关税部长。

1939年5月至1942年7月在兴亚院任职，曾任蒙疆联络部经济课主任。

1942年7月至1945年3月先后在大藏省主计局、外资局、财务局任职，创建大日本育英会。

1943年11月5日任东京财务局间接税部长。创办国民酒店。

1945年3月任津岛寿一藏相秘书官。

1945年10月任大藏省工薪局第三课长，提出一系列财政建议。

1948年7月任经济安定总部建设局公共事业课长，提出改善公共事业的建议。

1949年6月任池田勇人藏相秘书官。

1950年兼任国税厅间接税部消费税课长。

1951年第一次访美，为进入政界作准备。

1952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第一次当选为众议员，从此进入政界。

1952至1954年在众议院担任农林、大藏委员，同时任自由党干事兼青年部副部长。

1955年任内阁大藏常任委员、经济计划特别委员、自由党国会对策委员、政务调查会财政金融部副部长。11月保守党合并后，成为自由民主党党员，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内阁部长。

1957年任自民党总务、政调会财政部长。

1958年任自民党政调会副会长。

1959年任众议院文教委员长，创立“长期失学儿童和学生救援会（黄十字会）”。

1960年7月任池田内阁官房长官。

1962年7月任池田内阁外务大臣。

1964年7月任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

1965年至1967年10月任自民党政调会外交调查会副会长、会长。

1967年11月任自民党政调会会长。

1968年12月任佐藤内阁通商产业大臣。

1970年1月至1972年6月末担任实职，但确立了在宏池会的领导地位。

1972年6月第一次参加总裁竞选。

1972年7月任田中内阁外务大臣，为恢复日中邦交作出重大贡献。

1974年7月至1976年11月任田中年阁和三木内阁大藏大臣。

1976年12月任自民党干事长。

1978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参加总裁竞选。11月27日在总裁预选中获胜，得分居首位。12月当选为第9任自民党总裁和第68任内阁总理大臣。

1979年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和党内矛盾逐渐激化的严峻形势下执政，使经济有所发展，领导地方选举获胜，成功主持召开了东京七国首脑会议。9月7日协商解散众议院，9月17日举行大选。10月7日投票选举，结果自民党受挫。10月30日，第一次大平内阁总辞职。11月6日再次当选为总理大臣，12月访问中国。

1980年推进首脑外交，先后出访大洋洲、中北美洲、欧洲各国，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5月16日众院通过不信任案。5月19日解散国会。5月30日参加众参两院同时选举，当晚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6月12日在东京虎门医院去世。

